思忆文丛

季羡林

原上草

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牛汉 邓九平/主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思忆文丛

季羡林

原上草

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牛汉 邓九平/主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牛汉 邓九平 主编

简介

　　人类思想的先驱者，为了捍卫人类理性的尊严，高昂其头颅，在血泊中站立，他们的名子可能不闻于世，但他们的思想永存，他们用生命之光照亮后人前进的道路，让我闪牢记先驱者的精神遗训，人类思想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image]

目录

声明

目录

代序

前言

首页

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

是时候了

广场发刊词

北大民主运动纪事

第一株毒草

第二株毒草

第三株毒草

第四株毒草

再谈人性与阶级性

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几句人情话

救救心灵

我们为了什么——再致沈泽宜

五四断想

这是为了反对三害

在1957年6月26日报告会上的发言

与段、江、程、丁四位先生谈话的内容摘要

急流勇退

“疯子”的话

压制不了的呼声

略谈“五·一九”

“利己主义”原理

论现行选举方式的不民主和民主方式的实行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

肃反运动论纲

论人事档案制度

再不整风中国将非常危险

发言综述

胡风绝不是反革命

论当前整风——民主运动

三害根源

卫道者“逻辑”大纲

人性的呼唤

“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

论“个人崇拜”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利己主义者”宣言

我看民主

“我的忧虑和呼吁”的答辩

关于“我的忧虑和呼吁”的说明

回 答

“广场”何罪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

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

在北大的第二次发言

我的思考

论“阶级”的发展

再论“阶级”的发展

谈谈无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

论牧羊者的逻辑

我的态度：头可断，血可流，真理决不能丢

论阶级的发展

“平等”、“民主”、“自由”颂

为历史辩护

再为历史辩护（摘要）

组织手段过时了（摘要）

让青年去独立思考

岂不令人深思

《人民日报》在一个时间内的形而上学方向

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

铲草要除根

再论“铲草要除根”和“党团员想一想”

特殊阶层，安息吧！

声 明

如此伎俩

我的发言

最后的宣言

我的自我批判

“卫道者”们看

无 题

三害判决书

一封公开信

争取社会有九十度转变

现实的社会主义并非世外桃源

论现实社会中按劳分配原则的虚伪性

政治风云

给《人民日报》的批评

又似一株“毒草”

我要问、问、问？？？

讨喜奉承者及阿谀分子檄文

告全校“右派同学”书

怎么办——对这次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

领导的艺术

党啊，我们批评你，是真正爱你！信任你

大胆向党和党员提意见

发言摘要

有关民主的几个问题

乌“昼”啼

我认为阶级分析方法已经过时了

让青年学生纯洁的头脑自由成长

怀监狱

缅怀聂绀弩

聂绀弩在北大荒

到北大荒去

回忆母亲丁玲——1957年前后

我心目中的丁玲

不该发生的事——丁玲问题经过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节录）

陈述书

关于父亲的《陈述书》

坎坷人生路

版权页

封底

代序

1957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盲点。那一年发生了什么，那一年之后出生的中国人已经很模糊。最近出版的《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运动》是迄今为止对这段历史的最全面、最直接的呈现。文丛分三卷：《六月雪》、《荆棘路》、《原上草》。这三个意味深长的意象让人浮想联翩，让人想起白居易的诗、想起含冤的窦娥、想起逐日的夸父、想起鲁迅笔下的过客。文丛汇集了大大小小的右派们的文字，而不加任何评点和阐释——呈现本身即有其价值，对事实客观的呈现体现了人类成熟的历史理性精神，呈现事实能够使后人深思：悲剧是如何诞生的？

右派们的悲剧就在于对“说，还是不说”的判断。他们终究还是选择了“说”，结果为“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或者是数十年的牢狱之灾，或者是妻离子散，许多人甚至被剥夺了生命。例如，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民主人士参加座谈会，著名学者张奚若在5月15日的会议上指出执政党存在的四点偏差： 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二，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本来，这是正常的提意见，没有料到却招致毛泽东强烈而尖锐的驳斥：“我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无产阶级之急，近劳动人民之利。难道你要我好小喜过，急错近弊？”这就不是讨论问题的态度了。这种说话的方式明明就是不让对方说话。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是忍不住要说话、在思考问题的人。他们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他们的。思路不一定周全，他们的批评可能有偏差，他们的言辞可能过于激烈，但他们绝对没有颠覆政权的意思。然而，对他们的惩罚却是按照对待颠覆者的标准来实施的。

“说”的自由，即言论的自由，是现代人权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言论自由的程度与一个国家民主化的程度成正比。公民都拥有了七嘴八舌发表意见的自由，那么民主就有了第一层保障。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今天重读当年右派们尘封已久的文字，让人感到历史的奇诡——对自由的争取，却使自己丧失了起码的自由。

《思忆文丛》编辑出版的过程，我一直在密切关注着。钱理群教授是其中的灵魂人物，他不仅提供了充足的原始资料，而且几乎参与到编辑出版的每个环节之中。

好几次别的学术活动，他都匆匆来去，说是要赶回家与邓九平先生

面谈这套书的编辑事宜。钱理群先生十分珍视这笔“不可抹煞的思想遗产”，而对于更加年轻的一代中国人来说，珍惜这笔思想遗产，也就意味着珍惜自身的自由与权利。

转自《南方周末》

前言

我们祖国是古文明国家，历史悠久。有幸历史学源远流长；尤其奠定我国两大传统文化基石的思想家，老子出身于“周守藏室之史”，孔子更著有《春秋》。太史公司马迁忍受残酷阴狠的宫刑，苟全性命，只为“述往事，思来者”写完《史记》。

那“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觉悟，多么强烈，多么令人神往。“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入于《正气歌》；“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鉴败莫如亡国”，“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格言，比比皆是。这倒的确是我们中国固有的血脉。

面对新的世纪，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思忆文丛》，献给曾经亲历和未亲历的读者，也是一片“以往鉴来”的心意。

对于收集的1957年的文章，作为“实录”，为了存真，我们基本不作文字修改（除错别字外），也不以我们的观点来取舍。我们期待的，是从这有骨有肉有血的思想资料，孕育出一大批更富创造性和智慧的俊才；为祖国二十一世纪的新发展做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贡献。

1998.8

[image]

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

钱理群

——重读北大及外校“右派”的言论北大百周年校庆庆典活动的帐幕已经落下，喧嚣过去，一切归于平静。

这正是反思的时机。——或许是受了鲁迅的影响，我特别喜欢“……以后”这样的命题：此刻想做的，正是“庆典以后”的反思。

这些日子，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北大；也写了许多——关于北大。但凭着我的直感，我们仿佛又无意地遗漏了，甚至是有意地遗忘了不少——同样是关于北大。

我想起了刚收到的一位老同学的来信，说到校庆那天，“怀了不少旧，但似乎都局限在‘反右’以前，这也难怪，后面的事不好说了……”。我懂得他的意思：在我们这些老校友的北大记忆里，原是深藏着那一段或难堪，或痛心，因而“不好说”的历史，谁愿意轻易搅动——“避重就轻”本也是人之常情……。

如果这仅仅是个人的记忆，不好说就不说，这倒也罢，生活中类似的事太多，哪能老是念念不忘呢？

但如果这是一所学校，以至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记忆呢？——我翻遍为北大百年所写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图书，竟然发现：关于1957年的这一段，在北大的历史叙述（记忆）中已经消失，变成一片空白，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不留半点痕迹（！）；仅有的一本却仍然把这段历史描绘成一小撮“右派”学生在“诬蔑”、“攻击”……，让人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无论遗忘或坚持，都令人恐怖！

我于是想起了那一本书——那是“大批判”时，校方发给每一个学生，作为反面教材的《右派言论汇集》；当时我有个收集资料的习惯，朦胧中仿佛意识到这或许将是一个历史文件，就把它小心地保存了下来（可见我大概从头就是一个“谬种”），文革后期退还抄家材料，它又奇迹般地回到了我的手中，却不料在向周围的年轻朋友炫耀中不知被谁“没收”而后悔莫及——连一本书的命运也会有这般的曲折……于是我又四处打听，寻问，终于通过某个途径找到了，而且还有好几本，真是喜出望

外！

我迫不急待地打开了书……

我首先要寻找的，是因为聚集全校最出名的“右派”而引人注目的《广场》的“发刊词”，那是可以视为这个思想群体的宣言书的——“……人与人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与观点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总之，这里——整风运动为主流的大变革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或思想意识的大革命，对一切都要勇敢地再认识。

“大鸣大放成为这次运动的精神实质。毫无顾虑地发言，为真理而作好争论，以及为证明一些新生的主张、观点，天才的创造，都将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注：原文如此）

“中国将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春秋诸子百家争鸣，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以少年事叶（注：原文如此）为风骨的、建设文学的再生，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盛（唐）般的诗的创造，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伟大的马列主义的不朽理论会得到进一步更全面更正确的运用、阐明和发挥！党会因此而更强大更有生命力！人也会因此而返老还童，而具有十分鲜明可爱的社会主义个性！

“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 北大儿女是五四的后裔， 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

“我们的刊物——‘广场’便为此而诞生。‘广场’的含意在于：北大民主广场曾是五四举火的地方，五四的先辈们曾在民主广场上集会点火与誓师高歌！

“先辈的广场已经荒芜了，我们艰难地把它打扫干净，我们愿爱讲话爱唱歌的人们一起来打扫它，整理它，使它开出一万朵美丽的花！

“来吧！朋友们！到‘广场’上来！这里有自由而新鲜的空气，它可以震动你的声带，唱出你愿意唱的个性的歌！

“我们的广场期待着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到来！”

历经人世沧桑之后，再来重读这即使掩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也依然熠熠闪光的文字，怎能不令人感慨万端！正在总结与反思20世纪历史的我们，惊喜地发现：这发生在世纪中叶1957年的当事人所说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与世纪初（1917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世纪末（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语言到思想，竟是那样的相似！——同样是集合在“重新估定价值”的旗帜下，对“习以为常”的既定观念、习惯，进行大胆地置疑与挑战；同样是呼唤人的精神的自由、创造力的发挥，与个性的解放，呼唤社会的民主与民族文化的复兴，以及背后的对民族、国家复兴的巨大期待，等等，这都是一脉相承的。贯穿其中的是“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在我看来，这是“北大精神”的核心所在，它所提供的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范式。而几乎是溢出字面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精神，更使得这些20世纪不同时期的思想变革运动的参与者，看起来像是精神兄弟；因此，当年“广场”的勇士们自称为“五四的后裔”，北大精神的传人，这是理所当然，一点也不夸大的。

或许这只是外在的印象，不足为论；那么，我们就再进一步，来比较、分析下面这些论述吧。——

●“我们的制度不健全，民主权利不够，这都是产生三害（按：中共中央当时发动整风运动，以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与主观主义，群众概称“三害”）的根源”；“目前除三害都停留在表面上，似乎把三害的根源只归结到领导者的思想意识，并没有追究三害的社会根源，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三害的社会根源是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和党团员的盲从成风。……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的原因：一，法制问题，宪法的人民权利尚未得到绝对保证。二，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由于尖锐阶级斗争而形成权力高度集中使领导与群众绝不是真正的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而是绝对服从的关系。……三，言论自由问题。……在反动帽子满天飞的时候，在政治的压力下，更可怕的是在‘对领导不满，便是反党’的舆论下，任何反面意见都遭到毁灭性的围攻，任何片言只语都可以列入肃反材料，将来有无穷后患，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民主是不存在的”。

●“主要要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来根除三害”，“严密健全的民主法制，大公无私的人事待遇制度，健康活泼的民主生活的习惯性气氛，……是最强大的现代化武器”。

●“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

●“如果有人问，你们标榜的是哪一种民主，我们答：是从‘五一九’开始的（按：1957年5月19日，北大部分学生自发贴出要求民主的大字报，当时就称为‘五一九民主运动’），在民主广场自由讲台上出现的，正在继续形成与发展的这样一种民主，不是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我们要把它巩固下来，并逐步推广到全国范围中去，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目的”。

●“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公有制名符其实，就是说公有了以后，如何正确的分配。我们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但目前问题不在于此，而是不合理的悬殊的差别。这样纵然占有公有，但实际上在分配的过程中，无形中一部分占有了另一部分的劳动”，“（由于特权的存在），在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已出现一定矛盾，现在还不甚尖锐，叫内部矛盾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指出来，如果管理、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不得到更好的完善，矛盾可以向前发展，而且基本上满足‘阶级’关系的定义”。

▲“我们过去发生的许多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解放后我们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利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也还有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了个人领导”，“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以上凡标以“●”的，都抄引自《言论汇集》，作者分别是徐克学（数学系学生）、卑超南（物理系学生）、张景中（数学系学生）、庞卓恒（系别不明）、龙英化（哲学系学生）、陈爱文、江文（中文系学生）、钱如平（数学系学生）；标以“▲”的，则摘自人所熟知的《邓小平文选》中《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今天人们不难发现，1957年青年学生的议论与1980年党的领导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或有不同之处，但一些重要的观点，例如，社会主义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与“制度的弊端”有关，必须进行制度改革；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特权，反对领导与群众关系中的不平等；主张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些认识都是一致或相似的。但正是这些基本观点，在1957年是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言论的，所有的作者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而80年代以后却成为了中国的改革的指导思想，像“民主”与“法制”这类概念差不多都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当然，这也还存在着是否认真实行的问题，但至少再也没人斥之以“反动”了。

这或许是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但这事实本身却是应该好好想一想的。

1957年是什么时候？正是我们所引述的邓小平的文章中所说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这些年轻人提出了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特权等问题，要求民主与法制，应该说是及时的，表现了可贵的敏感与先见；但也正如前引的他们自己在大字报中所说，尽管“制度上的弊端”已经引发出了各种矛盾，但“现在还不甚尖锐”，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而更不容易为大多数人所察觉与认识，于是，尽管警告已经发出，国人依然处于盲目与盲从的不觉悟状态。

这样，这些忧国忧民的“广场”上的年轻人陷入鲁迅笔下的夏瑜那样的命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必须要为自己思想的“超前”而付出血的代价。

但对先觉者的远见卓识的拒绝，更不用说运用权力对之进行“反击”与镇压，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邓小平在他的文章中所一再谈到的，由于不承认集权、特权等问题的存在，拒绝扩大民主与实行法制，进而将现行制度中的弊端推到极端，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浩劫” 。在这个意义上，有些研究者认为，1957年的“反右派”打开了“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见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这是符合实际有道理的。历史确实捉弄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性”，相当多的“右派”的批判者落入了与被批判者同样的命运，人们用他们当年批判“右派”同样的（或更为极端）的语言与逻辑批判他们，在自身陷入了同样的绝境以后，才逼出了最后的觉悟。——自然，也有始终不觉悟的，在恢复了原有的地位以后，又重新使用起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原有的思想、逻辑与语言。但毕竟还是出现了这样的历史现象：先驱者的思想终于在某种程度上被他的批判者所接受，并且在批判者手中得到或一定程度的实现——当然，批判者是在自己的利益驱动下去实现的，这已与先驱者无关，而且先驱者的历史污名也未必因此而得到洗刷，更不用说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恢复与确认，不继续“整”

他们就已经够“人道”的了。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甚至在后代人的心目中，他们依然是“有罪（至少是曾经有罪）之人”。——这样的结局，无论对先驱者自身，还是当年的批判者、后来的遗嘱执行人，都是无情而无奈的。

面对这种无情与无奈，我们所能做的，仅是指明这样一个事实与这样一种历史联系：1957年“广场”上的思考与呐喊，正是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的思想基石，正是这样一些中国民间的年轻的先驱者以“非法”

的形式，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奠定的。而在他们之后，也还有新的牺牲。——但愿在这世纪末的狂欢、表演中，至少还有人能够保留一点清醒的历史记忆。

关于这些1957年的北大学子，似乎要说的话还很多。

人们，甚至是历史学者，在谈论与研究1957年的“风波”时，往往注目于那些“右派”头面人物，特别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这大概也是一种思维的惯性吧。其实如果仔细研究当时的种种“右派”言论，就不难发现，那些“右派”政治家所关注的主要是政治权利的分配——这当然也关系着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并非完全为了私利，因而自有其意

义，需要另作讨论；但真正体现了这场风波的思想、文化上的深度与意义的，恐怕还是被称为“右派学生”（也包括一些“右派”教师、知识分子）的思考。这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前引《广场》“发刊词”就是宣称他们是“为真理”而“毫无顾虑地发言”的。因此，他们的思考，除了前文已略作分析的现实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之外，还包含了更为广泛、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问题——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法学的，伦理学的，心理学的，哲学的，等等，出现了一批着重于理论探索的长篇论文，以及诸如（自由主义者宣言》、《利己主义者宣言》这样的有关世界观与基本立场选择的宣言书。今天看来，这些讨论自然是粗疏的，但确实又是反映了时代思考水平的。——顺便说一句，这一时期，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创造的那些知识分子，除个别人之外，大都表现出惊人的“理论上的沉默”：即使是仍然保有独立思考品格的，关注的也限于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而鲜有理论的探讨；更不用说为现行权力政治作理论阐释与辩护的。

这就迫使这些尚处于准备阶段的青年学生远非成熟的理论“习作”，充任这个时代理论水准的代表，这实在是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悲哀，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职。——不过，这已是题外话。

我们还是拉回来说。或许是受着“五四”传统的影响，这些北京大学的学子们在观察与思考中国的问题时，除了前所分析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弊端之外，更关注这种制度的受动者——中国国民的反应；如前文所引，他们是把“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与“党团员的盲从成风”看作是互相关联的“三害”的社会根源的。另一位学生的文章就说得更加尖锐，他指出，“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一旦权力的集中者“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王书瑶：《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的教训》）对群众不觉悟状态的这种焦虑，显然是五四“改造国民性” 思想的继续， 这些“广场”上的北大学生把他们发动的这场思想运动称之为“启蒙运动”，大概就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他们与“五四”时期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们之间的血肉联系。可以说，他们所要揭露、批判的，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国民性的弊病；共和国的敏感的年轻人在考察自己时代的国民精神状态时，同样面对着“人”的奴化与自我的丧失。他们这样论述着自己的痛苦的发现：共和国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使人们“陶醉”，由“陶醉”进而产生“迷信”（气三一群学生：《现实的社会主

义并非世外桃园》），以至形成了对“党，国家，领袖”的“崇拜”与“宗教式信仰”（参见王书瑶前文，朱庆圻：《领导的艺术》），制造出了种种“神话”，仿佛“党，国家，领袖”具有天然的，绝对的正确性，真理性，“过去是正确的，现在是正确的，将来也就永远正确”，“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并且这种“正确性，真理性”是唯一的，“垄断”的，只要是“不同意见”，“就一定是错误的”，是“不能允许存在”的（参看蒋兴仁：《宗派主义的鼻祖，官僚主义的根基》，谭天荣：《又一株毒草》）。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种抽象的“党，国家”的绝对真理性，正确性，就变成了具体的上级领导，以至个人的绝对正确，于是，“神话”就变成了“上级的一切指示都视为圣经”（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在这样的绝对理念支配下，人们所能做的唯一选择只能是“跟着走就万事大吉”（前引王书瑶文），这种“无条件地绝对服从”不仅是“盲从”，更导致了人的工具化与奴化——一位青年诗人这样自责：“这根无形的铁链没有丝毫的强力；然而，扪心自问，在过去，我们曾多少次说出了违心的话，做了它驯服的奴隶”（杜嘉美：《组织性与良心》）。而尤其让这些觉醒了的年轻人感到痛心的是，这样的“形而上学思维方”一旦成为定势，就形成了“习惯的机械势力”（谭天荣：《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我们为了什么》）：“只要不同意领导就是思想有问题，或者可能是反党”（岑超南：《再论‘铲草除根’和‘党团员想一想’》），“喜欢思考”或“不按照规定的方式思考”，就是“落后分子”，“听说是反动分子就不分皂白地群起而攻之，就这样不自觉地，机械地，反射式的，每日每时地伤害着别人与自己”（谭天荣：《第三株毒草》），“一旦有人提出新的问题，没把问题弄清楚就盲目地加以反对”（刘奇弟：　《论当前的整风——民主运动》），以至“造成了对一切不懂的东西的无条件的仇恨”（谭天荣：《救救心灵》）。正像鲁迅当年面对着“无物之阵”一样，今天新中国有思想的年轻人又为这样的“习惯的机械势力”所包围，欲挣扎而不能，陷入了无以摆脱的困境。正是在这“习惯的机械势力”的支持与拥戴下，对“不合人们胃口的思想施予暴力”，竟成了共和国精神生活中的常规（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这样的实现在欢呼声中的“群众专政”（这正是共和国的一个专有名词），是真正令人恐惧的。当人们欢天喜地地将自己的有头脑的兄弟姐妹送上审判台上时，他（她）们自己的心灵也受到了扭曲与损伤，“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知识的贫乏，思想空虚和意志薄弱，造成了习以为常的言行不符和自欺欺人，造成猜疑冷酷和互相残害”——面对这样的新的国民性的弱点，一位“右派”学生领袖这样写道：“我看到了这一切，希望改变这一切，而又被那些诚实的人所反对，这件事对于我，更大的痛苦是不可想象的”（谭天荣：《救救心灵》）。这发自内心的深沉的悲叹，使人不能不

想起当年同样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鲁迅。于是，与1918年“救救孩子”的呐喊相呼应，1957年的中国又响起了“救救心灵”的呼唤。而人们首先要争取的，就是人所应有、独有的精神的自由，独立思考的权利，他们庄严宣告：“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允许怀疑的问题”；“任何人都有探讨一切问题并坚持自己见解的权利”（刘绩生：《我要问、问、问？？？

……》），“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不让想吗？偏要想，……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谭天荣：《又一株毒草》）。同一篇文章还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宣布我们“不承认任何种类的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或者开始证明其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其存在权利。思维和理性成了测定一切现存事物唯一的尺度”。这样的引述，自然有策略的考虑，借此使自己的主张具有某种合法性；但确也表明，这些自称“强壮而又心怀恶意的小家伙”，比起他们的批判者，那些自命的“卫道者”，是更懂得、并且真正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批判精神的（谭天荣：《一株毒草》）。他们因此而不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北大精神的真正传人；可以说，他们所发动的，是继“五四”以后又一次“新文化运动”——在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争取思想的自由，精神的解放，进行新一轮的“国民性的改造”。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胜利了，从而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以至整个民族现代化的历史新纪元；那么，1957年的这一次悲壮的努力，却是以所有参加者的“一网打尽”而宣告失败，但他们的思想与精神却事实上在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运动中得到延伸，尽管后者未必自觉意识与承认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当年所提出的问题与任务，仍然是今天的中国的改革者需要继续解决与完成的，他们当年的思考今天依然保持着新鲜的生命活力，他们思考的成果，以及思考过程中可能有的不足与失误，对于后来者，都是极其宝贵的启示，遗忘、不承认、漠视、拒绝这份浸透着鲜血的思想遗产，不仅愚蠢，而且有罪。——其实，那些“广场”上的牺牲者在光荣地倒下的那一刻是曾经预言过“明天将属于我们”

的（谭天荣：《给沈泽宜》），他们毫不怀疑：“五一九’和‘五四’（一样）将显明地留在我们弟弟妹妹脑海里，永远鼓舞着后来的年轻人”（谭天荣：《救救心灵》），他们甚至直接呼唤：“历史学家们，重视这样伟大深刻的社会思想变革吧！”

（姚仁杰：《党啊！我们批评你，是真正的爱你！信任你！》）坦白地说，读着这些带血的期待的呼叫，我的心情沉重，羞愧难言。因为

我们真的长时间地（甚至直到今天）把这些先驱者、牺牲者遗忘了！我们的历史学家（也包括我自己）失职、失责了！1957年这段历史的书写，如此的苍白，稀薄，如此的充满迷误，致使“后来的年轻人”（这正是先驱者所寄以希望的）无从了解也无法理解，这是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过来人、学者的耻辱啊！欠账总是要偿还的，我们应该有勇气正视历史的血腥气，有胆识冲破权势与习惯制造的种种障碍，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收集原始材料， 认真整理、 研究先驱者的思想遗产，总结历史经验， 建立起“1957年学”，作为现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正在进行的“中国人与社会的改造”提供思想资源。——现在“是时候了”！

在对1957年“广场”上的年轻的探索者所发动的这场思想运动，作了以上不免是粗疏的历史叙述以后，我还想关照历史运动的参预者“个人”的命运，这其实是我在重读这些《言论汇集》时，特别感到兴趣的。——我以为缺少了这样的关注，我们的历史叙述将是不完整的。

《言论汇集》中收入了在遭到“反右派运动”的打击以后，这些“右派”学生，特别是他们中骨干的反应：他们公开贴出的“反批判”的大字报与私下的相互通信，当时是作为“猖狂反扑”的罪证而留下的，却为后来的研究者保留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的逆转对个人心灵的打击，以及个人所作出的反应与选择的资料。

种种反应都是因人而异的。前文提到的张景中贴出了宣布“急流勇退”的大字报，他说：“一个月更好地使我知道了政治是怎么回事。它比我能想到的要赃得多。

我必须保卫自己的灵魂不受玷污。”《头可断，血可流，真理绝不能丢》一文的作者钱如平（笔名谈论）则表示“宁愿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自己给自己人的子弹打死，而不愿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他留下了最后的“告别词”是：“我的母亲是人民，我的兄弟是‘革命者’，为保卫生产资料公有我愿拼命，我不想超现实的好吃好穿，一切事情为人民！真实地为人民！让千千万万的农民兄弟同志冬来有棉衣，夏到有便服，饥饿在中华沃土上绝迹，工农知识分子团结万岁。”我特别注意的是，最早提出肃反问题与胡风问题的刘奇第，在写了检讨书以后，给谭天荣写了一封信，说“我是在遵照着我的良心和情感做事”，“任何勉强的分析都将是教条和生硬的，因为情感是永远不能用事实和理论来代替的”。但他仍然谈到了“一些影响我的情感的事实”：“若不检讨，家庭要与我断绝关系，物理念不成了，朋友也不要我了”。

他说，正是这些“外界力量”“影响我正视现实”：“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学几乎所有的人统统反对我，而我做的这件事情又不是科学工作而是社会活动，这除了说明我错了以外， 还能有什么解释呢？ ”他还对谭天荣的某些“信念”提出质疑：“你说群众同情支持你，现在还不乏其人，这恐怕与事实不符吧”，在“如今我国的情况”下，“工人农民都不但拥护党，而且拥护党的现行政策，来什么变革？谁要我们的小变革？”但谭天荣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他接连写了好几张大字报，一再表明：“我将逆流前进，不退一尺一寸”。（《救救心灵》）他说：“（过去）我被无形的链子锁住了，今天我摆脱了这条链子，永远地摆脱了。这——我就满足了。对于我除了火与剑的搏斗，在生活中我并不要求什么”，“对于得不到的一切，我绝不强求， 对于属于我的一切， 我决不放过” （《叫我怎么说好呢？ ——致5402186》 ）。他不无骄傲地宣称：“我今年才二十二岁还没有学会害怕，我今年才二十二岁还不懂得恐惧，我今年才二十二岁不曾有过疲劳”（《第三株毒草》），他显然坚信时间与未来都属于自己。——今天重读这些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写下的文字，我无意在谭天荣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坚守，和刘奇弟的“正视现实”与返归平凡人生之间作出任何价值判断，我只相信这都是人所有的真实的选择。而且我怀疑他们所生活其中的（也是我们生活其中的）中国的现实能否允许他们如愿以偿地实现自己的选择。因此，我关心，并且想要追寻他们后来的行踪。我要高声呼喊———

谭天荣，刘奇弟，张景中，陈奉孝，钱如平，王书瑶，岑超南，蒋兴仁，徐克学，陈爱文，江文，龙英华，姚仁杰，庞卓恒，朱庆圻，杜家蓁……，所有“右派”

兄弟姐妹，你们在哪里？这几十年你们是怎样生活的？北大百周年校庆时，你们回来了么？作为真正的北大人，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北大，以至整个中国，都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

1998年7月1日～8日写于燕北园

是时候了

沈泽宜 张元勋

（一）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

和爱情

一齐都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一见天光。

让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太阳光照耀！

我的诗

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世的藩离，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二）

是时候了。

向着我们的今天

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和花瓣！

今天，我要鸣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笞死阳光中一切的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为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广场发刊词

佚 名

伟大的整风运动以其不可估量的壮阔的波澜，激动了全中国全世界，在此就学。

“五·一九”以来已经过了这个伟大运动的第一个浪头：第二个、第三个……难以预计的高潮必然会相继而来！

这个运动已远远超出了党内整风运动的范围，而且有了伟大的社会思想意识大变革的巨大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与观点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总之，这里——整风运动为主流的大变革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或思想意识的大革命，对一切都要进行勇敢地再认识。

大放大鸣成为这次运动的精神实质。毫无顾虑地发言为真理而作好争论，以及为证明一些新生的主张观点天才的创造都将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中国将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春秋诸子百家争鸣，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以少年事叶为风骨的、建设文学的再生，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盛（唐）般的诗的创造，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伟大的马列主义的不朽理论会得到更进一步更全面正确的运用、阐明与发挥！

党会因此而更强大更有生命力！人也会因此而返老还童，而具有十分鲜明可爱的社会主义的个性！

一切都进了一步，都重新沐浴，清除掉一切垃圾，栽种下茂密的花木！

一切都只有一个结论：好得很！

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北大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

我们的刊物——“广场”便为此而诞生，“广场”的含义在于：北大民主广场是五四举火的地方，五四的先辈们曾在民主广场上集会点火与誓师高歌！

我们的“广场”是真正的“广”的“场”，是一切不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的讲坛。只要为了“真善美”，不论什么基调的歌都可以到广场上来对年青人放开嗓子唱！我们的“广场”为争鸣而开，我们的“广场”是百花齐放的地方！我们的“广场”矛头指向阳光下的黑暗！我们的“广场”又是火葬场！

先辈们的广场已经荒芜了，我们艰难地把它打扫干净，我们愿爱讲话爱唱歌的人们一起来打扫它。整理它，使它开出一万朵美丽的花！

来吧！朋友们！到“广场”上来！这里有自由而新鲜的空气，它可以震动你的声带，唱出你愿意唱的个性的歌！。

我们的广场期待着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到来！

（1957年5月）

北大民主运动纪事

佚 名

1957年5月19日， 燕园处在往日的宁静里，人们按时从宿舍走向饭厅，从饭厅走向课堂……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然而在这个平凡的日子里，北京大学的校史掀开了光辉的一页。

中午，一张红色的大字报出现在大饭厅灰色的墙壁上，质问团委会出席“三大”

的北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接着出现了“一个大胆的倡议”建议开辟“民主墙”。

要求党团领导支持，以帮助党整风。这两张普通的大字报，揭开了北大民主运动的序幕。

当晚在全校团员大会上，有人间起民主墙问题，党委崔副书记答复说：大字报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们不提倡也不反对。这引起同学们很大的不满。

次日清晨大饭厅附近墙壁上，已经被五颜六色的纸张布满。许多大字报对学小栋党的工作提出尖锐的批评或建议，并对昨晚崔副书记无可奈何的态度提出抗议。

同学们激动起来了，大家蜂涌着、奔走着、争先围着。其中张元勋、沈泽宜二同学写的“是时候了”一诗，特别引人注意。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

一齐写在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见一见天光。

让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的落在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太阳照耀

我的诗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生的藩离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这首激情的充满了战斗气息的诗，鼓舞了人们的情绪，也激起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说：“五四”的火炬是对敌人的，对人民内部就不应该再举起，并指责作者的情调简直像白毛女申冤。然而绝大多数同学都对诗作了积极正确的理解。认为诗人唱出了年青人心底的声音，刘奇弟同学并和咏一首“白毛女申冤”用北大确切的事实说明了“我的冤屈像白毛女”。关于诗的争论是运动前两天的中心之一。

当天下午出现了一张署名“一个强壮而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所写的“一株毒草”。作者在这里吹响了反对教条主义的号角，提出了许多令人惊异的观点，他并建议北大学生自己办一个综合性学术刊物。作者缺乏透澈的说理和谦逊的态度，引起了许多同学的不满和攻击。“一

株毒草”的争论又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

大字报像雨后春笋一样增多着，宿舍、饭厅的墙壁上都贴满了份“新闻公报”

统计，截至20日下午5时20分止已有大字报162张。

看！年轻人畅所欲言了！他们无所顾忌、无所畏惧说出了心中想说的一切。

看！ 另一些吓坏了。 他们一见到尖锐的批评和新的见解就惊慌失措，看成是“诬蔑社会主义”的言论。他们到处贴标语喊口号，不考虑别人提出的事实，只从习惯的教条出发，把尖锐的批评说成是“否定一切”把新的见解说成是“反马列主义”，但是，运动的步伐并没有因为这股逆流而停止，它一直浩荡地前进着！

晚饭后，新的辩论会形式出现了，大家把饭桌当了讲台，发表自己的见解，这就弥补了大字报不能充分说理的缺陷。

晚上，江书记代表党委宣布支持大字报。

21号，刘奇弟贴出了“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要政府释放他”的大字报；轰动了全校。跟着许多讨论胡风问题的文章出现了。不少人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认为根据三批材料不足以说明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双方展开了争论。

22日，大字报大量增加，由饭厅附近扩展到宿舍和教室区了。到处是辩论会、演讲台。人们沸腾起来了，许多同学要求停课参加民主运动。

当晚，在廿七斋前的一个数百人的辩论会上发生了令人遗憾的事情，一群有组织的“群众”围攻两个昨晚辩论会上说错了话的同学，出现了“肃反斗争会的气息”，质问这两个同学有何意图，施加压力。然而同学们没有让这种不良现象继续下去，经过几小时的辩论之后，情况好转了。第二天党委会在广播台广播了一封致党员的公开信，要求党员不要压制群众说话。

23号，法律系同学邀请刘奇弟等三人开辩论会，学生会特地搭了一座辩论台，并安上了麦克风。这是个大型辩论会，参加的人很多。在辩

论开始不久，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林希翎（程海果）同学上台发言。她谈到胡风问题，认为信中写我们文艺界领导者的话，不过是一种漫骂而已，不足以作为罪证断言是反革命。她还顺便谈到了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她表示同意铁托同志的一些看法，认为“个人崇拜”是由于某些具体的政治制度造成的。（她声明拥护社会主义公有制。）最后她谈到青年人应该怎样生活，说过去生活是机械公式的 尔面之后总不外“天气好”之类的应酬话。她认为我们青年应该争取过真正社会主义的人的生活，就是说，人的特长充分发展，个性真正解放，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友爱的生活。她的某些观点是不够全面的，当即遭到某些人恶意的攻击。会场秩序大乱（详见林希翎讲演过程一文）这些观点在她第二次来北大参加辩论时，得到了补充和说明。

上面所谈的只是一些特别引人注意的大事，而琳琅满目的大字报所反映的问题是更加丰富多彩的。

关于教学方面，许多人提出要求改革学制，开放全部禁书，改变考试制度，取消政治课必修制。（这一点引起强烈争论）反对盲目学习苏联，特别反对盲目崇拜苏联的教条主义（例如在苏联历史中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关于选派留学生制度，大家坚决反对宗派主义的作法，要求公开考试，并提出出国攻读希望政府支持，对于学校中具体问题提的很多，这里不详细叙述了。

谈谈同学的“无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一文，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有人认为他的一些提法是不够恰当的，但反映出的现象是令人深思的。哲四的同学提出了反对意见。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笔战。大家都承认这些现象是存在的，只是理解上有差异。

有些同学还要求学校向本人公开人事材料，防止错材料造成不良后果。要求学校党委公开交待过去肃反运动中错斗了的问题。公布某些同学自杀的真实情况和真正原因。

有人对党、团、学生会的工作提出批评很多。首先同学们一致质问党委会，为什么对这次运动不管不问不积极领导。对青年团和学生会工作不民主，提出了大胆的批评。有人认为在这次运动中学生会主持辩论会的人有意压制鸣放，偏袒卫道者，有人指出学生会不代表学生利益，是党团的传声筒。

同学们对整个国家和党的工作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表现了关心政

治生活的热情。有人对斯大林错误的根源提出了和“再论”不同的看法，有人论证中国同样有个人崇拜存在，对如何根除“三害”问题讨论特别热烈。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认为除“三害”是只针对某些领导者个人缺点提出批评，不应讨论全党和国家大事；另一种认为“三害”产生的根源不仅是某些个人思想品质不好所造成，而是和我国政治制度某些环节的不合理有关。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后一种见解理由较充足有说服力，掌握了群众，成为运动的主流。

运动已经开展几天了，北京各报记者天天来北大，而迟迟不敢报导，使同学们极为不满，纷纷提出质问，有人直接到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谈北大情况并要求支持同学们的正义行动。

26日（星期日）在清华大学召开北京市高校学校运动会，北大许多同学去清华宣传，要求大家互相支援，把民主运动开展起来。在这运动中产生的“黑格尔——恩格斯学派”派人到北京各大学进行宣传活动。

25日下午，西语系举行“三害”控诉会，发言者揭发的令人痛心的事实，引起了同学们极大愤慨。晚上电影晚会后，江书记向同学们说：控诉会是对敌人的，不能对党，要求不再举行。第二天许多大字报纷纷向江书记提出质问，认为对待严重的犯罪分子可以进行控诉。

29日在“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倡议下成立了“百花学社”。31日发表了宣言，表示在拥护社会主义前提下对任何问题都可以自由争鸣，并准备创办一学术性刊物，发表同学们的论文，这是这次民主运动中新生的鲜花。

令人兴奋的是在运动中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大胆的干预生活，表现了青年人的奔放的热情以及他们的痛苦和希望。形式多种多样，诗词歌舞赋样样俱全。

此外在运动中出现了八种油印小报，并在“自由论坛”和“百花坛”的基础上，一个面向全国的综合性的同人刊物正在筹办中。

北京各高等学校也行动起来了。北大同学正在积极支援他们。×日天津南开大学同学来信说，他们的民主运动受到压抑，学校的广播台公然说北大处于“无政府状态”“被反革命分子所控制”。北大同学为使南开同学明白事实真像（相），于6月2日组成的访问团到南开去了。

目前，考试在即，同学们忙于准备功课，运动的高潮逐渐过去了，而一些讨论重大问题的论文，以小字报形式仍陆续出版。有些同学正在积极工作，可把运动推广到全国去。

从“五·一九”到现在仅仅十几天，北大学生生活起了重大变化，过去压抑着青年的一切戒律、禁忌、偶像，教条都被打得粉碎，笼罩在青年生活中的沉滞、呆板、相互不信任、冷淡、唯唯诺诺的风气改变了，一种新的充溢着生命力的生活已在建立，年青人已经敢于无所顾忌地大放大鸣，畅所欲言了。敢于大胆地唱，大胆地爱，敢于行动，敢于创造。

十几天的生活表明了：在过去缺乏民主空气的情况下“三害”多么深重地压抑了青年的进取心，束缚了青年的创造力，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十几天的实际生活表明了，青年人对于“三害”是多么痛恨，对于民主自由的渴望是多么迫切！中央关于“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在他们积极争取下，才冲破了一切保守势力得到充分贯彻。

十几天的实际生活也表明了， 群众要想得到自由民主， 全靠自己积极争取，“恩赐”的民主是不存在的。

十几天的实际生活又表明了：一旦群众掌握了社会主义民主这一有力武器，一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都将被群众民主的洪流冲洗干尽。

这次民主运动，主要的是一次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是青年人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序幕。

“五·一九”的重大意义，将为历史所证明。

第一株毒草

谭天荣

爱菲索人中的一切成年人都应该死，城——应该交给尚未成人的人去管理。

——赫拉克利特

到现在为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离我们无知的青年还有十万八千里，我们国家没有检查制度，可是一切报刊，（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和物理学报）的编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无知，对辩证法的一窍不通和他们形而上学的脑袋中装着的无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比方说吧：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按照铁的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与此相适应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的修正义与教条主义，六十二年的绝对统治，而“再论”都把它归结为“人们的思想情况”这不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又是什么（详细论证情况请见哲学教研室印“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一文）。

魏巍写的“春天漫笔”不仅空空洞洞的自相矛盾，而且简直是神经错乱，语无伦次，却被采纳为关于“徐进问题”讨论的最后批判书。

充满了极端盲从迷信诡辩，谬误牵强附会弥缝手段（或者叫作新颖观念）的物理学已经面临毁灭，无耻的李政道杨振宁剥夺了物理学的最后一点光彩，可是物理学报还在搞什么薄板和圆柱，再不就是什么耗损。

这一切已经完全不堪忍受。

我建议：

（1）让我们北大学生自己创办一个综合性学术刊物。

（2） 建立一个学生讲座，让我们向世界证明除了那些一般地，．禁止自己思维的“三好学生”（或叫白痴，或者优秀生；或者叫“小螺丝钉”反正一样）以外，中国青年还有的是成千上万“才子佳人”，他们坚韧果断才气横溢光芒四射，他们将使国际资产阶级吃饭时丢落刀子。

你凝了一下眸

你微微一笑

你目瞪口呆

你紧锁双眉

你咬牙切齿

你点一点头。

一切都很好，只是千万不要发神经病，应该改一改那种听到一句不习惯的话，就本能地反对哪种条件或无条件反射，要不我说西郊公园比北大对你更合适，好，再见！

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1957年5月20日

第二株毒草

谭天荣

辩证法说“必须按生活的实在情形来考察生活”。我们看到生活处于不断的运动中，所以我们要把生活的东西（拿）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走向哪里？我们看到我们生活是一幅不断破坏与制造的图画，所以我们把生活当作既破坏又制造的过程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中破坏的是什么？制造的是什么？

（一）昨天二位职业的教育家向我们提出官僚主义的定义问题（关系斯大林），在我看来，在今天的实际情况下实在是再也没有比提这样的问题更无聊了。只有绝对地禁止自由思维的人，才会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什么是官僚主义，现在让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过去几天，我到天津去了一趟，一方面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游泳在友好、信任和关怀的海洋里；另一方面，有几件小事现在还像蝎子一样地刺着我的心灵：去天津的列车上我看到乘务员们不断地忙着，收拾着每一片碎纸和果皮之类的东西。她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难道列车上真需要很多人这样地工作吗？难道乘客自己不会把碎纸果皮丢在垃圾箱里吗？难道这些青年的生活不需要更充实一些吗？要知道这些无谓的琐事在消耗着人们的青春呵！

南开大学的一张标题“巨大的悲剧”的大字报告诉我这样一件情事：程京教授曾先后在美国和英国留过学，在英国得到二种博士学位，是一位对相对论有过贡献的物理学家。1949年满怀热情回国参加建设。50年遇到思想改造运动，但在南大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思想改造呢？他遭受了各种人身攻击，被别人指着鼻子骂街。这位三十三岁的年轻人的心灵受到了残酷的伤害，现在在南大的校园里，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怪人：像“夜半歌声”中的宋旦萍，每天拖着患关节炎的双腿，从事各种琐事，他自己洗衣服连肥皂也没有，这就是当年的哲学博士，这就是当年的物理学教授——程京。

在南大我访问了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先生，在我看来，教授们总是渊博而谦逊的，渊博，这就是说什么也不懂，谦逊，就是什么也不想懂，这似乎是一个法则，这一次我毕竟遇到了一个例外，雷海宗教授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对于我这简直是奇迹，他对我说在这种哲学界无限混乱的

时期，注意“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两本书在思想方法上的差别是必要的。这句话有多大份量啊。但是据我所知，他关于“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陷入停滞”的说法，被《人民日报》编辑部按了一按，希望大家讨论（或者叫作讨论，或者叫作围剿反正一样），听说因为毛主席生气了，这场戏才没有开演，一切没落阶级的鬼祟和狡猾伎俩，《人民日报》都差不多用了。他们在残害着怎样的人才呀！

很多同学写信给我，其中有封信这样写道：你是青年团员，按情按理你今天谈的问题似乎是感觉不到的你蛮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爬得很高，走得很远，不会像我们这样受到各种歧视，打击和侮辱，因此，你的行为便格外可爱。

在肃反时，我在班上被当作“反革命”来斗争，起初有人怀疑，班干部们就说他们是不相信党，我有一个好朋友给我保证，我决不是现行反革命，他们就说这是我迷惑了他、欺骗了他，迫使我为自己捏造各种罪行。于是我平常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反动言论，任何一个举动，都是反动行为，总之我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表现了我是一个彻里彻外的反革命分子，为什么事情竟会这样呢？因为群众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只有党才是正确的，非党群众要提出不同意见，那就一定是错误的，这就不能允许他存在，就应该遭受一切打击和压制，一直到他作了令人满意的检讨为止。

很多同学一在班上担任某种职位，或者有所成就，青年团干部就忙乱起来，把所有“好”的和“正确”的辞句加在他身上。在这种情形下有多少同学以职位和成绩为资本入党入团、党和团就用这样的方法垄断了一切“好”的、“对的”、“正确的”东西，在群众中党员们和团员们习惯于歌功颂德，可事实上有多少党团员习惯于党一切都好的神话，有多少领导人习惯于奉承阿谀，有多少人因对党团员有意见而被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被当作反革命来处理，有多少工作人员因为向领导上提意见而受到各种非难，有多少阿谀奉承的专家青云直上，这不是八年来的成绩吗？

你来告诉我吗？这所有一切都是为什么？

请别人不要提到我的名字，我不愿意别人提到我。

亲爱的教育家，这就是官僚主义，懂吗？别在那白日见鬼吧！把八大文件说成八个大文件，不管叫什么主义吧，这位大首长毕竟是太不中用了，而却说这不符合你们关于官僚主义定义。还有那样一些人，他们

把先烈们的鲜血和枯骨，把党中央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把毛主席的革命理论，把工人农民的劳动成果，当作自己的家私。你是不是为这些而为他难为情？什么时候人们才学会害羞呢？

去他妈的吧，甘心做偏见的奴隶的人，要他们接近真理，原来不比要蛤蟆飞上天更容易。然而他们所处的地位，也不能要求一些别的什么，让生活本身来教调他们吧！可是我们却要走自己的路。

我们要回答，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们要回答，生活走向哪里，历史走向何方？我们要回答，这一切与斯大林错误与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与南斯拉夫问题有什么关系。

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我们要想，不让想吗？偏要想，让那些一辈子不动脑筋的人去发神经病吧！他们永远说不出一句像样的话。

我们要进行冷静的科学分析，要老老实实的学习，我们要向一切人学习，学习人类美好的一切，我们要学习辩证法，坚决反对给逻辑施加暴力，我们欢迎实事求是的反对意见，用开斗争会时用的那种独裁方式来表现自己的一窍不通，实在太乏味了。学习具体分析和抽象思维吧，你们中也有真正的人。

我们“不承认任何种类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要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在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或者开始证明其存在理由，或者放弃其存在权利，思维和理性成了测定一切现存事物唯一的尺度”。

有一个聪明的人这样说过“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是现实的一切，都会成为不现实的东西，而失掉了自己的必然性，失去自己存在的权力，失去自己的合理性，于是一种新的有生活能力的现实，就代替了衰弱的现实——如果旧的东西充分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便暴力的代替”。

我们现在正处在各种发展的质变阶段。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复归、教条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复归、“三害”向民主复归。诸如此类，在世界范围内表现为反殖民主义与反教条主义两条战线的斗争。在中国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和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的相互渗透，在这伟大的转变时期，有三种力量组成的百万大军：（1）那些认识了历史必然性，为真理

而战的战士。

（2）那些无辜的被损害者。

（3）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力量。

现在要分清楚这三种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到了一定时期，他们自会分道扬镳。过早的作各种猜测怀疑是最坏事不过的。

这支百万大军在一切领域内各有自己开辟的道路，谁要拦阻就会一毫不差的毁灭。

我们——青年同学应该属于第一种人。我们有责任大力支援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我们有责任把这次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领导起来把它引向破坏性最小的道路。

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既然我们的愿望是合乎理性的，那么他早晚会实现的。如果我们袖手旁观，生活也会老实不客气的把我们留在后面自己前进，在这里是没有交情可讲的。

善良的人们过来吧！近五万的共青团员过来吧！真正的共产党员们过来吧！我们需要个性强烈的人，色彩鲜明的人，我们需要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埋头苦干的人，我们需要热情而冷静的人，心地光明的人，让那些折衷主义者去指手划脚吧！

让那些空谈家和胆小鬼临阵脱逃吧！我们却要走自己的路。我们没有权利为一些琐事作无谓的争吵，我们没有权利一分钟放松战斗，不要动摇不要胆怯，不要怀疑，咬紧牙关，在我们选择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为了那些被歪曲的灵魂，为了那些被残害的心灵，为了那些像树叶一样被践踏的人们，为了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为了让全人类走向共产主义，让我们携手前进吧！

第三株毒草

谭天荣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这几天一些无谓的琐事，转移了反对三害、争取民主的严肃斗争，事情既是这样了，我也表示一下我的看法。

一、关于我和小陈的纠纷，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调查的，因为在场的只有我们五个人，陈玉良，刘奇弟，陈奉孝，程刚和我，五个人都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还调查什么呢？学生会责难我不参加他们的秘密会议。这也不能说是我不好，当天我们借广播器受到各种阻拦，我们知道我们的活动不合学校当局的口味，任何放肆和任性都会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因此一直小心谨慎，哪里是采取粗暴的态度呢？小陈在电话中答应让我们上广播室找他，我们到广播室时，他却锁着门放音乐，我们怎样敲门他也不理，眼看开会时间就要到了，这才爬窗户进去，当时小陈大声呼唤，说我是反革命，是强盗是破坏分子，说我们要抢电台。我对他说，先别说这个吧！我们想借一个扩音器，他说不借，你谭天荣是反革命，别人可以借偏不借给你，别人怕你，我不怕，我不和你讲马列主义，我说如果和我过不去，你也不要让同学们开不成会啊：还是先把扩音器借给我吧！他可不依，一直吵吵嚷嚷还打电话给校卫队，要求立刻派人来抓我们抢电台的强盗，来抓反革命，校卫队来了之后，他立刻提到爬窗户的事情，并且力图证明第一个爬窗户是我而不是刘奇弟，至于借扩音器的事他还是坚持，我爱借就借，不借就不借，当时在场的人谁也说不服他，这时我们才不能不去找江校长，至于打人的事，我只有在听了小陈控诉之后才知道，因此我丝毫也不能帮助学生会把问题搞得更清楚。至于我们当天对学生会，团委会，党委会和江校长的粗暴态度，好不好请你们自己来叙述一下。顺便提一句，我的记忆力从来没有欺骗过我，它对我永远像猎狗对猎人一样忠实。对于各种抗议，警告和人身攻击， 我都沉默地忍受， 我有自知之明，根据不成文的规定，既然已经宣布我是“右派分子”那么我就该受到各种凌辱（或者叫做严厉的批评）这是我的本份，我只希望不要再为这件事情麻烦我。对于程刚，我既不责难，也不要求，我只是建议你：在任何场合下都要爱惜自己的心灵。到现在为止我对于“忠于职务”的小陈没有任何意见，因为我有理由怀疑，小陈不借扩音器给我们，仅仅是由于任性，可以不可以提这样的问题呢？偏偏是我们借扩音器的时候，是谁给小陈以掌握扩音器的全权。

对前天物四（原第六班）的一些同学对证刘奇弟事件真相的大会，我有一点意见，现在是一场严肃的整风——民主运动，由于习惯的力量在阶级敌人被基本消灭以后，我们就把阶级仇恨转加在“落后分子”身上，用对敌斗争方式，伤害了很多自己人，似乎过去喜欢思考的人大都成了落后分子，其中很多就被斗争过，其理由常常是：你为什么不按照规定的方式思考，很多同学养成了不思考的习惯，听说是反动分子就不分皂白地群起而攻之，就这样不自觉地，机械地反射式的，每日每时地伤害着别人和自己，而那些受委屈的同学却容易把所有这些同学都当作有意伤害自己的坏人，这样就激起了偏激的对抗情绪，发生了一些无原则的纠纷，使我们放过了真正之三害分子。不要忘记，正是他们在我们中间散布着仇恨和猜疑，正是他们在制造着愤怒和绝望，正是他们在破坏我们团结和友谊。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更多地谅解和信任吧。

过去我们有过误解，有过一切非同志的态度，有过互相残害，这是生活本身的悲剧，谁也隐没不了，我们主张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来重新探讨一下过去的成绩和缺点，重新安排我们的生活，这需要大家努力，按情理说过去的积极分子应该做更多的努力。你们过去太自信了，你们的优越感是隔离落后分子的长城，现在该改变一下这种作风，要不，生活也许会向你们索取更高的代价，那时谁也帮助不了你们。

前天的对证会实在太无聊了，刘奇弟的问题，他是不是反革命分子，他是不是应该坐牢，在处理他的问题时是不是有过违反法制的行为，可是主持会议的人却仅扯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黄正中作了两个小时的报告详细地叙述了你们如何照顾刘奇弟，而刘奇弟又如何的胡闹，想想吧！正当刘奇弟讲出一些社会问题时，你们却从生活小节方面攻击他，这是多么别致的照顾啊！他被看管在二十四斋时，一个青年团员曾经是他的监视人，我知道这种照顾有多么的虚伪有多么冷酷，有多么残忍，你们说他被捆过三次，这是算什么意思呢？在二十四斋一天就要捆好几次，难道人们可以说话吗？也许一切都很正常，只不过我不懂而已，你们给我解释解释吧！真的你们也太高贵了，刘奇弟爱好音乐，他作曲他指挥合唱队，这也是你们的照顾，照这么说他活着也是你们的恩赐了，为了什么对人这样不平等呢？其实没有你们我们会玩得更好，也许让我们试试吧！只要人们不过分阻拦我们就能立刻证明我们这些落后分子同样懂得生活，我们这些右派分子不仅会战斗而且会娱乐。

刘奇弟小时因为不懂事，一时疏忽使他敬爱的先生被捕了。后来他知道这位先生是个地下的共产党而且被枪杀了，他的心里很难过，希望告诉一个他所信任的人，当他把自己的过去告诉一个他能信任的人，他

把自己的过去告诉一个女同学。希望她交待时她却不仅拒绝交待，而且把刘奇弟信任她才告诉她的材料向全班公开，还有比这更难过的事吗？他期待最低限度的信任，期待哪怕一分钟的温存，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友情，可是周围同学都“十分恐惧”，人们到了这个时候神经十分紧张，力图摆脱当时的处境，既然从好的方面摆脱是完全无望的，那么他不惜做一些坏事情来刺激自己就不难理解。所以按理说他反常的言行用不着医生来判断，当然我也不要求你们理解我只想建议你们平易近人一些不要过分盛气凌人，如果你们友好地对待我们，我们将还以十倍的友情。

二、关于我们去天津的事情我很满意，交了不少朋友，也结了不少冤家，不管人们怎样削弱我们的影响，我们还是到那里都掀起了新的大字报高潮，支持我们的信件至今还像潮水一样涌来，我们是应各校学生会邀请发表演说的，说的都是一些政治见解和学术问题，说要查一个水落石出未免没事找事，江校长说什么国有国法，校有校规之类的话实在没有什么道理，我们没有犯法犯规，在这里我用共青团员的话告诉你不用转弯抹角，采取实际措施吧；对于我威胁是绝对不中用的，就像对于现代物理学我们可怜的哲学家们显得绝对不中用一样。

我今年才22岁还没有学会害怕，我今年才22岁还不懂得恐惧，我今年才22岁还不曾有过疲劳。

四、最后该允许我对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人说几句话。为了满足校内校外部分同学的要求，我们现在想出一些油印小册子。问题在于现在极端缺乏经费和人手，过去印出的那些是我们献出我们可能献出的一切，坦白地说是经过不顾死活的努力才印出的，现在得重新组织力量了，我们用预定的方式来收集经费，我们欢迎捐款和义务劳动。现在暂时由我来负责任。愿意预定捐款或参加工作的同学可以在每天上午10～ll点，晚上9～10点来二十五斋342号来找我，这是我们大家的工作，我们不会忘记在困难的日子里帮助过我们“患难之交恩情长”。但是我们不向任何人乞求帮助，“生要站着才生”“死要站着才死”让那些嘲笑者见鬼去吧！

我们都要走自己的路！

第四株毒草

谭天荣

“五·一九”运动结束了。

从北大的民主空气最活跃的那一天（江隆基语）开始的这些惊心动魄的日子结束了，在一个相当长期内将又是欺凌与忍耐压服与屈从叫嚷与沉默的相互渗透。总之， 仿佛同“五·一九” 以前的阶段的复杂。为此，“胜利者”江隆基作了一个“初步总结”得到了不少的掌声。与此相应，另外还有些人不同意，作为一个“右派分子”我愿意以我自己的方式对这次运动作一些片断的判决。

（一）“五·一九”这是一个光辉的日子，在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中国青年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力量，看来是那么强大的习惯势力在他们面前表现了多么可怕的贫乏与卑劣呵——习惯势力的代表们在他们真理与正义的呼声面前，难道比老鼠在猫前更勇敢吗？他们在理性与法制的呼声中，难道比鱼在空气中更有生命吗？

他们在民主与自由呼声之下，难道比冰雪在太阳照耀之下更坚强吗？可是看看，我们“右派分子”吧！大字报中激动人心的语句、辩论会上钢铁般的逻辑力量，实际工作中那种中国式的刻苦耐劳，斗争会上，面临凌辱的从容的风度，以及在他们个人独处时平静的心灵，哪来的这样蓬勃的生气呀！哪来的这种永远不枯竭的精力呀！

还有比这种无比的灵魂天真，这种随时随地创造奇迹的信心，这种对于一切事物——即使它是难苦的——爱好更美妙的东西吗？然而按照生活的意志，他们暂时地退却了，如果把凡是受批判的人都算作“右派分子”，那么，他们的表现远不一致的，他们的遭遇也不一样。

在他们面前既不是喷射死亡的机枪，也不是各式各样的法官，这是一种别有风趣的考验，他们面临着的是对逻辑施以暴力的批判，拙劣的捏造下流的人身攻击，还有那些正直的轻信者的反对和来自外面的敌人别有用心的捧场。

对于这些面临决战的战士，这是一次必经的考验，生活就是这样地挑选着它所需要的人。

有些人在这运动中受尽了迫害，可是却为自己赢得了平静与骄傲，却避免了损失。

有些人饱尝虚荣心被蹂躏的痛楚，孤独的折磨，为自己的名声和出路而坐立不安，可以留下的，只是被生活遗弃后，那特殊的作用。

然而，也有这样的人，运动毫不留情地在他们肩上留下各式各样的考验，而他们熬了过来，忍受了接二连三的打击，既不违背名节，也不冒犯良心，更不吝惜神经与勇气。

呵！“右派分子”——人类的傲骨。

（四）如果承认“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那么，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就不得不承担，负起对这“五·一九”运动的起因作历史分析的责任了，他们可以一般地分析，近年来人们大脑结构的变化，也可以特殊地研究某个右派分子神经系统的奇异特征，在他们得出结论以前，我想从一个相反的立场出发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五·一九”运动是全国范围的整风——民主运动在北大的表现而中国的整风——民主运动是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反映，教条主义是列宁逝世以后，整个一个历史时期，苏联整个民族的特征，它贯穿于各个阶段，渗透入一切领域，教条主义产生于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相对闭塞的条件和与此相适应的局面（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肃反、文化革命、卫国战争）而不是全面资本运动、工人运动的全景——如马克思、恩格斯所研究的，世界性的宗主国——殖民地体系，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如列宁所研究的问题的对象，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这一否定是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的转化，修正主义是教条主义自身的树立物，它们寓于同一对象，没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作过比斯大林更多的“修正”。

教条主义的一般表现可以用哥穆尔卡同志的话来阐明。

“执行六年计划的实践是在某些挑选出来的部门，集中了最高限度的投资，而没有考虑到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但是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不能牺牲某些部门，而对另外一些部门过分偏爱，因为失去正确的比例，会使整个经济受到损害……“要管理国家就需要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信任他们掌握管理国家的责任的代表，这是代表劳动群众行使权利的道义基础，只有在对给予信任的人尽了义务之后，才能再次得到信任，失

掉了工人阶级的信任，意味着失去权利的道义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国家也是可能的，但是政府一定是不好的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一定是建筑在官僚主义基础上的，建筑在违反法治的做法上的，建筑在暴力之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最广泛的民主，而这种实质在这种情况却去失了它的意义……

“个人崇拜不能仅仅限于斯大林个人，个人崇拜曾经是一种流行于苏联的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经移植到所有的共产党，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个人崇拜的实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产生了一个个人的和层层崇拜的阶梯，每一种这样的崇拜都包含它发挥作用的一定领域……在波兰，也发生了这样悲惨的事实，当时有一些无辜的人被弄死了，只有许多人（其中包括共产党人）常常被监禁许多年，虽然是无辜的，许多人遭受残暴的酷刑，恐怖和道德败坏的现象盛行，在个人崇拜的土壤上，产生了违反甚至取消人民政权的最深刻意义的现象……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国内版的贝利亚主义。贝利亚主义是和它的一切总的变相成为个人崇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贝利亚主义这是用挑拨、血、监狱和折磨无罪的人来写下的一页”。

这种现象，在中国也有，只是程度不同，这就是我们要反对的。

当社会主义突破一国范围进入世界体系时，需要重新全面地分析问题，表现为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就暴露了自己的局限性，按照思想意识落后于客观形势的惯例，这种历史转变要求人们付出极高的代价，这就是南斯拉夫问题和波匈事件，中国的整风——民主运动表现得特别温和，因为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要求共产党在一定的程度上掌握辩证法，克服教条主义。

（三）一切过程都有两重性，货币之转化为资本其反面表现就是劳动力之转化为商品，资本的生产其反面的表现是使用价值的转移，在物体的相互作用中主动的作功永远伴随着被动的受反冲，物质的渗透永远伴随着运动的渗透。

整风——民主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实质上是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后者是由前者派生的，是前者的反面表现，与此相适应的是：整个过程贯穿着两种力量，保守与革命的相互斗争。

自然界到处都是相互对立的两极，它们处于统一体中，其相互作用以及到达极端时相互转化决定着自然界的生命，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从产生到消灭无需要经过三个阶段，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按照这种观点看问题，就可以消除“右派分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觉。

在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领导下也是苏联共产党，在赫鲁晓夫领导下，还是苏联共产党。1948年以前建设社会主义波兰的是“统一工人党”，把哥穆尔卡同志下监狱的也是统一工人党，用秘密投票一致通过哥穆尔卡同志为第一书记的，还是统一工人党。

我们热爱的党是不断革新，不断变化的党，而这种革新和变化是一个政党根据自身的要求发展的，这种革新和变化就是保守力量与革新力量的相互转化，而这两种力量通常都称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我们反对这种倾向：领导者把工作中的一切差错和弊病，加以各种粉饰和弥补，完了就归之于党和制度，说这是党的意志，说这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措施，如是对任何一种现象提出与某个领导者不同的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四）我按照我意识到的历史使命工作和战斗，我的一切行动自己负责，我不会受任何人利用，至于和我执有同样观点的人或有相似意见的人，无论是他们的个人品质和社会关系，我都没有兴致去研究，如果台湾和美国兴高采烈，那是他们的事，他们从来就是这样愚蠢的。

（五）冬天如果来到，春天还会远吗？

再谈人性与阶级性

谭天荣

常常涉及学术问题时，我的论敌就用文雅的谩骂，来炫耀他们的一窍不通。这些可怜的卫道者，说了半天，简直什么也没有说，你这篇文章倒有点意思。这么说，我愿意和你谈一谈。

你似乎认为我否认人的阶级性，　　　这是一种误解，你看过我写给5302041同学的公开信没有，关于无产阶级的立场问题我说得很清楚，你呀！应该再虚心一点，学术讨论可不比开斗争会。

好吧，言归正传，恩格斯说："道德上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一个普通的命题，他说善与恶的相互作用推动历史前进，可是在任何历史时期这种善与恶的相互作用都表现为阶级斗争。因此善与恶的对立存在于阶级关系中。这不正是毛主席说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吗？在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是新生的、上升的、日益壮大的力量，而资产阶级刚好相反，是腐巧的、下降、日益没落的力量。这样，无产阶级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而其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才是客观真理。这完全是可以论证的，而忠诚于革命伟大的实践家并且略识辩证法的刘少奇同志在这问题上恰犯了错误，他认为"善"与"恶"没有客观标准，"剥削者认为善的，被剥削者认为恶"，这显然是相对主义的胡说八道。

现在，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反殖民主义和反教条主义两种运动实际上是支配着一切。善与恶的对立也体现在这两种运动中，在这种意义上说来，周大觉关于领导者阶级正在形成的论点，是可以考虑的，他写道："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是：阶级是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及多寡各不相同的几个巨大集团" 。 现在我们看到领导者已经完全具有定义所提到的条件。

（1）　在生产体系中处于领导地位不进行生产活动而靠进行管理活动获得经济上的优势。（2）对生产关系来说，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3）劳动组织处于支配地位，它是控制的人最积极手段。（4）领导者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

在周大觉看来，现在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领导者与群众的矛盾，具

有阶级矛盾的性质，我觉得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运用的一次尝试，如果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就用不着害怕异己的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客观真理，而不是宗教呵，自封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禁止别人说话，这种作法本身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关于领导者阶级的问题，我想引哥穆尔卡的几段话，也许对澄清问题的实质有所帮助。

“要管理国家就需要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们信任他们的掌握管理国家和责任的代表，这是代表劳动群众行使权利的道义基础，只有在对给予信任的人们尽了义务的条件下才能再次得到信任，失掉了工人阶级信任意味着失掉权力的道义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国家也是可能的，但政府一定是不好的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一定是建立在官僚主义基础上的，建筑在违反法制的基础上的，建筑在暴力之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最广泛的民主，而这种实质，在这种情况下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个人崇拜不能仅仅限于斯大林个人，个人崇拜曾经是流行于苏联的一种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经移植到所有的共产党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个人崇拜的制度实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产生了一个个人的和层层崇拜的阶梯，每一种崇拜都包括它发挥作用的一定领域”。

“虽然个人崇拜制度是在苏联产生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把波兰所发生的一切弊病的罪咎都归在苏联共产党或苏联身上，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国内版的贝利亚主义，贝利亚主义和它一切总的变相成为个人崇拜制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贝利亚主义，这是用挑拨，血，牢狱和折磨无罪的人来写下的一页”。

在波兰事件以前，我们可以设想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可以这样说吗？然而在波兰哥穆尔卡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可以不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不有一次波兰式的变革，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有些右派分子，反对无产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还有民主集中制，这也许是因为这些术语完全或者部分地失去了原来的含义变成了领导者的“行话”。如果按照这些术语的本来含义去理解，我想他们一般是不会反对的。

好吧！理论就谈到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个问题，你说我看不懂荀

子，我并不否认，我的古文学得很差，我只是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应该叫做十诬蔑书或者叫做十歪曲书）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看懂了一点，我觉得中国古代哲学家十分精通辩证法，正像郭沫若对辩证法一窍不通一样，将来我还要好好学习，至于“聊斋”我也有些地方不懂，不过也很欣赏，比方说有这么一段话：“视之美，近之，微笑，招招手，不来，亦不去。”这种惊人的难以置信的中国式的简洁和美丽的句子把我引向了一个神秘的精神领域，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它。

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谭天荣

一切现实的皆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皆是现实的。——黑格尔存在的一切，都是应当灭亡的。——歌德辩证哲学也有它保守的方面，它认为认识和社会关系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对于相当的时间相当的条件来说，都是正当合理的，不过，这一理解方法的保守方面是相对的，而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恩格斯我们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获得了一致好评，在我看来，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是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立场出发，我们的具体分析基本上也是正确，但是，在思想方法上，却是形而上学的，因此在观点上，就不能不是唯心主义的，这说明到现在为止，我们党没有真正自觉地掌握唯物辩证法，在这里，我想提出我的意见。

我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人们问道，既然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是正确的，为什么又发生斯大林的错误呢？回答是，“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情况，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也是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了主观主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难道这算是什么回答吗？

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马克思的名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判断仅仅提出而没有解决问题，仅仅描写了而没有说明现象，我们的全部论证在逻辑上不过是同语反复，斯大林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斯大林犯了错误，个人崇拜的产生是因为个人崇拜的流行，如果稍微彻底一点想一想，就会伸延出无穷无尽的谬误，这正是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特征。

在我看来，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用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来说明，正如落体运动不能用物质结构来说明一样，正如商品价格不能用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说明一样，也正如匈牙利事件不能用匈牙利的国内政治生活来说明一样，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只能从决定着人们意识中两种世界观——辩证法的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矛盾运动的阶级斗争历史条件中去寻找，我的初步结论是这样的。

当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运动与工人运动向理论界提出问题时，需要了解全世界的经济生活与社会面貌，要求对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进

行透视，因为要求全面分析也就要求人们掌握全面分析问题的武器，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而这种思想方法本身也是一种科学，需要人们去寻找去发现，当时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古典哲学，已经为唯物辩证法的发现，准备了条件，完成这一切任务的是马克思，之所以由马克思来发现，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如果没有马克思，那么德国工人狄慈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伟大人物是互相排斥的，比方说历代集辩证法之大成的大思想家，亚历斯多德、斯宾诺莎、黑格尔和恩格斯只能有一个，百代而一怪，似乎是有道理的。

当人们去分别发动工人运动时，大家都只看到自己的国家，“只见个别的树木，不见整个森林”因此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占了优势，因此产生了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考茨基就成了不可救药的牺牲者，关于这一点，斯大林说得好，“考茨基反对他人攻击第二国际而替第二国际辩护时说道，第二国际各党是和平的工具而不是战斗的工具，所以他们在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革命发动时期，就表明自己无力采取什么严重办法，这是完全对的”，而这正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作为第二国际的领袖，考茨基可以始终是一个忠实的士兵，像我们的瞿秋白同志一样，但是修正主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本身的第一次否定，转化为自己的反面——修正主义。

当资本主义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时无产阶级开始组织武装斗争并开始夺取政权时，又一次向理论提出了新问题，要求再一次分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生活与社会面貌，重新配备阶级力量。总之，要求重新全面的分析问题。这就是说，要求人们重新掌握唯物辩证法，是谁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呢，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他们都是俄国人，这是“因为俄国当时是所有这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因为俄国当好孕妊的革命程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所以只有俄国才能解决这些矛盾”（斯大林语），于是列宁主义诞生了，辩证法以新的形式新的内容战胜了形而上学，否定之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造性的劳动， 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但是不仅普列汉诺夫而且是列宁，也局部地能“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他那哲学笔记中承认黑格尔的许多哲学命题，他不懂，这就是说，既没有接受也没有批判，在恩格斯的著作中，这种情况是没有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几乎包括了黑格尔的全部哲学命题并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在列宁的名著“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许多命题，特别是物理学的命题是错误的，在恩格斯的著作中，这种情形也是没有的（甚至在恩格斯早期作品“自然辩证法”

中一切概念判断都已经被新的自然科学发现所证实，更不用说反杜林论，一切关于恩格斯提出的原理已经过时的论点，在我看来，这是胡说八道），这可以用列宁不得不在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来说明，人们的才干是取决于社会的要求的。

到了我们的时代，苏联不得不在一个封闭的孤岛上建设社会主义，形而上学之否定辩证法是绝对必然的，在列宁同志“未发表的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倾向已经开始和第二国际时的和平环境相反，这时苏联是处在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所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能采取修正主义而只能采取教条主义的形式，即使列宁现在还活着，我们称为个人崇拜的基本历史情况决不会因此改变，斯大林是一个坚强而纯洁的无产阶级战士，他战胜托洛斯基和布哈林，决不是偶然的（虽然，在我看来，不能认为托洛斯基和布哈林，一开始就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因为他有超人的才干，这种性格，对于“认识和社会关系的这一发展阶段和对于相应的时间，是正当合理的”，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加里宁比斯大林在理论水平上要高出百倍，但是他也没有——因为不可能而没有——改变斯大林的路线，所以在我看来，把错误归斯大林个人是不公的。

当社会主义超过一国的范围而变成—个世界体系时，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就暴露了出来，恩格斯曾说，无论在某个多么宽广的领域中（宽广的程度要看研究的对象）形而上学的思惟方法，是如何的合用甚至必要，可是迟早要遇着一定的界限，在这一界限之外，它就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思维方法，而陷于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这就是斯大林的悲剧，这就是匈牙利的悲剧，这也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剧，在这里产生多少误会啊，我说我们应该更少地责难苏联，南斯拉夫或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从今天开始，我们应该更冷静地分析我们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局势，生活是残忍无情的，正因为如此，生活才是无限美好的，让我们来重新建立美好的新生活吧。

几句人情话

谭天荣

有部分同学听说我对某些问题有些别致的见解，很想看一看我的作品。我写的“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一文，也有部分学校的同志们向我索取。在这里，我想给校行政和党委会提两个要求，①请给我一间房子，让我把自己的作品展览一下，也许至少在一些自然科学的探讨中，没有什么危险吧。

②借铅印机给我印一下，把“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印成小册子，我愿付出任何代价。

为了说明一些从小积累的问题，我曾痛苦地思考过，看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思想家的一切我能找到的经典著作，现在到底整理出一个眉目来。所以，我写的这些作品，虽然谈不上什么创造，毕竟是诚实劳动的结果，我真心地渴望实事求是的反对意见，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轻心的反对意见，我已经习惯了，所以也不介意。

我是从物理学本体发现辩证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现在哲学已经江河日下，一切科学在形而上学的统治下已经面临毁灭，一些著名的学者，例如周培源、钱学森、华罗庚、郭沫若、艾思奇等，在哲学科学和常识方面存在多么可怕的空虚和混乱啊。

紧接着，我意识到，全世界面临一次空前的变革，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两支大军在不同领域内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学生运动不过是一次世界规模的民主运动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视着中国，中国注视着青年学生，青年学生注视着我们北京大学，所以我们没有权利放松自己的战斗。

在我看来，现在有三种社会力量已经形成了一支可怕的百万大军。

①认识了历史必然性的战士们；

②那些树叶一样被蹂躏的人们；

③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人民的魔鬼们；这支大军在为自己开辟道路，谁要是阻挠，就是毁灭，一丝一毫也不差的毁灭。

我们青年学生应该是第一种人，我们有责任把这次运动引向破坏性最小的道路，要知道，工人和农民不见得会采取写大字报的形式，让我们行动起来吧。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社会主义民主万岁！

马克思主义万岁！

自由、民主、理性、人权万岁！

救救心灵

谭天荣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国际歌最近加于我的一切，我都不想置辩，因为在我看来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按照规律来发展，为了人们的心灵，我写这张大字报，这是合理的。由于各样的原因，有人把我的动机往最坏处想，这也是合理的，一切都会改变。明天，人们将以信任代替猜疑，以友情代替仇恨，以平等代替欺凌，以真诚代替欺骗，这还是合理的。

自从恩格斯教给我这种指导思想后，我就永远战胜了意气、消沉，我微笑地工作，我微笑地战斗，必要时我会含着微笑倒下去。在我还有权利写大字报时，为了人们的心灵，我愿意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观点：
一、关于青年工作：首先让我们回忆回忆往事吧，解放前，我们唱，山那边好地方，解放后，我们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时我们的心里感到解放快乐，自从开始经济建设以后，青年工作的组织方式和活动的内容渐渐落后于生活的需要，强迫命令多于说服教育，行政措施多于青年活动。许多干部僵化了，脑袋对付不了复杂的生活现实，就采取禁止一切思维活动的措施，除了扣帽子以外，他们已经没有别的本领了，现在立场这一术语已经成为理穷词尽，用来搪塞的万能方箋，所谓“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等等都成了人们不去分析他们不懂得的新鲜事物却又为说明他们而胡乱搬用的空洞词句。于是有多少不能说明的现在，便有多少种不同的主义，而生活中的一切变化，一切运动，一切破坏和创造，一切新生和毁灭都被仅仅翻译成含义模糊的各种术语了。这样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知识的贫乏，思想空虚和意志薄弱，造成了对一切不懂的东西的无条件的仇恨，造成了习以为常的言行不符和自欺欺人，造成猜疑冷酷和相互残害。我看到了这一切，希望改变这一切，而又被那些诚实的人所反对。这件事对于我，更大痛苦是不可想象的，现在最可怕的偏见是，许多人以为听到了一句不习惯的话就发一顿神经病就算是站稳了立场，以为只认为谁出身于不光彩的阶级就永远是落后分子或反动分子才是阶级分析，其实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稍有一点常识就不会这样想了。列宁说过，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能够掌握无产阶级千百万人的心灵，是因为马克思凭借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固基础，马克思研究过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便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引向共产主义，而且主要的，是他唯一依据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

的最确切最縝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的领会以往科学上所贡献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凡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来审查过，任何事物也没有忽略过去；凡人类思想所树立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并且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检验过，于是就作出了那些为资产阶级狭隘性限制或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可见无产阶级立场不能是自封的，要真正能站稳立场，必须懂得一点道理，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全面利益和长远利益。我还是坚持没有确定的性格，没有对生活现实前后一致的见解，没有逻辑思维的习惯，所谓“站稳立场”不过是一句赤裸裸的废话。同样，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没有辩证思维的能力，没有无私纯洁的心灵，所谓“阶级分析”不过是自欺欺人。谁是真正的战士、谁是可怜的应声虫、谁是无耻的叛徒，让生活本身来裁判吧，我无条件地相信，中国青年——是那样的人，在前方他们是黄继光，那样勇敢，在后方，他们像刘胡兰那样的勤劳。现在在整风——民主运动中虽然他们是空手赤拳在搏斗，他们也绝对不会害怕，因为他们有一颗钢铁的心。

二、关于几个理论问题，我说过我拥护作为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制度的具体形式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其他什么的，我只是在随便聊天时提出过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从来没有说过要反对。有人对我说的一切都要探讨十分反感，可是正是这些人，在马列主义基础第一次课堂讨论时颇有体会的发言，马克思主义不怕反驳。比较一下他们的言行，倒是一件有趣的事。

现在很多历史分析，在我看来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些外行，关于再论中的唯心主义观点，我在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一文中已经批判过。三害分子对这篇文章像生了病的耗子一样害怕，事实上，现在的历史科学贫乏到惊人的程度，人们用千篇一律的公式来搪塞一切历史问题。就说匈牙利事件吧，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是帝国主义进攻呢？还是党犯错误是事件的主要原因，从科学观点来看这种争议是毫无意义的，帝国主义的挑拨和党的错误，在任何国度，任何场合，任何事件都是理由，正因如此，这些因素（字迹不清）在任何国度，任何场合，任何事件都不成其为理由，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为什么偏偏在匈牙利，偏偏在1956年发生了流血事件呢，我们并没有从这种争论中增加一丝一毫的知识，用哲学的术语来表达，我们可以说这种争议没有揭示出矛盾的特殊性。想想看，如果你进城去了一次，有人为了是到城里去有条公路，还是公路上有汽车来往是你进城的主要原因争论不休，你会怎么想呢？要知道这种争议之所以乏味，正是因为无论是公路还是汽车的存在，都没

有把你进城这件事的“矛盾的特殊性”揭示出来。

我说过“毛泽东思想”是形而上学到辩证法的“稳定的，缓慢的，然而是切切实实的过渡”，我说过刘少奇同志作为一个革命者，我是敬爱的，但是他对辩证法最多也不过是个半通，我说过康生、邓小平报告中充满了保守的自满的情绪，我说过胡耀邦同志的思想十分混乱与空虚，我说过党中央在某些历史分析中表现得过分愚蠢，在我看来，他们的理论水平的确不高，除了进行理论分析以外，谁又能用别的方法来说服我，对于我，只有恩格斯才是绝对权威，这是我自己的事谁也管不着。

历史上有过恩格斯，曾经是我活下去唯一的理由，依萨可夫斯基的诗句可以表现我对恩格斯的感情，“任凭我陷进了泥沼，任凭我冻僵在冰上，只要你吩咐我一声，任何的艰险我便又能经过”，正是恩格斯教会了我怎样生活、工作和战斗，自从我在书中认识了思格斯，我便永远地战胜了意气消沉，如果我能够活下去，我便要把自己培养成恩格斯那样柔韧，坚定而又深远的人。

三、关于我的所谓“反社会主义言论”我曾写过各种稿件给各式各样的报刊和名人，大都石沉大海，当我请教名教授们时，他们的态度大都是“我不知道你写些什么，因此，我不想看你的，又因为我不想看你的，所以也就不知道你写些什么，由此可见，你的确是毫无意义的，完全错误和荒谬绝伦的。”这使我很苦恼，不管别人怎么想，我还是觉得我有责任把我的智慧献给处在困难时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献给全面危机中的科学界，献给多灾多难的人类，献给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我觉得我没有权利沉默，为了引起人们注意，我有意说了很多偏激的话，关于这一点，我不止一次地和石幼珊交代过，现在有些人都用这些来非难我，而且还按照他们的意志作了不少的修正，经过巧妙的摘引、安插和修饰，经过更巧妙的说明和引伸，似乎对我说过的话都特别感兴趣。更有趣的是，我过去那样信任过的人，今天却在断章取意揭露我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我一直以为石幼珊是一个诚实的人，在这次运动中却表现为一个十足的说谎狂。真的，为了帮助同学们和我划清界限，为什么不公开我写的亲笔信呢？如果和我过不去，蛮可以用别的方法来对付我。来吧，我欢迎那些玩艺， 污蔑凌辱， 禁闭，捆打和谋害，这是我的本分，我只是觉得要（疑为“不要”——抄者）欺骗同学们，为了我们轻信，生活给了我们无情的嘲弄。

呵！善良的轻信者们！愿上帝保佑你们。

前天的批判会，我觉得十分乏味，我再一次告诉这些人，对于我，这种批判方式是绝对不中用的，或者进行真正的辩论，或者在肉体上把我毁灭，别的方式是没有的，懂吗？你们满可以不用开斗争会时特有的方式来表现你们的一窍不通，蛮可以不必借反对右派分子的手法来炫耀自己的绝对无知，也蛮可以用不着在强词夺理中显露自己无限愚蠢，还是建立一个异端裁判所吧，还是学学卡尔文吧，对于我，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无论死去还是活着，我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生活会证明，我们的事业是谁也绞杀不了的，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一定胜利，整风民主运动一定成功，“五·一九”和“五四”将显明地留在我们弟弟妹妹脑海里，永远鼓舞着未来的年轻人。为了这一切，我没有任何恐惧，自己人的反对，比面对枪杀要叫人难过，我也能沉默地忍受。

四、关于我个人的一个小问题，因为看到一些不愉快的现象，我曾想退学，离开北大，但自从“五·一九”以来，我深深地爱上了北大。现在，北大的一切都在向我招手，都在对我微笑，树叶展开眉眼，窗口凝着眸子，大路在×着我，友好地向我问好，清晨出门，每一块石头对我说“早安”，今天你将怎样开始战斗呢？晚上25斋的门神招呼我“晚上好，今天你工作得不够好，去你的吧，明天再来”，在小山上的草坪里，在未名湖边，一切都多么好啊，可是我更爱的是活动着的人流亲切的交谈和沉默的支持，我爱北大，这儿有我的朋友，有我的同志，在这里，我读过恩格斯的著作，在这里我学会了生活。

我多么想留在北大啊！作一个学生还是职员作一个教师还是工友，这对我完全是无关重要的，重要是我要在这里战斗。

亲爱的朋友们，我拥抱你们每一个，不怀疑毛主席也永远支持我们，不怀疑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他会从自己的队伍中清洗掉三害分子，不要怀疑马克思主义，她会从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清洗掉教条主义，不要怀疑整风——民主运动，因为一切过程都按否定之否定来发展，“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青年学生，自己能铺铁轨，自己能驾驶机车，难道不能克服目前的困难吗？一切都很好，完全不用害怕。

真正的共产党员们！真正的共青团员们！善良的同学们！请原谅我过去的一切无礼，我将逆流前进，不退一尺一寸，我不想向你们解释什么，你们的心是中国式的，用你们的心来理解我吧！

“卫道者”们我一步也不责难你们，我只是建议：在受到考验的时

候，要爱惜自己的心灵，良心的责难是过分残忍的折磨，救救心灵吧！不要在那冒充北大同学的信上签名，因为那是最无耻的谎言。遇到了新鲜的东西，仅仅嗅一嗅是不够的，还要深思熟虑，无论如何，在分析问题时，脑子比鼻子更有用，思考吧！我未来的朋友。

三害分子们：知道了你们遇到的是什么对手吗？重新支配一下力量吧！疯狂地挣扎吧！让我们慢慢地教训你们。

一个“强壮而又心怀恶意的小家伙”。

1956年6．24

我们为了什么——再致沈泽宜

谭天荣

你的回信给我带来了淡淡的怅惘。自从“五·一九”运动以来，这是第二次可有趣的“生活之插曲”。在你的回信里，对于我们这些毫无悔改之意的少数“顽固右派分子”表示了极端的轻蔑，在现在这样做是容易的，可是你愿意再进一步想一想吗？

过去我们写大字报、开辩论会、印小册子还到过天津演说，那时我们可说是一帆风顺，与此相反我们现在受到一些人身侮辱，特务跟踪，开斗争会还有那别有风趣的孤立，现实的皆是合理的，这些原来没有什么奇怪，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清这一切。

有谁愿意为我们的人想一想吗？我们不是厌世者，相反的，一般地说，我们是具有强烈的求生欲望，有人生乐趣的人，我们不是玩世者，相反的，对一切我们都严肃地加以探讨，曾经痛苦地思考过为了在生命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为了选择终生的道路，还有一点，人们似乎忘了我们也是自尊自重的青年，血气方刚，现在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条件下，把我们抓去质问任何问题，可以用任何骂人的词句用在我们的任何一个人身上。能够设想忍受这一切需要多大的耐心和毅力吗？自然有人会问：我们，为了什么？

前些日子，朱彬在北京日报和光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他们为了什么？”说我们是为了恢复解放前的剥削生活，为了证实这一点，他拙劣地为我们编造了一套历史，比方说我应该在解放前入团，并且不早不晚，应该在入团那一年学会赌博，还有出身小地主什么的，我没有兴趣去驳斥这些古怪的历史的捏造者，这多么乏味，真的，解放前的生活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人，至少是没有任何可以留恋的。

有人说我们是极端个人主义者，是夸大狂，是野心家，难道这些说法能安慰你那社会主义的良心吗？如果否认我们有表现自己的欲望，这是没有分寸的，我们是够狂妄的，可是能够设想光是这一点支配着我们吗？仅仅由自尊心作为生活动力的人即使能够在顺利的条件下工作得十分出色，也不会经受得起像我们这样的考验的（总算是一种考验吧），在我们人当中，有些罗曼罗兰式的个人主义者，也有高尔基式的集体主义者（仅仅是比方，我们不想和这些人比较），而小市民式的个人主义

是我们极端蔑视的，高尔基曾说：“如果一个小市民牙痛而他又没有勇气来拔掉这颗牙时，整个宇宙对于他就是一座监狱。”想想吧！我们要是个人主义是小市民的话，那么，什么是我们要争取的个人呢？团籍吗？学籍吗？我们只会失去而不会得到，名声、威信、权势、金钱、地位吗？这一切都见鬼去吧，如果一个人不想自欺欺人，那么他就会发现这些与我们是不相干的，没有一个势力眼光的小家伙会用我们这种方式往上爬，至少，这是不着边际的冒险行为，至于说到“野心家”这个术语用在我们十几岁的年轻人身上是不近情理的，关于这一点，我想你也不会不知道，我不想多说，我还没忘记，在我前面站着的是什么样的对。

那么，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不管对也好，不对也好，我们的要求主要是属于精神生活方面的，我们要实现我们的政治主张，我们为了我们向往的人类社会，只有朝这个方面考虑才可以找到唯一的解决问题的出路。当然，对于那只想随便找一个理由来骗一骗自己的人，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那是他们的事，去他们的吧！在这里，我愿意和你谈一谈。

我想还是谈一谈大家所熟悉的问题吧。前些日子“中国青年”讨论“徐进问题”。

人们说徐进的思想斗争主要是他的个人主义。这当然是那种“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这一著名理论指导下，创造性的应用。在我看来这种说明，无异于用商品的效能来说明它的价值。用人的生理结构来说明他的品质，或者，再通俗一点，用物体本身的物理属性（例如硬度、色彩等）来说明它会从高处往下掉一样。这种思想方法，我无条件的仇恨。正是这种思想方法，使人们对于民生各式各样思想的生活环境不理采，而对由这种环境下养成的不合人们胃口的思想，却施于暴力，似乎这样能解决问题似的。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情形，有人对于在艰苦岗位工作的人们，提出无穷无尽不合人情的要求，而对某些旧人员却无穷无尽的让步。有人在批评有缺点的好同志时，像猛虎一样勇敢，而遇到了真正的坏人坏事却像生了病的耗子一样害怕。有人对上级的一切指示都视为圣经；而对比方说：农业化高潮前低级干部表现出来的右倾思想却大谈而特谈。似乎他们比那些农村干部一定会高明似的，最令人难过的事，谁如果坦率地暴露自己的思想，谁就会受到各式各样廉价的谴责。

在《学习》杂志上也讨论过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有一个公路勘测人员说：“要说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可以，可是说到已经结

合起来，我思想搞不通。

我们成天开天辟地，把公路引向荒无人迹的地方。当人们坐着汽车旅行时，我们却走向他方了。当然这种工作是本份的，可是我们的待遇比谁都差，有钱买不到东西，我们的年龄一年一年的增长，可是婚姻问题根本无法解决”。诸如此类，不能不认为这个人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可是那些坐办公室，游公园的大首长、大学者们，大概要喝了过多的烧酒，于是写了文章证明：这算是什么呢，不会是你个人主义作祟吧了，只要你按照我的方法思想：“我们——大首长们、大学者们应该发号施令，为所欲为。你们——天生的贱种，应该埋头苦干，不计较个人得失。那么你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就结合了。”这样人们不愿意真正地暴露思想，反正没有人和他说真心话。于是社会上盛行着一种虚假、伪善与欺骗的作风，这种风尚，这种传说，这种习惯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 可是这一切是因为什么呢？ 要是我们也相信“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这反马克思主义反历史主义的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命题，那么我们一天也活不了。上面那些思想方法我是切齿痛恨的，可是难道我们可以痛恨那些为这种思想方法掌握的群众吗？你记得吗？

在天津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如果我们不是为了基本群众，那么我们的一切工作就失去了道义上的基础。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仅仅是因为缺乏思考的习惯，全部问题就在于让他们思想活跃起来，不要过多地责难他们，与此相应我非常不同意你对天津师院数四同学关于他们学生会不民主的演说。在我看来，这正是使我们脱离基本群众的作法。还有我为了我们在师院时那种高高在上被人们视如贵宾的处境十分忧虑，我们当时过分自负了。这种错误得到了恰如其分的惩罚，你记得那天下午的场面吗？那是我们活该。我记起了肖洛霍夫笔下的达维多夫，他对鞭打他的群众说：“一切都为了你们，你们却这样打我”。但他也知道那是拉古尔洛夫的不好，难道我们可以设想他对群众进行报复吗？他是这样说的：“有人想要我求饶，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使布尔什维克屈服。我不会报复你们的，布尔什维克不会这样对待自己人。但是要使你们觉悟”。这就是我所向往的英雄，为什么当时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痛恨“卫道者”们呢？这就是原因。

我们反对的不是个别人物；而是一种习惯的机械势力。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全部困难；这也是我们的光荣。

再举一个例子吧！我想引一段咱们都熟悉的一段话：“每天我在墙上划一横，每五天就凑成一个‘正’字。每天我都盼望出狱，可是每天都叫我

失望。秋天了，透过铁窗可以看见白云在飞，我真难说出那时候的心情，那时的滋味，我只是忧郁地望着那一小片青天和飞翔着的白云，我想起了‘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决定自杀，决定深夜撕下被单上吊。后来我想到一个姓聂的朋友，我就改变了主张，他是个老干部、共产党员、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了。曾在杭州西湖公安分局工作过，后来调到江南分局任南桥派出所长。我和他接触了几年，知道他是一个热情公正的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领导干部以审查他的名义，在1954年把他关在狱里，他不服气，整天吵着要自由。这批家伙就给他戴上了镣铐，他受了刺激以后，精神错乱，终于上吊自杀。等到发觉后被送到医院里，几个局长、副局长吓得轮流到医院里去探望，还告知医院，只要救活他，花多少钱都可以。结果人还是死了，这批人就在党内下一个含糊的通报，说他畏罪自杀，草草了事。（我不知道详细情况，但我顺便为我们的朋友控诉，要求重新审查案子，追究责任）我之不再自杀就是这个原因。

否则，落下一个畏罪自杀的名义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

不自杀的另一个原因是对民主、自由的坚定信念。民主、自由是真理，今天它虽被这批家伙玷污了，终有一天，会重放光芒。我一定要活下去，要做一名民主自由的勇猛战士。这批家伙们现在这样胡作非为，但终有一天要受到正义的裁判。就是这样我耐心地等待着，忍受着那狱卒的吃喝，忍受这惨无人道的折磨。”

你能不为这样的申诉感动吗？难道无产阶级的立场排斥正义和真理吗？难道马克思主义否认真理的客观标准吗？（这是那些理穷词尽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的歪曲和污辱）这些就是我们要反对的现象。

咱们在一起谈过了多少知心话，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感情，党的错误我们感到痛心；而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完全不需要从外面输入进来。可是现在这些现象；我们反对的那些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而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用哥穆尔卡的话来说，我们要反对的是那种把威信建立在血、牢狱与欺骗的基础之上的本国版的贝利亚主义。

现在我们是在困难中，受到各式各样的人的反对。但是为了摧毁那种建立在血、牢狱与欺骗之上的威信，为了那些无辜的被损害者，为了曾昭伦、钱伟长的自尊心，为了真理和正义，为了理性和人权，我们愿

意殊死地搏斗。江隆基这家伙试图用什么“岗位”之类的废话来吓我们，老实告诉他，就是付出生命，我们也是愉快的，我不会忘记保尔的话，为了爱人活着这是卑鄙，为了家庭活着这是自私，而为了个人这简直是无耻，我们可不是那种人。

至于你对我的某些无理，现在我不再计较了，我对你的不满是你凌辱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理想，我们的“五·一九”运动，我们纯洁无私的心灵。这方面按照生活的意志，我不能原谅你。

（1957）6月23日

五四断想

谭天荣

旧的悠悠死去，新的悠悠出生，不慌不忙，一个跟一个——这是演化。

新的已经来到，旧的还不肯去，新的急了，把旧的挤掉——这是革命。

挤是发展受到阻碍时必然的现象，而新的必然是发展的，能发展的必然是新的，所以青年永远革命的，革命的永远是青年。

新的日日壮健着，（量的增长）旧的日日衰老着（量的减少），壮健的挤着衰老的，没有挤不掉的，所以革命永远是成功的。

革命成功了， 新的变成旧的， 又一批新的上来了，旧的倒下来拦住去路，说“我是赶过路程来的，我的血汗不能白流，我该歇下来舒服舒服”，新的说“你的舒服就是我的痛苦，你耽误了我的路程”，又把它挤掉……如此武戏接二连三的演下去，于是革命似乎永远“尚未成功”。

让曾经新过来的旧的不要只珍惜自己的过去，多多体会别人的将来，自己腰酸腿痛拖不动了，就赶紧让“功成身退”不正是光荣吗？“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是古训啊！

其实青年并非永远是革命的，“青年永远是革命的”这定理只在“老年永远是不肯让路的”这前提下才成立。

革命可能永远“尚未成功”，几时旧的知趣了到时就功成身退，不致阻碍了新的发展，革命便成功了。

旧的悠悠过去，新的悠悠上来，一个跟着一个，不慌不忙，哪天历史走上了演化的常轨，就不再需要变态的革命了。

但目前我们用“挤” 来争取“悠悠” ，用革命来争取演化“悠悠”是目的，“挤”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于是，又想到变与乱的问题，变是“悠悠”的演化，乱是挤来挤去的

革命，若要不乱挤，就是得悠悠的变，若是该变而不变，那只有挤得你变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书夜”，古训也发挥了变的原理。

这是为了反对三害

谭天荣

最近几天来，《人民日报》大为反对据说是“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卢郁文接到匿名信。

一、在我看来不是这样。一般地说共产党人不仅有权利反驳，而且有用斗争会的方式进行压服的特权，说真的共产党剥夺别人为自己弁护的权利，倒是应该反对的。

二、……过去普选时大首长再三指责我们没有民主的习惯，没有百分之百地参加选举，“真是给你们民主，你们还不要”，可是在今天，在广大青年学生争取真正民主时，大首长们却惊惶失措了……。

三、……现在我们最低限度的民主要求像胡风提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却被斥之为资产阶级民主……。

总之， 在我看来， 卢郁文没有实事求是，而是在无的放矢，他的意见也并不“平易近人”是纯粹的废话，毫无意义的空谈，在这场严肃整风——民主运动中。

实在更没有比这种言谈更叫人恶心了……。

卢郁文的品质是不是“典型的无耻之徒”，是不是“为虎作伥”，我不敢发表意见，不过就常情而论，关于他制造共产党和党外人士之间的墙与沟方面出了不少力量的说法似乎可以信赖的。要不《人民日报》为什么只字不提呢？考虑到这种人的本性， 他们是不会放弃这种机会的， 要不是他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的话，真的《人民日报》太盛气凌人了。为什么“为虎作伥”的虎，一定是指共产党呢？我看说他们是“三害”分子更合情理些。把真正的反对“三害”的言论，称为“反党”

“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另一方面又登一些廉价的批评，不痛不痒地胡乱给“个别领导人”提一些意见，这就是《人民日报》拙劣的诡计，再则《人民日报》把给卢郁文写信的没有留下姓名这一举动加以责难，是多么可笑的自欺欺人，写信人的顾虑可以用葛佩琦的遭遇来作充分说明，他们只不过不愿意在枪林弹雨中暴露自己而已，林希翎也接到各种匿名信，她该登在什么报纸上呢？该通过哪个电台广播呢？　这真

有一点像俗语中说的“只许官家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这几天《人民日报》组织的读者来信和其他方式，对这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围剿未免太不中用了，这些言论很多地方我也不同意，比方说在我看来，他们满可以不用卢郁文之流提什么警告，可是《人民日报》更显得软弱无力了，在这场围剿中，正人君子除了对这些荒谬论点，表示极愤慨以外，除了神经质地问“居心何在。和“有何意图”以外，并没有说出什么道理，正像北大学生会主持的辩论会念纸条，在墙上公布从天津来的讨伐信件一样（支持我的信要写成大字报可以贴满北大每一块墙，不过这样做多么乏味）。《人民日报》组织的十字军，充分表现了没落阶级的情绪，那些有着内在权利的人，用不着炫耀自己的力量，想想看一种相信自己前途力量的人会为一封匿名信之类的小事大兴问罪之师吗？真太像为了转移人们对学生运动的注意而有意制造的纠纷，这不过是垂死的挣扎而已。

　　红色的是火焰；白色的是剑；这是最后一场战斗！让真正的勇士们前进吧！

在1957年6月26日报告会上的发言

张景中

一、关于退出学习的原因

“我退出学习的原因基本上和杨路同，但今早几个尊敬的老师劝导我，要我参加学习，我部分接受，参加一些讨论会，但气氛又不是那么坏的大会——如不是批判会（我所认为不应批判的问题）。另一方面我需要休息。”

二、三害根源

“新宗派主义（指现在的宗派主义）是由于对工作不了解情况，希望一部分人接近他，以改进工作，了解情况。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宗派主义：1．经常和这批人接近，因此和其他人疏远，不信任，这样在精神上形成隔膜，因而更不信任，如此循环……

2．在制度上，　如选举制度，层层隔膜，为此而采取一系列的工作方法，而加深了这种隔膜，这个情况是有其特殊性和普遍性的。

“新官僚主义：大部分出发点是好的，愿意把工作做好，但由于不了解情况，做了错事习以为常，很主观地认为是不了解情凡犯了错误，但为了面子、个人利益而进行掩盖，越掩盖，错误就越大。

“旧三害（指解放前的三害）对新三害起助长作用，而过去的权威，损人的利己主义，在人们思想上的遗留有时产生了和旧的相同的错误。

“新三害是在新的矛盾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由于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是因为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地位，因而看法不同，这是永远有的……要有效地防止三害，应在制度上改变。在苏联相中国的制度由于本身的缺点，对产生三害大有些关系的。

“人们的思想是各有片面性的，领导片面，群众推翻，这就是民主集中制之必要，但目前做得不好。”

“直接生产者和管理生产者之分离（所谓分离是指管理者不是从生产者中来）从历史上看，不是好现象。奴隶社会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有些

人只单纯地从事管理。

因而产生了阶级，而目前不会产生阶级是因为人们的自觉……我不曾说明目前要产生这个转化，而只是说直接生产者和管理生产者分离不是好事情，这只是我的感觉。”

“一部分人进行这样的工作，一部分人进行那样的工作，这是纵的分工、而管理生产和直接生产的分工是横的分工，管理生产者应从生产者中产生，领导科学的必须从搞科学的工作者中产生。”“从领导上派下来的分离性较强，我不反对分工，但反对分离。”

“农业生产合作社是由选举产生的，因此，工厂中应该由工人选举厂长。”

“工人代表大会的方向是好的，应促成最后领导者绝大部分由工人中产生，领导者参加劳动是好的，但没有劳动者参加领导好，现在是有好多领导者从群众中来的，但没有制度保证。”

“在选举上，选民对代表不了解，如团的选举是对团组织投信任票，这种现象虽不是独裁，但是不好的，应该让候选人到选民中说明自己的政治见解。”

“候选人名单应多一些，有选择，目前提几个选几个，你随便改掉一个人也会选上的。”

“这种选举制度是不好的，显然不是民主，但说不民主，要被别人说是诬蔑，因此说是有缺点，要改”。

“人民对国家大事的了解不够，不了解，不能决定这个政策的好坏，而目前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斯大林的错误不了解使人们不能公正的判断，如果人民了解后，都得出和领导不同的结论，这就可说明领导的不对。”

“《人民日报》若经常介绍北大情况，及时指出缺点、错误、就可避免目前的谣言和反革命的挑拨。”

“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有一句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用生命来保证你说这些话的权利。’如不说目前人权没有保障，而只是说与大家有不同的意见的人如何保障其人权。”

以上这些观点，我再声明一下，这些原则是在党的领导前提下，希望在党的领导下讨论的，“目前北大是否有右派，我不敢肯定，反正我不是右派，肯定阶级斗争是存在的。”

三、天津之行（略）

四、我的看法与问题解答

“一开始我们希望党委会领导，而党委会没有领导，这就可能有错误，关于思想解放的看法洪久楣曾向市委问过，市委没有反对。”

“目前的做法是摧残了部分民主势力。”

“我们有同学开始认为党是虚伪的，运动开始后就认为不是如此，但目前又贴上‘莫谈国事’。”

《广场》找不到地方付印，因所有誊印社接到通知不让印，《广场》之基本路线是拥护党的，拥护社会主义的。”

“对刘奇弟不下结论，我和杨路说刘奇弟有复仇主义，谭敢于提意见的精神是好的，他也是帮助党整风的。”

“杨路以前不关心政治，而现在是帮助党整风的。”

“沈泽谊说：我面临了两条路：坚持真理就要离开党，放弃真理就可靠近党，而在阶级斗争中往往要放弃真理，以后什年不谈政治”。

“目前政治尽管目的伟大而手段不能不采取肮脏，《人民日报》为了人民利益但手段是肮脏的，我欣然接受组织处分，校规国法，我不改变我的态度，假如以后更正……我就可以（放）弃这个肮脏的看法”。

此后听众提了一系列的问题，张作了一些回答：“去天津各人目的不同，我没有如杨路所说“去冲击一下”的想法，本来我们大家不让杨路去，杨路说一定守规矩，不乱说，以后就一起去了。”

“我不参加学习愿负违反制度之一切后果。”

有人问起信的问题（指张景中写给5506136的） 张景中说“信公开没道理。就信的内容讲可以公开。我的信就是要组织力量而且要积极地组织力量帮助党整风。”

“组织性和良心是有矛盾的，立场和真理有矛盾，为了真理可放弃立场不会做敌人。”“一切政治其手段可以是肮脏的，但我不反对伟大的目的可以用不正当的手段达到特别是阶级存在时。”

有人问张景中：你说制度是根本的，为什么学校订出制度搞反右派学习，而你不参加。张回答说“我处在矛盾中”。

与段、江、程、丁四位先生谈话的内容摘要

张景中

为了劝告张景中、杨路，希望他们不要再坚持错误，立即回头，段学复，江泽涵，程民德三位先生找他们谈话，杨路不愿意来只来了张景中一人，谈话时丁石孙也在，下面是谈话的简单过程以及张景中的一些意见。

首先发言的是段学复先生，他表示了系里对他们两人最近的行动和言论的注意，他们是不对的，希望他们虚心一些，听听别人的意见，好好地想一想，在谈话中再三表示他对他们二人是诚恳的。接着是江先生谈，他认为他们这样不虚心是不好的，他认为年轻人考虑问题时不应该不考虑历史，不考虑别人的意见，不管社会的实际情况，他说这样并不是真正的独立思考。程先生希望他们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在这三位先生谈话过程中， 张景中就谈了他从5月19日以来所参加的活动，最后并谈了目前的看法。张景中谈话的摘要如下：1．他的动机是要求自由讨论问题， 例如讨论产生三害的原因等，这就是组织黑——恩学派与百花学社的原因。

2．黑——恩学派的目的不过念些恩格斯的著作， 百花学社不是反动集团，在一成立时他们就怕被反革命分子利用，因之没有组织纪律的约束，社不对社员负责，社员不对社员负责，且一切会议是公开的，欢迎同学参加，欢迎党委有人来参加，除去龙英华组织过报告会外，没有什么活动。

3．《广场》 不是百花学社的刊物， 为此内部还展开过反宗派主义的斗争，《广场》中每篇文章都是从社会主义立场来帮助党整风的。

4．去天津的原因是：①辟谣②接受朋友的邀请。去的7个人是偶然地组成的，各人的目的不一样，主张也不一样，带去的印刷品是按下列两个原则选择的①早期的大字报②引起争论最多的大字报，（他没有详细谈在天津的活动以及油印大字报的准备工作如何做的）。

5．关于他写给北大一同学的信的内容， 现在看是错了，但当时并不错，因当时他并不知道有反右派的斗争，出版《广场》和组织百花学社在现在看是不对的，所以都解散了。

6．这次运动的主流是好的，　“自由主义者宣言”以及谈论的文章可能是不好的，但这不是主流，问题出在党委领导指导不好，当时没有指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领导得好，他们将成为反右派斗争的积极力量。

7．谭天荣和他一样，　也只是希望自由讨论问题，他的缺点只是有些狂妄而这一点现在已有很大改进。

8．党对他们是不择手段地打击，　如印刷厂工人斗争他们，且扣住他们的稿子和纸张，说要告到检察院，但直到今天还没有告，江副校长听信一面之词，对他们六个人不加区别的警告以及《人民日报》说百花学社是反动小集团，《广场》是反动刊物，而这些都没有经过详细的调查，且报导的事实有歪曲，要报导的话就应该把他们的东西都登出来，如谭天荣的文章等，现在这样是不公平的。

9．现在的作法是违反宪法的，　他们既然没有被剥夺公民权，就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学生会为什么不借地方和扩音器给他介工。

10．参加学习就要对不起朋友，沈泽宜昨天已在写检讨但是沈说话得有良心的，沈认为在良心与党的利益之间，他今天选择了后者，以后沈将几年不问政治。沈写检讨他不写检讨，双方是能谅解的。

他在谈话中，是尽量把事情说得轻描淡写，说他的动机是好的同时坚持他的错误。

在他谈过之后，先生们就问他在今天的反右派斗争中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他的回答是一方面承认在全国范围内有右派，另一方面反复说党委在反右派的同时扼杀了他们这部分人，而不正面回答先生们提出的问题。

他一直坚持他的错误，完全不考虑先生们对他的劝告，谈话从上午十点到一点半结束，先生们对他这样顽固的态度感到气愤。

急流勇退

张景中

1．我大体上同意杨路“最后的宣言”中所讲的话。

2．一个月更好地使我知道了政治是怎么会事。 它比我能想到的要肮脏得多。

我必须保卫自己的灵魂不受玷污。

3．我希望百花学社办下去，为了避免社内分歧，我退出。

4．我不参加这次学习了。我要利用这几天休息和玩。

5．我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履行自己的诺言、打算：举行一次三害根源的报告会。

和一些已约好的同学稍稍交换一下意见。

假期里到天津一次仅仅是为了不失约。

6．我永远记住这一个月来的情况，并将对我一生中所能遇到的朋友叙述真相。

“疯子”的话

严仲强

首先我声明，支持这种用大字报发表意见的方式，并且现在我用我的行动表示支持。

我对中共内部这次整风感到兴趣，因为这会促进社会的发展，事实上即便不整风将一切缺点说成优点，将人民内部的矛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式解决也“好”，因为我相信历史的车轮的前进是一个政党所阻止不了的，矛盾的积累必然会导致矛盾解决，只不过这种方式采取和平改良的方式或革命变革的方式罢了。我并不想认为这次整风对我是一种恩赐，相反，我认为这是一个稍有见识的政党都应当采取的一种手段，要统治就得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我回忆过去几年的若干措施，就拿肃反运动来讲，我觉得这是生硬的袭用苏联老大哥的错误的经验的结果犯了极端教条主义的结果。就拿本校来讲吧，简直乱斗好人，例如：将顾牧丁先生等当反革命分子来斗，这完全是一种歇斯底里，这样套“整个运动是正确的，但有少数偏差”，怎样能使“良心”上得到安慰？思想上的懒汉才对这种公式最感兴趣，他们用这种公式将自己愚蠢粉饰为多智，丑恶粉饰为善良……前几年的错误绝不是个别的偏差，它是一次根本的路线的错误，其严重性和几次左倾的错误是不相上下的，为了威信不必害怕承认错误吧！用纸包火总是十分危险的，斯大林的错误总有一天被揭发出来的，党中央也该整风，难道掩饰错误、喜欢斯大林的威信对革命有好处吗？

再说几年来学校里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也是恶劣到极点了，一方面是民主、自由、友爱等口号的积累，另一方面是人们实际上不自由、不平等苦闷的积累，自下而上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形成一条大山，沉重地压迫着人们心情。可是现在人们愤怒的火炬已经迸发出来了，“五四”的火已将重新燃烧起来。

老爷们、公子们尽管你们道貌岸然，一本正经，但是掩饰不了你们的罪行，历史是不容抹杀的，让你们发抖吧！让你们从宝座上滚下来吧！社会主义基础只会因为清洗掉少数混蛋、寄生虫而更加巩固起来，是谁在人民中筑起千万条鸿沟，是谁在人们中传播彼此不信任的气氛，是谁使人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现在该是由人民向你们清算的时候了吧！这些坏人坏事的存在发展一定有领导上的支持，我要求政治上及其

他方面扩大民主，哪些东西是党内“英雄”们可以知道的，哪些东西还可以让非党的“群氓”知道，也应有明确规定，可惜不知共产主义者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论点是否有最正确的理解！可是不要忘记人民在必要时一向会给那些自命为“英雄”的人以严厉教训的。为了反对个人崇拜我想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公布出来只会有好处的，可惜前几天报上还说这是美国间谍制造的，这怎么能不降低报纸的威信呢？

我建议学校中开放唯心主义课程，应当和唯物主义课程处于某种均势，这样才有可能批判唯心主义。

将香花和毒草明确分开只会影响百家争鸣，因为讨厌毒草必然从而讨厌传播毒草的人，谁愿意自命为毒草的传播者呢？

监视人的言行、调查人的历史，只应是公安机关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扩大这种工作范围。

好了，我该继续我的备考工作了，对我的意见提出看法，矛头指向我，还要是指向我所反对的东西，由大家选择吧！

压制不了的呼声

严仲强

自从中共提出“鸣”“放”政策及整风运动以来，不少人初步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盲从的习惯势力受到了打击，人民初步地提高了积极性。由于一部份人不仅喜欢研究理论而且喜欢用自己认为是最正确的理论去改进世界。所以“鸣”“放”

政策不能与党的整风混为一谈，　不能以某些言论不能帮助党整风为借口，　而限制“鸣”“放”的范围。

有人认为“鸣”“放”政策的提出是由于我国过去几年来建设上取得成就，马列主义的广泛宣传，政权的巩固，这是没有说服能力的。不可否认这些原因是“鸣”

“放”的必要条件，但它远不是充分的条件，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得不出人民可以充分享受民主权利，可以真正的管理国家政权的结论；否则就不能说明为什么会发生波兹南事件及匈牙利的十月起义，以及斯大林为什么能够破坏民主集中制及集体领导。“鸣”“放”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苏联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皆比中国先进，但就不提“鸣”“放”政策。所以“鸣”“放”政策可以提出，但也可能被执政党在一些借口下取消或有名无实。在中共所提出的反三害斗争中没有明确提出反教条主义，这是有其用意的，因为教条主义反面为修正主义，而提出修正主义，就使人联想到制度及路线问题，这样就不能符合共产党的最高利益。

现在修正主义这个用语的意义很不明确，它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在某些方面有些混淆。有人喜欢称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些言论、措施为修正主义，但同时他们又很谦虚地说：自己对南斯拉夫真实情况了解得很少。

人民不会长期容忍缺乏民主的生活的，但人民对民主内外体验及要求则和具体的历史条件有关，人民对新社会爱的基础仍是对旧社会的恨。所以即使新社会缺乏民主，但只要旧社会更不民主，人民仍是非常愿意接受新社会的，并尽全力去保卫它。由于我国人民没有民主生活的习惯，所以苏联人民可以在痛苦中容忍了斯大林一系列的罪行，而匈牙

利人民就不能容忍拉科西——格罗集团的统治，而毅然组织起义，中共吸收了波匈事件的教训，了解到“鸣”“放”是可以缓和党、政府与人民之间矛盾的。作为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来说，总是喜欢知道国内各种力量对比的，这种对比的真实情况是不能从某些干部及文人们无耻的献媚及阿谀的颂扬中寻求正确答案的。但鸣放可以提供这种答案，通过鸣放中共可以估计到各种力量对比，学习对待各种不同人的手段，从而达到更巩固的专政。在“鸣”“放”中会有人反对社会主义及共产党，这是中共早就料到的，但是出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竟如此迅速地出现了两支性质不同的力量：①民主运动的力量，②右派的力量。由于右派完全反对社会主义，要求资本主义，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人民应当反对他们。

民主运动的代表者们，他们喜欢思考一些问题，他们要问：三害是否和社会的某些制度有关，是否和党的领导有关。他们要求民主、自由、人道，他们无情地揭露过去的工作缺点，因而降低了中共的威信。由于他们对美好的明天强烈的爱，对现实生活中的缺点强烈的恨，他们对待某些问题上常有偏激情绪，别有用心的就是从这个弱点上对他们加以全盘的否定。这两种力量的出现，皆不符合中共的最高利益，（庸俗利己主义型及美化利已主义的利益）。中共对他们因而采取了对立的态度，并且将两种力量混为一谈，凑成一个所谓“右”派，从而对右派展开进攻。

为了使问题明确起见，探讨一下民主运动潮流和右派进攻产生的原因，还是有必要的，右派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只要有机可乘时自然会向社会主义进攻。随着国内资产阶级的消灭，这种力量会逐渐削弱下去。但搞一次大规模反有派运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右派，民主运动和右派进攻的性质根本不同，不能因民主运动和右派进攻混在一起，而否定民主运动的意义，这种民主运动在本校表现为“五·一九”

运动，它的产生由于领导者对三害根源解释及对过去运动中优缺点的估计不能令人信服，因而群众自发的起来探讨这些问题，他们要争取民主、自由、人道，而这些生活的基本要求，在过去是受到限制和轻视的。

为了正确地估计这次民主运动，在讨论问题时，大家应当有一个共同的前提，一切言行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应当以这个根本前提为参考。这个前提应当是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谈建设社会主义及要求党的领导才有意义。在这个前提下人民要求一个最完善的制度，及一个最正确的领导是完全正义的，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内保守势

力却喜欢称这种要求为反社会主义，所以就应当对反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作一些分析。有人将社会主义基本特点归结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人民民主专政及党的领导。这几个概念皆非常广泛，但正因为它广泛也就缺少了具体内容，具体的社会主义并不像理论上所宣传的抽象社会主义那样优越。例如三害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反对社会主义中落后于基础的上层建筑，并不离开社会主义。事实上即使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是可以批评的，例如南斯拉夫公有制形式和苏联公有制形式并不相同，人们自然有理由怀疑现在公有制的形式是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最好的形式，对这种要求不应污蔑之为修正主义，事实即使有人要回到资本主义，只要他们不以行动来推翻社会主义，并且讲出自己的论点，那么也还是属于百家争鸣范围的。

从理论上讲抽象的社会主义也曾有一个抽象的共产党领导，抽象的共产党应无条件的拥护，但具体的共产党可以成为官僚主义的化身，例如拉科西——格罗集团，反对这种集团并不能算反对社会主义，中共不喜欢这些论点，因为它是以最大多数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而不是以共产党的最高利益为出发点的，事实上任何具体党的利益和最大多数人民利益常常不能一致，因而发生党、政府和人民的矛盾。在中国三害普遍存在，就是这种矛盾的表现，不及时纠正错误，党和人民的矛盾，可以发展到对抗，从而被人民推翻。

站在民主运动潮流中的人，要求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中作种种改革，从而争取一个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和更正确的领导，他们绝不是要回复到资本主义，按照派最初的定义，这种势力应当称为左派势力，中共是中间势力，还有资产阶级的右派势力。

本校“五·一九”运动是一次民主运动，它代表有理智的中国青年内心的呼声。

过去被歧视的，不敢讲话的人开始讲话了，不少人抛开书本奋不顾身的投入斗争，为了人民最高利益，他们不考虑运动斗争对自己究竟会有多少好处。三害老爷们发抖了。因为他们又一次领教到人民的力量，真理的种籽是不会消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历史在一定阶段可以后退，但它总的趋势还是前进的。民主运动的代表者们，尽管有人污蔑你们为右派分子，尽力将你们形容成小丑，从而想将你们完全否定，但有理智的人会看清楚这些阴谋。你们应当心平气和，心安理得继续在你们所选择的道路上前进，历史会对你们作出公正评价的。

现在共产党人手中最有力的武器还是所谓立场、观点、方法，但立场、正义等和真理不同，真理反映了客观规律，他可以通过实践去检验，而立场、正义则是一个信仰问题，客观规律并不能告诉人应当选择某种立场，只有生活本身才能告诉人这一点，从立场来批评一个人的言论是最软弱不过的。

中共这次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因为他反对了真正的右派，但也是错误的，因为它将民主运动与右派进攻混为一谈，从而打击了进步力量。这种作法从长远利益看，非常愚蠢，对右派斗争流行一时的手法是批判会，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只不过是肃反时斗争会的变相而已。这种会不能解决思想问题，因为这种会的性质，不是学术性的探讨，而是政治性的宣传、鼓动，它在说理争鸣的画皮下，为了获得最好的政治效果，打击右派势力，争取中间势力。这种会在形式上可以不择手段，有些人不借用最虚伪的做作来获得听众由于一时冲动所赐予的掌声。

我估计这篇文章会受到多方面的攻击，一定有人警告我，若不悔改则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应当声明我是不会被反革命分子利用的，因为在我和右派势力之间，还隔着共产党的中间势力，污蔑、谩骂、恐吓只能引起我卑视的微笑，即使最无人道的群众性孤立，我也满不在乎，为了真理、人道、民主、自由，我可以牺牲一切。

1957年7月3日

5302041

布鲁诺在被烧死前说：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略谈“五·一九”

王存心

对于斯大林个人专断的严重错误和匈牙利的武装暴动，我们国家的领导当局所作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说服力不够，虽经大力宣传但仍有许多人不肯接受。

“三害”的实质和根源是同性质的问题。照样轻描淡写敷衍通过，当然人心不服。

为了防止“五·一九”这样的事件，我们国家领导当局作了巨大的努力。首先慎重地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 然后通过报纸等宣传反复解释； 另外，还有特别布置的政治学习。但是，“五·一九”运动这样的事件仍然发生了，出乎领导当局的意料。有人指出，在我们国家里选举流于形式，人格没有保障。“三害”到处都是。当然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为了我们社会主义更好，不少有认识的青年人投身于“五·一九”这样的运动中。他们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不满足于用思想改造的方式来除“三害”，主张在理论上作一些必要的修正，制度上作一些彻底的改良。不容否认，中国过去太糟了，对比之下，人民对新中国是无比热爱的，只有在人民忍无可忍的时候，暴力的革命才会发生 顿如领导当局有决心进行一次和风细雨的彻底的改革，不会有多大的困难，虽有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但他们必竟是少数，并不可怕。我们国家的领导当局为了顾全自己高度的威信，十分固执地坚持不太高明的见解，对“五·一九”这样的运动不但不予以支持，不积极的领导，相反的，不择手段的加以压制，并利用广大群众对新中国无比热爱的情绪大张旗鼓地掀起反“右派”斗争。由于没有正确的领导，由于反革命的破坏，由于少数人近于疯狂的偏激，由于知识不足的广大群众不明运动的真象，经不起重大的阻力，“五·一九”运动未得到健康的发展，目前“五·一九”运动被反右派“斗争”代替。尽管如此，“五·一九”运动还是有成绩的。它给了“三害”分子一个有力的打击，在许多人僵化了的脑袋中起了振荡，还有，更重要的是，领导当局虽然口头上不承认，但阴改一点，阳改一点，实际上在改，不是吗？以我见到的来说，学生会的权力似乎是加强了，那些非行政机构也不再发号施令了，反“右派”斗争的政治学习延长十天也极为慎重，由校务委员会决定。总之，规矩多了。

与上文无关的附录

①正如一个好的领导者，不是不犯错误而是善于改正错误，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也不在于它如何绝对的好，而在于它能及时地按照人民的意志改变。

②人眼望见的天边决不是尽头，历史的车轮永远前进，中国人民已跨了很大的一步，但不能就此停止不前。

③有人认为政治是肮脏的，对政治生活中一些看不惯的事有点生气。

为此，特从弥勒佛（大肚罗汉）抄有关对联一副，牢记在心，可免烦恼。

上联：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何所不容。

下联：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

“利己主义”原理

王存心

“利己主义”由来已久，它的内容是很丰富的。限于认识水平，恕我不能详细叙述。在霍布斯那里，可以找到“利己主义”，实际上，“利己主义”是建立社会契约论基础。由于霍布斯对高尚的利己行为强调得不够，他的“利己主义”不易被某些品德高尚的人接受。与霍布斯相反，车尔尼雪夫斯基着重强调了高尚利己行为，提倡“美化的利己主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化的利己主义”容易为那些品德高的人接受，但内容较为贫乏。甚至有人认为他主张的不是“利己主义”，只是不恰当地利用了“利己主义” 这名词。 霍布斯的“利己主义”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利己主义”都美中不足，完美的“利己主义”必须是二者结合，这种结合是极自然的。

人总是做最能使他满意的事，人的任何有意识的行为没有不是这样的。如果说人愿意作自己满意的事，这种愿望是利己的愿望，那么所有的人都是利己的愿望，正是这种愿望在支配人的行动。

一件事对一个人有利还是不利，或有没有利害关系，取决于这件事和这个人以及评判者用以评判利害的标准。评判利害关系可以是各式各样的 焚例来说：如以健康为标准，则能增进一个人健康的事，对这个人是有利的。因评判者用的评判利害的标准不同，同一件事对同一个人可有不同的利害关系。为了明确“利己”一词的涵义，究竟应选择怎样的标准？一种绝对的抽象的标准是否存在？

谁要是武断地提出一种绝对的标准，这种标准虽对他自己是适用的，但不一定为大家所承认。当他按这种标准硬说一件事对某人有利，而那人却不满意这件事时，不能认为这件事对那人是有利的。对自己有利的事必需是自己承认的。因此，一件事对一个人的利害关系，评判者最好是这个人自己，用以评判的标准也由自己选择，致于如何选择，选什么，个人有所不同，并且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不相同。一个人对一件事感到满意时，认为这件事是对他是有利的；反之，一个人认为一件事对自己有利，在当时这件事是使他满意的。这句话浅显极了，谁都明白。不过，请不要轻视这句浅显的话，它给出了“利己”一词的涵义，是“利己主义”立论的基础。“涵义”作为一种感受，是不需要解释的。任何概念的定义，最终都是归结于直接感受到或间接感受到的东西。一个人对一件事认为满意，归根到底这件事必能使他在直接的感受

中感到满意。

随着每个选择的用以评判的标准不同，几个人的利己愿望是千差万别的。有的为名，有的为利，有的追求精神生活的享受，有的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有的喜欢惊天动地的英雄事业，有的喜欢默默无闻的谈漂泊生活，有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损人利己，有的把帮助别人当做最大的乐事。如此杂多的人的利己愿望，分别研究起来是费事的。有些有利愿望带有很大的普遍性，在正常状态下差不多是全人类所公有的，如吃得饱，穿得暖。也有社会上某些集团的人共同的利己愿望，如阶级利益。此外，奇特的，怪癖的利己愿望也有不少，有的是十分荒谬的。所有这些，不管差别怎样大，在前述意义下都是利己愿望，千差万别的利己愿意，在利己这一点上相同。

人的利己愿望及在利己愿望指挥下的利己行为，可以从利己的角度进行分类。

虽然人的愿望和行为是利己的，但其效果可能对别人有利，可能对别人有害，也可能与别人没有利害关系。以对别人的利害关系作标准，利己可以分为：损人的利己、不损人的利己和利人的利己。不要以为利人的利己这样的用语有矛盾，它的意义是十分确切的。一件对自己有利的事同时可以对别人有利，对自己有利与否，取决于自己；对别人有利与否，取决于别人。

我们坚持的利己原则是：损人的利己不损人的利己和利人的利己，都是利己；利人的利己受到欢迎、损人的利己遭到反对，只不过表明人人都利己。人都利己实在是很明显的。只要经过思索，作一番选择，人总是做最能使人满意的事。许多人不认识这一点，是由于不了解利己一词真正的涵义，错误地把利人的利己当作损己的利人，把利人和利己对立起来。人在作利人的事时，常常要牺牲一些人的利益，但这是出乎不得已，是为了自己更大的利益他才这样做。

关于利己行为，有一点要特别着重提出，就是，除了深思熟虑的利己行为，还有一些利己行为是不假思索就作出的。表面上没有计较个人利益，而行为的效果却有利于别人，自己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失。例如，人在紧急关头的自我牺牲，将士们在战场上的许多英勇的英雄行为。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违反了利己原则呢？不是的。一个人在作出这样的行为以前，对于这样的问题，即在那样紧急关头采取怎样的行为不符合自己的最大利益，早就有了考虑。既然主意早已打定，行动时也

就表现得毫无迟疑。

为了着重强调高尚的利己行为，我想谈谈符合利己原则的“舍生取义”。人为什么愿意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去作他认为更有价值的事？这和利己原则是不是违背？

如果把生命作为人的最大利益（指没有任何东西比生命更可贵），显然，“舍生取义”违背了利己原则，但前面一再提出：“利己”一词的涵义不能这样简单的了解。

“舍生取义”的行为究竟应该怎样解释呢？简单得很。

各章早已提出的：生我所欲也，义也我所欲也；二者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请注意“欲”字，正是这个欲字给出了问题的说明。对于贪生怕死的人不明“舍生取义”，也可以作出解释，因为他不欲。按照利己原理，人都是利己的，利己本身的所以不褒贬，不过，利人的利己受到欢迎，损人的利己遭到反对，这是不容易的事实。因为人人都利己，行什么样的利己在好呢？从利己的问题考虑利人的利己最有利，可以受到欢迎，少受到反对，既利自己又利别人。做一个利人的利己者从不容易，许多利人的事常常使人感到不利己。作一个利人的利己者需要一番努力，作起利人的事业，才会感到很满意，实际对自己有利，才能心安理得地“自我牺牲”。

损人的利己、和利人的利己的划分是抽象的，很难有人是三者之一，大多数人是三者之混合体，在人的一生中，有许多利己愿望支配的利己行为，其中有些人是损人的，有些是不损人的，有些是利人的。

尽管人的利己愿望是千差万别的，但同样的都有利己愿望，都要求过幸福、自由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并非绝对的不可调和，相反的，人们联合起来会更有力量。会得到更多的好处，于是，有利己愿望的人结合在一起，过互助的社会生活，人成了社会的动物。与动物本能的联合（如蜜蜂的“社会生活”）不同，人的联合是大家都有利己愿望，都要求生活幸福的结果，是利己以“契约”的方式构成的联合，借助于此种联合调和彼此利己冲突，并争取共同的利益。

国家是“契约”的产物。在国家出现以前，人的社会生活是很不完善的。所以严密的国家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很大进步。有的国家，统治

者利用国家政权为特权阶级服务，并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这样的现象是不理想的。不要忘了人们都是利己的，社会上的人都是利已者，只要有了得利的机会，一部分人就会爬上统治者的特权阶级的地位。

不要把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国家和少数人掌握的国家混为一谈，实际存在的国家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大多数人的意志，同时又被少数人采取。历史上一个个的国家被推翻，随之一个个的国家又重新建立起来，不断在改变着，总之趋势是越来越好。以利己愿望作基础，人能联合起来过互助的社会生活，尽可能地使彼此利害冲突调和，事实证明这样的联合好处很多，对大多数人有利。当人们都这样联合逐渐习惯之后，人们相处得越来越融洽，并且，个别的人离开了社会就几乎无法生活。这里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合作。虽然如此，社会上人与人间的利害冲突还是很频繁，所谓纠纷差不多到处都是。因为人与人的合作是以人的利己愿望作为基础，不是什么铁一般的自然法则。为了调解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利害冲突，社会上不能不设特定的有权机构来处理由于利害冲突引起的人事的纠纷，如法庭、监狱之类。

在没有健全的民主法制以前，人与人间由于利害冲突引起的纠纷的裁判，往往依照少数统治者的意志，或以所谓上帝的意志为根据。少数统治者的意志，有时符合大多人的意愿，也有违背大多数人意愿的时候，当然最能符合大多数人意愿的是健全的民主的法律。

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对于人与人的利害冲突起一种调节作用。与法律相配合的，还有作为社会舆论的道德，是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持的用以评判人的行为标准。以此标准可依据，对于一个人的行为，人们表示赞成或反对，说它是善或说它是恶的。

善与恶是人对人的行为所作的判断，不是人的行为本身所具有。因为在不同的人看来，同一的人的行为可以是善，也可以是恶，无所谓善恶。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人们用来评判人们行为善与恶的道德标准不断在变化，与变化着的越来越完善的社会生活相适应。

社会上人们用来评判人的行为善与恶的道德标准，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利己愿望的体现。要想清楚地了解道德标准及善与恶的问题，必须回到一再提出过的利己原则，由利己原则作出一般说明。利己原则除了肯定人都是利己的，还说：利人的利己受到欢迎，损人的利己受到反对，因为人人都利己　焚例来说，偷东西是损人利己。为了自己的利益，大家都不愿意自己的东西被偷掉，于是大家都反对偷东西，社会舆论就认为

偷东西是不道德的。与此相适应，法律上把偷东西规定作犯法行为。

顺便说一句，法律与道德并不完全一致；有些合法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也有些合道德的行为是不合法的。

好的国家和好的法律能保证人民生活得幸福，怎样才能有好的国家和好的法律呢？必须人民当家作主，按照人民的意愿建立国家和制定的法律。争取民主，也就是争取好的国家和好的法律，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人民的意愿可以充分表达出来并加以贯彻。国家的组织形式及法律程序等不合人民的心意时，可以用民主的方式更换或加以修正，可以不用暴力而实行一些彻底而有意义的改革。在一个不民主的国家里，所有这些都不可能，当人民中大多数的利益受到严重危害时，他们就会起来革命，用暴力手段推翻当时的国家政权，同时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者也向他们进行反击，于是流血的残暴的斗争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已屡见不鲜。

与人民民主对置的是统治者的集中权力。为了有效的行使国家政权，使在全国范围内有利于国家民主的事务进行有一致的步调，为了使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并有坚强的领导，权力的集中是必要的。不过，这种权力的集中必须作为民主的结果，才是民主的集中。集中与民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否则民主将被限制而成为“集中的民主”。民主的集中是民主的，“集中的民主”不一定符合大多数人民的意愿。由于民主的集中与“集中的民主”不大容易分辨，民主的集中常常被“集中的民主”

代替，使民主不能充分发扬。

民主建立的国家和民主制定法律，能使人民享受各种民主权利，为了人民自由幸福的生活，这些民主权利是不可少的。在法律上作为人权看待的自由就是这样，人必须自由的生活，自由的行动，生活才能幸福。自由，不受约束。人可以作各种决定，按照这种决定采取行动。不在他人他物的胁迫下，即没有约束，纯粹是自觉自愿地作出决定，并实行它，这就是自由。不管是一喜一怒，乃至把手举起，似乎是自由的，其实并不自由。推本求源都和别的事物有一定的因果联系。因此，通常谈到的自由，只不过是一种表现的自由，意志的自由。在法律上作为人权看的自由，就一般意义说也就是表现的，不过，它和最广义的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有所区别，有他独特的意义。法律规定的人的自由权利，是有限制的。允许人自由地生活，自由地行动，但以不侵犯他人利益为原则。这样的自由是维护人们共同体中每一成员幸福生活所必须的。因

而是大家的要求，为大家的愿望接受。

前面的叙述中，对个人的利己愿望和利己愿望的个人组成的集体，说得已经不少了。但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领域在前面的叙述中没有涉及，这就是社会上人的各种集团，既不是社会上一个个的人，也不是社会上人的全体。在同一集团里的人，由于有共同的生活状况，使他们的利己愿望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从而对许多问题有较一致的看法。他的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行动着，并不一定是为了自己所属的集团，但他们的利己愿望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因而他们的个别行动往往对他所属的整个集团都有好处的。当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利益是共同的时候，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他们为联合起来向侵害他们利益的人或别的集团进行斗争，他们之中的优秀分子，会为此表现出高尚的利己行为，以他所属集团的利益作为自己最大的利益。

这种高尚的利己行为并不违反利己原则，是可以理解的（一些卓越的文学家了解得较深刻），但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作到的。

所谓阶级就是社会上有共同生活状况的人的集团的一种。比如工人阶级，就是没有生产资料并为了生活下去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人的集团。阶级之间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是不相同的。由于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上出现了阶级斗争。社会上有阶级这事实不容否认，不过也不要忽视各阶级的成员都是有利己愿望的个人（利己者）正如整个社会人的全体是有利己愿望的个人（利己者）组成的一样。致于阶级是怎样产生的，这不是三言两语解释得清楚的问题。通常认为阶级是伴随私有制一起出现的，由于生产力发展，剩余产品有了可能，加上分工和交换给财产的私人占有以便利的机会，于是出现了私有制，随之也就出现了阶级。还有战争中得来的俘虏，令其做劳工可以从剩余产品得到利益，也是促成阶级产生的重要因素。这种说法是可信的，我只着重提出一点，那就是：阶级的形成仍然是以人们利己愿望为基础的，人如果没有利己愿望仅仅有剩余产品，强占剩余产品的事仍不会发生，阶级仍不会形成。不要以为在私有制和阶级出现以前原始人是不利己的，实际上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结成原始群和部落等，并且会因为争夺事物等发生利害冲突。

谈谈阶级也应该谈一谈剥削问题。大家知道工人替资本家干活，并不能从工资得到全部报酬，一部分无偿的劳动被资本家占去了，这种不平等的交易，即所谓剥削。这种不平等交易确实是进行了，但工人不是心甘情愿的。在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之前，工人不得不和资本家进行这

种不平等交易，并且没法争取这种不平等交易，否则就有挨饿受冻失业的危险。工人要求打倒资本家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为了自己切身利益。工人除了争取彻底的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公有制，也进行争取提高工资的经济斗争。工资多少是取决于资本家和工人双方的，一方面要使资本家获得很多的利润，另一方面也要工人的生活得以维持。资本家依靠他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利用工人失业压低工资，工人也运用罢工等手段争取提高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保证资本家获得够多利润的条件下，工人工资的提高是可能的，不一定绝对日益的贫困化。

“利己主义”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方面是：这样那样的人各式各样的利己愿望如何被决定；另一方面是：运用利己原则来探讨各种人生和社会的问题。

在“利己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利己原则是中心，起枢纽作用。利己原则是浅显的，正因为它是浅显的，所以它是可靠的。在探讨人生和社会的问题时，如能注意这样一个浅显而又可靠的原则，对于问题的说明是会有帮助的。当然利己原则并不是唯一可以信赖的原则，不具备别的知识，仅仅有一个利己原则是什么也解决不了的。

为了进一步指出利己原则的功用，下面以商品的价值为例，略加解释。

商品是为了交换而被占有的物品。交换之所以必要，因为分工；占有之所以可能，因为私有。商品有使用价值；即商品对人是有用的，能满足人的需要。商品有交换价值，指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能和另一数量的别种商品交换。确定了交换时商品之间的比例，商品的交换价值就相对的确定下来。商品的交换价值直接决定于交换双方，交换时商品之间的比例，必须是交换双方都同意的，否则交换就得不到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不是因定的，由于市场上商品的多寡，及交换双方不同的需要，商品的交换价值会因市场上供求情况的不同而不同。通常，在一定的供求情况下，商品的交换价值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成正比。如果不是这样，包含劳动量多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不按比例地高于包含劳动量少的商品的交换价值，这时，生产包含劳动量少的商品是更有利的，包含劳动量少的商品就会增多，因而破坏原来的供求情况。结果认为商品有一种既非使用价值，又不与交换价值等同的属性，叫做价值，而把它理解为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并且把交换价值换个名称，叫做价格，则可发现，有时价格与价值成正比，有时不是，有时价格等于价

值，有时价格低于价值，但不远离。这是什么？这就是政治经济学里所说的价值规律，它可以用利己原则来说明。

上面给予商品价值的说明，对于简单商品生产是正确的，但不适用于资本主义很发达的时期。大家知道，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生产部门，在剩余价值宰相同的条件下，会有不同的利润率 顿如商品是按照所包含的劳动量多寡出售，确实是这样。

资本有机构成生产的不同部门利润率不同，由于自由竞争，利润率平均化，随之商品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这就是政治经济学里所谓平均利润率的规律，它和价值规律在表面上是有些抵触的。如何用利己原则来了解平均利润率的规律呢？为此，必须指出，和简单商品生产不同，在资本主义很发达时期，资本所有者是不从事劳动的，资本家凭着他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工人的劳动中取得利润。既然可以自由竞争，哪一个资本家都不愿把资本投到利润率较低的生产部门，相反地，哪个资本家都想把资本投到利润最高的生产部门去。平均利润率规律的实质是：同样多的资本获得同样利润，从利己原则看来，这是最明白不过的。同一利己原则，运用到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同时也是劳动者的简单商品生产，得到的是价值规律，运用到资本家不劳而获的资本主义很发达时期，得到的是平均利润率的规律，两者表面上有些不同，其实质是同一的利己原则在不同条件下的运用。关于地租、地价、商业资本、帝国主义时期的垄断价格及社会主义时期的物质利益原则诸问题，也可用利己原则作类似的考虑，限于篇幅，不能详细论述了。最后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可以由利己原则得出，需要着重的提一提。就是：不断改进的社会制度和不断提高的社会生产力。

好的社会制度能使社会上大多数人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大家都满意，因而大家愿意保卫它；对于不好的社会制度，人们不满意的，人们要求推翻它，改变它。历史上有过各式各样的社会制度，一个个地被建立起来，然后被推翻被代替。在人民能充分享受到民主权利的社会里，社会制度有不合理不完善的地方，能较容易的及时地用民主方式使之改进，不致于发生暴力革命。正如一个好的领导者不是不犯错误，而是善于改正错误一样，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不在于它如何绝对的好，而在于它能及时地按照人民的意愿改变。是否民主，是衡量一个社会制度好还是不好的标准，当不好的社会制度严重地危害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人民不能行使民主权利使社会制度有所改进，这时就发生了暴力革命。不受多数人欢迎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长期存在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必须能满足当时社会上大多数的利己愿

望，才能稳定。不是什么抽象的社会生产力之类在推动社会前进，社会前进的动力是在利己愿望并不断要求这种利己愿望得到满足的社会上的人。社会发展暂时的有坏的社会制度代替好社会制度的情形，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好。

谈到社会生产力，大家都知道，社会生产是永不停地发展着的。但是不要以为社会生产力是自己在那里发展，不是的，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是人。人们为着自己的利益，不断改进生产工具，使生产有计划地进行，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谁都希望在进行生产时能少费力气多获得产品，谁都希望体力和脑力负担很沉重的劳动生产能变得轻松愉快，这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只要办得到，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总是愿意使生产力尽可能的提高。由于重重限制，生产力发展速度是有限的。不好的社会制度会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但不能改变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总的趋势度然提高社会生产力是符合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的， 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也就违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不容许。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好的社会制度被推翻，同时也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1957年6月15日

论现行选举方式的不民主和民主方式的实行

蒋兴仁

——要求民主选举学生会

目前选举方式是党团提名介绍个人优缺点，投票选代表，再用同样方式选举领导机构，没有竞选活动不说明被选人怎样工作，代表人民当家作主的选举，好像选模范一样（其实并不模范），因此实质上不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不民主，理由如下：

（一）提名：提几个选几个，虽说可以选其它的人，但没有竞选，不知另选何人，几个人想另选某人，也等于废票。

（二）提名时是介绍候选人人品，如工作积极（？）思想进步（？）作风正派（？）联系群众（？）等，不介绍他将怎样工作，百分之百的通过，表面上是人民作主，实际上把主权让给他去独裁，选举实际上成为人民出卖主权的手续。

（三）这种选举产生的领导，其工作合乎人民需要也是自然的偶合，产生“三害”确是必然的结果。

（四）选模范（？）式的选举可能选出有德（？）无才和不愿工作的人，把工作搞糟。

（五）这样选举产生的机构的工作不易得到选民的了解，提意见也不知多数少数，采不采纳，怎样采纳，由领导个人决定，根本不一定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名义上的主人，选举者根本无法干预工作的进行，实际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怎样选举才民主

选举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体现，要作到这点就必须实行有以下两个特点的选举方法：

（一）选举前有竞选——由候选人向选民介绍他被选后的工作原则和实现此原则之初步计划——总称施政方针（至于作风正派，工作积极等可介绍也可不介绍）说明其好处缺点。由另外人批评其错误，经过充

分宣传讨论和修正后，再开始选举。

如只有一个候选人，没有与他竞选的人，也这么进行工作，也要充分讨论，这样选举才是选原则，选计划，不是选模范人品，才是选民意志的执行者，才是选民自己当家作主，不是另外找一个主人。

（二）选举后被选人必须向选民报告工作计划执行情况，困难，缺点和对当前重大问题处理方法，举行辩论会及讨论会，在原计划未执行和有新问题解决方法不令人满意时要投信任票，罢免改选。

（1）选举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选民是选自己的意志，不是选某人的人品。

（2）　保证工作，代表人民意志不是代表个人意志，不产生独裁和严重的官僚主义。

（3）　保证选得其人。不称职不愿工作的人，不敢竞选也提不出代表人民的施政方针，也不会选上。

（4）　选举的机构是代表人民的意志的执行者，施政方针已得人民同意，更易深入人心，容易得到人民的支持。

（5）直接受到群众监督便易防止三害。

民主方式执行原则

（1）从基层作起，从百家争鸣已经开展的地方作起。

（2）　　供给任何人竞选的一切物质手段（如宣传费，以前工作情况，存在问题等各方面的资料）

（3）消除一切顾虑，鼓动人们提出各种意见，竞选纲领，互相批评。

（4）　用法律保证没有拉拢，收买，威胁人，其它任何破坏宣传和选民选举的行为。

（5）　党的领导体现在提出正确的施政方针，派出优秀的竞选人，不体现在其它制度上，这样的领导才是人民选出的，不是强加的，才能够联系群众，不产生三害。

实行步骤：

（1） 首先在北大试验民主选举学生会，然后推广到各高等学校学生会，各地群众团体，合作社，工厂等基层单位，以致全国政权。

（2） 在北大实行的步骤：——马上确定学生会任务，宣布具体选举法，在本学期开始，候选人提名，提出初步竞选纲领，收集同学对学生会的希望和意见，进行初步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在放假前正式确定候选人名单，各提出完整的竞选纲领（工作原则和初步计划）利用各种形式正式展开宣传活动，下学期初步进行选举，建立民主学生会。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

陈爱文

这次运动中，有人好谈社会主义制度问题，有人忌谈社会主义制度问题，交锋之下，前者宣布自己应不反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只是要改进某些“具体的制度”

后者也声明并不反对某些“具体制度”的改变，双方突然失去了争执的凭借——然则又何其汹汹滔滔乎！

斥绝社会制度；社会制度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文，它要有书面条文的根据（宪法根据），更要有社会风气、社会力量的支持，它是活在广大人民生活中间的有生命的东西。 因此， 一种制度的形成必然经过如下的历程，争取——宪法——再争取（争取立法的实现）。中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正在走着这样的历程：1919年革命开始，到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是第一步；解放后一系列的法制，特别是1954年社会主义根本大法的订立是第二部， 紧跟着第二步而来的第三步， 正近在眉尖，1954年订立宪法的时候，许多人忙于唱赞美诗，很少有人严肃地考虑，如何实施的问题，所以有1955年肃反中许多地方破坏法制现象的出现；宪法规定有言论自由，通信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等。可是有的人却由于说了几句不同于习惯教条的话正被指为“反动言论”；有的地方公然检查信件，必然把正当的友谊聚会诬指为“小集团”甚至“反党集团”；有的地方甚至非法拘禁，变相审讯，如北大24斋就一度被代用作牢房，这些明知是非法的，但是在当时却到处诉说。这说明了，仅有书面的条文，如果没有社会力量的保障，就不能说这社会已经有了某种民主制度的建立。必须有群众的争取，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今天的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迥异于过去统治者和人民大众的关系，但是矛盾仍然是存在的。有了中央的鸣放政策，还必须加上群众的争取，才能够冲破保守力量的阻挠和束缚，才能保证贯彻中央的意图，民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部分和全体的关系，民主制度还没有完备，恐作风问题是错误的，（原文如此编者注）但是把它看作社会主义制度所导致的，也是错误的；三害得以泛滥，是由于社会制度还没有建立完善。我们目前的任务是：

争取宪法的彻底实现，切实保障民主自由人权，使社会主义制度臻至完善。

如果有人问你们标榜的是哪一种民主，我们答：是从“五·一九”开始的，在民主广场上自由讲坛上出现的，正在继续形成和发展的这样一种民主，不是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我们要把它巩固下来，并逐步地推广到全国范围中去，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目的。‘’侈谈改革社会制度者可以休矣，假如你们要改变的也不过是人事档案制度，留学生制度等，请注意这些并不是社会制度。假如，这并不是社会制度，假如你们要争取的也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请注意，这正是我们要建立而没有建立好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

但是我们反对人“挟天子以令诸候”，他们把一些离开传统习惯的见解都指斥为“离开社会主义”。肯定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是，经济上的公有制和政治上的人民民主专政，没有“否定这个原则的，就不能妄指为“离开社会主义”。

我们同意陆定一的话，要在风浪中站稳立场，而我们所理解的立场，并不是现在有些人所理解的凝固的狭隘的不顾事实的成见，只有没落阶级的立场才是偏见成见，先进阶级立场水远是代表历史前进发展的要求的。

收起那些“耸听”的“危言”！摆脱那些“规戒”和“禁忌”！拿出主人的态度来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肃反运动论纲

江 文

北京大学1955年暑假的肃反运动斗争错了那么多人，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让我来谈谈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区别“肃反工作”和1955年夏开始的以胡风集团为典型，以广泛开展斗争为形式的“肃反运动”这两个概念。毋庸置疑，肃反工作对过去·现在·将来都是需要的，本文专谈后者。主要论点如下：一、当时局势，1953年朝鲜停战后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1955年的国际局势趋向缓和[1] 国内阶级关系并不是“日益尖锐化、深刻化、复杂化[2]”。资产阶级在改造中力量日薄，工人阶级的领导日益加强，阶级矛盾不可能日益尖锐化。有人认为，直至1956年底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那时起，阶级关系才趋向缓和这是割断历史的看法。在此之前，已是彻底改造的准备阶段，矛盾当然不会尖锐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合作是有历史传统的。

[1] 见周总理在二届政协二次全国委员会上的政治报告。

[2] 见本文第二点张仲纯的报告。

二、肃反的指导理论，张仲纯同志的肃反动员报告说：“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深刻化；复杂化，从理论上苏共党的历史上来讲是如此，目前中国情况也是如此（？江文）

因此就有必要开展肃反运动，当时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提高警惕反对麻痹”一文的基本思想亦是如此[3] 这种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绝对尖锐化的理论早已破产，不须再驳。

[3] 见55年6．30《人民日报》社论文三、肃反方针“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不冤枉一个好人”以及后来提出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和“不杀少捕”的政策，是正确的，使错杀和大量错捕可以避免，没有造成斯大林式的悲剧。

四、肃反的敌情估计：开始阶段提出“百分之几”[4]“百分之五”[5]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北大大约斗了二百多人。

[4] 5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

[5] 史梦兰肃反报告“大约有5%的反革命分子、 坏分子，不过我们在班上不要掌握这个比例。”

以百分之五推算（如财政部电力部[6] ）虽然简便，但为有头脑的人所不为，大家知道“中国的情况极为复杂”[7] 根据主观意测的数字开展斗争实属可笑。有人认为，上级也无硬性规定为百分之五，我想这个对敌情的错误估计，在当时实际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是造成肃反扩大化。

[6] 今年5月19日15日《人民日报》。

[7] 毛主席七届三中全会报告。

五、检查肃反运动的主要标准。我们和史梦兰同志不同，他总结成绩说“发动了群众，开展了××次的斗争（具体数字党委会有案可查）”。我们认为应以客观效果来检查，不能以斗争次数来信定成绩，事实上，这数字在估计错误时引用它反倒适宜。我们以为斗错了多少人，就是错误，斗对了多少人就是成绩。（全面估价不拟在此详述）总之，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之下，在错误的领导思想和敌情的估计之下，绝大多数的斗争是错了，到底有几个对的，因数字保密，我不得而知，这样还能说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是正常的吗？还能背“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难免的”公式吗[8] ？固然我们亦不应忘记肃反后一阶段转入以审查干部追查校对材料为主要方式，运动基本是健康的，获得了巨大的成绩。肃反运动错误的根源，不在工作方式，而在于脱离群众，以宪法人权为儿戏的官僚主义；以搬运公式为满足的教条主义；以及不准阿Q革命的宗派主义[9]。

[8] 史梦兰肃反总结。

[9] 毛主席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到《阿Q正传》的报告。

论人事档案制度

江 文

——请教严仁赓校长助理并致国务院人事档案制度的建立，基于两方面的作用：一、系统全面地了解干部的历史情况、工作经历，优缺点及受过奖惩等，作为使用干部的依据之一。

二、审查干部的政治情况，防止反革命分子混入内部。

前者是内部问题，属于民主范畴；后者是敌我问题，属于专政范畴。前者对干部本人可以公开，后者必须严格保密。过去我们大量吸收干部，对他们的情况还摸不清楚，敌人也乘机混入是现在国内敌我矛盾基本结束，经过肃反、审干，干部政治历史情况基本弄清，人事档案制度第二方面的作用也基本结束了，因此档案材料对干部本人就可以而且应该公开。

至于发现个别干部有反革命嫌疑的，应该由公安部门建立档案进行侦察，这样做的好处：①可以迅速证实材料的真伪，及时破案；②怀疑未证实以前，不会影响干部的工作和政治生活。如果把这些材料放在人事档案里边，由于人事部门没有侦察破案的力量，对于坏人，不能及时查出，对于好人，则使他长期蒙受莫须有的嫌疑，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在实际工作中，已经产生下列主要消极后果：一、造成人事干部及某些党员的特权思想，最近《人民日报》已经揭发了许多事实。我校也有这种情况，有诗为证："……情郎名叫档案袋，姑娘倾心好几载，姑娘啊，只怪你思想与他（档案袋——本文作者）有界线，怎怪他不与你结姻缘"

（见16斋东墙底下，李丰楷，赵振忠，李林活，蒋镇，王磊，张钟所作广场漫步）诗意虽然隐晦，正好道出了某些人的心理，以为"思想有界线"的普通人是没有权利看自己档案袋的，而只有那些"思想没有界线"的人，才有权利看别人的档案袋。

二、 不与本人校对， 造成某些诬告及误会的漏洞，如中文系新闻54级有一位"积极分子"（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恕不指名）秘密检举了一个同学，说他曾向自己打听江苏省公安厅派往敌区工作人员的名单。幸有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被检举者发觉，才查明是诬告的。试想，如果不被发觉，将对他造成怎么样可怕的影响。

三、由于某些领导者对干部的片面的评语，及一些莫须有的材料影响了对干部的正确了解和使用。

四、形成干部对领导的隔膜和怀疑。“到底他们对我的看法如何？”“是否在我的档案袋中放进什么材料？”这次运动中不是还有人担心自己写的大字报会被装进档案吗？

校长助理严仁赓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答复说：“此系国务院规定必须保密，以后的鉴定材料，会经本人同意”连研究研究，向上级反映的余地也没有。难道国务院规定就不可以重新考虑吗？今后固然要防止错误，可是，过去材料中的错误，就让它过去吗？我们要求以理服人，不要以“令”服人，在新的时期下沿用旧时期的人事档案制度，正是产生三害的根源之一，改变这种过时了的制度，正是整风的目的。

再不整风中国将非常危险

胡稼胎

胡稼胎说：再不整风中国将非常危险，农民有许多是吃不饱的，如果逼得他们起来，党员们的性命都有危险，应该猛省，不要苟安。党委会在学校弊多利少，应退出学校。

他说："最近几年来，我深居简出，尽量减少和别人的接触，开会从不发言，尽量减少和别人的接触，但在解放前我并不是这个样子。在武汉大学时，我担任教授代表，在教授会上向贪污公款的工学院长开炮，仗义直言。今天毛主席提出整风是非常英明的。再不整风中国将非常危险。农民有许多是吃不饱的，如果逼得他们起来，问题就非常严重，党员们的性命都有危险，应该猛省。不要苟安。党委会应退出学校。走社会主义的路是大家肯定了的，已载在宪法上，党委会学校妨碍群众的积极性，弊多利少，党员向党报告教员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教员怎么积极起来呢。不借业务或业务不高的人领导业务，要在十二年内赶上国际水平，无异缘木求鱼，空中栽树。过去把人分为进步、中间、落后三种。我大概是被认为既落后又顽固的人。这种标准是人为的，应该撤销。党员被认为是进步的，但现在看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又那么多，这都是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因素，又怎么能说得上进步呢，而那些拍党员马屁的所谓积极分子则是墙和沟的建筑者。

（原载北大校刊125期）

发言综述

胡稼胎

他对农民看法的“根据”

甲、在七7月1日的会上，他说：农民，是根据我的经验和报上看来的，我的堂兄弟来信向我要钱，我儿子的同事出差到洛阳，看到农民很苦，又听到经济系陈振汉先生的发言，我讲的是根据少数听来的话。农民有5亿多人，我讲的是一小部分，诸位讲的也是一小部分。我讲这话，以后不久报纸上就发表广西的事件。

（齐香先生接着说：我们不要求你们解释，希望你端正立场。）
乙、他说“我自然是个地主”，但是，“我的情感是农民的情感”，“所以这次提到了农民问题”。在7月2日的大会上，他说：关于农民问题，我在14岁以前一直在乡下，我也放过牛，从前乡下农民苦，我知道的比你们多，所谓镰刀一上壁，家里没有吃。我自然是个地主，有四五十亩田，雇工种田的。我依靠田上了学，我进了香港大学，除了家里寄钱以外，有官费，有县里的津贴，我的兄弟也依靠田地进了大学。我因为看到农民苦，所以田租比人家收得少。我是看到农民苦，才这样做的。所以我说我的情感是农民的情感。也是因为我有农民情感，所以这次提到了农民问题。我从听到农民生活苦的个别事实推论到农民苦，是逻辑错了，但另一方面也是我有农民情感。

他对党委会可以退出学校的根据

在7月1日会上，他说：我也表示这样的态度，党外的人是客人，党请客提意见，可以只提缺点，并不是请我们来恭维党的。当然像章伯钧，储安平那样大骂主人失去了客人的身份。党的成绩我也讲过，最大的成绩是改变了中国百年来受屈辱的地位，我不相信罗隆基，章伯钧等夺到政权后会搞得好。因为人总有错误，世界局势可能有变化，所以一定要首先做到内部团结，北京大学靠近中央，又有党员副校长，可以够了。党要依靠群众，党委可以退出学校，是因为它有三害，如果能改掉，当然多些人做事也好。学术方面的领导有党员很好，没有也可以，只要有人掌舵即可，因此，只需两个党员副校长，这样也就可以在政治思想上领导了。我觉得我说的话和周总理的话意思差不多。

“我的话也许有错，因为人说话不见得合乎逻辑”

在7月1日会上，他说：许多话我在小组中已谈过，有的话传得不正确，说80％农民没得吃，我没有愚蠢到如此。

大家诚恳的动机，我很感激，我从儒家观点接受马列主义。儒家是讲仁的。所以接受社会主义，我觉得剥削是不合理的。年纪大的人有许多思想不能改掉，而且这些思想与马列主义并不抵触，我接受马列主义是移花接木式的。

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没有加入过任何党团，因为我没有政治才能。如果有政治才能的人当然参加政治团体。我认为党整风是好的，应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我对党是善意的，因为本着儒家博爱的精神，我的话也许有错，因为人说话不见得都是很合逻辑。

他说党员是便衣警察，他认为是逻辑问题在七月二日会上，他说：党员是便衣警察，我认为是个逻辑问题，我把自己经历过的少数事件，推论到党员是便衣警察，这种推论方法是不对的。我班上的同学向领导汇报我的情况，我认为学校是党委领导的，所以就想到报告的是党员，就得出，党员是便衣警察的结论。

他的“动机““效果”和“产生效果”的“原因”

我的动机是本着儒家精神，但许多说法与儒家精神违背，这个意见我接受。关于“三害”问题，我说过共产党有成就，也发生了“三害”，但如果让储安平等人上台执政也不可能免去三害。人看问题是有许多毛病的，我说话主观方面是没有仇视党、敌视党的，但效果却如此，原因是因为我只说了党的缺点，没有说党的成绩。

突出地提出了党的“三害”。

他认为他的错误在于“用字上欠斟酌”

在7月2日会上，他说：有许多人提到立场问题，这可能是个问题，我是从儒家立场出发接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有仁爱精神与儒家相同。我是从团结愿望出发对党提意见的，但因用字上欠斟酌，结果与原意相反。我的话在听到的人看起来好像与右派野心家的言论互通声气。

最后，蔡鸿宾同志说，听了胡先生的辩解，我准备的发言显然是“落

后”了，胡先生口口声声相信党，爱社会主义，但从胡先生的言论看却完全与资产阶级右派息息相通，这不是资产阶级右派，又是什么呢？董桂枝同志说：我不同意会这样开下去。我建议扩大这个会，邀请同学和系外的教师参加。希望他（胡）好好想一下，在会上表示态度。此外杨周翰、杜秉正、杜美、曾藩本、袭景浩、陈占元、赵琏和罗经国同志等接着发了言。对胡稼胎先生的不老实狡辩一致表示气愤。有些同志要求胡先生深思和猛省，否则就要斗争到底，最后主席表示接受大家的要求，研究召开扩大会议问题，对胡先生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彻底的批判。

胡风绝不是反革命

刘奇弟

反胡风运动已过三年了，胡风及其“集团”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遭到镇压，今天旧案重翻，我要为胡风说话，更精确地说，我要为真理说话。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作为一个公民，我来过问法律，这是正常。我的行动有宪法支持。

胡风是怎么一个人？

凡是正视事实的人都会清楚，在解放前胡风是一位进步的作家，是民主战士。

他辛勤地追随着鲁迅；在那万恶的社会里，他向人们揭露黑暗指出光明，他为青年所爱戴，尊敬。正因为这样，正凭着这点，在解放后他才被选为人民代表。解放后他更不懈惰，带头高龄跑这跑那去乡下参加土地改革；在朝鲜抗美援朝，勤勤恳恳体验生活，从事创作。他们（胡风分子）写的作品有血有肉，最为读者所喜爱。这类人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什么？世上还会找到这样一种逻辑，把他们说成反革命。

看！这种控告和判决到底有没有理？

关于对于控告胡风的内容，不外就是那三次反胡风文件，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们再来看一看，它到底有没有理由？回答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反把闲人聊天、侯宝林说相声的逻辑和推理搬进了法庭。像这样的办法，只要他说过话写过东西，都可以按这种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办法，用说相声的逻辑推演成反革命。

请问，这能当作控告吗？

因此，自勉为要作个正义的维护真理的人的我是不能不大声疾呼！

胡风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同学们，你们认为怎样？让我们彻底搞清楚吧，假如你们也认为胡

风被冤枉，那么让我们一道来要求释放胡风吧！

要知道救人命不但胜造七级浮屠，而更是为了支持正义，维护真理。

（1957年5月）

论当前整风——民主运动

刘奇弟

（一）运动的性质

（1）整风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是自上而下，要求思想改造。

自从党中央决定整风、毛主席提出百家争鸣以来，全国各地火热地展开了这一运动，出现了一片令人兴奋的新气象。党外的民主人士以及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大胆地热情地向党诉说出长期被压抑而又不敢说出来的知心话，并且提出了许多批评和意见，至今党中央是非常重视和很诚恳地接受这些善意的批评和意见的。

党中央决定整风，毛主席提出百家争鸣，这说明党中央和毛主席预见到这运动的必然性和它的必要性；说明共产党和我们的领袖是发展着的，进步着的，而不是腐朽着的；这说明我们人民还需要而且应当由共产党来领导，虽然运动还刚开始，但我们有理由来深信这一点。

（2）民主运动由群众自发，是自下而上的，要求改革（不是推翻）制度。

一旦整风成为群众性的运动时，一方面是百家争鸣，另方面是群众自发性的民主运动必然兴起，这是客观事物开展的必然规律，是不随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民主运动正常地是随领导的预示而导发的。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矛盾是人民内部的，而不是敌我之间的。否则，民主运动将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而是在“造反”。

说到这里，我们还不能肯定：党预先完全估计到今天的运动情况的，运动中的许多现象表明事实上也不是这样的。但我们不能从此得出党落后的结论。我们深信党在对待和解决这民主运动的问题中是会体现出它的英明和伟大的。

（二）运动中存在着的问题

（1）偏激情绪：

话闷在心里闷得太久，一旦倾泻出来，言词、语调上的激昂是可理解的。受过“三害”伤害的人更不用说了。这现象是不太好的，所以大家都在改正这一点，然而，这并不是运动中的重大问题，而问题却在于，有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把“偏激情绪”当作运动的障碍来围剿，而把“三害”却丢在一旁不骂，我们希望参加围剿的人仔细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这种围剿是不是就等于保卫社会主义？

（2）习惯势力：

为数不少的人都是这样，在习惯势力控制之下。他们的心地都是好的，对党非常信任，但是他们不习惯于思考，一旦有人提出了新的问题，他们还没把问题弄清楚就盲目地加以反对，要是有人（保守者）对这新问题加以歪曲和恶意地引伸出其它结论时，他们就更加激昂和愤慨了，“指责”就像骤雨一般地落到提问者的头上。

对于这种被习惯势力控制住的人，我们深为同情，并且要与他们携起手来，在运动中一道前进，互相启发和教育，发扬辩论、独立思考的风气。

（3）保守势力：

这种保守分子很难说他们有什么好心，更谈不上信任和爱护党。给他们取个浑号——“三害”的卫道者，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他们思想贫乏，理论空虚，他们的演讲和文章，只是教条和口号的堆砌。他们腐朽、没落、软弱无力，是永远阻止不了运动的前进的。但是由于他们的缠绕，往往浪费了我们许多的唇舌和精力，他们搬弄许多好听的口号，有时还能欺骗住一部分群众。以后，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吝音一些，在群众面前揭穿他们后就够了，不要再跟他们多罗嗦。他们的脑子已经僵死，只剩下驱壳了。我们要摆脱他们，大踏步地前进。

（三）党将采取的政策和步骤

我不是党员，不能肯定党将会采取什么政策和步骤，现在我只能在理论上作几种可能的推测，并略加分析。

（1）仍然决心彻底整风，欢迎和支持民主运动。

这将是党最英明的一着，是适合于广大人民的要求的，它将使运动最顺利地前进，得到完全的胜利。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

（2）整风缩手缩脚，忽视民主要求。

这是愚蠢的做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许多现象表明就是这么一回事。要真是这样，其结果便是“整风不过一阵风，批评建议又落空”。这样，矛盾没有解决，不能不令人感到忧虑。

（3）物极必反，大开杀手：

这是人们想也不愿意想到的事情。　　但我们不能不想到其可能性。（哪怕是1／10000的可能性也罢，　　由于它的严重性，我们不得不重视。）显然要是这样，人民内部矛盾即会转变为敌我矛盾，党将自己否定自己，人民会不惜再度流血来争取民主和自由，争取一个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社会。

（四）运动的几个阶段

（1）继续揭露矛盾：

运动开始以来，重点是揭露矛盾。这个方面做得比较好，现在已经进入探讨和争辩的阶段。运动深入了，思想细致了，但我们不能忘记和停止揭露矛盾。有些人由于顾虑，还没有说出内心话；有许多问题，由于习惯势力还没有能够提出来，在探讨辩论的同时，我们还应不断地广泛地揭露矛盾。

（2）深入研究，在理论上解决问题：这一阶段已开始了。拿我校来说，已经树立了独立思考，深入研究和说理争辩的风气，这是可喜的，但不是人人都如此，有些人还假借种种原因（功课啦、身体啦、考试啦、与业务无关啦）不愿动脑筋而袖手旁观，甚至不闻不问，我们觉得这是不应该的。作为一个大学生，一个知识分子，是应该密切注意社会运动和国家大事的，是应该对各种问题深加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的，要求民主，就得有民来主。

（3）要求政府整风有头有尾，监督政府进行制度的改革和改进：这是整风——民主运动的最后、最有实际意义、关键性的决定整个运动的成败的阶段，要是没有这一阶段，或这一阶段的工作搞得不好，整个运动必将残缺不全，前功尽弃，一无成就，或虎头蛇尾，达不到什么效果，不了了之。

可是一些人却往往忽视了这一阶段，忘记了我们这一决定性的工

作，他们之所以会如此，不外由于这几种想法：（1）　　整风是党的事情，我们不过是帮助党整风，提些意见，批评一下，也就算了。

（2）民主是党的恩赐，给多少算多少，不必强求。

（3）　党是英明伟大的，会知道怎样做，一定会做好，用不着我们去多操心，更用不着监督。

显然，这些想法都是不对的。因为：（1）　整风的确是由党领导，针对党本身的事情，我们是帮助党来整风，这却不等于整风不是我们群众的事情，把群众当作客人，只能看党的面色行事。就像病人请医生治病，医生帮病人治疗，不等于治病不是医生的责任。医生是客人，医生只能将就病人的口味来下方。何况党害了病，受苦的不仅党本身，受难的是全国人民（是医生）。

（2）　民主运动是党的恩赐吗？决不是。诚然党领导着全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人民才拥护党、爱戴党，要是党不全（心）为民主而斗争，它就没有这一切。要是他停止为民主而斗争，它就会失去这一切。为民主运动而斗争是作为党领导的必要条件，是党的责任，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赐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说民主是党的恩赐与说生命是上帝的恩赐是同等的愚蠢。

所以民主不能是给多少算多少，而必须充分而完整。

（3）　党的确是英明而伟大，的确会知道要怎样做，我们也深信会把事情做得好，但是这一系列的“确是”“的确”“深信”是基础，保障这一系列的是什么呢？

是党与群众密切的联系，是群众对党的爱护，是群众对党的监督，没有这一切，这一系列的“确是”、“的确”、“深信”是不好存在的。

同学们，同志们：整风——民主运动是与我们血肉相关，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是运动的主人，我们绝不能看谁的脸色，绝不能将就谁的口味。我们懂得怎样对待敌人（反对公有制者），我们懂得怎样对待朋友，我们懂得怎样爱护我们的党。

让我们更加团结起来，将运动推向另一高潮（第二阶段的高潮）。最后的，全面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社会主义公有制万岁！

社会主义民主万岁！

说明：

1．本文曾参考各大字报，但未援用原文，故不将一一列举。

2．由于篇幅限制，　本文未引任何材料，这些材料周围太多了，举目皆是，请同学们自己去挑（若高兴的话。）3．对本文或作者，有意见而不愿写大字报者，请将意见和批评写在下边。

三害根源

张锡锟

（一）制度问题

制度可以笼统地讲，不必加注解，说什么具体制度，制度中的某些环节。一些人一说到制度问题特别小心，硬要加上具体的制度，制度的环节。这样一来可小心翼翼地说小制度，很小很小的制度。

（A） 制度是人订的。而每个人都有其局限性、两面性。制度要不断改进才能达到完善地步。必须破除人们对具体制度的迷信。

（B） 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制度上。制度并非神圣不可侵犯。这也不是个别环节。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有些相似。官僚主义一定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不一定是官僚主义。两个主义没有本质区别。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人的思想意识落后于存在，这仅是产生三害的一方面；而目前官僚主义普遍的现象又如何解释？历史上程度也不同，这又为什么？这是由于制度不同。

要扩张它还是收缩它，是制度与官僚主义接近还是远离，民主还是独裁。

如社会主义国家严重程度不同，既变成社会现象，就要从制度中去找。不然，为什么会变成普遍流行？因为有些制度方便于成长。

在我国1954年宪法出来后，人们乐于歌颂却忘了切实保障。如肃反时人身侵犯，以后又压制人们发言；又如24斋的牢房，公民人权无保障，法制不健全。又如损害名誉，动不动就是立场问题，一些人利用统治地位损害人权，败坏社会风气。

官僚主义者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不是不知道。领导也不在乎，一手垄断，在人权无保障下作威作福，表面上（还是喊）为人民服务。

又如选举制度，选举几个提名几个。对选拔干部，不要光是来个工作积极，是个什么模范的介绍，还要考虑他们的思想方法。有人对在大饭厅投票，大喊幸福，这难道是心坎中发出的微笑？实际上我们并未干预政治生活，连被选举人也不认识，一提意见就加

上“反……”“反……”层层选举没有直接选举好。这并不是说资产阶级选举方式好。连班上也如此。这就更不必要。一些干部总商量把谁调回来，调回来干吗？强加于同学头上。

集中制度上的问题说的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往往片面强调过去阶级斗争时期集中多，阶级斗争缓和以后，人们思想意识落后。如工人委员会比厂长制就好。注意不要落在时代的后面。

政治思想上落后进步在宪法面前应平等。但并不如此，如考大学许多人因政治条件不好而不取。又如政治课必修问题。明明宪法规定有信仰自由，而又规定教徒必修猴子变成人；这平等吗？

（C） 不民主的统治方法，人民从何处监督。光喊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形式主义的签字，权限不下放，实际上讨论机关都无权。

（二）可耻的社会力量的支持，思想懒汉，满足于作应声虫——恶劣的社会力量，对领导盲目服从，对指示盲目推行，对下压制。

若没有这股社会力量，官僚主义不可能到处横行。人们习惯于体会领导意图，以为左倾比右倾好，以为这是自己具有的身份，天生如此，还自认为立场稳。不体会反面就会夸大矛盾，强加于人民头脑中，以为人性次要，阶级性重要。一些人在以白骨搭成的梯子往上爬，良心何在？要摧毁这股力量，必须有积极力量对应声虫回击，尤其是抬轿子的人。

（三）思想上的问题

这与宣传机关有关，要消灭家规的矛盾。我们作的应是教导人们接近客观真理，但同学得到的是教条化的东西。

“愚民政策”——凡是使人民是非模糊的宣传都是愚民政策。如保密制度，连永利碱厂碱的产量也保密（化工老师讲的），这除了增加人们的愚昧又有什么？经济上绝对数字的保密，相对数字的迷惑人，如二十大赫鲁晓夫报告中谈各国生活增长倍数，从而得出社会主义优越的结论。增长情况总与基数有关吧，同一水平比才行，这就是愚民，使人信服得五体投地，造成印象不真实（而政治经济学就好些）这就是扩大矛盾。此外航空学院连牌子都不挂，其结果也不过是愚民。有的地方连蒋光慈、黑格尔的书都不许看。又如科学院、原子能、国防化学方面的保

密。

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宣传上的片面性，也许我说这个又会来个立场问题。过去把社会主义说成是天堂，都说成是“最……”“最……”这等于告诉人们不要再前进了。还要什么实现真理？连政治先生也说过：“过去对社会主义宣传得太好，几乎完整的没有缺点。”要全面认识，好像资产阶级的东西一切无可取之处。

科学宣传的片面性，自然科学方面对摩尔根一棒子打死，对自然科学要谈阶级性，扣上一句唯心，加上一棒打死；把罗蒙诺索夫说成十大家，石像放在大图书馆，似乎一切文明都成了俄国的。偏要如此灌输，使人们不能认识客观真理。对斯大林盲目崇拜，对经典著作不能批改，当作神明，从这意义上比作圣经也不算错，教条主义统治比作中世纪的教会统治也完全可以。在形式上可与日本武士道、希特勒统治相比。

从前宣传苏联一切是天堂，二十大以后才知道农业落后，官僚主义者在银幕上出现足见普遍，但也说明了英明。又如匈牙利问题，从前宣传得一切好极了。匈牙利事件爆发以后原来乱七八糟，这难道我们不知道？只是有意识地愚民。

又如南斯拉夫问题，过去一切骂够了，现在只称之为社会主义，难道会不知道？

我们党水平那么高，难道是不是社会主义也不会辨别？到现在资料还是知道得很少。

愚民政策问题，不动脑筋的人得到欣赏，有意见的人就一直压制，我只管效果不管动机，有些问题党不是不知道，除了增加愚昧还有什么？凡是混淆是非都是愚民政策，不管动机好坏，但导致效果怎样呢？

人民盲目崇拜领导，便非常欣赏，认为立场稳，于是积极分子提拔成了官僚主义。用信仰代替知识，首先是信仰，把知识推到微不足道的地位。这不是愚昧又是什么？就是不要人思考，一棒子打死，效果就是爬上去，说好听点是领导，说得不好是统治，在思想上把矛盾拿开。

上述三方面汇成了一股洪流。

卫道者“逻辑”大纲

张锡锟

近来， 不少时髦之士纷纷出头， 一些人对卫道者一味进行标榜，场尔者为在“卫道者”三字前，冠以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或是更美的字样，不过这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相反地却说明了“卫道者”离开了那些用以吓人的字眼而外，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大家对教条主义者的嘴脸，我想还记忆犹新吧，它之所以厉害，不就是装出一副马列主义的面孔吗？不就是拿着镀有马列主义的皮鞭在那里挥舞吗？所以我要提醒你“朋友，这已是老面孔了，群众不再是那样容易被吓到的了”！

另外一些人，企图把“卫道者”和群众混淆起来，其不过是想欺骗群众，以达到迷惑一部分群众去与“卫道者”为伍的目的，故必须把“卫道者”的面貌，用下面大纲方式描绘一下，以期稍微明晰一些：逻辑大纲

1．党的错误是个别情况，对它批评就是反对全党；2．民主自由是党的恩赐，再要索取就是煽动闹事；3．歌颂逢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4．万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话就是毁谤造谣；5．盲目服从是思想单纯，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6．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则，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马列；7．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责就是阴谋造反；8．政治等级是统治杠杆，取消等级就是制造混乱；9．苏联一切是尽管搬用，谁说教条就是挑拨苏中；10．“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谁若过敏就是别有用心。

凡具以上属性者“卫道之士也”。

人性的呼唤

张锡锟

人在形成过程中，人性亦随之形成。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人性也同时充实着自己的内容。但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起，人开始具有了另外一种属性——阶级性，加上人们的种种阶级仇恨的教育，人性就在阶级矛盾的掩盖下，被冲淡了，被忽视了！（如各种酷刑的出现）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本应使人性得到更多的尊重，但恰恰相反。由于过分地强调了阶级矛盾、仇恨，所以一些绝灭人性的东西无阻地发生了。（在各次运动中），对阶级异己加以私刑。如不准休息、吊打……以及其他肉体摧残。与此同时，官僚主义者对人身进行了无形的迫害。由于法制的不健全，所以这些恶劣现象在社会上未被有效制止，所以社会风气开始败坏。

儿子可以对父亲任意谩骂，甚至将其捆绑、鞭打……学生开始以无人性的方法，以得到领导对其阶级性强的信任。无人性成了得到信任的强有力的工具了！于是扣大帽子之事风行了，每逢一人，就迫不及待地千方百计的想将人证明为反革命，所以把一切生活琐事以及开玩笑的话，都搬来作为口实，而进行荒谬的推理。将其推向反革命的边缘。（当然，若有一点可能，早就被叫成反革命了！）朋友，人性安在？

你有生活得更好一点的愿望，难道你的同学就没有生活下去的起码要求吗！朋友，想想吧！不要再出卖良心，不要再屠杀自己的兄弟吧！回到人性中来！！

“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

龙英华

先讲关于反社会主义言论和对《人民日报》社论的评论。我认为重复大家知道的东西，就是教条主义。

过去反社会主义言论藏在心里，现在说出来了，很好。说明社会主义民主扩大，说出来我们知道了，有利于思想改造，有利于给我们上课。我看反社会主义言论有这些：①我所要的是理想的社会，要不要社会主义无所谓；②“党天下”，共产党可要可不要，民主党派和党自由竞争；③自由主义宣言，不承认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④有人主张由下而上地搞，像波兰、匈牙利的方式，这样国家生产会受到损失（暴动、罢工、罢课）。

整风是扩大民主，可以和教条主义斗争，斗争后可以出现新事物。

关于《人民日报》社论（指：“这是为什么”等），用辩证法看，好的是主要一方面，缺点是次要一方面，全部否定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另外有教条主义（全部肯定）和修正主义（全部否定）的态度。社论批判反社会主义言论是正确的，因为需要提高警惕性，但从辩证法看，也有不好一面，对恐吓信的分析不深刻，对怎样区别反社会主义言论分析不够，给了教条主义者以把柄，如临大敌，不分好坏，打击积极分子。

“自由主义宣言”出现是一件好事，证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在北大大大发扬。大家知道了它存在。不要把他们推到帝国主义的一边去，要客气一些，说理吧！我们占了半个地球，心胸要宽大一些。批判右派，右派可以转化，转化了就不叫右派了。

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比马、恩时已大大变了。但有继承性，列宁、斯大林学说是发展。现在来论述下列问题：

一、世界向何处去：这是关键问题。有些我也只是“猜想”，恩格斯曾说：只要科学在发展中，总是需要“假设”的。我认为世界是人类大家庭。人类的共同敌人是自然界。自然界与人类有一致的方面，也有矛盾的方面。人类不分阶级在自然面前是一致的，在氢弹面前人类有一致的利益，一丢下不管哪个阶级都被炸死。所以大家感到战争打不得！（当

然我们还要预备氢弹）战争有转化为和平的可能。人类对抗性的矛盾有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的可能。这样战争转化为和平、变为人类进步。

美国有（一）亿多人，有六千多万工人，他们生活得很不错。英、法、西德工人阶级也类似。你去发动武装起义试试看！过去美共教条主义碰了钉子，脱离群众，教条主义破了产。英共也破了产。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胜利了。法共也像胜利。国际工人阶级共约两亿（苏联5000万、美国6000万，中国算个2000万吧，算四口之家，工人阶级家庭人口共八亿。全世界人口大概26亿，除此八亿还剩18亿。农民算它个16亿吧（中国5亿，印度3亿等……）——工人运动总之有一天是要统一起来，因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最低目的上要有共同点，所以总应该团结改造社会党人，只要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战争。然而过去教条主义者把工人阶级让给社会党修正主义了。教条主义使社会党都与帝国主义合作了。

用理论斗争来代替武装斗争，全世界来一个百家争鸣。欢迎社会党人来作报告（但仍要准备氢弹）。欢迎杜勒斯等等他们来我国争鸣，但我们也要派人去宣传，和他们交换，看谁是真理。在人道的基础上，在氢弹和死亡威胁的面前，团结起来。

无产阶级专政无论过去和未来都是能在个别国家里提出来，作为全世界口号是值得怀疑的，这个口号会脱离群众，不管加多少解释。资产阶级比我们高明得多，搞了专政，但不提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列宁、斯大林的口号。中国毛主席加以否定之否定，提出“人民民主专政”，这是现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而共产党情报局用争取人民民主的口号，来代替专政更前进了一步，可吸引更多的人，可团结资产阶级，比人民民主专政更高明的口号也可以提，再否定之否定，如共产党情报局提出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你到印度搞无产阶级专政试试看，谁跟你走？只要保证党的领导，因此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是的确不当的。“一论”

“再论”题目虽然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但提出的五条经验中就没有提这口号。

在我们国内由剥削阶级基本消灭后，专谁的政呢？——专政对付帝国主义，国内主要是人民民主。这一名词关系很大，弄得不好混乱自己。英国提不妙，意大利讲议会过渡，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很好。我们要使民族主义向我们看齐，民族主义国家，欧美政府中的某些人士都

拥护社会主义，可是我们的口号把别人吓跑了。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口号过时了。

我们要夺取全世界，首先要改造自己。过时了的制度（对敌斗争时的（口号），不适合于今日）、教条主义像喜马拉雅山，压在社会主义国家头上，出了波、匈、苏事件，人民不得不暴动，老是老一套解释，实际上是反对百花齐放，妨碍言论自由。表面赞成发扬民主，实际上阻挠。这样我们人民有很大潜力没有发挥出来。

在工厂、学校中没有彻底实行民主集中制，阶级斗争时有利的制度，现在变成了官僚制度。肃反前的工厂一长制，左得厉害。肃反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是以党代政。

管理制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左倾管理制度的改变，才能发挥潜力，1．制定新选举法，直接选举。在工人委员会中，党可以争取多数，保证领导。

可以竞选，上边批准，这样选出来的人，不能是高兴就走群众路线，而是非走群众路线不可了。

同在我们的领导集团，情况是中间大，两头小。上头是英明的好领导；中间是有某种程度上的官僚主义，不好不坏，不适合今天需要；底下是“三害”分子，或违法乱纪分子，让他们下台！

2．过去是“官派官”　，特别是在评级之后，干部基本配备全了，下级没有机会提拔，因此矛盾很大。仁人志士新生力量不能吸收到领导集团中去。现在大概有20万官，这对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时有好处，现在过时了。我主张“凡长皆选”！

不好就罢免，否则他们脱离群众后，官僚主义仍可能出现。

我们可以先整风，再选，希望中间类的缺点能够克服。教条主义不愿谈这个问题。

入党也要结合选举。现在入党的加深了危险。因为这些新党员容易被上头和底下两类人所俘虏，虽然是各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但斗争性差——在整风中可看出来——被不好不坏的干部，坏的干部团结在一起，教条分子喜欢教条分子，官僚主义喜欢吹牛拍马者。毛主席说共产党不改造要变成国民党。我看共青团不改造要变成三青团。47年我在学

校和三青团斗争过，很知道他们那一套，有些共青团像三青团员，现在多少共青团员就是用三青团的手段来对付整风积极分子。有些党员不动：以为这是站稳了立场，这是消极分子，他们反而要打击积极分子。消极的留在党内，斗争积极的反而喊要开除出党，岂有此理！（声色俱厉）。

二、中国往何处去？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也订出五年计划来）。“民主长一分，生产长一寸”！现在农村民主化，实行选举。　　工厂学校应向农村学习。苏联最近分全国为105个经济区，这是大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现在是走谁的路，是斯大林路线和南斯拉夫路线谁胜利的问题。铁托、陶里亚蒂、毛泽东、赫鲁晓夫是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人说苏联是法西斯主义，在本质上是错了，但反映了官僚主义厉害。

我们的气量要大一点。可以和资产阶级妥协。把资产阶级帽子摘掉了，有何关系？我们如果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开展，可胜过10亿万大军，10亿个氢弹。我们搞好了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马列主义基础讲社会主义只讲经济基础（工业化），文化革命（原子能化）还应有政治基础（民主化）——在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有合理的管理制度和上层建筑。

在社会主义中，说有新阶级，即是修正主义。但是有阶层，揭出这一点是有好处的。人们经济、政治、文化地位不同，意识也不同，因此分作阶层，各阶层一致的一面是主要的，斗争是次要的。但可以转化。这是阶层斗争，如匈牙利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转化了，官僚主义是压、打，矛盾就转化了。

三、北大（往）何处去？

北大在全国各地的人均有。应当在理论上好好讨论这些问题。要求民主办校，民主选举：学校三害主要表现在教学制度上。

应当让学生多读、多想、多写、少听少背。现在我们教学只是拼命往学生脑子里装！　　装！装！在上课时讲100个问题：50个——众所周知，40个——一看就懂，还有10个信息量。教员是政治宣传员而非科学家。我看毛主席叫把功课砍掉一半的意见是很好的。对文科都合适。

我主张搞理论斗争，理论弄通了，再从上而下的搞。我曾和谭天荣

在一个晚上商量过，他主张走出书斋，让全国学生动起来，工人动起来，农民也动起来，自下而上地搞。我是不同意的，我主张搞理论斗争。

我认为学校的主体是学生，学生是生产知识的劳动者，他们学习动脑筋就是生产知识。应当由学生来选举学校领导……。我一个人想得还不够，大家动脑筋想想吧！

论“个人崇拜”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群 学

所谓个人崇拜，就是把少数人的力量以过高的甚至于离奇的估计。表现在思想上的个人崇拜，是有它的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决不是偶然的，个别的现象。

（一）个人崇拜在历史上产生的原因，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之际，由于某些人有杰出的劳动生产的才能，因而被大家尊重这很自然，因人总是想生活得到改善。随着剥削关系的形成，少数领袖们为了满足自己无害的欲望，就在原有群众信任的基础上，加上一种威力，因此就有“威信”之说了。人们有爱自由的天性，有爱平等的本能，奴隶受不了压迫，反抗的怒火燃烧在整个奴隶社会。领导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地位，必然是十分凶残镇压反抗者，此外还要在思想上制服人民，那就是领袖们有惊人的本领，仿佛有移山倒海，扭转乾坤之势，如何英明，简直未卜L就什么都知道，　奉若天神。此外，更有利用、歪曲宗教主义，麻醉人民。

打开中国历史，真是举不胜举的此类事实，直到蒋介石，他也懂这一套，不过他以复古之名，扼杀新的思想，实行愚民的政策等。个人崇拜的法律保证，也就是利用政权的力量来巩固个人地位的卑鄙目的。今天的教条主义者，能和上例诸位“媲美”，他们不许有人对政策的怀疑，不许有人对现实问题的切实的讨论，同样以政权的力量保证他们在思想斗争中取得专横的独裁的“胜利”。表面上说的一套是“科学，发展，真理”；实际上做的是：“顽固，唯心，愚民政策”这些只是表面现象，下面就深入其产生的根基。

（二）从历史上看，中国革命之初就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不崇拜者要说话，许多说道理者的遭遇不会很好。就党内来说，几次重换中央机构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出严重的互相争权倾轧的惨景，美其名曰：“党内斗争”，瞿秋白之死有一半是自己人杀的，把自己同志的错误看成不可饶恕，这也说的过去，然而把自己人也看成敌人似的，这绝不是工人阶级的品质。

这是为了争得个人超人“威力和信任”的一种初级形式的表现，因为在1930年前前后后几年里整个革命队伍人很少，不能有很大的威力。

与此相伴随的是乱杀自己人的罪行，远在“井岗山”时候，就有这情形，（有记录者：毛泽东：“农村调查”中一个知识分子干部的下落不明的被杀，毛主席也在后面加了（？！）），在历次革命战争中都可以找到不少被枉杀的自己人。

（三）不完备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给个人崇拜的产生留出了肥沃旷野。因为像选举中，特别是县级以上的选举中，干部几乎不摸，这样领导者自身来讲易功臣自居，趾高气扬，群众看来，党……（原文如此编者注）（四）更重要的是深刻的经济基础。我们知道以往剥削阶级存在的社会中，个人崇拜的产生是自然又必然的，而今天说法很多，而且称为“卫道者”们害怕提出“个人崇拜”是社会制度产生，他们认为这样说法实际上就否定了公有制的优越性，就反对社会主义……不得了！但是，我都不以为然，因为事实是事实，正视与否定还是客观存在，我的看法是：是由制度产生的，这是因为上层建筑的产生决不是凭空而来的，必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习惯势力是不怕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一旦利用政权，习惯就可能改变，它以至在一短暂的时期内起一点阻碍作用（如婚姻问题），同时，我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无比优越，我们是在公有制的前提下来谈此问题的。 问题之所在， 是公有制如何使其名符其实——就是体现在分配上的合理化（决非绝对平等）。现在，经济上以各种名目，照顾之类，较高级官员过多地实际地占有社会劳动产品，此外政治地位，人格等等的实际上极不平等，这些现象决非一个国家、一地， 半载一年存在，而是全面，长期存在。这就是“谈论”所说的“新阶级”的形成，它的枝叶是在不完备的公有制的空隙上滋长起来的 扶不能简单地、唯心地“说成是”人们的思想问题。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悬殊，就必然地要产生个人崇拜，如（一）中所述。

（五）“个人崇拜”者的理论基础：首先他们强调了一个政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并予歌颂、赞美，进而把它的作用夸大到似乎一切都是一个党能完成的，因而奉若神明，拒绝群众的意见，而当把党的地位异常特殊之后，再就进一步推崇个别高级领导人员，以至发展到如神的崇拜，一句话，全部理论基础是：历史主要由个别政党所创，而政党由领导者所创，一切及时指示奉若神明，否认了群众的主要作风。

（六）为什么马列主义理论中早已肯定了群众是历史真正创造者而实践中，实际上政、经、社会地位如此分呢？这就是经济上的特殊逐渐形成阶级，利用政权，不许人民说，压制批评。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制度”来保证群众以可对领导者进行监督，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有十分严重的缺点，它只能在书本上，讲台上反对个人崇拜，丝毫没有物质的力量

来保证。在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个人崇拜是制度产生的，这并不是说必须推翻这个制度，而是说必须彻底改变完备这个制度。

（七）消灭“个人崇拜”的办法。

必须调整经济悬殊、社会地位的实际不平等，吸收劳动人民参加政权，建议领导定期换人，各省政府主席等也应轮流担任，劳动人民中杰出的先进人物（劳模先进生产者）应做领导工作，领导者必须实质地参加体力劳动，而不是形式的去几次，在这些条件下群众看到领导并不是“神仙”。也许有人说此时无法工作了，回答：相反真正的领导，应以自己劳动等各方面才能、忠诚取得群众信任。（后面还有几行，下雨看不清了——抄者按）

“利己主义者”宣言

群 学

请耐心些，不要一看到利己主义就说我在宣传资产阶级思想。

1．人原来是自私的（概论）

首先我说这句话是与资产阶级的“人本质就是唯利是图的”有本质的区别，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这种自私是生存所要求的，人为了生活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参加到一个集体中去，个人的利益总和就形成了部落的利益。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以后，这种自私就由生存和欲望共同来形成了。在私有制社会里，这种欲望没有被应有的道德所限制。因此一些人的欲望就妨碍了另一些人的欲望，这是不好的。

到了公有制社会，人，仍然是自私的。这种自私也仍然是生存和欲望共同来形成，其欲望不外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它又包括荣誉、地位、兴趣、理想等，只是这个整个社会的人们欲望类同，机会一般也相差不多，因此就不可能为所欲为而要受一定的道德观念所限制，最理想的是做到不损害别人情况下满足个人欲望。

2．人们这种欲望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个人欲望就不会形成部落，私有制社会没有个人欲望就不会形成阶级集团，也就没有阶级。但在私有制情况下由于欲望没有被道德限制，其自身又产生了阻碍社会发展的一面。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受到适当限制，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动力——主观能动性。

3．但这一点却从来都被忽视　厄单的宣传什么“绝对服从祖国利益”，动不动就拿这是集体利益来压人，但却没搞清，什么才是真正的集体利益。他们忘记了在平时若不适当的满足个人欲望，就要丧失能动性，大家都丧失能动性就等于丧失社会前进动力，也就要失去社会优越性。就企业的发展来说，社会主义企业加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企业还不如的话是有些道理，因为失去了能动性，还有什么推动社会主义企业发展呢？

4．有人说“人民内部矛盾以前就有， 只是与阶级斗争比较起来不显著，现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也就相对的突出了”，这句话对，但不完全，革命胜利后，人民内部的矛盾不但是相对的突出了，而且也绝对地严重了。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程度随着革命胜利这个突变，也要发生巨大的变化。更使人遗憾的是，这种矛盾由于旧思想影响和一些坏风气的保证，革命胜利后竟得到了不正常的发展，从而部分地加强了人民内部矛盾。

为了消除或减少当权集团与劳动人民的矛盾，我们认为，应该取消党政领导者的一切特权（为工作所必需者不算在内）这是消除目前主要矛盾的有效办法，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作为人民称职的领导者，应该为了社会进步而具有慷慨的自我牺牲精神。取消领导人的特权，其意义远不在其本身可以为国家节省一些开支，更重要的是消除了当权者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实际差别，使得他们的思想意识更好地反映客观，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目前我国提出的领导人参加体力劳动，实际上太肤浅了，流于形式。每一个真正的人民领导者应该基于他们的才能与自我牺牲精神取得群众的敬佩与信任，每一个领导人应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质。但是，现在很多领导干部并不是这样，可是他们通过“莫明其妙”的途径取得了领导地位，因此我们要求改革我国选举制度。叫那些不称职的人下台，让他们到其他岗位上去强调按劳取酬。

同时为了以后的错误得到及时的改正，必须树立起有效的群众监督，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至于更具体的道路还有待大家讨论。

我看民主

叶于泩

最近，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引起同学们广泛注意，这不是偶然的。我的这篇东西，简要地说明个人的初步看法，愿与同学们共同深入探讨。

一切社会都有民主

顾名思义，民主就是群众自己支配，影响自己的共同事物。只要有社会，就有民主，因为分工协作的生产劳动，本身带有互济的性质，就不能不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各个形态的社会都有民主，作用的范围不同而已，民主生活由来已久，是人类精神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

民主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分工合作的扩展深化，民主生活必然地随之相应发展。因为：第一，个体愈是依赖于集体，对社会共同事务就愈关切，民主要求就愈迫切。

第二，个体在经济共同体中的地位愈重要，民主要求就愈快得到实现。纵观社会历史发展大势如此。

民主的阶级性

在阶级社会中，民主带有阶级的烙印，统治阶级允许基本阶级的成员，享有较多的民主，以便集中其阶级力量，镇压被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则力图缩小其民主权利，以分散力量，削弱反抗。

不能认为民主只涉及阶级斗争。原始公社的集体议事，公选领袖就是民主生活的表现，也不能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会消灭民主。

民主是先进的社会理想

几百年来“民主”一直是先进的社会理想，资产阶级唤醒了民主精神，随着转化为它的敌人，无产阶级宣布自己为新的民主旗手，但在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里，却作得很保守。

社会主义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权地位，是全民性的，新型民主的物质基础，人们第一次也可能获得发展个性、自由竞赛的均等机会，但是这种巨大的潜能，迄今远没有充分展开。

在现阶段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作为手段，这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威胁还存在，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建成社会主义，所以目前民主居于服从地位，但又必须充分利用民主这一有力武器，才能团结全民实现反帝建国任务。

但是也是目的。既然民主是先进的社会理想，既然共产主义社会是要建立更高类型的民主，就必须承认它也是目的。

民主化问题上的保守倾向

社会主义国家多数是存在这个偏向的。（目前已着手纠正）表现在人民群众不能确有把握地监督国家工作，法制不够严肃。民主权利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没有彻底实行等方面，这种情况大大束缚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我们的国际威望。

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法制不健全不严肃，民主权利没有严格可靠的保障，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温床。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其本性说，要求它的上层建筑具有高度的民主性，但是我们现有的政治理论，国家制度领导方法尚未能体现这个要求，这种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日益显露，并尖锐地反映为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

为了消除“三害”，发挥全民的积极性，单党整风是万万不够的，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大刀阔斧地进行上层建筑的改造和建设。

为此首先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实际压力、限制，建立起一个民主自由的舆论来。

欢迎和同学们讨论，请来找我或留下地址姓名。

“我的忧虑和呼吁”的答辩

叶于泩

（一）你把“据说”当成事实

答道：我不仅没有把“据说’当成事实，而且把许多事实当成“迹象”。

既然有人在“据说”上转圈子，不妨分析一下：“据说北大处于无政府……”有民主墙公开信为证。访问南大的同学可以证明。

“据说有人要毛主席下台……” “据说不赞成大鸣大放的有……” 有两条有“论当前的民主运动集体（恐系“及其”之误，抄者注）领导”一文为证，有潘家威同学为人证。

“据说北大闹的……”这是林希翎说的，许多人不信，但没有反证。

我一共用了四个“据说”，一一交待如上。物证、人证俱在，不是事实是什么？

我之所以冠以“据说”二字，是为慎重起见。奇怪的自称尊重事实的人，往往无视于某些事实。

（二）你的材料太零碎，不能说明问题。看问题要看主流。

答道：材料的确是零碎的。这等材料又焉得不零碎。若不是搞运动，这“零碎”

也得不来。就在目前， 这些零碎， 对于外校同学，也还是了不起的新闻，在层层“保密”之下，把这些零碎，假定为“矿苗”是可以的。有人卑视“内幕新闻”，我确很感兴趣。

至于运动主流，大家都看得到，我也表示乐观。但是逆流也应该注意。“顺”

与“逆”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大家都警觉了，逆转的可能性也就小了。“忧虑”一文的目的就在提醒同学们注意一下逆流。

（三）你的文章散播对领导的怀疑情绪，增加同学鸣放的顾虑。

答道：应该说明，领导者是允许被怀疑的，只要有道理，信任以监督为条件。

盲目的信任是信仰。

至于增添顾虑：如果我的看法多少符合事实，那么同学们怕报复的顾虑也是有理由的。如果我的看法纯属错觉，那么同学不会相信，即使相信了，领导也有责任出面说明情况，解除顾虑，因为这至少说明，这部分人对党中央的意图知道得太少，以至不能抵制我的错觉。

（四）鸣放政策是中央通过的。分歧在所难免，不等于不团结。

答道：我根据一些“迹象”，推测党内的重大分歧是可能存在的，若不警惕，有影响团结的可能，所以呼吁“提高警惕，注意事态的发展”，可见我亦没有把分歧和不团结等同起来。但是，因内部意见分歧，而导致不团结，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不能不存戒心。

鸣放方针自然是中央通过的，但单就这点，尚不足说明领导者看法的充分一致。

都是高级干部，水平相去不远，开始有90％不同意，（注意这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为时不久，就会完全同意吗？况且鸣放也有各种各样的鸣放法，贴大字报、开辩论会是“放”，找几个老头老太太谈谈也是“放”。

（五）胡耀邦说的中共历史上第三次大风浪，彭总说的社会大变动，语意隐晦。

可以有几种解释。

答道：确是如此。写出我的理解，供参考。

如果仅仅指的是和风细雨的整风，逐步贯彻的鸣放本身，那怎么称得起“社会大变动”呢？我推想中央一定有长远的政治规划，在整风基础上继续采取重大政治改革措施，至于具体内容，那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大变动”仅仅是“社会的”，那怎么称得起“中共历史上的大风浪”，而与陈独秀右倾、王明左倾并论呢？（这两次都是联系着党内大争论）如果变革只是社会的，那么1949年共和国成立的“变革”，比起当前

的整风鸣放要“大”得多了，可见，我们面临的严重形势不仅仅是社会的，而且事涉党内。这是不奇怪的，因为社会斗争，常在党内得到反映，因此设想在已经开始的社会大变动的过程中，可能出现党内矛盾尖锐化，是可以的。

后记：①我相信我的看法，一定包含着许多主观、片面的成分，不过一个人既然只能用他自己的头脑来思考，我就大胆地把它写出来了。而且我想如果每个人都深入地哪怕只是片面地想一想，恐怕也不是没有好处的。②我的推想是建立在间接的材料上的（一个人能掌握的直接材料能有多少呢？）不过推想的正确性之最后保证，却在于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关于“我的忧虑和呼吁”的说明

叶于泩

一、本文不企图证明什么，只是写出作者个人的忧虑！以及基于忧虑的呼吁，列举诸“迹象”是为了说明忧虑的原因。

二、迹象的说明：（逐条解释）

①鸣放方针提出之初，有百分之九十高干不同意 尔林希翎致马老公开信和潘家威“论目前民主运动及其领导”，既然无人反驳，当属事实。

②北大处于无政府状态等，见民主墙南开同学来信。

③北大闹的比波匈事件还凶……是林希翎说的，我有几分相信，故列为“迹象”，冠以据说。

④有人要毛主席下台……潘家威同学谈，这话是胡耀邦说的，有人写信给毛主席，要他下台等。

⑤贯彻鸣放障碍重重，至今……，个人读报，观察结果。

⑥胡耀邦谈当家难等是潘家威等六人，访问胡时，胡谈，并见潘文“论当前民主运动及其领导”。

⑦反对鸣放有我们熟悉的领导者在内，出处同上条 份潘说此系友人告知，已答应保密，不便道出姓名。

⑧陆定一、彭德怀谈话，见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

⑨苏联转载陈其通文，“教条主义”是我校传达毛主席报告时说的。

⑩苏联对鸣放冷淡是我读报观察所得。

⑩我校领导落后于群众，是个人观察结果。

1957年6月2日

回 答

叶于泩

应该声明，我没有义务回答作者问题的，这些问题本身表明不尊重人权的粗暴态度。也许作者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拐弯抹角地用发表日记的形式来提出质问。

作者问我：你的忧虑解除了没有？为什么迄今未表示态度？为什么个人的"忧虑"要印发传播？从这些咄咄逼人的问话里，我闻到了逼供的气味。

然而这究竟是主观臆测，又焉知作者不是一片好心呢？所以我决定回答他的问题：

（1） 看了《胡耀邦同志接见了我们》一文颇有收获，例如我知道了"有人要毛主席下台"的话不是他说的，那只是潘家威同学的不是了，但是这篇报导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了我的忧虑。胡谈的只涉及到我所谈到的许多"迹象"中的部分，他也没有否认，他把当前整风鸣放和陈独秀王明事件并称为中共历史上的三次大风浪。

他对这些话的解答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请查阅"答辩"一文）。我和许多同学一样还是希望党中央派人来校报告我国面临的严重局势，以及中央的决策。作为党外群众，我是无权过问党内秘密的，但是假若"秘密"牵涉到国家社会的命运问题，那么我以公民的资格要求参与。

（2） 我印发"我的忧虑和呼吁"一文，理由有三：其一，把我的想法公之于众和大家共同商讨。其二，假使我的想法有部分真实，那么就能起到引起大家注意的作用。群众警惕了就可以防止把"鸣""放"化大为小，甚至半途而废的可能作法。其三，假使我的想法是全错的，并发生不良影响，那么上级领导也会出面说明情况，这对于解除顾虑、深入鸣放是有好处的。

这些意思，全在"答辩"一文中说得清楚，作者不是太冒失就是太健忘。

“广场”何罪

叶于泩

近几天来“广场”受到各种各样的恶毒攻击，包括人身调查，挑拨性的中伤，甚至把“广场”编委说成欺骗钱财，用心叵测的阴险分子。无疑的，这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广场编委是极大的精神压力，迫使我们去正视自己的工作缺点。但是我个人也有想不通的地方。我要问“广场”有何罪过，而劳如此“声讨”。

因为主编说过：“广场”是北大同学的刊物吗？

因为我们选稿时，表现了自己的倾向性吗？

因为我们是同人刊物而不是团委会、学生会创办的吗？

因为我们的看法不为某些人所欢迎吗？

因为“广场”编委不都是可靠的人吗？

到底是因为什么？种种责骂到底何由而来？又来自何方？

“广场”一开始就慎重宣布它的立场、性质、目的、编委名单、第一期要目，并请同学们监督批评，我想作为一个新办刊物，所能向读者表达的最大诚意也莫过于此了。 现在它的第一期还在痛苦的难产中，还在种种的重压下挣扎着，而竟有人意犹未足，还要加上狠毒的目光，还要加上震耳的咒骂，恨不能婴儿死在母腹之中，我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样想的。正直的人们，能够思考的人们，我再次向你们提问。

“广场”何罪？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

王国乡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如今的民主是给你的恩赐，不！不是的，这民主是我们自己争来的——里面，还搅和着匈牙利人流的血液。

我们盛赞共产党毛主席，因为它（他）能“顺其时”。要不然匈牙利的火焰也会在这里燃起，反革命乘机混水摸鱼，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将受多大损失！

有头脑的人，也不要那样想，以为整掉某个共产党员的三个主义，就会万事如意，不，不会的，如果缺点只是个别人造成的，为什么全国普遍各地都如此。关键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缺陷的问题。

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没有这社会主义就会枯萎，要保卫社会主义就必须给人民权力，让我们在精神上，正如在经济上一样得到平等自由。如果人民的义务只是“服从领导”体会领导意图，那么“三个主义”在运动中被整掉，还会再起。

也许一位“无头脑的人”来一个条件反射，大呼曰，“怎么！你说社会主义不民主，就是要资产阶级民主”。你否认集中……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反社会主义本身……”。

天哪！别激动，你的思维失掉了联系，要知道，“要民主”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不等于“要资产阶级民主”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不等于“否认集中”

不等于“反社会主义”。我说我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因为它没有使人民免于贫困的自由，我要集中，也要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存在的根据。但是我要说：如果只集中，没民主（我国只是民主不够）就会变成秦始皇或法西斯；专政是对敌人，如果对人民，人民就会打倒你。

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最优越的，因为它铲除了剥削——（我宣誓：我要用我的生命我的血保卫它）。但是不合理的政治制度、领导方法和精神生活，都远不是我们的理想，而且它反转过来破坏经济制度优

越性的发挥。

有头脑的人，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争取真正的人民民主自由。人民没有权利什么事也办不好，社会主义也会瓦解或出现“斯大林”。

我认为民主不仅是一种手段，而且也是目的，它是共产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份。如果只是方法，那么建成社会主义后，就不再要民主了。——这多荒谬！

要民主，不能只是文字的空头支票，必须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国尚未颁布民法、刑法——等必要法律。人民的民主只是领导者的意志、恩赐——这怎么会没有三大主义。

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

我们要作国家和自己的主人！

社会主义民主精神万岁！

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

林希翎

林希翎5月23日在北大第一次发言（根据记录整理）我今天很激动，到北大吸到了新鲜空气，而人大是教条主义的老窝，官僚气太重，还是北大有民主传统，继承了五四的传统。

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这个问题还不能肯定，现在下此结论，未免过早。

我过去也写过文章批判胡风，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很可耻。现在看来加给他反革命罪名的根据是很荒谬的。

胡风是对中央递意见书，怎能说这个意见书就是反革命的纲领呢？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

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例如，他批评庸俗社会学，要动摇机械论的统治，庸俗社会学、机械论就是教条主义，他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现在的文艺作品就是公式化概念化。文艺是反映生活的，现在的生活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机械的单调的。他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讲话是抗日时期发表的，现在情况变了，知识分子也成工农兵了，不适用了。

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胡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不同的意见，现在百家争鸣，很多人不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吗？刘绍棠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不赞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胡风反对宗派主义，党内是有宗派主义的，胡风触犯了文艺界的首长周扬、何其芳，所以才整他。

胡风分子中有个别人有历史问题，但并不都是反革命分子，例如谢韬就是个很好的教员，很早就搞革命运动，从三批材料来看，不能说他是反革命。胡风的纲领若在今天提出来，就不会说他是反革命，若是鲁迅提出来，就更不是反革命了。

说他们通信秘密，哪个人的信不是秘密的呢？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难怪有人说共产党六亲不认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图推翻政权的才能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风显然不是

这样的。

今年4月，　最高检察院谭副检查长到人民大学作报告时，有人间他胡风问题怎样了，他说：现在侦察工作已经结束，但胡风很不虚心不接受意见！同志们，这说明什么呢？两年还想不公布胡风案件的下文，我看共产党是有些为难，没法下台，错了也不肯认错，估计毛主席可能有两种心情：①明知错了，不承认，②毛主席自己明白了，但高级干部中很多人还不通，现在若对胡风平反，是有困难的。

从赫鲁晓夫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中可以看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是这样被逼上梁山的。我们知道列宁在的时候，季诺维也夫曾出卖过情报，而列宁仍给他工作。

在革命胜利到斯大林消灭了他们的肉体，这是斯大林的专横。

赫鲁晓夫否认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说是美国间谍机关制造的，这很笨，真是撒下了弥天大谎。如果说是间谍搞的，那这间谍就是赫鲁晓夫自己！

《斯大林时代》一书出版了，这本书很好，斯特朗是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对苏联的情况很了解，但这本书只有十一级以上的干部才能看（群众哗然）。苏联说这本书是反动的，文汇报登出来后，苏联还质问我们，这不是苏联干涉我国内政吗？

我国也是肃反扩大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法制是不健全的。例如南京肃反时，一个晚上把逮捕证发给各单位一下子就逮捕了二千多人。连某礼堂都住满了犯人，后来又都放了出来。

我曾经在区法院实习过，最近人民代表要去检查肃反工作，毛主席下了一道命令，要检查过去所有的案件，现在从法院、检察院到公安局都忙着修改案卷，起诉书错了的修改，没有理由的补上理由，但是这还叫什么检察呢？

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

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现在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很严重，我们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办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点步就够了（群众轰她，少数人欢迎鼓掌），我知道有很多人愿意听我的话，但也有些人害怕我的讲话，我要讲下去。

我经过研究，认为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共产党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当革命胜利了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的政策，这是最笨的办法。现在他们封锁新闻，例如北大如此轰轰烈烈，为什么报纸就不报道！（有部分群众鼓掌）人民群众不是阿斗，真正要解决问题只有靠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

我们是正直的人，正直的人到处都有？不仅北大，还有南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各地大都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群众轰她）我不害怕，大家不欢迎我，我就滚蛋，我既然到这里来，就是冒着危险，坐牢也没关系（群众中有人喊：不要煽动。）听说现在有风声要收了，想封住人民的嘴吧，这是最愚蠢的。北大是放了，高级知识分子是放了， 但广大基层还没有放，现在揭发的远不及实际生活中的1%，因为这些教授都是老头，很世故，我们青年长个脑袋是干什么的呢？难道是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的吗？我们要说话！

北大是放了，但我还不大乐观，因为还有很多卫道者，他们想把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成果，作为他们向上爬的台阶。（群众轰她）同学们，我们说话要警惕，不要让他们钻了我们的空子。

我们今天的斗争不限于发发牢骚，对一切缺点不能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我们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让每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在她发言过程中，群众递条子，要求制止她发言，并且有条子骂她是“臭娘们。”）她讲完以后，有三四十个人围住她，要她继续讲。有个学生还找她签名。另外一个女同学说：我们要警惕煽动性的话！旁边一个学生打了这个女同学两下。（后来这个打人的人溜走了，没有找着）接着有人发言反驳她的意见，提出质问，她又作了三分钟发言。发言未完就被群众轰下台去，有二三十人推着她到大会旁边另一个场上让她继

续讲，她讲到她过去的部队里，知道部队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从马寒冰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她还说：过去在我心目中，党，组织，领导，非常神圣，我也很盲从，后来才有些转变。

在北大的第二次发言

林希翎

5月27日林希翎在北大作第二次发言。　她首先声明：上次的发言是在冒失和激动的情况下谈的，都是胡说八道。但对全部发言完全负责。上次会场秩序很不好，这一点北大没有人大好，人大同学的组织性、纪律性很强。今天要求你们耐心听我讲完，即使我是反革命，也请等我讲完了再到法院告我去。接着她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制度问题：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我同意铁托同志的意见，个人崇拜与社会制度有关（不是指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制度，而是指具体的制度），如庞大的官僚机构，产生了官僚主义分子。现在党也在精简机构，我衷心地拥护。再如，特权分子产生的原因也与一些不合理的制度有关，如看文件，要按级别，党团员也是一种特权，能够留学，参加游园。因此，要克服错误，就要从根本上改革这一切制度，上次谈到不要改良主义，也就是这个意思。

（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它反映了上层建筑与基础的矛盾，也即意识形态不能适应公有制基础的矛盾。如“三害”即与政治制度有关，与公有制不相容。这个矛盾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原因是意识落后于存在。

人民内部矛盾在我国表现为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这个矛盾目前是非对抗性的，发展下去可能会转化为对抗性的。现在已有局部表现为对抗性，如某些地区的罢工、罢课等，我在东北、玉门曾经看到过这些现象。

（三）上次我谈到各个统治阶级都有共同性、局限性，这在哲学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马克思说：“法律是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这在各个社会形态里都是适应的。在阶级差别消灭以前，各个统治阶级都有它的局限性，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在公有制社会里，这种矛盾是可能被认识的，也可能被克服的。今天的整风就是克服这种矛盾的方式，如果不除“三害”，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四）“三害”的哲学基础是黑格尔灵魂的复活。现在大学里讲课提

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时，总是说这是最好的社会。这个“最”字，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看只是一个社会阶段，因此他们的“最”字，就是以形而上学代替了辩证法。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只歌颂正面，而对阴暗的一面避而不谈。如动员上海工人到西北参加建设，只谈西北如何美好，结果工人去了不是那么回事，就罢工。

我对现实生活是不满的，即使是五百年后出世的话，我也会不满。如果对现实满意的话，如何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人们对现实不满是正常的，应该鼓励人们对现实不满。我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进了一步，问题是使公有制再前进一步，有人提出了定息20年，我坚决不同意，我赞成马上取消定息。

（五）一个政党也好、一个人也好，进步的标准是能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动社会进步。不能的话，就是反动。斯大林在后期阻碍社会发展，因此是反动的。他杀了那么多人，如果不是斯大林的错误，二次大战不一定起来。

不是斯大林的错误，赫鲁晓夫领导的十万人也不会全死掉。

（六）整风问题

（！）主要的危害，是不敢大放大鸣。我前次曾经说过80％的高级干部不同意百花齐放，这不是没有根据的，这是毛主席自己说的。至于高级干部退出会场，这是指民革主持的会场上有高干参加，后来退出了会场。

上次我说中央在收，这话说错了。但确有人在喊收，北大写了那么多大字报，新华社的“内部参考”登着，许多干部说北大不得了。这是他们神经衰弱。

（2）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对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评价。斯大林的后期是反动的。毛主席可贵的一点在于他有辩证法的思想，善于发现错误，改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但并非他没有犯过错误。个人崇拜在中国也有，但毛主席很清醒，如他去年6月横渡长江， 当时不让报道，可见他是谦虚的。主席写几首诗给诗刊，创刊词上有人评价，说主席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伟大的诗人。我看主席看了一定会很生气，这话多么肉麻。有人说主席写的字最好，我看不见得。

（3）　胡风问题。我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人大已给我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了，宣布我是反革命，晚上到公园都有人监视我。

胡风是不是反革命，从法律观点来看，谁也不能肯定，因为现在法院尚未判决。

同时，这个案子这样搞也是不合法的。哪有一个案子搞了这么久还不宣判，即使特务案件，也不能二三年不结案。如果将来“诉讼法”公布了就不能这样做了。

现在党也感到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看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这也不足为奇，是受了斯大林的影响，加上客观上舒芜把他们以前的信发表了，结果就从文艺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我可以肯定，如果这个问题发生在现在的话，就不会把他当反革命处理。现在对这问题提出怀疑的人很多，要求重新处理的愿望很迫切。

我对南斯拉夫问题很感兴趣，我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比较民主的。

在林希翎讲完话以后，有几个北大的教员和学生上台反驳，在他们反驳以后林又接着发言。她说：上次有人揭我的底子，说我就是报上登过的林希翎，和刚才有些人的发言，都说明神经衰弱者的条件反射，到处是反革命。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我看到有一个公式，就是反领导、反组织，反党、反人民，从这个逻辑得出一个反革命的结论。我的讲话付出了不少的代价，说我是反革命，极为卑鄙，我提出抗议！

上次我来发言后，就有人在辩论台柱上贴一条子，“林希翎女士来北大一趟，我的水碗不见了。”同志们，那天我走的时候，北大有八个人送我，我并没有偷你的水碗！（掌声）几天来北大学生川流不息地到我家去拜访我，其中有一个同学说，我来向你自首。上次在会上扰乱秩序，破坏你的发言，都是支部书记布置让我做的。

同志们，我用毛主席的说法，这些都是国民党段祺瑞的作法，是极卑鄙的！

我的思考

林希翎

社会制度问题

社会制度问题，实际上是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问题。

任何社会现象要从社会制度本身来看，这是一个基本原理。马列主义教导我们，研究任何社会现象，都必须从社会物质生活本身找答案，社会制度的概念定义是经典作家所能做的事，所以我是不能下定义的。但可提出看法：社会制度应分两部分，即基础和上层建筑，我国的经济基础现在基本上是公有制，这是不可动摇的，从发展的观点上看，它比私有制前进一步，所以有人提出定息20年应该坚决反对，因为这是私有制的继续，取消定息的时机完全成熟，应该成为公有制。

我国上层建筑的某些部分不能适应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三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上层建筑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不适合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缘故。目前我国哲学、文学、艺术各领域都表现出教条主义非常厉害。政治制度不是抽象的，我想谈一些具体的制度，如人事制度，等级制度，保密制度扩大化，特别是产生官僚主义的重要原因是官僚机构。

人事制度：不合理现象、宗派主义反映在此明显，并不是以德才衡量一个人，而是看资格，看是否是党员、切员，许多不合理的现象，不仅要看现象本身，而且要看这些现象的怂恿者和产生这些现象的条件。有些人把不好的东西归于旧社会，但是就是在新社会里，青年提高也很少，青年希望求知，想听报告、看材料，但有等级限制，为什么青年中存在虚荣、名利，和现存制度有关。有些党员是为了享受特权，而跑到党内，不入党就没有出路。有人叫我入团，说你不入党入团，你的前途、婚姻、地位如何解决，我听了很生气，要这样我一辈子也不入团。

等级制度：干部发桌子、纸篓都分等级，等级制度已深入到各个方面……产生三害的原因是等级制度、人事制度与保密扩大化，这些小的制度（等级、人事、保密扩大化）组织了总的制度，具体制度本身产生了三害，这些制度和公有制是根本不适应的，是私有利的产物。

我国教条主义的统治在这些方面只是宣传光明的一面，现在有些人

还说夸大黑暗面，有人说：“我们的现实生活是这样的吗？”这样使单纯的青年到了社会，看到这些问题会大吃一惊，甚至会苦着脸而消沉下去了，教条主义害人一点也不奇怪。

基础改变但思想意识仍是以前的，三害和过去的封建性、买办性、法西斯性有关，如宗派主义和封建性、法西斯性有联系，教条主义与买办性有关，买办是媚外崇美，对苏联的学习也是如此，当然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友谊不可破，但把苏联东西乱搬就太教条主义。有人说：“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大蜂窝”，我看“是教条主义策源地、大本营。”苏联是教条主义策源地。老师讲话就像个打字机，苏联医学就未超过中国的协和，组织疗法害人不浅，无痛分娩法现在也不用了，这都是由于处在迷信的状态。

我不赞成改良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还存在，封建思想、法西斯思想、甚至奴隶思想也出现了，要在巩固基础的条件下彻底改革政治制度，中央现在也认识到这点，如现在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但这不是唯一方法，这不是根本解决，群众不一定是需要他们来干活，而是需要他们来办好事，当然整风是良好的开端。

关于统治阶级的局限性

统治阶级都有共同的局限性，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我研究很久，在以前不敢讲，现在也还不成熟，提出大家讨论。我说这是客观规律，在社会上存在阶级时，这个规律便起作用。

对现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局限性如何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规律是仍起作用的，当阶级存在时仍起作用。不过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规律可以被人来利用，存在克服这个规律的可能性，但这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是要有主观能动性，在许多条件中政党起决定性作用。

现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利益是一致的，但也有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在统治与被统治之间（领导与被领导），我认为领导与被领导就有矛盾，统治与被统治的地位不同，看问题角度不同、利益也不同。企业的厂长和工人的矛盾是看问题不一样，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但发展下去，由量变到质变会爆发成对抗性，要看到现实生活中这个规律在起作用，领导有一定的局限性 顿如不加主观能动性克服的话问题就会发展。不同的地位产生看法不同，本来是被统治者，但一旦爬上统治（工人爬到厂长），说话口气也不同了，一切也就变了。

在青年报上有文章说小资产阶级看问题有偏见，会发生匈牙利事件，害怕小资产阶级片面地反对官僚主义。我看只要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都有偏见。主席没有偏见还革不了命，赫鲁晓夫的报告没有偏见吗？工人罢工没有偏见吗？工人最有偏见；工人对不合理的事情非常不满。我国五亿多小资产阶级，五亿人不反对官僚主义，什么人反对官僚主义呢？五亿小资产阶级总比官僚主义好的多吧，五亿人总是宝贵的，除开五亿，剩下一亿，这一亿中真正的产业工人没有许多，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有很多联系，这样归根到底只剩了领导者。这个论调等于不让大家反官僚主义，我说：反官僚主义人人有责，甚至是反动的人。

关于“对现实不满”

谈一谈对现实不满的问题：对现实不满，我认为是一个好现象，应该鼓励人们对现实不满。满足现实的哲学基础是黑格尔灵魂的复活。黑格尔有绝对观念。现在有些领导也成了黑格尔。

社会主义是最好最高最美好的社会。这个“最”字就是形而上学的。将来会有更好的社会。如果我生活在五百年以后的“X”社会，我也会不满，社会是前进的，满意现实社会就不会发展。猴子要满意现实的话，那么我们现在都不会变成人。对现实不满是应该支持的，而现在有些先生唱一些廉价的赞美诗，成天和国民党、资本主义比较，向后看不向前看。教员讲课也是和国民党、资本主义比较。

有人说不满现实会失去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我看这不对。当然我们现在歌颂是需要的，真正的歌颂是好的。但不能要公式化的歌颂，吹牛的歌颂，这样会败坏人心，真是害人不浅。要把现在有什么问题老实的告诉人民。

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存在，统治者是有局限性的客观规律也存在，因为有公有制为基础，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没有根本对抗，所以领导有可能认识这个规律，党一系列的措施都可见党认识了利用了这规律，克服这局限性，从党过去、现在和将来准备实行的措施都说明了这一点。

这些问题如何办？

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要彻底改革，要发动人民来讨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不只是党员的，应该让全民尽情地提意见。现在的“鸣、

放”只是上层，这是不行的，我看上面的是老头子，不大胆，世故深，不敢说，为了巩固他现有的地位，不敢和共产党闹翻，要广大群众讨论提出意见，再综合起来，这是理想的。

法制问题

以党代政的问题存在，共产党是执政党，威信很大，实权都在共产党手中。法律是形式主义，苏联宪法更虚假。苏联有法制组织，实际斯大林可以完全破坏法制。

我们没有法制，法院量刑是审判员说了算。如肃反问题，是否扩大化，我感到是扩大了，主席说没有，我不同意。苏联破坏法制是骇人听闻的。中国杀了77万人，这也不少，冤枉的人也有72万。肃反的理论根据也是错误的——罗瑞卿报告都是受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成后，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化这一错误理论的指导。

胡风问题，这个问题很棘手。

现在看来胡风假如侦察当中没有其他新的材料，只是提意见，这是好的呀。所以我同意赶快解决，这方面我向主席进一言（主席这里是有错的，但也没有关系）。

常委会决定对肃反大检查。那些公安局、法院，就涂改过去的案件，怕人民代表检查。很让人气愤，法院审判的结果都是党委的批示，把批示也都撤下。“十五贯”

的现象在这里太多。你对领导有意见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组织，反组织就是反党，反党则反人民，反人民则反革命，用这个公式来定罪的，完全是斯大林的方法。

下层领导者他还是自觉与不自觉，完全不完全的继承过去统治作法，继承了地主恶霸的作风。可惜中国没有这样的统计，究竟有多少人有错误呢？多少人被害呀？

改革措施

用什么措施来改革？如果党完全是共产主义者，不要政府亦可，完全以党代政，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形式。团、妇联、人代大会、工会这些纽带都是形式。实际上公民得到多少权利？选举是安排好的，劳民伤财

的布置工作和会场。

根本的改革要发挥群众智慧，要真正的社会主义。党、团中央应该在整风基础上抓紧整党、整团。整党问题不仅是党内的事情，人民也要管。因为党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执政党是人民的命运，所以每人都要来过问。要真正发挥党的作用，必须保证党的质量，清洗一大批混蛋，特别是解放后真正为共产主义入党者有多少？

向上爬者倒不少。这是由许多等级制造成的。还有一批中等的人不坏也不起作用，没有什么思想，过去的党员强调“老实”，给爱人写封信也要汇报，成天谈思想，我看这些人可真没有思想。对于不起作用者，应该动员他们退党、退团。

入党、入团不仅要党团批准，应该有70％以上群众表示同意，而对不起作用者，群众还可以罢免他。党团不应有任何特权，他的特权应是人民给的信任，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要在物质上给以特权。这样使真正的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入党多好？否则，他可以不入党。

在干部问题上，现在报上登的职工代表大会我很同意。把企业交给职工，这是很好的。

应该叫人民作主。同志们：过去你们感觉到作过主吗？我没有作主，我没感到是主人。

干部的提拔一定要群众同意。有些干部只是靠老资格吃饭。资产阶级国家的部长们可以辞职，可以罢免。我看这好，我们的干部，只是上提，不能下放。过去下放往往好像是犯了错误，升上去就高高在上，这样继续向上升，还能都当毛主席吗？

干部经常换一下也好，资产阶级的两党制倒可以竞争一下，在我们国家里，当然这不需要。但这说明能多提意见是好的。部长们调换一下和人民一起参加劳动是很好的。

论“阶级”的发展

周大觉

谈谈同学提出等级的存在，似阶级分野，然他为免和自称“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道者”哓舌，不提“阶级”二字。小区区非神非圣，就十几年来对革命运动所见所闻及亲身领悟发表如下浅见，希大家补充事实，并加理论深究俾使达到改善现况之目的。

一、远在1945年我闻浙东游击队纪律严明，帮助农民抱不平……我出身贫农之家，深恶痛绝阶级压迫，要求平等民主自由的热望，尤如大火在心中燃烧，目睹善良正义的兄弟壮烈牺牲，深深同情，此外我也知一些关于社会主义未来的道理，在年幼的心灵里撒下要翻身， 要平等民主自由的种子， 我自小学到初中天天幻想着“总有一天”我有民主自由的权利“总有一天”我可以不受歧视鄙视……。然而七年的经历证明了不是那么美丽的，新的阶级压迫，正在开始形成，惨状目不忍视……。

二、谈到“阶级”的发展，就要回顾一个什么是“阶级”？根据马列主义，我们知道它是社会上的各种集团，它们间是由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在生产中的地位（指支配或被支配）、产品的分配、社会上的地位等所决定的，从土地改革彻底胜利之后，接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后，旧的阶级关系粉碎了，因此从现有理论上看来，我国已基本上消灭了阶级，“卫道者”们没有想想，1957年的今天理论已大大落后于实践，而你们都却以此为满足，高而躁的干叫“社会主义万岁”“马列主义万岁”这和佛教徒求菩萨活一千年的唯心愿望有何区别？我们要问社会科学理论是否在发展？如果旧的过时了，也就是说死亡了，那么怎么会万岁呢？如果喊马列主义精神万岁，还是对的，因为它主张科学地研究问题，而不是死保住陈腐的观点去作阻碍社会进一步完善的人。

随着旧阶级的消灭，新的阶级又起来了，自然这与旧的不同，它有独特的特点，粗略想来有以下几点：

①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现在的占有已不同于资产阶级，他们是比较分散的，现在掌握政权的各党政军要人占全国人数比例很少，集体占有，美其名曰：“全民所有”这点现在一时不易看清楚的，如果看一看分配关系就更鲜明。

②分配，中央一级干部（或称万岁、九千岁、八千岁……）（或一品官，二品官……依此可排下去……）　每月薪金500多元，也许农民比还恰当，即便以普通工人比较一般为40～60几元不等也不相差30多倍，据我所知在中国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即使中等资产阶级也没有如此大的纯收入，因为资本家他极大部分利润必须投回生产之中，我们可从讲课中知道，中国许多中等资产阶级他的总资本不过两千元左右，因此，　纵然形式上不是剥削关系，　　　但实质上存在着不平等交易，也许人们要说："他们是脑力劳动者高级又复杂……"此话下面再谈。

③我们要问，如此悬殊难道是符合社会劳动等价交换吗？我看不是，只不过利用政权——领导者自己对物质享受的感兴趣，自己规定的。在整个社会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　　如果不是不等价（指劳动量相同）交换，不可能相差800倍，因为试想象：你周围很落后的生产力，你一个人能创造如此多财富？毛主席等他们劳动竟如此珍贵？若告知天下农民赞成者我看寥寥。

④社会地位，宪法上名义上规定公民一律平等，然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待遇（不论工作、学习、游玩、吃饭……）均论等级，显易可见不平等，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可以呵斥直到无辜的斗争，施以肉刑（变相的），这和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态度有何区别？至少换了一个名义和方式罢了！

⑤官官相附（例如魏巍所揭露的）可见已开始自觉地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的利益。

⑥变相的衙役公差存在，只不过美名曰"通讯员"，实则不平等待遇。以及公差仗势欺人屡见不鲜，（可看报）此外对公民的不信任，犹如特务监视甚至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因为最凶残的国民党中美合作所，他们抓人也至少有些事实为依据，　纵然枉杀者也有，但试看北大有200余人斗错，被捕者两人，也是早已有交待过反革命罪行的。可见现在根本没有什么人权，生命安全时时威胁，一触犯上层贵族，就可以被冤杀枉斗关上几个月还以一淡淡的道歉。可见这种也可以和剥削阶级的统治，"媲美"，"卫道者"们会说我没有"立场"，但我试问：人民不要听娓娓动听平等自由无剥削……美好无比的社会……然而连生命也无保障，人的尊严随时可被侮辱，这算什么"美好幸福"的社会呀！如果这样的"社会主义"万岁，我宁愿拼死，不愿再存，简直是牛马的生活！！！

⑦历史上如朱元璋等打天下之初，总是为了争取群众，与人民一起骗得大家信任，一旦大功告成一脚踢开群众，借故屠杀功臣，（朱元璋所作大家知道的）争夺地位名利。在我国现在，也是伸手找报纸或打听一个儒林内部就一目了然，更有许多政客投机分子，削尖头皮钻入政党，荣华富贵有势有权，盛气凌人。

⑧也许这个比方过分，但比譬只能相似不等于相等，请看官辨清，这时还在初中一年级，一位国民党军官大叫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国父遗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像煞有介事，事实如何大家都知道，不赘述，今之自命“卫道者”之贵族说“辩证法、唯物论、民主、自由、平等、美好的社会……”事实像顾牧丁副教授只不过过去有些和旧政客来往和胡风也有往来，但马列主义中说：事物是发展的，既然如此，过去有“问题”（？！）又怎能推出今天有问题（！？）这叫发展吗？再说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然江书记说：对顾有“根据”，有检举“材料”没有调查就宣布他为胡风分子，岂不是含血喷人？

就思想方法而论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甚至还不如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唯物呢！（可参看毛泽东选集谈到我党应调查研究问题——毛主席所说过）因此使人不禁要问：现在的“真实理论”是什么？因为马列主义只是掌权者的招牌而已，实际行动又是另一种理论指导着。正像辛亥革命流产时一样，现在这样的现实“万岁”下去，我认为革命流产了，假如不急剧地扭转现在歪风的话三、你们会说现在工农生活不是提高了吗？对，我看到的，但提高了多少？实际上提高了多少？社会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生活水平总是上升的趋势，这点从历史上看封建社会一般收入总比资本主义社会好……。我国工农收入几年来实际上增加不多，仅过吃饱不饿死的程度，倘使有人说以往半年吃糠吃不饱等等，来替现在社会分配、政治等不平等辩护的话，我要问：你也知道我们的眼向奴隶社会的方向看去还是向更合理的社会望去？

资本主义不合理，我反对，但我认为现在也不足美，要改变。真正的劳动人民的代表真正的人民领袖应该是和人民共甘苦，尊重人民的伟大人格；他们是历史的主人，挂羊头卖狗肉者必须下台。

四、新的阶级矛盾和旧的不同，可以利用群众的压力和平的方法解决，必要时也可以通过暴力——到无可救药时。任何企图以歌功颂德，个人作用，一部分人的作用捧到天上来迷混群众视残的人，在铁的客观现实面前粉碎，丑相毕露无遗。毛主席是伟大的，他知人民疾苦，功劳

是大的，但我们更要记住，和他一起搞革命的数以万计的工农知识分子无声无息地流尽了血，党是伟大的，作一个党员是光荣的，但是没有人民也将一事无成，一切功劳应归功于人民（当然也包括党员和领袖），把缔造历史的丰功伟绩划归一个党所有是反历史现实的、唯心的。

五、要彻底改变现在作风建立起足以保障人民自由民主的法制，反对口是心非，反对对群众的欺骗，宣传，反对唯心主义的传播，反对特权阶级的存在，制止屠杀，监禁无辜的人民！反对新的变相的阶级压迫，人们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现实世界，要用自己的耳朵去听听人民群众的欢悲哭泣，好的发挥坏的坚决产除，如果有一个集团坚决违反社会的发展违反人民愿望的话，我想人民一定会群起而攻之，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万岁！！一切违反历史发展者的怙恶不悛者应下台！

正义万岁！真理万岁：民主万岁：人身自由万岁！

六、如果有人要驳请针对论点，希勿牛头不对马嘴乱放炮更勿歪曲原词之义，勿断章取义。

——一个自幼耕读，挣扎，受地主，也受新阶级压迫者——（注）声明我不写姓名，取作“谈论”继“谈谈”同学之后，有感而作，现在卫道者拿着藤条——教条乱打人，我也得知一切新思想刚出现时，总会有反对者出来，而且也很可能遭到迫害，因为几年来事实教育我即使经过一定考验的人也常常口说一套，做另一套。江书记说过，有争鸣自由，我现在深感可疑，其态度也不很诚恳，对顾牧丁之道歉冷淡淡的说一声，甚至可以说还嘲笑他历史上有过问题。好吧，写到这里请提意见。

再论“阶级”的发展

周大觉

昨××杨君传达和黄良元同志谈话内容（史三中共党员，有一定教条主义习气，诚朴，会思考一些问题的好同志）。交换看法一致。

①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得多。然而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公有制名符其实，就是说公有了之后，如何正确的分配，我们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但目前问题不在于此，而是不合理的悬殊的差别，这样纵然占有公有，但实际上在分配过程中，无形中一部分占有了另一部分人劳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产品（或相当产品的货币）因此，若分配不好，也就有剥削现象，这时虽然生产资料公有。

②目前正是发展悬殊（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但另一方面制止它发展的因素增长，有自觉地自上至下的和平方式解决的可能性。

③双方一致认为，习惯势力固然是一重要因素，旧社会遗留下来升官的愿望，轻视其他职业的恶习，但这是次要的，它只能在新旧制度交替之际起一引起阻碍作用，像婚姻问题，有了法律保障，再加利用政权力量，宣传与舆论，习惯势力完全可以扭转，重要的在于规定一定的法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④黄良元认为自己受教条主义影响，起初看我文章时很反感，主要认为社会发展到公有制为基础就万事大吉，无需再考虑如何更完满以及可能产生新的阶级分野，没有考虑如何防止党、政府工作人员不脱离群众，没有注意到要有一定的制度来保证（这里制度指具体办法）。

⑤黄良元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核心将放在分配上，如何完善管理制度，不好的管理制度会导向变相的阶级分野，今后他将和同学们长期研究此问题，并提交给有关部门考虑。

⑥与经济上差别相应的社会地位等，一致认为必须改变社会，应树立起劳动光荣，各个行业地位平等，这要求分配上，政治上，（即参加一定领导工作等）权利平等，这是物质的保证，否则空谈。

⑦我们对如何改进现在政府领导及党、团地位有初步磋商：1．革命者应“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建议党员，团员把一部分钱交

给组织，作为社会费用，这样实际收入比同级的其他同志少一些。现在恰巧相反，因此没有体现革命者的精神，反而助长了对物质享受的无限要求。

2．除个别特别优秀品质的同志外， 领导人员应该常换，三四年改选一次，改选出原来的群众中的典型、模范人物’，这样保证不脱离群众，又有个别有经验的人指导业务，就能把行政工作搞好。

⑧我们的不同意见只在于用什么词来表达及对当前程度的估计，黄良元认为只提一下人民内部矛盾，对措词认为不重要，知道那么一些意思即可，我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此语太抽象，应该说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在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已出现一定矛盾，现在还不甚尖锐，叫内部矛盾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指出来，如果管理、分配、 社会地位等问题不得到更好的完善， 矛盾可以向前发展，而且基本上满足“阶级”关系的定义。因此，为了正视现实，重视这一问题，指出新“阶级”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不能轻描淡写地含糊的说一句“人民内部”矛盾。要解决它，必须从经济上、政治上（社会地位）上解决，其他都是次要的。

⑨我昨天受凉，不能亲自去，黄良元同志请杨君代为问好，深表感谢。他们的谈话是昨天晚上7．45～8．45进行的，在友好、讨论问题的气氛中进行，因时间有限，只谈主要问题，只好握手告别，大家认为有时间还有畅谈几次的必要，很有好处。

⑩声明：许多同志对我提出许多意见，因时间有限，不一一答复了。由于许多误解，以为提出讨论改进公有制中的问题就是否定公有制等等。其他又如措词不妥当、词不达意等等都不多谈了。许多具体材料也可以商榷，但不很重要，因为找一找报纸就有的，主要的是一些基本的看法。本人学理科的，没有专门研究历史、哲学等，文章也写不通，这些请原谅，不原谅就批评，也受得了的。其他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管理制度的问题，本想专题再讨论，因考试面临，一个多星期没念书了，想补一下，不再写文章了。如有同志感兴趣，请示尊址，或洽商约定地点面谈半小时或一小时即解决。本人无法来时，请杨君或刘君前来。

1957年5月28日

谈谈无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

沈迪克

在古印度，人们被分为高低贵贱的四个等级，婆罗门、刹×利，在古罗马……在封建社会……在资产阶级社会……在纳粹，有优秀的雅利安人种……在新的时代人们进步了思想聪明了，等级也就更细致了。有出身世家的特种材料等级的非……有出身……的应声虫，吹捧等级，有第一可靠等级，第二……第三……可惜我没作过人事干部，不能把这种新的“人种新麻衣相法论”中的微妙之处……向你阐明。

有人要说，你在这里人为地制造分裂，但是亲爱的教条主义先生，客观的存在是不能因为你的否认而消失的！看看人所共知的事实吧！

①留学生问题，大家这点谈得很多，我就不多说了。

②生产实习的问题，什么机密地方而去什么等的人，在我校也有，请参考航空学院的争论，那里更尖锐。

③毕业后工作分配的问题，某些工作，某些人是不能去的，例证之一就是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研究，虽然在世界各国早已公开，甚至我们也帮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建设，但它对于中国青年来说，是保密的是要由些“人事专家”根据人种论细细的划清了你的等级后，钦定的，如果你本来就是贱民阶级，你就今生休想。

④在各种运动中，如果你不是高贵等级，那你就准备挨打，挨斗吧！纵使你没有任何罪（请参考墙上那些申冤书）可以证实。

⑤请参考各报上的发言，和前几天报上的新闻记者的四个等级的区别。

好！够了！大家自己想想看，自己日常生活周围吧！只要你头脑还不是空虚到一无所有，你会找到更多的例证的，至于那些想否定这些的人，他有不可告人的隐私，正如资产阶级不敢承认资产阶级社会有阶级一样，那是由于他的……而决定的。

在解放前和解放后初期，在思想上人的类型的这种划分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逐渐的由于有了物质经济基础，于是“向上的心”就鼓励着

产生了一批钻营吹捧，拍马屁的，看脸色的积极分子，打击别人，在小班上作威作福的人（三好学生）虽不见得是白痴，但也只有凡事乖乖听话，正如胡适所说的，任人打扮的千娇百媚的姑娘才行的。

他们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古语云："好利之心，人皆有之"上升到了一个高的等级，就有着许多的特权和物质利益在引诱呀！

譬如留学吧！不就更进了一步吗？这种心情不值得"怜悯"和"同情"吗？

听听那种似乎正经的所谓"争取政治生命"的饭碗的呼声吧！当然要是真有愿为共产主义建设贡献一生愿望的人是值得敬佩的！

但是在这种呼声后面，人们可以嗅到更多的是米饭和肉汤的香味！我是学××和××的！我好像是第×个等级的分子，即使毕业了，那有些什么来保障我的胃的要求和这个要求的进一步的提高呢？还是就加入到谋求等级转变者的行列中去吧！

千万个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将会为此在九泉下哭泣。

有些人平常大叫发扬五四精神，可是当青年们真正拿起火炬的时候，就张惶失措了，叫什么和风细雨呀！赶快拿出反党反革命帽子来扣了呀！以及批评"是时候了，"的那首马雅可夫斯基式诗的作者们之流，读者们！用上面我所揭露出的"人种论"去分析一下，就会揭露出它们为什么会"如此"的"等级"根源来了，本来嘛，这是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嘛！

本来我想用"……人的阶级"这个标题，可是鉴于大批书呆子人民大学放出来的散毒的蜜蜂，正是专门来钻这种缝的，为了不作无味的争论，我改了一个名词，反正事实总是事实，至于那批毒蜂的教条主义，大家在政治课上已领略够了，譬如大家就知道"马列主义"的一位教师王××，就是以有名的公式："苏联由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造的原子弹会长翅膀，而美国由于资本主义的腐朽性，所以原子弹长不出翅膀"。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而著名的，好，就到此结束吧，不过我要公开宣布，本文我不署名，是不是不负责任呢！不，这里面还有一个微妙之处，古语云："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大家还知道我校有个人事室吧！那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属于你自己的口袋，专门记录尊座的行为的，而且是你自己不被允许知道的，对于国家安全必需的档案制

度，我并不反对，但是过去已有过屡见不鲜的例子，由于尊名上加上黑点，于是你就从第几可靠等级降到了第M》N可靠等级，将来我在前面谈过的那些东西，就会跟着你屁股转，够你一生慢慢享用了。

所以这点请大家原谅， 求生之心， 何人不有呢？至于“无阶级社会中的等级（或阶级）”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否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有联系或者会存在多久的问题，可以让书呆子们去争论，反正“有”不会因为说没有而变成没有，“没有”不会因为说“有”而变成就有的，反正“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有名不具，请恕不周

谈谈

论牧羊者的逻辑

沈迪克

“五四”晚会，我也到东操场去漫步了一番。只见，营火雄雄！一支美丽的红色火炬悬挂在主席台的正中，但令我惊异的是，看热闹的人比真正参加会的人要多，壁上观看唱“团结就是力量”的人比唱的人要多，而更多的还是那些早已割据地盘，心不在“五四”而在“教育的诗篇”的晚会积极份子。

难到（道）在具有光荣传统的北大，青年的热情就是这样“高？”吗？我心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有心的读者可想一想，为什么现在的情绪是这种“高法”，而当时是那种“高法”？）

但是敬爱的领导者和他们的歌颂者们，是欣赏这种驯服的群众的，他们之中的一个会在鼓掌声中爬上台去大讲一通什么五四的传统呀！继承呀！火炬呀！之类。

是的！他们也歌颂“五四”，上面绘出的就是他们万分满意的一幅“五四的牧歌”，多么驯服的羊群呀！

亲爱的读者们，你们大都作过“不关心政治”的检讨或挨过这种批评吧！大家想想看，怎么搞的？难到（道）这许多大字报的作者，这许多牺牲了学习和休息时间，甚至端了饭碗来看大字报的读者，是不关心政治，是不关心国家大事，是只会钻教科书的书虫吗？

稀奇的事无独有偶。除了我们这些“不关心……的人”突然变成了“关心”的人之外，那一批大大小小，成天督促大家批评检讨的牧羊人却也同时突变了、沉默了、大多数都变成了消极分子，变成了“不关心……的人了”。倒底是谁为了真理而关心，又是谁为了别的什么而关心，真理只有一个，大家回答吧！

有人说：“青年是年青的，年青的就是幼稚的，幼稚的就是应当受教育的，作为被教育者就应当无知的。”于是好了。

既然是无知的，就应当是规规矩矩的，每个星期你就应该死背六小时的政治笔记。

既然是无知的！就应当是理解力和记忆力也是不够发达的，所以为了关心你，我们每年把政治课的教材换汤不换药的灌输给你，以锻炼你的记忆力。

既然是无知的！那就不应该有思考力，也不会（应）有辨别是非的能力的。

所以羊儿们呀！我爱护你们，遵照养羊的惯例，我已为你们每个小班都挑好了一批顶乖、顶听话的三好优秀羊。跟着他们走吧！要是跟不上，那你就一定是迷了路了，因为你自己根本就不应该能认识路的。

羔羊迷了路，我该多伤心呀！

由于篇幅，我就不把这个我们学校青年工作方针的“牧羊者的逻辑——既然是无知，就应当……所以就……”再多说下去。但是亲爱的读者们，你们既然已经掌握了他们的思想方法，那自己也就会去分析许多问题产生的根源了。譬如，大家都有过开一种只有主席和小牧羊者发言，会场绝大多数沉默，无聊，磨时间的“灾”

会的经验吧！大家不要怨主席，他也是人，也不愿意经常处在这个令人精神愉快的窘迫位置的。在这个时候，大家应该深刻体会大牧羊者对你们的关心，体贴入微的亲热了！

往年古怪少呀！今年古怪多呀！羊儿们说了话呀！牧羊人大吃惊呀！

牧羊者吃惊了！是的，当第三次“五四”的火炬燃烧得更明亮的时候，你还会更吃惊的！好心的牧羊人呀！我同情怜悯你的倒霉遭遇！

大家说我没有名字，我就取一个，就叫“谈谈”好吗？

我的态度：头可断，血可流，真理决不能丢

钱如平

先生们，同学们，同志们：头可断，血可流，真理不能丢！

您们的欢迎太多了，我并不很欣赏，因为这只不过表示了我原有的良心，我是一个贫农的儿子，深知没有党是不可能进大学的，但有同情劳动人民的天性，有偏激的情绪，有恒怅那些剥削阶级气味未尽的参加队伍的人们，挂羊头卖狗肉地危害人民，因为我接触过了老革命干（可能遗漏一“部”字——抄者注）和游击根据地出来的同志，那么亲切，难（可能是“艰”——抄者注）苦朴素，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知道他们是直率地、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决不讳言自己有病，我深深地感动，心底里就想（可能是“向”——抄者注）他们学习，做好自己的榜样。入大城市后，不少现象看不顺眼，在这里仿佛“浪费”是一种“阔绰”的表现，少数党员粗暴地对人，和自私地抢“吃苦”的专业，我很反感。我想，人为什么要装出虚伪的面孔？

我声明，对经四同学主要关于分配原则的论点表示赞同，新阶级（指对抗性的）不存在。此外，他们其他的具体细节上，我认为他们有教条主义，如关于工资问题×（不表——抄者注）要什么考虑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资制度等等，是教条式的搬用唯物史观，当然要考虑，但实质上有原则区别，一为劳动，一为剥削，如斤和尺不能比也！基于现在主要反对右倾分子，他们企图推翻我们政权，这样就没有我们讨论的前提，故其他问题也不能讨论下去了。以后再说。

对经二同学表示遗憾，他们文章往往文不对题，泛论很多，具体分析很少，其实我们知道你们所说的具体的为什么得不出阶级存在的结论，并不是喊口号和威胁恫吓所能解决的。

如果我认为自己分析是正确的话，——如果没有他人说服我才不怕威胁呢，头可断，血可流，真理不能丢！倘使真的有新阶级存在，那么就不难找到新的阶级力量，那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主席语），也可以这样说新生力量是不可被战胜，纵然旧势力如猛虎，你们大××（不清——抄者注）亲眼看到腐朽的国民党，表面上很强大，但内部土塌瓦解就要如山倒的，因此，经二妄想以恫吓代替说理，想的太可笑了！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并不能杀服我！

在打退右派分子进攻以后，我将继续写文章，批判那些教条主义，并继续要对那些打肿脸充胖子，不敢坦白地承认自己错误的“三害”分子，要进行辛辣的讽刺，对具体问题也将提出具体办法和步骤，希领导考虑，我自己家之事，也写信给有关部门建议他们处理。

我不得不感谢一些好心的朋友同志，同时对口是心非表里两套做法的朋友、同志供予一个友好讽刺。

有人说我悲观，“什么自己的子弹打死”，这不然，我指的是宁愿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自己给自己人的子弹打死，而不愿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我的母亲是人民，我的兄弟是“革命者”，为保卫生产资料公有我愿拼命，我不想超现实的好吃好穿，一切事情为人民！真实地为人民！让千千万万的农民兄弟同志冬来有棉衣，夏到有便服，饥饿在中华沃土上绝迹，工农知识分子团结万岁。

——谈论——

论阶级的发展

钱如平

近日，自《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社论发表后，说我神经质的人们，不摸摸自己屁股，　是否神经失常，正像肃反时凑5%反革命一样连忙到北大乱找，如同见猛兽闯入燕园，大声疾呼“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神经高度衰弱的人们，一听“阶级”就魂不附体，并说：这是在扩大矛盾，转化矛盾，啊！看官：岂有矛盾能因我之如此认为扩大，如果真如此，那我高呼帝国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私人性矛盾，那么英美法资本和工人矛盾便日益扩大（严格的单调上升）则资本主义立刻就灭亡，用不着工人斗争了，用不着世界和平运动支持了：我认为：客观事物，并不因各人认识不同而变质， 不然就是反马克思主义， 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马列主义”者，我以前文中明确指出，叫口是心非，讲的马列主义，做的是比佛教徒还迷信、唯心，此等人祸国殃民，要求下台——一个公民——社会的主人完全有权提出，有权干预国事，有人指责：“你在遭反驳后，无事可做，进行神经质的谩骂、……企图溜之大吉，”真是“天才”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凡言之成理者，取其精华，凡狂暴无理攻击，教条主义乱扣帽子者加以驳斥和辛辣的讽刺，揭露其丑形若“州官”“判官”“无常”“百官”又若苍蝇——臭而令人讨厌，使染霍乱，这叫谩骂？不仅不懂文学的A．B．C，而且听了干瘪的叫喊，“以理服人”

后，也不考虑自己身上的回声？我是新社会主义的主人，宪法明文规定，谁敢侵略人权？为什么要溜走？臆造者未免太荒谬！奉劝先生上卫生所看一看病，现因考试迫近眉睫，无暇详论，故不打算现在作一一回答，暂时谢绝参加“辩论会”。

鉴于景升伟同志基本态度真诚，姑且不论其以“教育”者的口吻，既然要求回答，说清楚，好吧，我撂下功课，给一简明扼要的回答。如果还有分歧或不清，请写出真实姓名，房号，以便登门参见，指教，本人尽实际时间可能作一回答。一次不行，可互相保留己见，言论应自由，帽子请勿乱扣，你们批评我结论太早，我接受，不可希勿将此原则，只用于对人。你们也没有什么十分充足的论据，以“显然”

代替材料，并把“后果”作为原因，逻辑上矛盾，如此争辩，我只好适可而止地应付，这里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我用笔名“谈论”的原因，一则

有前车之鉴，有不说理的与自称卫道者成天纠缠发现他见者，二则表明我只作“谈论”不可能专题研究很透，有正确部分希领导考虑，有认识不全面而误者，希解释，“论”者指讨论，集智求知，而不打算作论文。政治不是我的职业，我不允许超出笔名之外对我污蔑和诽谤，歪曲……

言归正传，写下主要论点，由列宁关于阶级定义出发，试看现实：1．生产资料占有，　　主要掌握在军政要人手中——因并不握在群众手中，一个工人并无权干予生产。

2．分配不合理，　高者有不合劳动应得报酬者，（不然为什么要工资改革）多得部分可称剥削。

3．社会地位，　（详见报纸，从生活小事到政治权利，我们只可叫万岁，不可叫“九千岁”，只能称——“级”——能叫一“品”从表面条文，口头说到实践，有差距离d＞0）。

4．对人民不信任，　杀功臣，只要举一例，就大字报来说，为什么崔书记态度冷淡，这是相信群众，有辨别是非能力吗？确信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肃反时，为什么片言只语讲错了话，就杀鸡用牛刀式的用四人彻夜监视一个公民？（可去[问]28，417当事人）　这是信任乎？他听说钢院有一人跳楼自杀，告诉良友——党员同志，然在肃反时竟以“考试期”把此消息告诉党员，“妨碍他”学习，“居心何在”不是老虎？这是对人民充分信任？你们会谈，领导缺点就无关紧要，反正你们个别缺点四个字是和全国各地都有，北大就斗错了200人、清华200人，（见清华同学在驳命与病写的）　全国反革命有5％（史梦兰语），由此推出北大也不相上下，如此皆反对人民之信任乎？我坚决反对敌人，必须彻底肃清反革命，然我不赞成借肃反之际，硬把自己人往敌人一边推，甚至于进行个人意气报复，以及借口调查材料不多，“斗出材料”来的做法。这实际上也是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收集材料，什么是功臣？人民！

是的，党很伟大，能正视并改造现实，见到有“阶级”出现的危险就设法改善，管理机构的官僚化领导像“阶级”，这点在上次“再论”中有重要更正“即可能”

代替“正在”，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之初，也以管理者出现，后来就逐渐不过问生产了！新“阶级”概念引入，当然与旧的不同，因而也不必害怕，算新的阶级矛盾的解决可以用和平的群众监督的方法解决。目的在于便于认识现实，在当前算内部矛盾也可，然而太抽象，我企图从经济

上，政治上阐明矛盾来之何方？至于“内部”

二字指出了多少具体内容，你们不喜欢用“阶级”那么就用“内部矛盾”二方面人也可。

正像你们“喜欢用”领导的缺点和全国皆有，北大就200人斗错同义一样。

“平等”、“民主”、“自由”颂

钱如平

封建王朝造风，继承历史传统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应该颂；杀势腾腾来势汹，血腥气味浓，

小百姓拙作，上奏商榷；

因才疏学浅，有措词不正确，已声明注释，然今日“州官”装眼瞎耳聋，

“卫道者”斗错百姓，口致歉意就行，吾之解释声明，为何杯水车薪？

你们屠刀霍霍向我逼进，“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之枷飞近；我尝到二十世纪中国的文明，

不敢再点灯争鸣，“谈论”要逃命，罢，罢，罢……祝你们万古长青！

子孙若苍蝇！

原来特权思想“兴隆”，

悔不当初自己太朦胧，

总可向“百官”争鸣，

更不该舌战、笔仗去交锋！

斯大林之幽灵仿佛长存，

“土刑”不足，外国货运来，

判官、无常，请快宣布犯“叛国罪”

我打算从容走向“断头台”！

罢，罢，罢……祝你们到处横行，儿孙绝技更加精！

为历史辩护

S·C

政治家、诗人和记史官

政治家对国家和政权负责，有他明晰的判断力和正确的政策；诗人对人道和良心负责，用爱和恨来褒贬世事，诗人永远记得×××在××××屠杀学生时的鲜血，但政治家为了少流更多的血，不得不请他当部长，而去镇压罪过小得多的伪薄蹲长。

记史官高喊：历史万岁！把一切都公正地刻在竹简上，以基狐、司马迁为自己的榜样。

政治家——冷静的头脑，聪明的理智。

诗人——激动的感情，良心和灵魂。

记史官——无情的刀笔，客观和事实。

这三种人对胡风问题的看法都不一样，我更倾向于记史官的看法。

胡风是政敌的典型犯和过去式

查遍胡风的材料及意见书，并未找到他“藏有手枪”的话，他是用笔“且打滚，且作战”的，内心充满了痛恨和仇意，他可能是先天的反革命种子，但更大的可能是列宁说的——遇着他所心爱的理论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恐怕难以为情，便背叛了我们。换言之，是后天的反革命。（姑如此称之，但统称是“政敌”。）这个结论的获得，我并不打算从胡风的材料下功夫来保卫形式逻辑。因为我不是学法律的。然而从材料的意见书看，他们的确是：“先把自己变成老爷，再和老爷作战。” 在政治和文艺理论上，以“打倒”为目的，所以在感情上、在效果上（注意“感情”，和“效果”），胡风离开了革命的道路，另行组织一个集团来叛变了它。回忆1954年由蓝翎、李希凡发动的和唯心主义的一场作战里，胡风趁机起事，掉转茅头，所有的笔尖都对准党中央狂喷墨水。他的危害性在于使党中央，尤其是中宣部岌岌可危。胡风政敌的面目已经暴露，你看看那时应该用“和风细雨”

还是“暴风骤雨”来对待他更好。

一群人，有组织、有理论根据、有阵地，有头目，抱着开仗的决心——这是典型的政敌。在当时不逮捕他焉有何法？（这不是共产党的新发明，而是历史提供的可靠办法。）

我们今天看问题，需是“此时，此地，此事”，但昨天看问题是“彼时，彼地，彼事”。胡风如果在进攻时注意时间，在情绪上不是那种样子，他就不是政敌。但事实毕竟已铸成。那我们的结论就是：胡风是政敌的典型犯和过去式。

历史在前进但留下了黑脚印

宁可流一百颗眼泪，不可失去六万万人的心。

政敌被捕之后，就称为政治犯，这种人在法律上有时很难把他们纳入情节里。

当时过境迁、历经桑沧之后，再去判他们的罪，有时极难下手。

因此，凶狠的执行者，过去用“杀无赦”了结，而善良的执政者，则用“赦无杀”来了结。——也就是不了了之。共产党属于后者。

历史踏着坚实的步伐前进，势必在泥泞的路上留下黑脚印。要回过头来抹平脚印就前进得更慢，要迅速前进就顾不得这个。

胡风问题牵涉广、声势大，在人民心目中铸下了深深的印象，人民感到作得很对，如果现在发现当时处理胡风事件时确有不符合法律约束之处（如私设公堂，私拆信件，文字解释错误等等），我觉得不能反过来加罪于人民及其领导者，要那样做，人民伤心。领导者元气受挫，得不偿失，有百弊而无百利。政治的天平最灵敏。

何去何从，当然判若黑白。

在前进的道路上留下黑脚印，领导者是伤心的，但宁可掉一百颗眼泪，决不可失去六万万条心！

马列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如果在动机与效果上是好的，他就那样做。

胡风事件如果将来公开具结，当然欢迎；如果将来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我们当然了解领导者的苦衷。

人权和法制是一件弹性背心。聪明的主妇给婴儿做衣服要做得大些，以备他日后发育时合身；政治家比主妇更聪明，他请国家和政府穿一件弹性背心，人权和法制是弹性的，它不妨碍国家的发育，它是件背心，使心活动自如。

政治家有了远大的理想，在人民政权下使人权逐渐完美，但在历史的每一瞬间，例外的外延是完全不可能的。也就是人权和法制都有弹性。

一个普通人侵犯了人权， 非法审问另一个人， 监视他的行动，剥夺他的自由（哪怕是暂时的），他就要受到法律制裁。但肃反干部犯了同样错误时（何东昌说："肃反的积极分子犯了错误"），显然政府不会判他们的罪，至多检讨，深刻检讨就行。反正，这个普通人和肃反干部作为"法人"（法律学专用名词）是完全相等的，但作为"生活的人"则还有所不同。乍一看，这似乎是"只许官家放火，不许民间点灯"。但仔细想想，再想想就明白了：当阶级斗争尖锐的一瞬间（你能否认胡风事件及肃反当时不是阶级斗争尖锐的一瞬间吗？），人权和法制是一件弹性背心。

共产党不是蓄意破坏人权，但是当时不如此，以后没有办法，所以弹性背心是客观存在的。有人以诗人的姿态高呼"人权何在"？一方面抹煞了人权的法制，另一方面掉进了形式主义的陷阱。

事实沉默在时间里，真理的眼睛向前看，手段是目的的仆人，人的心房偏左胸。

俄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说："每一时期都是崭新的。他充满着自己的希望，包含着自己的幸福和悲哀。"（见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54年版《论艺术》）这话的意思很明显，时代是变化了，生活的前景在今天都比以往更幸福而光明，旧事重提往往令人神经过敏和爱区区几出悲剧有没有必要呢？没有！回忆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是可以作为经验、作为教训，他的价值连城，倘作为良心、作为怨恨，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书呆子的感情。

过去某些事做错了，是悲哀的事实，最好让他沉默在时间里，而使

真理的眼睛朝前看，迎接未来的生活。因此我同意，小鬼[1]关于 “平反的意见，但反对“反罪于干部”的做法。因这种社会如今还为时尚早，小鬼和一些人出来指问人权和法制，这是民主的做法，但情绪过于激动。带着诗人的心情和剑侠的愤怒，容易失去冷静。毛主席说：“民主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

民主当然只是目的的仆人。小鬼在水利馆面前把民主抬得太高了，想要他回到旧时，过顽固的生活。所以只要民主，不要生活，是偏激的，民主不能给人吃饭，不能给人电影和话剧看，而知识分子即常常振臂呼吁这种民主，这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的差异，这也是就是学校整风特别激烈而外界比较太平的原因，君如不信，请三思之。

[1] 小鬼是清华大学右派学生韦德高的化名。

革命工农群众的心房，是偏在左胸的。他们对共产党更多的信任，更少的怀疑，知识分子总以为自己的心房长在胃里，是不偏不移正中央，说了许多正义的话，有些有道理，有些则是感情的副产品。我认为头脑清醒，心房偏在左胸边的人更为可爱，可惜自己做不到这点。少一点激情，多一点谅解——那更好。

再为历史辩护（摘要）

S·C

任何历史时期的任何执政党（包括共产党），都采取必要的手段来对付他的反对派——这是由历史本身所证明了的。

如果证据确凿，胡风是反革命，那无话可说；如果证据不够，法律学上不能构成胡风的罪过，那同样无话可说。我的理由如下：一、胡风的组织发展到几百人，在社会动乱时期霸占文坛，控制了部分出版事业（如臧克家的诗集，要牛汉批准出版），即使它是文艺流派，但已在事实上成为革命的绊脚石，野心昭然若揭。因此，执政党可以用暴力的办法拔除它，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甚至宪法）。历史上这种事例屡见不鲜，然而崇拜法律的人，看不到这个社会规律，看不到党派及阶级斗争的超法律性。

二、作为统治阶级有它共同的和不同的性格，他的共同性格之一，就是在取得政权之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来消灭并镇压反对派，以期保自己的天下。正因为迅速而且残酷，所冤死鬼必不可免，如果懂得这一个规律，他们在九泉之下应该欣然瞑目，共产党比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都要伟大，因此这个朝代的冤死鬼人数最少， 而又是因为了大多数人而死的，让人们看看迭更司（Charles Dickens）的双城记和雨果（Victor Marie Hugo） 的九三年，再看看中国史书和西洋史就会摸到革命前程的特性，浑然醒悟，而不至怒发冲冠到帽子都要飞了。

三、政治生活是残酷无情的，它往往用蓝色的手段来达到红色的目的，他排斥人道主义和人权……等使人糊涂到耸人听闻的说法，请问诸位，听到哪位党员说过人道和人权这种话吗？ 没有， 因为执政党是不相信C．托尔斯泰主义中“爱” 和“善”的意志，而只相信马列主义的。

四、近年文艺界的改革，似乎是采取了某些胡风的主张（如表演制片小组，刊物独立……都却与胡风意见暗合），但是这是文艺界的自发要求，还是胡风的功劳，或者是故意说成是党的政策，却不甚了解，请提出你的论点。

限于篇幅，不能畅所欲言，请同志开辟论坛，进行辩论（我已看过胡风的材料和某些参考资料）。

组织手段过时了（摘要）

马云风

工人阶级对全民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政策领导应该坚持到阶级消灭为止；而用组织手段进行领导，现在过时了，应该立即停止。

我所说的组织手段指下面四个内容：第一，本质上以党代政的各种手段。如工厂、学校的党委负责制，以及许多党的地方组织直接领导农业生产等等。用这些方法进行领导的结果，就是党说了算。

虽然党没有禁止别人提意见，但是只要党没有改变主意，不管对的错的一切仍按原样进行。如学校中的党委负责制，虽然存在着基本上代表着教职工的校务会议，但它只是个咨询机构，院长有最后决定权，而院长个人又要服从党委会，这样人们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党委会犯错误，于是受害的不仅是党内而且是全院。党委的级别愈高，权限愈广，这种危害就愈大。

第二，公民的选举权不平等。如50万人以上的工业城市的人民，10万人选举一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而其它城市和农村则80万人选一名代表。其它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虽无明文规定，也有类似的情况。这样的人民代表大会就可能通过，虽然大会上是多数同意，而实际上是少数人同意的决议，也就是说在国内人民之间有发生少数人强制多数人办某种事情的可能。

第三，任命行政单位的领导者时，常常是一定要有几名党员而不是以才德作根本条件。这样在才德不够的党员领导机构中，就可能办出错事来。比如安插德有余才不足的党员领导者很多，决定有关科学技术问题时他们不仅很难提出自己的方案，而且采纳别人的方案时不敢轻易接收一个而常常是各个方案的折中方案，这样工作盲目性很大，这样造成的损失，小的几十元而大约能几百几千元的也有。不是党员而才德兼备的人也会犯同样的错误，但是可能性就少多了。

第四，政府、学校、工厂等的人事部门有变成党的常设机构的倾向，人事档案神秘化，这样作就难怪群众不敢说话了，对离自己远的上级敢提意见，对顶头上司则不敢提，学校中毕业班同学说话比低年级顾虑多。因此今天人都有两个影子，一个是太阳照的，再有一个就是人事

材料，它不仅跟着你而且很大程度上决定你的命运，不准看本人的人事材料是不合理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各种组织手段，都具有一种共同的特征，就是：不管对的错的，只要是党的决定就能够加载到人民的身上。所以党和人民之间就有发生一种强制性的可能。在工人阶级革命胜利的初期，对人民的强制因素或有强制的可能性存在是必要的，而在敌我矛盾转变成人民内部矛盾的今天，工人阶级解决内部矛盾时唯一的办法是说服教育，不应该有任何强制因素。如果说民主集中制本身就具有强制的成份，那也应该发生在国家和人民之间（上下级、多少数、遵守法律等），而不应该发生在工人阶级或政党和人民之间，因为我们睁开眼睛看事实的人都会承认，工人阶级政党是先进的，同时也是会犯错误的。联共党犯过错误，中国党过去也犯过错误，谁又能保证我们党从今以后连犯错误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呢？危险的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犯错误时，自己并不认为是错误。因而组织手段可能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保证好事贯彻到底，同时也保证了坏事贯彻到底。我看这是组织手段的两面性。有人说犯错误主要是主观主义，因而今后主要是加强学习提高思想。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必须同时指出，过去许多错误的东西，尽管有许多人反对（如前面说过的保定地委一例），甚至普遍的不同意，为什么还能贯彻下去了呢？这不能不归罪于组织手段。它保证好事的顺利完成是主要的，但保证坏事完成的黑暗的一面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不得不让我们去思考一种代用品，它既能让好事贯彻到底，又避免组织手段黑暗的一面。我下面的意见就是由此出发提出的，是否正确，望请诸君指正。

第一， 党委负责制改成有党代表参加的多数表决制。 在任何一种权力机构中（如学校的领导机构）必须有党的代表。他和其他成员有平等的权力。如果这种权力机构是选举产生的，当选的人员中如果没有党员，则党有权派一名或数名代表参加这机构。但是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这样党的宣传、解释教育工作都可以进行，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政策上对全民的领导作用得到充分的保证。同时它排除了组织手段的黑暗一面，再也不会把错误的或是群众不愿接受的东西施加在人民身上了。

有人会说：“既然党犯错误，你能保证采用这种制度的权力机构就不会犯错误吧？”我只是提醒这些人注意一点，这种机构代表全民（或局部地区的全体），因为全民包括了这个党，而一个党包括不了全民，所以全民总比一个政党犯错误的可能性少。

第二，改善选举制度。除少数民族以外选举权一律平等，用竞选的办法产生代表，政府和人民代表、代表和人民之间建立定期的公开的质询制度。

第三，任命某单位领导者时不要以是否安插上个党员或安插上个群众为原则，唯一的原则是：德才兼备。（领导者并不是权力机构，所以和第一条不矛盾。）第四，行政部门的人事机构不要特殊化、党化、神秘化、应该和其他行政机构完全一样。人事档案和公安档案不应该混在一起。公民有权随时看本人的人事档案。

让青年去独立思考

沈以光

一、关于个性和独立思考问题

整个社会是复杂的。生长在社会中人的特性也是各异的，不能强求一致。如果干涉过多，就会影响个性自由发展，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是不利的。在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政府对人们管得较松、干涉较少，因而这些国家的人民获得了个性解放，要怎样发展就怎样发展，充分发挥了才能，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莫大的好处。但是中国数千年来，在封建统治下，个性得不到发挥，使经济落后。解放后，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已得到了解放，但由于缺乏民主传统，思想统治还很严，若有人不问政治，要按自己的喜好去发展个性，是不可能的。中学里，总是强调集体主义，一切强调集体活动，框子太小，限制了个性的发展。应尽量减少对个人的限制。因此建议：

（一）只要大框框，不要小框框，让青年在大框框中本着自由发展、自然淘汰的办法，去发展各自的个性，使其潜力得到广泛的发挥。

（二）让青年去独立思考，大胆怀疑，勇于幻想，甚至对党的政策、方针也可以怀疑。使青年的“原始思想”得到充分发展。

这就使中国每个人的个性得到了解放，各人的特长得到了发挥；那么，中国的前途，将不可限量，统治全世界不成问题。

自从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和周总理作了“向科学进军”

的报告后，以上情况有了好转。但是最近又强调学习政治，回到老路上去了。

二、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中苏关系不平等，中国实际上处在殖民地地位。苏联专家渗透到我国各个部门，对我国的机密了如指掌（幸亏中苏友好，否则不堪设想）。总之，苏联把我国抓得太紧了。

反对学习苏联一面倒。一切都学习苏联，使人看了很不舒服，中国好像殖民地。

中国应走第三条路线，在中国建立“东方的南斯拉夫”。集中西之大成，搞个综合式的民族共产主义国家。

中国埋头苦干12年，各方面初具规模后，就可以松一口气，与苏联建立双方平等的新关系了。

岂不令人深思

呵欠伯

我本想用“反共就是反革命吗？”来做标题，但考虑到那些没有头脑的读者断章取义，也怕那些稿费爱好者把头砍去领赏，因而采用这个不太醒目的标题。

首先举一个不太客气的例子，设想英国工党说：“反对工党就是反对工人阶级，就是反革命”，这是很可笑的。但难道英国工党不正是如此宣传的吗？难道他们不能找到一些工人在报上发表文章支持他们这一论点吗？也许以英国工党比共产党不大雅观，我们另举一例：当年斯大林在没有头脑的人的“乌拉”声中，岂不也是神气十足，有多少由于反对斯大林的某些错误见解而被当做反革命砍去了头（“胜利者代表大会”参加者在会后两年之间被砍去了一半，选出的中央委员70%被杀了头）。

“反斯大林就是反革命”，今天看来已是可笑的了，但在当年却奉为天书，谁敢说个不字。

“共产党”就其观念来说有两种：抽象的绝对正确的共产党和具体的在某一时间由具体的人组成的共产党， 抽象地给共产党下定义时， 总是用着漂亮的字眼：“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全人类利益的党”“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者的战斗联盟”等等。这样漂亮的党，我们干吗要反对？美好的共产主义的道路，我们何必要离开它？面对如此理想的党，整风岂不变成“无的放矢”了吗？

但在某一国家具体到某一时间，由一定的人组成的共产党，并不像他的定义那样单纯　份我目前的知识来判断，在1927年说“反党就是反革命”是正确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初期，共产党的确接近于定义。（我不得不如此赘述）匈牙利的劳动人民党在去年10月前，就说它很符合于共产党定义的要求，很难说反对它就是反革命。（某些敏感的读者，会在这里嗅到了似乎我赞成十月暴乱，如此我劝他快去领赏，但他犯了明显的逻辑上的错误。）很多报上的文章用共产党的光荣的过去来证明今天及以后也和过去一样正确，这是很自然的，但都很不对头，同样的一个党如果也像斯大林那样念念不忘他的过去，看到了党员的见解便认为是群众的见解，看到了工人的见解便认为是农民的见解，在各种副职的名义之下总揽一切特权……这样纯粹由张刚、张斧、彦平、孙

伟、金铎、郭琪[1]之流所组成的党， 那便很难说它符合共产党的定义，请问反对这样的共产党怎见得是反革命？！

[1] 这些同志大部分是师大党委负责同志。——编者也许有人间：是否应该反对目前的共产党呢？共产党不领导又由谁来领导呢？

请同志们不要闭着眼睛回答。虽然最近几天报上“工人”说话了，“觉悟的”工人群起而应战，大叫“这是为什么？”民主党派的意见正在偷偷撤退，然而在鱼米之乡吃南瓜而肚子胀，吃草根而饿死农民的消息，确有所闻，报上却只字未见，岂不引人深思。

（1957年6月11日）

《人民日报》在一个时间内的形而上学方向

佚 名

《人民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特别是整风初期）登了大量的好报导，好文章，但这个报纸的基本思想方法，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形而上学的方向。

首先我表明我同意百家争鸣中应该有反批评，应该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反击，例如，葛佩琦，但是我遗憾的是为什么一谈到制度问题便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一谈到党的领导的问题便是反对党，一谈到新社会中的错误便是希望回到旧社会中去，这种逻辑是已经过时了的思想硬化的思想方法，过去肃反中的错误，便是这种思想指导的恶果。（不要拿新旧社会对比来辩论，我们对于肯定新社会比旧社会好是不见得比你差的。）

“党天下论”对不对？

我认为“党天下论”并没有反对党的领导。作者一再表示拥护党的领导，为什么编者竟看编戏呢？（从前有人看戏不看戏文怎样，专看演员漂不漂亮）党天下论指出了生活真实的一面，的确就是因为不放心群众在每一个地方放上一个党员做头儿，（不是名义上的而是实际上的）才限制了群众的积极性。难道党政不分、有职无权，对群众不信任不是一致的呼声吗？

我认为根据“存在决定意识”，不同地位的人看问题就会不一致，姑且称之为地位局限性吧，英明的领导就是要摆脱这种局限性，是有全面辩证的观点。试问我们的全体党员都这样高明么？试问最近揭发的矛盾是党员看出的呢，还是群众看出的呢？

因此，我认为“党天下”，是三害产生的原因之一。

固然“党天下”而使人误解为共产党为自己汀天下，但是为什么不看内容呢？

为什么不先从理论分析就一棍子打死呢？为了这一点，便给人以反社会主义反党之名么？ 这与《人民日报》及5．12号的大字标题：“不要怕围剿，不要怕打击”形成极大的讽刺。

为什么“政治设计院”就是和党争领导？

管理国家是科学，给国家制定政策就需要调查研究，分析比较，试问不给人家充分的资料，不给足够的时间，一上来就表决（当然不是说完全未讨论，不过这样够否）这是科学的态度吗？这样人家怎能表示负责任的意见，为什么在设计的时候吸收大家的意见就不好？这样就反对了党的领导？试问民主党派参加设计就能篡夺了党的领导，生活会回答的。

（以前那种形式的通过，我看还是干脆不要的好。）（为了避免无谓争执，我承认不完全是形式，但请问不能更好些吗？）为什么不能成立“平反”机构？

有人说这样就是不信任党，这真是思想硬化的典型，试问党能保证不犯错误么？

党是由党员组成的，党员是人，不是神，这就少不了犯错误。照这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不问政治了。这些人迷住了斯大林，可斯大林少不了犯错误。

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害怕人民的监督，生活会告诉人们，这样是削弱党的领导还是帮助党更好地改正错误，从而巩固党？民为帮之本。

章伯钧为什么说话两样，我看这说明了他还有顾虑，说明我们是压服而不是说服 洞使他们错了也应该说服，为什么围剿呢？这是对待善意的批评么？（当然对章不了解，是否他有别的问题，本人暂不作最后结论。）写到这里不禁感到，许多党员缺乏党性：缺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缺乏唯物主义觉悟——实事求是。

请《人民日报》想想，说话作事不要只顾眼前，要给自己留后步。历史是无情的，的确有许多人就是要百年之后才能定案的，斯大林便是借鉴。

希望不要搞出以前肃反的错误，不要给自己再造出些“平反”。

最后向中共和苏共中央进一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有还是没有？没有就公开郑重否认。有，假如不涉及现行的军事、经济……秘密，我看还是公开了好，任何对客观面貌的隐（瞒）和保留都不是唯物

主义的。常常有人为了眼前的顾虑，不敢老老实实的正视现实，结果总是自己吃了亏，大家也许都有这样的经历，希望把眼光放远点，相信人民的觉悟吧，（当然不是说一定要现在就公开，如果有的话请考虑适当时间。）

末了希望这篇涉及《人民日报》的短文能在《人民日报》的篇幅上刊出。

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

王书瑶

斯大林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骄傲了。但是他可以破坏法制、进行独裁、进行疯狂地屠杀的保证又是什么呢？无论是苏联共产党，也无论是中国共产党都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他们都不免统治者的共同弱点，他们害怕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的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如果苏联在国内消灭了阶级的对立以后，实行高度的民主，政权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则一切错误都是可能避免的。苏联共产党或者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这一教训时，没有归于是制度本身有毛病，而却归之于“人们的思想情况”，我认为是很不妥当的。

任何历史时期，决定历史进程的人民群众，都是根据其自身的认识水平来取舍一切的，来取舍领导的。任何时期的领导人物，领导路线，都具有时代的特点，都标志了当时人们的觉悟程度。领袖人物决不是一些所谓什么天才，他们一经出现，就会立刻为不论什么样的群众所接受。在中国历次革命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

由于中国人民过去深受压迫而文化低、愚昧加之无产阶级年轻幼小，所以在接受马列主义真理时，就不可避免的一定要有大量“左”右的机会主义出现，正因如此，在大革命时中央不能接受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而接受陈独秀的错误领导。在十年内战期间又不能接受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而能接受“左”倾机会主的领导。直到经过两次革命的失败，以血的教训才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此时，才表明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水平已大进一步，以致取得今天这样的胜利。因此我们看到，决定一切的不是领导者的思想情况，而是人民的认识水平。因此，一切领导者如果不愿革命遭受失败和损失，就要尽量提高人民的思想水平。必须使他们具有深刻、明快的洞察力，具有一切政治上的远见。但是由于苏联在建成社会主义之后没有这样作，反而解除了人民的思想武器，使政权握在少数人手里，致使斯大林的骄傲自满，错误理论造成对国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巨大的损害。

为了使人民群众认识水平提高，必须使他们充分认识到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来决定一切。任何在理论上或在实

际上，不论以何种隐蔽的形式对人民作用的降低，都会妨碍这点。如果使群众觉得有了一个可靠的领导者，有了一个可靠的党，　它100%的正确，只要跟着他走就万事大吉了，这就使群众必然日益产生依赖思想，日益麻痹。也必然得出贬低自己作用的论调，诸如什么“共产党是自己的解放者”，什么“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于是一切功绩都是共产党赐给的，解放是、民主自由是、大鸣大放也是，但是不，决不是这样，人民群众才是自己的解放者。在共产党的指导理论上明明是写着人民是自己的解放者。一切领导者的作用也就仅在于他应该进行正确领导，不然又怎能称做领导者呢？不论是政党，也不论是个人，决不能说过去正确，以后也就正确。看待一个人或政党，首要在不在于他过去做了什么，有过何许伟大的贡献，而是在于他今天正在做些什么？对一个人或一个政党，抱着毫不保留的态度而跟着走是很错误的，只要他今天一旦不再能代表人民，违反人民了就应该毫不留情的抛弃掉，正如今天对过去曾与刘志丹共同领导创建陕北根据地的高岗一样。正是苏联人民对共产党可能发生的错误领导丧失了任何警惕性，认为斯大林就是一切，再加上苏联政治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就促成了斯大林的全部错误和犯罪得以实现，而中央权力极大这点起了重大作用。由此可见，今天在我国广泛流行着的对共产党的某种崇拜，是十分有害的。

群众既然可能因为体验到自己有正确的领导而变成群盲，于是党的领导水平就决定一切。就形成了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极大的比重，畸形的比重！于是更加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于是就变得更重要，于是就更要加强……如此循环下去就造成了第一个恶性循环，造成了党对国家的绝对控制，就歪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群众既已变成了群氓，就又反转来有利于党内一切错误倾向的发展，——在这种群众基础上，它也不能不发展——同时，任何党本身的错误又必然要来影响群众。如此，又一个恶性循环。当这两个循环到了一定程度时，党内严重错误就成为不可救药了。

于是斯大林的错误就成为不可避免，而且在他生前还不能纠正。很难设想，如果斯大林活到今天，世界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大家可以从赫鲁晓夫报告透视一点吧：即使斯大林迟死几个月，也就会造成更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人们！应该看到这有多么危险。应该感谢上帝，斯大林早死了，苏联得以保存，更惨重的事件在苏联得以幸免。而在波兰、匈牙利就成了必然，人民在平时不能影响政权，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而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统治又是狂妄愚蠢，到了一定阶段就会不借用暴力

达到自己的目的，当全国人民的命运是掌握在一个小集团手中的时候，如果小集团尚能服务于人民的意志，人民就可能认识他，一旦小集团不能代表人民而只能代表他自己的时候，人民就要毫不留情的抛弃它，正如拉科西——格罗集团被匈牙利人民抛弃一样。人民一定要自己掌握政权，一定要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要什么自封的改造者与领导者。匈牙利人民、波兰人民与南斯拉夫人民已经为此付出了鲜血及巨大的代价。这些事件应该敲醒一切睡梦的人，而把它完全归之于反革命的暴乱该是何等的愚蠢！

六亿人民的生活决不应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党员占1．6%，而决定国家大事的人又占1．6%中的极少数）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苏联人民，已经为此付出了自己最优秀儿子的鲜血的代价（胜利者代表大会70%的中央委员啊！1100多名代表啊！）。人民！我所爱的六亿人民，如果不愿历史重演，无数先烈的血不致白流，世界共产主义不受毁灭的威胁，就应该及早起来，结束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真正自己当家作主，真正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也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更快更好的到来！

我想顺便提一句也许是必要的。在对敌斗争中，加强党的领导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为了矛盾（敌人之间的矛盾）的统一有利于我们的一方，就必须要取得内部绝对统一，因此，我这里决不是全盘否认党的领导，而是反对国家高度权力的集中和党对国家一切生活的绝对控制。

但是政权应该是怎样的呢？这是我希望大家来共同探讨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也超出了本题的范围。作者的希望是大家都来积极参与国家大事，参与国家生活，拿出中国青年固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神情。

※※※※※几句衷肠，运动开展已经两星期了，凡大力参加者无不感学习压力之重大，对于一个物理系的学生来讲尤感其甚，欲放不得、欲鸣不得，不能不令人深思学校当局对吾辈鸣放之大力支持也！虽然如此，亦不避艰难，敢抒胸中之见，以呈与识者。

时间紧迫，精神紧张，文章不当之处故必极多，尚有不敬之处，拜恳鉴谅一二。

王书瑶谨识

（注：该文原题目为《高度集权是危险的》）

铲草要除根

岑超南

在激动的日子里，要想得更深刻。

史大林错误，波匈事件，我国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吗？不，都是一个根源：不民主。

请注意：在人民作主的地方，就有了阳光，一切幽灵、宗派、教条、官僚都会被人民扫光，毛主席说：发扬民主，鼓励批评，只有理论价值罢了，当人民的公民权利在实质上还没有保证的时候，当打击、报复、暗害盛行时，批评者地位没有保障时，当你的命运还被掌握在领导的手里时，鼓励批评，不过是对批评的讽刺。

同学们：我们要满足在民主传统的北大，特别是学生时代生活是最民主的，因为我们没有“经济压力”、“政治压力”，更没有顶头上司，想一想，为什么同在北大，同学大鸣，而老师噤若寒蝉。

很简单，谁没有提升的要求，谁不怕暗害，打击，谁敢得罪命运主宰，是彻底民主化的时候了，要除三害，便要铲草除根。否则“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是信任人民的时候了，没有人民的绝对权力，没有人民的民主监督，不论如何整风，整来整去，都不过是一阵风！要真正整风，首先要把一切不民主的制度一扫空！

我坚决要求下列民主措施：

①严格保证宪法的公民权利。

②人民对领导有绝对的实际的监督批评罢免权力。

③反对人事制度的神秘化，专横化，人事工作要受人民监督。

④除政府、军事及特殊部门外，一般不滥行保密，以免借保密而干坏事。

⑤反对新闻封锁，压制言论，扩大参考消息发行，民主墙经常化。

⑥干部政策要德才兼顾，反对党团特权化，反对“盲从便是德”。

再论“铲草要除根”和“党团员想一想”

岑超南

上次两篇文章招来许多意见，主要是“太刺激了，影响效果”我接受，现在我摒绝一切刺目的字句来详细论述我的观点。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除三害要从更根本出发：目前除三害都停留在表面上，似乎把三害的根源只归结到领导者的思想意识，并没有追究三害的社会根源，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所有文章的中心精神只不过是论证一个早已公认的命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认为如果错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那只应该从错误者本身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来寻找原因，但如果错误已经形成社会风气，那么只能从社会目前状况才能分析其根源，所以我认为除三害，首先要挖根。只有“铲草除根”，才免“春风吹又生”。

“三害”的社会根源是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和党团员的盲从成风：任何错误措施都要在一定的群众中间贯彻，一定要暴露在群众面前。所以如果民主生活正常，人民有实际上可以行使的民主权利，就会对三害群起而攻之，三害自然无法成风，事实上为什么大学中三害较社会上为轻？因为学生爱“闹”、敢说！

为什么今年毕业分配有根本的改革？因为我们不答应了！所以三害的根源是缺乏人民的民主和监督。

另一方面，“三害”的形成总要有社会力量来贯彻，这力量便是党团员的盲从成风，党团员是社会的骨干，没有党团员的盲从，任何错误都行不通，例如没有党团员“绝对服从分配”的盲从口号，以往错误的毕业分配方式是不可能维持贯彻，所以盲从风气使党团员对三害的斗争，被解除武装，所以这亦是三害的根源之一。

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的原因：

一、法制问题：从西语系同学案件、张顺有事件等都说明宪法的人民权利尚未得到绝对保证。法制遭到破坏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我国解放前处于封建独裁统治，丝毫没有人生权利，形成人民对做“官”者都畏之如虎，默认其有莫大权势。在解放后，由于长期尖锐阶

级斗争，要求高度集中，人民民主受到很大限制，政府人员集中了很大的权力，因此当人民遭受违法行为时，竟习以为常，不敢回击，如肃反中对人都有随意软禁、监视的权力，这显然是违法的，而我们竟熟视无睹，如我本身的接触，在入学以前我工作时曾经协助税务局向工商户催税，当时便有一个税务员把一个欠税的小商贩押到税务所，审讯监禁这人，这是××违法的行为，而当时我竟以为平常，甚至还做了帮凶，审讯时还记录口供，因此发扬民主首先要健全法制，尊重人民的人身不可侵犯。

二、领导与群众关系问题：由于尖锐阶级斗争而形成的权力高度集中使领导与群众绝不是真正的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而是绝对服从的关系，无原则的扩大保密更××人民监督的可能性，权威化的人事制度使个人前途被操纵在领导者手里，转×的鉴定会使人遗恨终身，所以在这情况下是谈不上人民的民主监督。

二、言论自由问题：在人民内部事实上并不存在言论自由，在反动帽子满天飞的时候，在政治××的压力下，更可怕的是在“对领导不满，便是反党”的错误舆论下，任何的反面意见都遭到毁灭性的围攻来压制，任何片言只语都可以列入肃反材料，将来有无穷后患。在这情况下，真正民主是不存在的。

党团员是三害的间接支持者，盲从与“三害”不可分割：党团员是国家的中坚，是国家政策的贯彻者，祖国的伟大成就与你们名字分不开，反之“三害”成灾亦与你们分不开，请别激动，只听歌颂，不听批评，又是三害的梦想。盲从亦有其社会根源，执政党的地位使党团员对反面意见抱有反感的情绪。除了“光荣、正确、伟大”便没有其他的教条主义教育，××“有肯定一切”

的成见。在尖锐阶级斗争中，党要求党团员的绝对支持领导，来衡量党团员的立场和党性是完全必要的，但××党团员对立场、党性有错误的理解，把任何××的不同意都认为“立场不稳”“党性不纯”这便完全陷于盲从，完全××绝了思维，更甚至把××了，视为积极，打击××英雄。

盲从与三害是不可分割的，××的××领导方法，使领导人习惯于以行政命令代替群众教育工作，客观上便要求有一批盲从的骨干来贯彻工作，由于领导掌握大权，于是对盲从者表扬信赖×××××××这便鼓励了盲从风气的发展，盲从发展又转而使领导者陷于“三害”，又更鼓

励盲从，于是可为因果蔚然成灾矣！

整风应该是全民的大教育。

执政党的地位使整风是全国的与全民的事，在整风中除党员整风外，更重要的是启发人民的当家作主精神，敢于斗争，勇于监督的精神，××××××整风，我坚决相信，人民起来了‘一切幽灵都会被扫光！××我××人民无敌！人民万岁！

（划×者系看不清的字）

特殊阶层，安息吧！

岑超南

一、在党团员上层分子中有两类人：第一类：领导所做全是对的，经典著作的话全是对的（以前联共党史的话也全是对的），只要不同意领导就是思想有问题或者可能是反党，这种人实际是从未思想过，还自以为对党有利。可怜！

第二类：纯粹个人主义者，无非利用职权达到个人卑鄙目的。可耻！

二、他们起了什么作用——墙与沟的作用。

（1）向领导主观歪曲报告同学情况：（2）维护领导“威信”压制民主。

（3）当领导作出不合理措施时加以帮忙。

（4）后一类人更进行了私人报复。

三、怎样产生的：——领导的官僚主义与宗派主义。

领导由于官僚主义不接近群众，不相信群众，可是领导要工作就要有耳目，由于宗派主义，于是就找党团员这些上层分子为耳目，特殊阶层随而产生！

四；应该怎么办——领导清除“三害”。

领导深入群众，信任群众，与群众商量工作自然会好，不必特殊阶层代劳了：特殊阶层，历史使命已告终了，安息吧！

声 明

陈奉孝

《自由论坛》这样一个小型刊物是由我发起的，现在出了关于肃反问题的专号，我知道这有可能把全校的矛头引向我的，因此，我觉得有下面几个问题需要回答：一、你发起创立这样一个刊物的目的是什么？

答：我发起创立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想把全校同学关于要求进一步扩大民主范围的意见集中起来，因为我深深懂得一个人的力量好比大海中的一滴水，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好建议，喊破了喉咙也起不了好多作用，往往会遭到官僚主义者的打击，逐渐被压下去。但是如果把许多人的共同意见集中起来，就是下股强大的力量，官僚主义者就不能不重视我们，群众也会敢于支持我们，因此我想发起创立这样一个刊物，保住这个讲坛，使大家有讲话的地方。

二、你们为什么要出关于肃反问题的专号？

答：这是必要的。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因为许多同学所以对党不满而不敢讲话，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我们肃反运动的不良影响和副作用，许多被错斗的人到现在还不敢讲话，党的具体负责者还没有向他们道歉，我们希望勇敢的人××讲话。

三、你们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党整风，还是要搞集团，这样做是在故意××矛盾？

答：是的，我们是为了帮助党整风，但并不限于此，还要争取进一步扩大民主范围，这二者本来是不可分割的，整掉了官僚主义这股恶风，就会进一步扩大了民主，要整风整得彻底，整得好，就必须提出扩大民主范围的要求。

我们是要搞集团活动，但是我们要搞的是民主集团，不是反党集团，我们要攻击我校党的领导者，因为他们的官僚主义太浓厚了，如果这种官僚主义的习气继续保持下去，就很难说他们是代表党的，攻击坏党员与攻击党并不等价。

四、你们这个刊物命运如何？

答：我们要尽最大的力量来把它保持下去，不仅在整风期间，以后也想保持下去，如果可能，我们还希望把它改成油印和铅印，不过，我们都是穷光蛋，文艺修养也不够，要做到这一点困难是很大的。

大家不敢讲的话却可以到这里来讲，如果有人不愿意让他的名字（十一字看不清）一定给你保密，我们的刊物绝不受官僚主义者的左右。

如果有人关心我们的刊物， 可以直接到28斋426号来找我交谈，如果学校领导人怀疑我们要搞××，提出质问，也请直接找我交谈，不必捕风捉影，追究别人，如有问题我愿负全部责任。

许多人在怀疑我们，也有许多人对我们抱有很大的期望。怀疑我们的人让他们怀疑去吧！我们并不害怕，对我们抱有热望的人，有话来讲吧！我们绝不辜负你们！

如此伎俩

陈奉孝

自从我校反右派开始以来，保守派为了挽回他们已经破产了的名誉，为了挽回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竟不惜采取造谣诽谤破坏别人名誉，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等卑鄙的手段来打击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以期达到威吓和欺骗群众的目的。

第一，保守派在《人民日报》上宣布了百花社是反动小集团，宣布了广场是反动刊物，他们明明知道这样做在北大会有很多人不相信，但他们仍然不惜采取这种手段来欺骗外校同学，打击北大的民主运动，造成外校同学对北大民主运动的疑惧和仇恨。

第二，保守派拼命制造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莫须有的罪名，加在这次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头上，好像只有他们才是代表党和社会主义似的，利用所谓批判会的手段来威胁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并争取群众。

第三，他们利用一切宣传工具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破坏别人名誉，把人家说成是小丑，坏蛋，流氓和打手，以便造成群众对这些人的怀疑和仇恨，从而孤立他们。

第四，虽然保守派利用了上面的手段，但他们也还很清楚，还有许多人支持这次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而大多数的同学对保守派还有怀疑态度，因此根据前车之鉴，他们还有最后一张王牌，那就是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在“百花社”和《广场》编辑部中，找出一个所谓反动分子或反革命分子来，他们现在正在对某些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进行逼问，搞得他们思想混乱，用威胁的手段逼他们承认所谓反社会主义罪行，并找出这次运动中的组织者进行逮捕和法办，这样他们就可以高喊高叫了，看啊！说“百花社”是反动小集团，“广场”是反动刊物，你们不是不信呀！

这里面真有反动分子哩！

同学们不信请等着看吧！这样手段保守派迟早会施出来。最后，我们必须申明：我是这次运动中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我发起创立了自

由论坛，参加了“百花社”，后来又以个人的名义参加了“广场”编辑部。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因为我认为“三害”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现象，要根除它必须依靠群众力量，所谓小集团在根除“三害”中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

保守派们，我是这次运动的组织者，你们对我自然是恨之入骨的，那么请你们来我我吧！我知道你们会用捏造和无穷的推论的方法给我制造罪名的，对于这些我都愿意承担，我只是希望你们不必再折磨那么多无辜的人，同时，我公开要求那些跟我接触过的人不必再顾什么情面，把你们所了解我的一切言行全部讲出来好啦！

我绝不会怪谁。

我的态度就是这样：如果有人（不管是谁）愿意共同跟我把问题搞清楚，那么我欢迎，如果有人要我做什么坦白交待，那绝对办不到！保守派们！你们不是掌握着权利机关吗？那么，你们现在就用吧！不必再用所谓批判会的手段来欺骗群众了。

保守派们！虽然看来你们胜利了，但是你们晓得吗？“五·一九”的火种已经播下了，它迟早会变成燎原大火把你们烧尽

我的发言

杨 路

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只谈自己的看法）由清华29人事件表现了领导很不喜欢到校外去谈，工作消沉，希望外校不知道我们的情况，这对整风并不好。我觉得有必要讲讲北大的真实情况。如果外校的同学还没有动脑筋也可以抛砖引玉，即使被批判也会使他们认识提高，所以要去（因为他们太不敢鸣放，我们去开炮）。

去是以个人访友名义不代表北大，共六人有三个广场编委，谭和我是“黑——恩”学派，还有刘奇弟，还印了些传单，当然片面，但也只有这些才能起我们的作用，为使思想僵化的人动动脑筋。传单片面而且偏激，有些我是不同意的。如关于胡风的问题，传单是煽动性的，但比糊涂好得多。传单是个人的看法没有造谣。

去后谈及“政治课选修问题”“肃反的一些错误”。我说肃反损害了很多人的自尊心，妨碍团结。为什么那时候肃反呢？现在为什么不肃？整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有波匈事件的血，而不是恩赐。

晚上开会刘奇弟先介绍北大情况，态度傲慢。谭讲“再论”下面非常欢迎。并讲青年的生活，思想僵化，个人崇拜的根源，其他根源。开始辩论，××每场辩论几乎都反对。但没有正面驳斥，捕风捉影，最后学生会读了信讲滚回去等等。我没发言。

第二天，天津师院数四及学生会请我们去介绍情况。数四和学生会争主持会场，后来决定下午先请北大的讲。晚上辩论。报告先由沈泽宜介绍情况。我说“你们要听就忍耐些，要不满可退场”。刘奇弟讲胡风问题，再由谭讲那些不能像相信宗教那样信奉马列主义。晚上不叫我发言解释。我要退席沈泽宜抗议。数四很支持我们。

这是在过道的事，这就是三害分子江书记所说的秘密会议。次日与数四讨论结果希望下午谈谈“三害根源”、“政治课”“青年思想”等。谭刘去天大，我和沈去参加数三的辩论会。我谈胡风问题和以前一样。并谈到官僚主义是统治者不可避免的，主观主义是认识的问题。沈谈“是时候了”。下午数四的辩论会偏袒我们不公平，同学大有意见。我谈政治课的问题，刘奇弟讲然后又是辩论。同学认为数四篡夺学生会的领导要赶下

去，由学生会掌握会场。这种作法何其糊涂。我们又不能发言。

我和沈便启程回校。刘奇弟抗议学生会，后同学们把张景中赶出去了。

我以为我的目的达到了，因为他们动脑筋了。而且我看我们六人的目的也不同，对目前的形势估计也不同。我开始并没想帮助党的整风，只觉目前压制得厉害，要民主、自由这是正义的，但我最后反对的是愚民政策、封锁消息和书刊。我从不考虑这活动受谁欢迎的问题，而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后可以发挥大家的积极性。我本人以要求民主而去的，而且这样对整风对党有利，为避免清华29人那样所以没向组织商量（怕三害分子）回来也没有汇报。我觉得这对社会主义也有利。

我认为目前的主要分歧有二点：

第一，是对真理的看法问题，也就是真理的不怕辩论的问题。我认为真理是不怕辩论的。

第二，是对民主的看法问题，你们把民主当作手段，爱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

而我却认为民主是神圣的权利，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一个人在不妨碍别人的前提下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们是只知道有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承认还有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原则。

最后的宣言

杨 路

6月22日在“广场”编委扩大会议最后一次聚会上的发言同志们，同学们，鉴于目前局势特作个人声明如下：一、党内进步势力已和保守势力结成联盟（至少是默契），以打击国内的反社会主义分子。这种分子在北大我不敢肯定没有，正像某些人不能证明它一定有一样。

从某些迹象（《人民日报》的报导）看来，党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方式，在打击反社会主义分子同时，将许多积极要求民主与革新的人一概扼杀，严重地摧残了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当中的民主力量。

二、我是不能同意这种小题大做的措施的，我将保持与党不同的意见，即不应因一小撮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同时打击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力量，不应借口阶级斗争而打击了那些为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积极扫除障碍的人，同时对那些手段上很不高明的、不公正的、显然的对民主的压制表示强硬抗议。

三、党和民主激进派已由它们各自的片面性而陷于某种对立状态，虽然这主要应由党来负责，但我们如果再僵持下去，对党，对现时还缺乏主见的群众和对我们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这种局面只是对三害分子和真正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有利。

四、民主力量应当退却，这不是向三害分子和保守势力退却，而是与党内进步势力妥协。这种妥协现在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虽然《人民日报》那篇报导荒谬可笑，要盼望更正恐怕是比较困难的，广场应当停办百花学社应当解散，否则不管你们是否进行了反社会主义活动，只要有一点明显的民主要求，除非变成“浪淘沙”

那样低级的东西，强权和所谓“舆论”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五、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向“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战士致敬！希望大家注意到人们在民主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民主权利除掉它的阶级性外，还有着全民性，即全体未剥夺公民权的人民对政府之约束，后者作为一种暴力机构很容易伤害人民，人民必须用一种全民平等享有的民主权利来保护自己，来抵制政府可能采取的暴政。

希望你们吸取教训，在全民平等享有的言论、出版自由得不到充分保障时，其他许多进一步的民主要求是谈不到的。

六、在这次运动中，我的路线基本正确，没有离开社会主义，但也有错误，现在还不准备检讨，今后行动方针是：①谢绝一切辩论会、讨论会和个别谈话；②不写大字报小字报；

③拒绝参加这种不问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死的学习和批判。

朋友们，希望你们考虑我的意见，避开流弹，我没有力量帮助你们了。我厌倦了，我要继续去念那本“Introduction of Methmathes”

七、当别人指责我参与了某些我一直闻所未闻的政治活动（召开秘密会议，破坏学生会）并以一封不负责任的捕风捉影的来信（曾以大字报贴出，无名氏写的）作为佐证时，提出抗议，不但是我的权利，而且是对压制民主者的必要的冲击，是为民主力量撑腰，对这个抗议竟然使得一些同志过分激动，并且因而要求开除我的团籍、这件事，我不得不感到非常遗憾，并且啼笑皆非。

八、对于那些扮演了不光彩角色的别有用心的趋炎附势者，希望他们得以称心如意青云直上，更希望他们在不久的将来能学会害臊，能学会尊重自己。首先是作一个正直的人，坚持着作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再见了：

我没有爱过这人世，人世也不爱我，它的臭恶气息，我从没有赞美过，也未曾向它偶像崇拜的教条下跪，没有强露欢颜去奉承，应声吹捧，因此世人无法把我当作同类，

我不是他们之中的一个，虽则其中我的思想和他们是全然不同，

要是没有玷污自己的心，屈辱了自身，也许我至今还在那人海中浮沉。

6月23日注：　对于我个人确有过的全部言行，我愿负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但对某些人对我的造谣中伤歪曲引伸，张冠李戴以及血口喷人一概不感兴趣。

我的自我批判

鲁中速

自从我的论“阶级”的一文发表以后，很多博学善心的党内外朋友、同志，以丰富的事实和材料，证明了我的论点有问题。我回想起来发表文章的第二天，就是大哥在去年这个时候因工牺牲了，这是官僚主义的杰作。留下七岁的孩子和年轻的寡妇，一周年纪念。在气愤悲伤之余，在一个晚上写完了文章，希望内心的石头下沉，另外尚有一些旅途中目睹水灾之祸，又见拥有无厌要求之领导人员，故吾怀疑阶级存在乎？为便于问题提的干脆，我先作了大胆的结论，且附声明，若有材料请补充。我也认为广大人民生活水平有显著提高，我急于天下皆温饱，离开历史和实际可能。现在，我同意经四同学的分析，应该看到不合理的分配正在消灭，真正趋于合理中，事实上我也无法说得具体，得出一个标准，因为这是个很复杂的经济问题，有时为照顾某些生产部门能迅速发展可以适当的提高工资等等。

关于社会地位问题， 5401130已写出，完全一致，过去我是幻想过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其实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低估领导的作用和集权。从前，因阶级斗争尚未终止，美帝国主义尚在台湾横行，“斗牛”式导弹威胁着我们的安全，昨晚看宋景诗有感，深知无党坚强领导，国家就要迷失方向，我当时想，宁愿死在自己人的子弹下，只要能保护其余许多人的幸福。我希望以后尽可能多吸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保证人权并采取具体措施，如可否出国半工半读，研究生一视同仁的建议总工会妥善安排牺牲工人的家属，以加强安全措施。我真要说的就是这些，为了变成理论问题，故提“阶级”之类，许多论点的确荒谬，虽有些个别例子是事实，是不是通也，其他不再写出了，有兴趣请留尊址。

“卫道者”们看

徐克学

一、我们的社会制度中有产生三害的根源不少被批为离开社会主义的大字报提出对三害根源的讨论。认为我们的制度不健全， 民主权利不够， 这都是产生三害的根源，我认为这些看法还是有道理的。

“卫道者”们不要慌，不要一听到：“我们的制度不健全……”就条件反射似的举起双手反对，大喊“你的动机何在，你污蔑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老天啊！谁还敢鸣，敢放，敢对重大问题进行探讨，谁又愿意做反革命和可疑者。卫道者们，你的脑子哪里去了，但愿不是我们社会现实生活使你的脑子生锈了，而在此提供这种论点的证据，动动你的脑子吧！我愿意在此提出一些论点的理由让你们的脑子开动、开动。

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被分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里，现在，将来还会有这对立的两方面。在我们的社会里，领导者还要组织被领导者向阶级敌人作斗争，由于领导的地位使得领导者不可能完全了解被领导者群众的要求和呼吁，这样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有其产生的条件了，领导者要领导被领导者和阶级敌人作斗争，民主生活不可能完善，要集中，甚至民主被集中挤得可怜。

这样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有墙有沟也不是没有客观原因的，难怪有人不敢大鸣、大放，对领导者有意见，想批评前顾后虑，三害得以安然存在，被领导者的处境不可能像领导者看得全面，看得长远？尤其在阶级斗争还没有消灭时，我们的制度，必须规定被领导群众要服从领导者的命令指示……。领导者在群众中久而久之有威望了，领导者的话被奉为经典，某些时候群众只能凭着对领导者信任接受指示和领导。万一领导者错了将如何，群众也只能把“经典”教条的歌颂，并贯彻到行动中去。斯大林的一个公式，随着阶级的消灭，阶级斗争愈尖锐，为什么曾被奉为经典呢？大家可以想想。我说出了我的意见。条件的限制我不能列举如上的例子。结合我们的制度仔细分析，证实我的看法，但是有头脑者，可以想到更多的例子来说明我的看法。

二、我们的社会制度必须处理双重任务——人民内部矛盾和敌对阶级的矛盾。

不要忘记我们的社会制度，要担起双重任务，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又要进行对敌国、蒋介石的斗争，阶级斗争的任务给我们的制度带来不可避免的缺陷。这缺陷也就成为三害的根源。不改变我们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彻底根除三害。问题很清楚，若不离开时间、条件、环境，谁都应该承认我们的制度是优越的，还能够组织力量和阶级敌人作斗争，还能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虽然不是根本解决，但比起历史上任何一种制度都要完美，因此我反抗三害根源的讨论时，提出立即根本改革我们社会制度，提醒这些人不要忘记蒋介石、美帝体系的存在。那么不能根本改变怎么办？整风是办法之一，随着阶级敌人的缩小适当扩大民主，改进某些制度也是办法之一，这不是根本的办法，因此党曾经整过风，今天在整风，以后还应该整风，时时整三害。

三、莫忘记我们自己身上有不少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卫道者”们不要害怕对根本问题的讨论，我看到不少大胆想有意鸣放的人、遭到非治病救人的攻击，我本无写大字报之意，但提出这个问题，刺激一下病人的神经，可谓针疗法。我的意见不一定对，可能错了，我欢迎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批评，但若有人立刻条件反射式的未经过第二信号系统而发出一连串的呼喊，你的动机是什么？你对我们社会制度进行诽谤、污蔑……，你想挑起人们对我们的社会制度的不满吗？……那么我要向你大吼一声，朋友、你病了！对于你的病我给你介绍一位神医，请到16斋北墙有洪元娟大夫处方，向卫道者同志呼吁的大字报一张，请到该处就诊吧！这是本人写这张大字报的主要意图。再见，祝你健康。

无 题

张志武

《人民日报》连续的社论使人无所是从，如果你坐在凳上则可看出趣事。看来党的缺点和错误是严重的，怕右派分子给宣扬出事，赶紧拿出“反社会主义”“反党”的大帽子来，把这些敢说话能说话的人一下子扣死。这些知识分子真是短见，叫你鸣，你也得有个分寸呀！哪能什么都说呢？满以为说的越厉害越是响应党的号召，越是起带头作用。结果作了典型。共产党这一招把右派分子打得可够呛，那些借机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再也不敢了。原来有顾虑的人这回也看到了现身说法。这个场面看来不好收拾，今后人们都会更加小心了。说话要考虑，首先都要作自我的言行检查。不出一个月，这前前后后都给人们看到了。人们对问题更有了清楚的认识。什么事情都有范围，都有局限性。顾虑不成其为顾虑了，它将变成分寸的出发点，想怎么的就怎么的不行。自由、民主都有阶级性。我们有对党对社会主义歌功颂德的自由，有和风细雨批评的自由，我们有拥护社会主义的民主权力，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权利，没有想什么说什么的自由，没有不经领导批准的民主。

共产党的领导不可怀疑，社会主义制度不可怀疑，我们现存政权也不可怀疑，即使你是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因为你可打着学术的旗号反党反人民。

三害判决书

张志武

被告：宗派主义，年36岁，1921年7月1日生教条主义，年38岁，1919年5月4日生官僚主义，年8岁，1949年10月1日生查被告宗派主义自诞生以来，搞不团结，破坏党与非党团结，迫害群众，造成对党不满。

查被告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当成死的圣经，不问客观情况，硬按清规戒律行事，不顾中国情况，生搬硬套苏联经验，扼杀新生力量。

查被告官僚主义，平日高高在上，不问下情，主观臆断，脱离人民，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对来自群众的批评置之不理，反恶意猜测提意见的动机，加以打击报复。

以上被告由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公诉来院，经本院审讯被告对以上罪行供认不讳。

为了整风，彻底根除三害，理应判处被告死刑，但念宗派主义对加强党性，维护党的利益，保持党的纯洁有功。教条主义虽然生搬教条，但对减轻脑力劳动，防止操劳过度，遵守马列主义（准）则有功。官僚主义对维获（护）领导威信，防止忙于日常琐事有功，减（轻）干部体力劳动过度有功，故免于判刑宣布无罪释放，今后再有骚乱滋事之徒控告那三个主义，本院定判其诬告罪，斩首公众，以儆效尤。

北京大学整风法院

一封公开信

张志武

江书记：

本来想同你面谈，但因种种原因，没能如愿以偿，我来到北大还不到一年，对情况还不熟悉，对过去北大存在什么问题还不了解，加之自己又是个党员，所以对“五一九”以来的整风运动就不敢乱云云。

现在高潮已经过去了，更确切点说，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辨论会消失了，民主墙上的大字报只剩了稀疏几张，与当初比较起来，使人有日落西山之感。当初；正像您说的是“琳琅满目”，现在我说是一片凋零，如果说运动在发展中，我们不断（管）好坏是可以的，今天第一步已经过去了，本着盖棺论定的保守主张，现在来同您谈谈这个运动及党委对这个运动的领导。

从5月19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运动， 有人叫它民主运动，有人叫它整风运动，反正就是运动吧！我想现在您不反对这句评语，从它的起因，暴露出的问题，群众运动的情况来看，运动是健康的，群众的要求是正当的，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行是极少数的，而且是为群众所指斥的，至于有些人言语尖刻，情绪激动是可以理解的，它的主要缺点是，运动没能直接在党委领导下有步骤有计划的进行。您曾代表党委向全校师生宣布，党委完全支持大字报，但大字报不是最好的形式，并对崔副书记的态度表示遗憾，现在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了，回味一下党委是怎样完全支持的呢？我想不出来，是不是崔副书记的不禁止就是完全支持呢？或者他被大字报不是最好的形式给否定了吧！是你在党内的话起了作用吧：记得您在党支委干部会上（党委、总支、支部），叫我们领导党员和群众用大字报或论坛反驳那些污蔑、谩骂和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解除某些误会，向那些人讲清情况，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您对党员可否用大字报来揭露三害却只字未提，而且我们法律系党总支委员肖永清同志和张国华同志还告诉党员，党员有意见不要用大字报形式提出，当然这不是不叫党员（鸣）吗？这种作法在客观上就使党员小手小脚起来，妨碍群众大鸣大放，从全校来看，在这次运动中党员和靠近党的积极分子是比较沉默，没能起到积极带头作用，有些人质问党员是有道理的。

我们的党是没有私利的党，这一点8年多的党内生活使我坚信无疑。

在这封公开信里，我提了一些党内的事，照理说党内的事情是不应该讲的，无论什么时候党内外还是不同的，党的纪律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忽视，不过要看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党委在这个运动中是被动的，放弃了领导。所以如此，我认为您和党委委员除了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缺乏经验外，还有一个错误的看法，认为这个自发的运动超出了党委领导是闹事，事前心中无数，估计不足，事情起来了，张慌失措，不能预察运动的进程，只怕出乱子，一味的希望平息，看不到它是崭新的冲破传统习惯的大变革大运动。

如果党委很好地领会了中央、毛主席的鸣放方针，事前有足够的估计，运动起来之后能积极领导，号召党员带头采取一切形式大鸣大放，会使很多想讲话的人能无顾虑的讲出来，会使党团员和全体同学紧紧团结在党委领导下，会使离开社会主义言论及其不应产生的错误言论更加减少，会对三害攻击得更有力，但是您和您为首的党委会没有这样做，你知道这个损失有多大啊！您知道这挫伤了多少积极热情的心啊！希望党委好好总结这次运动，希望在考试完了后，或者下学期初，党委重新掀起这个运动，积极领导这个运动，我愿在党委领导下和群众一起，把风整好。

在这封公开信里我提了一些党内的事，是否妥当，请指示。我们的党是没有私利的党，八年的党内生活使我坚信不疑，指出党委的缺点并不意味否认全党。

此致

敬礼

张志武

1957．5．26

争取社会有九十度转变

应成旺

——三害根源及防止之法

必须强调从团结出发

“团结－批评－团结”公式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办法，在这里第一个团结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可是，参加讨论的很多同志是抱有阶级偏见的，（并非对敌我问题）以及一棒子打死的观点，运动中的这股暗流使人感到恐慌，并给运动带来各种不必要的混乱。

如在探讨我们“管理制度”问题时，有人担心：这会离开了社会主义；也有人反对：这是教条主义的说教。真是天哪！你说他们就不明白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历史上私有制发展的必然吗？都不明白在公有制基础上一系列经济的政治的管理制度有改革的必然吗？不是，只是因为在这些同学的思想上欠缺这样一个前提：讨论要有实事求是的心，除三害要有对症下药的精神，我企图本着这种心情来探讨，三害根源与防止的问题。

测病况

对党整个工作的估计：“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这几乎是无可辩驳的历史真理， 但是也得承认， 党的工作在有些地方，有些方面，有些时期也可能“成绩是次要的，缺点是主要的”。在这里若有任何夸大的估计，都会犯把党偶像化，或走上全盘否定党的片面性的错误。党犯的“三害”病在解放后是大大地发展了，它严重地几乎侵蚀到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它已经巍栋到全国人民生活的健康发展，整风是迫不及待的了。

采病根

产生“三害”的原因总归起来有思想的和社会的两方面，而社会的原因是根本性的，（这里不否认思想因素的反作用及在某些条件下也有决定的作用）而其中最主要的可算是现行的政治经济管理制度了。因为从现有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材料分析，“三害”几乎都与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集中的统一的过多有关，而这些过多又是在制度上有规定的，反而党领

导全部的社会活动几乎它不是通过“制度”来贯彻的，就如：管理机构的重重叠叠，领导同志不犯官僚主义，工作上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倒反有点怪，“三害”的风在这种条件下就成为制度的产物了。制度虽不是万能的，不能绝对保证领导者不犯错误，但是制度能够保证群众对领导的有效监督，使领导的错误很容易被群众发觉，并能及时得到纠正，例如匈牙利过去领导集团的严重错误长时期以来不能得到纠正，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于没有能利用制度来保证群众的积极监督作用，坚持“三害”根源于思想状况的人，仅仅看到它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理应格格不入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公有制所能以体现的，各种具体的管理制度在事实上产生与助长了“三害”的可能性的一面，认为管理上过多的统一集中与公有制是联系的，而与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就联系不上，真是太天真了，太脱离实际了。我们要问，如波匈事件斯大林的错误与他们的政治经济管理制度就没有内在联系吗？这些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所出现的弱点与我们党的“二害”

在表现形式上产生根源上没有一致的地方吗？只要同学稍以相互联系的观点来分析事物，就不难回答了。所以今天我们探讨它设法铲除它，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也有头等的实践意义。

抓住历史分析法

应该怎样来分析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的通病呢？我认为回顾一下历史是有好处的，在过渡时期党是处在这样的环境中的，阶级敌人的顽强抵抗，社会经济混乱与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经济狡猾，及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国际的资本主义阴谋等等一切（纷）繁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决定了阶级斗争的剧烈化，经济上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艰巨，革命本着谁战胜谁的法则，迫使工人阶级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坚决严酷，强力的手段，也正是由于党在革命的实践中能够创造总结出一整套政治上，经济上服务于敌我斗争的更多地保持集中统一的管理制度，才显示了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劳动群众的强大威力，才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辉煌胜利。同志们，党，她伟大英明，能够领导群众创造奇迹的历史事实，是我们在任何时刻所不容忽视的，但是这与强调正视今天的社会现实，并不矛盾。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结束，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主要地服务于敌我斗争时期的一套管理制度，领导作风，领导方法，紧迫地要求改造，使之有效的适应于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的今天的社会情况，要不然用老办法来处理新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这就会不可避免地滋长“三害”及人为地造成人民内部的矛盾。

社会要有九十度的转变

若在阶级斗争尖锐时期人民的自由民主受到一定的限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现在就是改变的时候了，社会主义要继续过渡！“三害”要彻底根除！

因此，我们建议：除了对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根本上反对党的领导的阶级异己分子需要以另一种方式予以对待外，对人民内部矛盾的一切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领导同志应该为广大同学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在物质上，精神上的支持）无顾虑地，更有效地，全面地探讨现实社会中政治经济的管理制度，党的领导方式在领导作用中的各种弊病。

青年的社会主义，难免有些幼稚，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从不夸张自己说：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未来的共产主义有天生的经验。

历史的车轮要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来推进，未来美好的生活依靠人民群众的大胆勇敢，无穷无尽的智慧来创造。党的领导是航船的舵手，只有领导才能把分散的群众变为组织的力量，伟大的党要继续走到群众中领导群众！党要永远是群众力量智慧的解放者：

社会要有九十度的转变，现实要求人们严肃地考虑下述问题：作为强力工具的国家还是经济关系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否要改变？将国家所有制形式变为归生产者大家庭的直接民主管理的所有制，是否值得考虑？自下而上的建立起人民群众的各种组织直接影响中央政权，并达到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它的发展中依靠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的自由行动，而不是依靠于国家的力量，”为使社会主义正常起来，为使官僚主义当作一种社会势力加以彻底消除！

我们承认：凡是合理的都将变为现实，现实中的糟粕要无情地予以剔除。闭眼不看现实，自欺欺人反对社会不断改造的人，将受历史的斥责，最后将为群众所抛弃。

致同学们

目前运动的发展在剧变，情况不会使人乐观，促进、阻碍、破坏运动发展的各种因素在交错地发展着。更多地注意，是什么因素严重地影响着对以上这些问题也是对党整风运动带有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在这个决定性的时机中，袖手旁观的态度只会葬送运动的成果。我们要提高警惕！识别伪装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敌人，要高举起思想战线上阶级

斗争的旗帜。我们要反对：阻碍运动前进的抱有保守的客观上充当“三害”牺牲品的同志们，要反对在运动中抱有否定过去一切的虚无主义观点。不懂策略的骑士式的横冲直撞，盛气凌人的做法是不对的。运动中的各种流派或暗或明地形成着，现在是比任何时期都更要领导的时候了。

让马列主义永远从生活中发展，未来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们不惜贡献出你的勇气、力量和智慧吧：让那些认为现实中好的都是社会主义的，坏的都是资本主义的，认为只要有公有制这个法宝就万事大吉了，“教育”人们不要再去攻击社会主义的浓疮而付出代价等等形而上学的教条去见鬼吧！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要由人们去争取！

让社会主义永远不断地前进着！

※　从私有制变为公有制为社会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而将原先服务于敌我斗争时期的经济政治上的管理制度，到领导作风，领导方法改造为适应于阶级斗争已基本上结束了的今天社会，这为社会九十度的转变。

现实的社会主义并非世外桃源

佚 名

一、现实社会主义并非是世外桃源社会主义社会是历史的连续，它与历史上的社会并没有绝对的改变，要是说，资本主义是劳动人民的地狱，那么，现实的社会主义也还不是劳动人民的天堂，可是有些人对目前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陶醉迷信，好像现在已经到了世外桃源，正如因为资本主义对封建社会跨进了一大步，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说着资本主义永恒的梦语。

二、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虽然目前我国的生产关系大大优越于旧中国和资本主义，因此为生产力的高涨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又突出了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面，这就是当权集团与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它取决于生产资料的占有，那么现有人与人在生产中的关系是什么呢？有人说，现在人与人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了，但是客观的存在恰恰否定了这种乐天主义的论调，现实生活中当权集团在生产资料支配上具有“超群”的特权，这种特权与他们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上的其他特权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当权集团与劳动群众便是现在社会主义内部的主要对立面，目前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重大错误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这样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当权集团与其追随者的存在， 就是“三害” 得以横行一时的基础（对于现在社会内部是否存在当权集团这一点和“三害”的基础已有很多有关文章（此）文不加叙述。这里向乐天主义者敲起警钟！

“三害”害在哪里！

他们不是鸡毛蒜皮。它们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斯大林时代的错误，在苏联经济上造成严重的损失，特别明显的表现在农业，在波兰情况更为突出。

解放后中国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教条的搬运苏联经验与盲目的发展亦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损失，目前我国经济建设中的

困难并非与此无关。

（乐天主义者，赶快跳出井底吧！）三、解决目前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主要矛盾的试探目前社会主义内部主要对立面（脱离群众的当权集团与劳动群众）的斗争与统一就是社会主义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发展是遵从着渐变到突变的规律，因此，当人民发觉到生产关系中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面时，就必然要求一个根本变革。

某些人感到这句话实在太刺耳（也许是一种条件反射）他们是一提到根本变革，就像历史上一个集团起来打倒另一个集团，一个政党起来打倒另一个政党，打得当权者一扫而光，其实这种条件反射式的恐惧是大可不必，他们没有考虑到时间、条件变了。现在全国人民已经有了相当高的觉悟，他们决不愿意返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牛马生活，但是他们坚决要求把社会主义推向更高一步，另一方面现在当权集团，虽然是享有特权的阶层，但是他们的特权毕竟与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大有差别，更何况他们也是刚刚从旧社会中解放出来，他们为了打倒旧中国，曾经抛头颅洒鲜血，他们到底是接受到马列主义的真理，在过去艰苦革命过程中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紧紧地依靠着群众。

解放后虽然由于他们地位不同，与群众疏远了。但毕竟没有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现在我们党的主要方向是正确的，但是错误是极其严重的，如果党不认真（解决）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斗争发展，不认真摸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不认真探求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果党不对不合理的地方做坚决彻底的改革，如果党不实实在在地依靠劳动群众的智慧与监督，那么其后果是难以设想的。我们不埋怨党，因为认识一般是要在对立面矛盾突出以后，同时我们也坚决要求我们的党勇敢地采取彻底的改革。

为了消除和减少当权集团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我们要求党中央尽可能消除党政领导者的特权，（为工作所必须者不在其内）我们认为这是消除目前主要矛盾的有效办法，这样作有百利而无一害，作为人民称职的领导者，应该为了社会的进步而具有慷慨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取消领导人的特权其意义还不在其本身可以为国家节约一些开支，更重要的是消除和减少了领导者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实际差别，使得他们的思想意识更好地反映客观，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目前我国提出的领导人参加体力劳动实际是还太肤浅了，流于形式，每一个真正的人民领导者应该基于用他的才能等自我牺牲精神取得群众的敬佩与信任，而不是通过强权和要强权机构存在，就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应该特别重视改进选举

制度，同时为了保证以后的错误得到及时的改进，必须树立起有效的群众监督，扩大社会主义的民主。

关于更具体细致的道路，还有待全民的讨论，还有待党中央的重视，亲爱的母亲——我们的党，不要辜负我们的希望！

声明：

1．我不愿在个别字句上辩论，而欢迎就文章的整个精神作讨论。

2．我们试图探讨的是对社会主义内部与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基本看法，所以希望不要以战略和策略的观点来对待我们，战略和策略是随着国内、国际的形势而改变，仅仅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看法不随这种改变而转移。

论现实社会中按劳分配原则的虚伪性

佚 名

现实生活中人们是被自然地划分为各种等级了，不管你愿听不愿听，习惯不习惯，反正是事实存在着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当权集团与人民之间的差别。当权者们利用革命胜利后人民对党的无限的热爱与信任（甚至到盲从的程度）偷偷的将自己和劳动人民隔开了，当权者们利用了人民对党的迷信加上自己的权力给自己立下了各种各样的特权，（无数铁的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请参看“谈谈”同学与“谈论”

同学的文章），这些特权绝不是经济上的报酬，还有政治、社会地位和各种制度的保证形成了一个当权集团的整体，而且这个整体是愈来愈稳定了，谁做上官，那么他将永远的做官（除非犯了反革命的罪），而且他们孩子也做官，大官的儿子是不会做堂倌和理发员的，有头脑的人们！这种稳定性有世袭制度的气味。

正是这种特权的存在，使得按劳取酬分配原则挂上了虚伪的色彩，有人说按劳取酬分配原则是我国现实社会中最合理的分配原则，是的，要是真的按劳取酬我也承认，问题就在这里，正是人们都认为现在已经按劳取酬了，是合理的分配原则了，才使当权集团享受无上的特权，而在人们之中都变成了天经地义的合理的事情，不，有头脑的人们是会点破其虚伪性的，在生产力这样低的我国，大官们即使在经济上的享受也已大过于其劳！（请参看“谈论”同学文章）。

你想过这种特权，这种虚伪的分配原则的后果怎样吗？它不仅使当权集团和劳动人民隔开了，矛盾加深了，成为现实社会内部的主要对立面。更重要的，同志们，它们就成为了人们“好利之心”之社会基础。有人说现在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了，因此丧失了“好利之心”之存在的全部根据。我不免要说这些人有些教条主义，因为他们光搬了前人的话，而忘了等级、特权虚伪的分配原则存在的事实。但要它们存在，那么就必然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中去，人们对于这些东西的追求和在私有制社会中人们对利润的追求是有相似的推动力的，只要你不闭眼不看事实，那么你可以看到：大量的人口流向城市，无数卑鄙的人们拼命的不择手段地提高自己的等级；无数的热血青年（徐进、黄坚……）在这些事实的影响下动摇了他们坚定的信心，过于责怪他们是不公正的，最令人气愤的是和徐进一样自私的××也骂起他们来了，不公正呵，人们，社会存在是

要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的。

声明：

①我没有回答语句上硬找出的问题的义务。

②本文许多论点是借用“谈谈”同学的，特表感谢。

③我等口才欠佳，只作书面辩论。

政治风云

佚 名

天有不测风云，　一星期前的报纸还在大鸣大放，但自8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这是为什么”后，政治气候为之一变 陡天来各报对“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围剿，真是气势汹汹。追究其导火线，乃卢郁文接到了一封恐吓信。于是《人民日报》断言“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阶级斗争的信号。”于是工人阶级奋起反击，读者纷纷来信声讨反动言论，《人民日报》以明显的态度给予北京大学的大量捍卫社会主义的勇士们以明确的行动方向，纷纷挺身而出痛击“反社会主义言论”，在清华29人事件后，沉默已久的党委会也在同日发出冠冕堂皇的对当前整风运动的意见，于是高潮再度来临，与第一次高潮不同者，目前中心似乎不是整风，而是反对反社会主义言论。

共产党领导的运动具有丰富的经验，任何运动出现偏差在所难免。应该注意的是运动的主流，不值得对次要的偏差过分地注意，但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却出现了意外，卢郁文收到了一封恐吓信，就转移了运动的目标。比之以前，如在肃反中《人民日报》曾为一个无辜的自杀者、发疯者发表过一篇社论！？曾有一回？？奋起痛击藐视法制，蹂躏人权的行为吗？人命比之于恐吓案如何？

推测这次整风运动中这种喧宾夺主现象的原因，可见是自发的民主运动，带有知识分子无政府狂热不合共产党的口味，正如在个人崇拜问题上一样，三大主义的最后根源是少数党员的作风和方法问题。凡超过此定理者，一概归之于反社会主义言论，探讨更深刻的原因，不免触及社会制度问题，“也即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合乎这种逻辑口味的整风，不妨称之为“掸灰式”整风。这种整风才是共产党真心诚意领导的，当然，即便轻“掸”，倒底还有“灰”下来，内部矛盾也可解决了，其实今天看来矛盾存在并不影响社会的长期存在。对抗性阶级矛盾存在的封建社会也可以维持数千年之久。如果苏联存在内部矛盾，苏共绝不在意，苏维埃政权不是稳若盘石吗？接壤西方的小国发生的事情，东方大国似无发生之可能，此乃国情不同，如此看，即使没有整风也无伤大体。

尽管《人民日报》强调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一切党外人士的善意批评，可是必须在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种种现象的指导之下，报上的大鸣大放销声匿迹了，看来这种做法似乎离整风这题太远，到底不大像话，于是今天《人民日报》又出来安抚一番，指出“绝不能混淆广大群众的善意批评同少数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批评之间的根本界限”，并再三反复强调善意的批评有时也会不正确的，批评者的立场不坚定，认识不全面，甚至附和右派言论，后又指出“不容易一下子就区别出善意的批评和右派分子的恶意批评，所以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进行全面分析”。

捍卫社会主义的勇士们，大概又可在这篇社论中得出新的行动指南。

给《人民日报》的批评

陆坤元

最近有人对储安平“党天下”的批评，是可以的，但批评他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批评，我不同意。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反批评呢？根源在于《人民日报》对储安平的发言作了断章取义的摘录，用小题标出的结果。这样对整风是否起好作用，我怀疑。特与同学探讨，并请《人民日报》公平答复。

根据6月2日《人民日报》刊储安平的发言是这样的：（我是根据小标题原文抄录全段含意的）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在我看来关键在于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在全国范围，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作法，是不是过分了一点？……党这样作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一家天下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与非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读者请注意储安平讲“党天下”是宗派主义的思想根源，并不能用“蒋天下”来比喻和理解，而是带有括号的“党天下”

即是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他指党组织只相信党员，不相信非党的知识分子，至于把这种现象扩大为清一色，那是不对的，但批评基本是对的，更谈不到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了，这样的批评好像叫人不“鸣放”似的，建议党报表示态度，否则有碍“鸣放”。

现将《人民日报》摘录的标题抄下，请注意所摘重点和原意是否有出入，他说：在全国范围内不分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从而形成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清一色局面，我以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

最后建议大家两线作战，要对反社会主义言论批评，而更重要的是对“三害”

作斗争，今天的形势虽有逆流，但有的是否逆流？我们不欢迎逆流，但更欢迎与非逆流作斗争，假想一个敌人反击一下有什么意思呢？

又似一株“毒草”

陆坤元

最近校园中对“三害”揭发探讨少，对反社会主义言论批评多，这是否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我认为反社会主义言论，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是可反批评的，否则会引起一部分人思想混乱，这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而我们的“鸣放”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但是“鸣放”中之探讨“三害”根源，是否与社会主义制度有关等等，一些根本性和理论性问题上，我认为这样去思考问题，就不能被认为是反社会主义的，我们不能把“鸣放”仅仅压缩在具体人具体事的范围之中，而必须问一个为什么？并且大家来探讨怎样更好地来克服过去的错误和缺点，使我们的认识提高一步，以使今后不或少犯错误，不再看见或少看见一些人民为“三害”所害，这样讨论问题，并不是和整风无关的。周大觉，谈论，谈谈几位先生认为“领导者的阶级”正在形成，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某种意义上的“阶级”存在，或还有“等级”

存在，这样提出问题引人深思，经四哲四有些同学对这些观点提出反驳，我基本上同意后者的观点，但是我要问一下，前面几位先生要这样地提出问题，而不提其他问题，我认为他们看到了目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某些不合理的现象，如有的党员有“特权”，同样工作能力，级别比别人高，待遇比人厚（住房比人多，有福利金等……），有的高级干部把家属也送进不应享有的医疗机构中，办公用具也分级别。

科长以上的伙食科员不能吃，而有的党员自以为比群众高一等，把不同思想水平的人，原来只是为了在工作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原文如此编者注）而结果以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态度，去对待不同的群众，损害了一部分人自尊心等等。这说明什么呢？这是党取得了领导地位（在国家生活中）后，有些党员沾染了旧习气，不想在群众之中，而想在群众之上，不想与群众共甘苦，只想个人得利，这些人在不同程度上思想离开了共产主义，政治上在蜕化了，现象虽较普遍，但是党的性质并没有变，大部分党员还是好的，中央对“鸣放”政策的贯彻，实质上表现了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翁的思想，党对错误和缺点绝不容忍，相信人民创造历史，于是开展整风运动，内外夹攻，使不合理的现象，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没有合法的市场，从这次运动的开展中，也可看到党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是“统治者”，对人民来说党是领导者，这是原则问题，须划

清楚。

现在还是把问题扯回来，谈论“阶级”，谈谈“等级”，以及周大觉的“领导者的阶级”正在形成中的很重要的根据之一，是分配问题，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大家无法否认的，管理权是属于人民所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说的国家行政人员执行的，不过这个政权机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这种管理如经四同学所指出的，不能和私有制的支配权相混淆，没有变卖生产资料的权利，而前面几位先生谈到支配权的表现似乎指分配得不均，认为有的人分配多，有的人分配少，领导者物质待遇高。一般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比较低，这是事实，问题是这种分配是构成“阶级”和“等级”的物质基础吗？是“阶级”和“等级”这些词含义的新发展吗？若要这样用词则已经变换了原来概念的内涵，好像把人这个概念称呼为动物一样，你说人不是动物吗？不！人是动物，但动物是人吗？又不！动物这词不能反映人的本质的特点，人的本质是有理性的，会制造工具的动物，这就是说，不能从分配多少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须以所有制不同来划分阶级，在今天基本上有两种公有制，就是工农两大阶级。而资产阶级正在消灭的过程中，若要根据列宁阶级定义死抠，那么到了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时代也有“阶级”，因为在阶级定义中有这么一条“……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我们知道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人们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会完全一样的，若说那时候还有阶级。依据这种论点，那么阶级的本质是什么？在对抗性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同，阶级的本质和剥削相联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的本质与所有制的不同相联系，这并没有违背定义，关键问题在于所有制的问题，有人说现在全民所有制，实质上是党中央领导集团所私有，这点大家也明白，党中央领导人民当家，并未把国民财富纳入私人腰包，这样谈问题是对党中央的信任问题，当然站在不同角度的人对党中央的信任是什么的这点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但是他们是反映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是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式的法权”的不平等，这个法权还是继续统治者，因为产品是按工作分配的。现在的问题是：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共产主义者是否应该与历史上形成的党外民主人士或专家享有同等的，由于社会发展所造成的这种不平等，即享有同样的物质待遇，是否以天下为己任的共产主义者当劳动人民生活还提高不多的年代“后天下人之乐而乐”的精神生活严格要求自己，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员的工资按马克思的说法不超过熟练工人的水平。其他人员凡不直接参加劳动生产的共产主义者按此适当递减，以与群众在生活中同

甘苦，这样做对党本身的巩固和发展也是有利的。

关于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难免的，或存在的，或严重的类似公式，我基本上同意，因为一般说来这是事实，抹杀成绩是不对的，但每一件是否可以用此公式来套呢？若此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因此我要求党委会重新分析一下，北大的肃反问题，不能以扩大范围了事，究竟在肃反问题上成绩是基本的呢？还是错误是基本的？我实在想学习一下，总结工作的方法，以便我走上工作岗位应用！！！

有人看到北大肃反工作错误严重，又看到其他单位同样发生“偏差”，由此推论到党中央的方针是否正确？是否受了斯大林的阶级日益斗争尖锐化的理论的影响而搞错了，若此党中央应作检讨，我认为党中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发生在1955年搞肃反运动时对敌我双方估计的情况不足，对敌情估计过高了，扩大了打击面，很多人斗错了，这种错误的程度应作何种估计呢？

是否还是成绩是首要的呢？还是错误是首要的？应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公开的交代，并检查原因何在？！另外肃反运动的方式，我认为可以发动群众搞，但不应开斗争会，因肃反是细致复杂的工作，不同于土改和镇反，因为地主恶霸、社会上的流氓等等是浮在社会上面的，群众一目了然，经过发动群众像大扫除一样，把这些垃圾大部分清洗出去，而反革命分子是隐蔽的，开斗争会实在不能解决大问题，反而把自己人斗了，也伤了人民之间的感情。中央在执行政策上这点是有害的。

由肃反而谈到法制问题，由于三害在肃反上作崇破坏了宪法，侵犯了人权，故要防止三害之为害扩大，必须健全法制，而要使宪法切实施行，须扩大人民的民主生活，加强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并拟定一定的制度，保障人民法权制，这尤其在下层组织更重要。

总之，三害根源在认识上混淆了敌我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思想上是执政党地位，使有些党员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政治蜕化所造成，而在物质待遇上由于收入多，不知道群众生活疾苦是什么所造成的。要改变以上群众情况反映，除了认识两种不同性质矛盾， 物质上与人民同甘共苦外， 还得扩大民主生活，某些党员思想上不以“统治者”自居，而以人民群众中的领导者或称之为以身作则，为社会主义先进战士作用来帮助群众，共走社会主义，长期“鸣放”很好，群众能替党员经常洗脸照镜子。事实上，群众今天没有党的领导也万事不成，问题在于二者怎样结合，

否则党也会像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那样的发生危机，建议扩大民主制，同时在党内建立对党员进行定期的群众监督制（除了长期鸣放外）。

对本校运动的一些看法：领导保守时，当初龙英华等“鸣放”对整风是起了推动作用的，即使个别人动机是“恶”的，恶在历史上也起作用，这点不能否认，林希翎大胆提出问题，刺激某些人想问题，对独立思考的良好作用是有影响的，虽然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她却是揭发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或某些阴暗面，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有好处的，不过他们扩大了缺点，并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对党失去信心，对局势悲观，或认为会发生匈牙利事件，他们要举起“剑”像唐·吉诃德那样的与风车作战，甚至要与反革命势力结合起来，组成百万大军。由于对实际生活的了解不够，思想方法片面，个人狂妄不愿与反革命结合（如谭天荣）不管你是否承认立场问题，今天客观上你是否真正地为了人民利益是很显然的，现在的客观效果已有部分失去了推动历史（指北大整风健康发展）前进的作用，希望你和你持有同样观点的同学们，应冷静地想一想，别钻进牛角尖钻不出来，实事求是地探讨问题大家欢迎，只是用黑格尔的三段论否定之否定的公式，套一切现实生活不仅是目前而且将来也会使你碰壁，若你提出像马克思那样否定资本主义而你论证了否定社会主义的必然灭亡，我就跟你走，告诉你我也在想看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内部矛盾而被否定呢？我认为，目前只有“再论”一文所述在量变阶段说法是正确的，只有通过对现实生活大量研究，才能指出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是什么？指向何方？目前的结论还是走向共产主义而不是什么“乌托邦”主义，夜深了，再见！

一个愿在运动中改造自己并影响别人的小伙子——陆坤元

我要问、问、问？？？

刘绩生

一、“凡事理之来，当于疑中求信，其信乃真”，“求实者人道之一大要是也”，“求实之法在怀疑，疑一物斯知一物”（笛卡尔），疑——信——疑，人类之思维正是通过这一过程的不断反复取得确定的，可靠的知识。禁止怀疑和理智分析，而仅从建立在感情，偏见和愚昧的基础上的迷信和盲从来对待知识，这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话，自欺欺人，因此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允许怀疑的问题　　洞使这些问题是不可动摇的真理。在我们国内除少数抱有政治阴谋的阶级敌人以外，任何人都有探讨一切问题（包含社会主义制度在内）并坚持自己见解的权利。遗憾的是，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在某些问题上，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即使是一个正直的公民，也命定要在动机上遭到最恶意的猜测，在名誉和尊严上遭到舆论的残酷的伤害！这是不是“禁锢思想”？探讨问题为什么必须在一定的界限内呢？

二、根据已发表的言论来看，大体上可分为四种类型：①的确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②尚需进一步研究的；③虽有错误但根本不是反社会主义的；④基本上是正确的。（由于篇幅限制，不能一一举例）对他们，特别是后三种言论，都应该实事求是的，肯定其“是”，否定其“非”。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沙里淘金”

正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没有什么可以非难的（沙里如果真有金，为什么不该淘呢？）然而近来廉价的帽子满天飞，逆耳之言，一概被归为“反动言论”，“怒斥”，“警告”，“组织上的处分”……远远超过了针对言论本身的具体、客观的分析，试问这种做法，何以服人？我们是要把别人拉出泥坑？还是推进泥坑？

三、不少人已被斥为“右派分子”，但是只要他们还是人民，那么他们在各方面与我们仍有同样的权利，这种权利应该得到大家的尊重。为什么不准他们发表文章、演说或进行反驳呢？为什么除去“检讨”以外，报纸上很少能见到他们的文章洞使有，也是编辑的“摘要”，而且总是“拒绝批评”，“坚持错误”，“抵赖”

……之类的问题，在精神上对他们施以压力，在群众中首先造成恶劣的印象和非常不利于辩论的气氛。我不明白，这种变相的压制究竟是

什么？

附：关于“百花学社”“广场”编委会，“民主接力棒”的性质及打人事件的真象，“北大已经被反革命分子所控制”，我对报纸的报导半信半疑，而且在充分听取当事人辩论之前，我将继续保留这种态度。

四、作为上层建筑的某些不合理的具体制度，以及相差悬殊的分配关系，显然是三害产生的根源之一，在这些方面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某些人回避了问题，总是把这一意见解释为“要推翻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而“煞有介事”地痛加“批驳”，是否过分滑稽和无聊。

五、为了根除三害，树立民主风气，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在全国人民和干部中进行一次尊重法制、人权的教育，是完全必要的。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必须与党领导下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相结合。否则将一事无成。“五一九”运动正是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先声。如果说它包括有不健康的因素，那么这也是与党委会的领导分不开的。今后应该在这方面吸取教训，改进工作，而不能否定运动的本身。许多人连“五一九”运动这个名称也不愿承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它有损于北大校誉，还是因为它与整风运动水火不相容。

六、除去“右派分子”以外，一般人很少给党中央提意见。党中央也似乎没交待过自己的缺点。我想知道的是“三害”的蔓延全国是否与党中央的领导有关系？

是否一切错误只在下面存在？而党中央却能自我独清“一尘不染”？如果有那么些错误，为什么不能让人民了解？

七、不少人，大脑里已形成了这样一个奇妙的公式：民主＋自由＋人道主义……＝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道主义……）似乎这些字眼天然地带有布尔乔亚的色彩。 以至于在别人提起它们时， 总是按照习惯赠以同样的冠冕。我们要问：“人性”存在吗？“民主”等等除去其“阶级性”以外有没有全民性？这些口号本身是否已经过时？“资产阶级民主”等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八、我不知道以上的无法无天的问题会给我自己招来怎样的麻烦？但是，我以作者和公民的双重名义，郑重声明：我的论点不容歪曲，我的尊严不容侵犯，除去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批判和答复以外任何污蔑、诽

谤和恐吓都是我不屑一顾的。我欢迎诚恳的说理和帮助，但是如果有谁对我盛气凌人，那么我将还以三倍的傲慢！最后，不管人们是否乐意，我仍要振臂高呼：思想大解放万岁！！

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万岁！！！

真理和正义万岁！！

人民之间的爱、信任和互相尊重万岁！！！

附注：

（1） 我呼的这些口号本身都是“抽象”的，正如一切口号一样，但我希望它们能具体而充分地在我国实现。我深信这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2） 不善于在大庭广众中抛头露面，只愿意“个别谈话”，所以如要当面赐教的话，请来24斋102室。

讨喜奉承者及阿谀分子檄文

泰学铭

在广大同学所掀起的民主和自由的运动中，绝大多数有志青年都欢欣鼓舞地昂起了头颅。但是也有少数持有“善意”的人们却表现得异常悲观可怜。他们躲在角落里，在拿着“和风细雨”的盾牌，用颤抖的声音说，“太过火了”，“不要全盘否定，成绩是基本的。”……这些听惯了喊“伟大”“万岁”等等甜蜜动人的口号耳朵突然（其实并非突然）听到这□□□的“带着恶意的”话，怎么能不惊□□□呢！

这群可怜虫们□□□□地捧着经典著作和经典文件却在现实面前闭上了眼睛，他们看不见“三害”流毒之深，在浓厚的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人民的民主正在变成历史的名词，人民的自由正在变成不可兑现的支票，□□的宗派主义正在将中国共产党拖向人民贵族的宝座，庸俗的教条主义正在侵蚀和僵化着青年一代的思想！

这些可怜虫们，还是比较消极的，更积极的是那些举着板斧和棍子的家伙，他们只准人家说“正确英明”，不准人家说“错误愚蠢”，只准人家歌颂光明，不准人家揭露黑暗……他们实在是强迫人家在他们的屠刀下称赞“好快刀”！强迫晨莺在猫爪子下婉转歌唱！

遗憾的是这部分人中间有不少是党员以及一些被党信任的“积极分子”，细分起来，这部分党员是属于爱听奉承话的一类，而那些“积极分子”则是奉承这部分党员的阿谀分子，这两部分人长期地靠着党的威信结成“联盟”，相依为命。高唱在群众之上，高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空洞冠冕的词句，实际上玩着一套迷惑别人的把戏！

更遗憾的是，这部分人竟蒙蔽了我们的一□领导者的眼睛，他们信任这部分人胜过信任群众，提拔这部分人胜过提拔群众，把他们当作推心置腹的良友，把群众当作随时警惕的对象，其结果是谄媚的“宦官”飞黄腾达，忠直的谏臣被打入冷宫。

放下你们的棍子！放下你们的板斧！放下你们的屠刀！

告全校“右派同学”书

黄友剑

1957年的今天，是最富生命力的今天，右派的青年人是最富生命力的青年人，我们为什么声嘶力竭地呼喊，为什么我们终日劳碌奔波，什么力量使我们成为真正的勇士，是什么理由使我们一直坚持斗争。亲爱的同学们，难道我们是为了极端的个人主义？或者是为了才子与佳人？难道我们是要使历史的车轮倒头前进？或者是反党反人民？我相信这些话是对我们最愚蠢的歪曲，是时代的疯狂性代替了人们的理智，人们是多么习惯于紧张的阶级斗争，人们对当前的现实——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如此的不习惯，以致我们这些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优秀青年遭受到可悲的攻击。

当然我们自己也犯一些可以原谅的错误，我们的过激的行动，我们过分不相信党的情绪，我们在客观上作了社会上右派分子的政治资本。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五·一九”人民民主运动开始时所未想到的。这也可以说是此次民主运动中的副作用。

也可以看出一个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并不是十全十美，它有它阴暗的一面，非在不得已的时候，是不应该行使我们的民主权利的。应当承认，事实证明，我们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了过于主观的政策解释（虽然责任不能完全由我们这些青年人承担）因而在不必要发起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而发起了一个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虽然我们的主观愿望是如此善良，而我们所遇到的责难，却如此的不幸，但是最可爱的小伙子们与姑娘们，我们千万不要为我们所干的不愉快的事而过分地悲伤，列宁不是说过吗？上帝是准许青年人犯错误的。亲爱的同志们，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告诉我们，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并不是保守势力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甚至不是居于统治地位。因此，我们承认“五·一九”人民民主运动是不必要的。它具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因此我们客观上是错误的，那我们就勇敢地承认错误吧？但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也告诉我们在此以前所预料的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具有最伟大的历史意义的变革中，的确有强大的保守势力在顽固地阻挠我们前进，他们客观上不愿意无产者们以最快的速度走向共产主义，他们不能适应新的历史环境而有所改变，他们墨守

成规，他们是教条主义者，他们对人民的命运不负责任，这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不管他们以前有过多大的丰功伟绩，因为过去的丰功伟绩，并不能抵消他们现在对人民的犯罪，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放弃那些不必要的民主运动吧！让我们团结在各国共产党的进步势力的周围，团结在毛泽东——赫鲁晓夫的周围，克服我们前进中的一切障碍，奔向共产主义！

怎么办——对这次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

燕遁符

光荣的北大学生，确实不愧为“五四”父兄的继承人，我们再次举起了民主自由和真理的旗帜战斗。

“向民主墙发起人历史系一群青年致敬！向先锋沈泽宜、张元勋……致敬！”

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就直接跳进社会主义社会了，这有好有坏，好在免除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灾难，坏在人们在精神上的要求非常之低，与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不相称。

譬如说，在英国、法国……工人认为民主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是本分，而在我们这里，很多人却认为民主自由是领导者给我们的恩赐，有（则）感恩不已，无亦不关紧要……。

故在我们国家里， 如果不特别强调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就特别容易产生“三害”。

事实恰恰如此，我们这里的确是民主太少了，（同学们可以举出成百上千的实例说明这一点），故“三害”在全国各地普遍流行起来决非偶然，也绝非解决了个别干部的思想作风的问题就能解决得了。

这使广大人民的智慧用不出来，大大妨碍了社会发展。故从根本上铲除“三害”

太必要了，故大量好心人苦口婆心地要求：“给人民以充分的民主”。

“这对巩固人民江山当然是有利无害，但某些神经过敏者认为：要民主 = 认为现在没有民主 = 心怀叵测，冤者枉也”。

这次整风，领导上特意教导我们要针对“三害”，“理论”少谈，大概是领导上没有认识到或者是不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

怎么办？

老话，大力发扬民主，大力宣传，让人民确实认识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是自己的救星，请自命人民恩人者彻底换一个脑袋（来一番彻底的思想改造之谓也，绝无他意。）

具体的怎么办？

1）自下而上地行动起来：

在现阶段不可能。因为现在这个矛盾尚未充分成熟，除部分大学生外，很少有人深深地“感受到不自由的莫大痛苦”。

2）自上而下地行动起来：

要求英明的领导者大力宣扬民主、自由、人道，并且从法律上、组织制度上确保人民的民主权利。

如果领导者不够英明，怎么办呢？

我们的火光可能会暗下去。但是，朋友们，不要紧，矛盾存在着，终会有一日成熟、爆发。等到广大人民觉醒过来的时候，火将更猛烈地燃起，烧遍全中国。

普洛米修斯们，坚持前进！

领导的艺术

朱庆圻

大家仔细去阅读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波兰目前局势》 一书，8．90～108的四篇文章， 那里揭露产生思想上的悲剧一个重要原因，可悲的是，非常可悲的是，像《真理报》记者一样找到了过去同样的字眼，不是来对待我们的思想敌人，而是对待我们自己的具有不同观点的同志，抓住他们个别的字句，就说他们是反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复辟者。

回想一下，在我们生活周围，发生了哪些思想上的悲剧：天真的大学生在政治考试时被要求去背条文，背苏联各次党代表大会的情况和内容。

年纪不大的同学在肃反中在严厉的面孔下被错“斗”。

团的干部任意地在背地里对非团员论长论短。

不同情或支持马列主义的国际上的科学家就不得赞扬。

宣称人民代表大会是从下而上的全民的选举，而其实是彻头彻尾从上而下的选举。

列宁所说的，“政治是最吸引人的矛盾”这句话在我校这次民主运动中充分体现出来，然而它在我们的“政治课制度”是无法体现的。

就在这次运动时期，清华大学党委竟动员党员去破坏29人的演说。

以上一系列的思想性悲剧是否要铲除呢？是不是由于某些干部官僚主义才产生的呢？这点我有如下看法。

“我们不仅要使国内人民生活得幸福，而更重要的是能战胜任何外来侵略，战胜资本主义确保人民永久幸福。”这样一个问题是高级干部所必须深思的。是啊！

在中国是当家难！人多经济落后，还有暗藏反革命，美帝还在扩军备战，还在搞什么导弹基地，“领导者”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 顿如对于

群众的某些不满或怨言尽量拖延下来，只是去处理某些非法行为，只是反对某些干部“三害”行为，不积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而能够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有利于战胜外来的侵略，那么，这样做是自明的，是眼前利益服从更远的利益。我们回想一下，德日法西斯的士兵的斗志和士气都很强，在被俘之前剖腹而死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他们的头脑固化，不追求真理，不独立思考，而且有着宗教式的信仰。诚然，对于领导者来说，被领导者若都具有简单而带宗教式的头脑，那就太好了，任何外来的侵略都无情地被粉碎。在我国思想领导上，竭力希望广大人民具有典型共产党员的思想：没有个人打算唯党是从，坚决服从组织分配以党的理想作为个人的理想，不追求文娱和艺术修养，看见不顺党意的言行就激烈地反抗，假如这样的党员不断地成长，那么全国人民将团结在党的周围，像一个人一样，这种人可以称为头脑简单带有宗教式信仰的人，也可以称为世界上最光荣最觉悟的人 顿如我们认为这种方针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应该为此而努力，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加强学校教学中的政治课，让马列主义作为鼓励人民忘我工作，取消个人打算的力量。使人们经常保持很多的纪律性与组织性，让人民经常沉醉于开会、批评、检讨、宣誓、保证决心、……等等简单生活方式上，作为党的助手的青年团不应该从各方面供给青年们以精神食粮，更不必去培养青年对生活的各方面爱好和艺术修养，作为“团”应该是加强对青年进行思想改造，加强青年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尽量取消个人打算，最后是争取入党。除了这些基本方向外，在细小处注意培养，例如；我校某党员对某非党团员教导说：“谈恋爱的第一需要是为了互相帮助，互相进步”（若按此，同性恋爱就是很正常的事了）就是这样的精神的过度表象。

要求人民具有简单头脑并带有宗教式信仰的思想教育方针，最集中的表现在我国艺术事业上。生硬地认为人们来看电影的第一需要是为了受教育和改造思想，我国出产的“反特”影片所唯一希望收到的效果是：“人们！你们要警惕啊！”“人们！你们不要乱说啊！”“人们！你们要仇恨反革命啊！”有时也把反革命丑化得可笑，刚一出现在银幕时，谁都知道他就是坏人，是特务。所谓对“艺术性”的了解在这种精神下，有了新的式样，凡能很好很巧妙地配合“政治性”收到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的目的就叫“艺术性”强。这样看来在解放了的国家所出产的影片对观众的吸引力远远赶不上资本主义世界翻译过来的影片，并不足以为怪，解放的中国不可能出现像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也不是不可以理解。另外，对旧的艺术作品不管他多么吸引人，只要他有不健康的思想因素，就要被“禁演”（现在有所改进），其实，在新的影片中，在艰难的环境下，通讯员和女护士的一段谈话表明，他们之所以在这艰苦的环境中保持高

度意志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伟大理想“即希望和毛主席见面，和毛主席握手”。在这种凡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作用的艺术加以发扬，不能收到思想改造效果的艺术加工以轻视的精神下，加上官僚主义，才可能在解放了的中国发生了伟大的人民民间声乐家瞎子阿炳遭到饿死的悲惨的事件。在这里我应当压制个人的激动，还是冷静地来讨论一下。

有人说：“革命的先烈为了下一代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么我们的生活稍微简单化一些，公式化一些，少讲点民主，又有什么不可呢？”固然，假如这样做是有益的，那么这种说法也是莫明的，为此来分析一下，显然使生活简单化，开会化，极力培养典型共产党员的这种方针，在知识分子和农民这两个阶层上已收到较大的负效果，可惜，解放后我还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只是听别人说：所以这里还是不讲，希望那些了解农村情况的来谈。知识逐渐增加的青年，要求各方面精神食粮，越来越厌倦那种整日开会、批评检讨的生活方式，要求充分发扬民主，要求个性的发展，这在我校“五一九”运动充分表现出来。

再退一步来谈，假如站在五十年后的人的眼光来看，这种思想领导方针是对的，是保证了后一代的幸福，那么我们来检查一下施行情况吧！一方面在人民群众中做得还好，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不少人，已习惯于开会，教育、改造、竞赛的生活方式上，要他们在大放大鸣充分发扬民主倒是费力的事，就在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在这次运动的高潮时，很多同时听了江书记说西语系的控诉会开的不好，不对，它是向党控诉的报告时就热烈鼓掌，还有这样的同学，在别人的大字报上贴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还有这样的同学在别人提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从根本铲除“三害”时他们宣称自己是卫道者，要出来维护社会主义的道，维护马克思主义的道，甚至在公开集会上宣称要通过这次运动申请入党。他们，就是这种方针施行良好所收到的果实，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党的干部本身，这种方针施行得情况很不好，对他们不严格要求取消个人打算，对个人的照顾无微不致，从物质生活条件去激发他们的向上心和歌功颂德的本能，甚至用组织的威信和“团”的力量去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在更高级干部中经场焚行盛大酒会盛大宴会，在伏老来京时，曾举行上千人的盛大酒会，既然我们公开承认我国人多经济落后，实行公开的统购统销政策，宣传要勤俭办社、勤俭办国，为什么还要这样大摆国际场面，能提高国际声望吗？中苏友谊靠它巩固吗？这样做就人为地制造一批国家食客，更有害的是对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有恶劣影响。党员干部不以己为人民的勤务员，不好好铲除个人主义思想，就要产生很不好的影响，特别是在农村出现了“党员土皇帝”的称号，甚至采

用打骂、禁闭等方式强迫农民卖余粮，应当指出。我国人民武装主要源泉是农民兄弟，党对农民的领导是应该有高度艺术的，要知道农民由于对统购统销施行的不满是会将毛主席的像丢在厕所内的。

由于我感性知识的不足，我还不能公开地全面地来反对这样的思想教育方针和这样的“领导模型”，也很有可能，假如我做了高级干部、知道很多底细，得到更多感性知识，那么也可能会同意这种方针，希望人民的生活在目前尽量简单化，开会化、宗教化、甚至能够心胸广阔地忍受来自下面的指责质问，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对得起我的子孙。

但是基于我现在的感性知识和理解水平，作为一个公民，我向党的领导提出新的“领导模型”，他是基于这样一个原理：“一个人从内心里十分热爱自己的家，那么一旦有人无理破坏他的家时，他会冒着一切危险保卫自己的家”。这样要使得人民愉快热情地生活着充分发挥民主，真正当家作主，让人们知道国家困难的底细，充分发挥个性，先进的入党的干部不再是拿着“教育你们”，“改造你们”的牌子来对着群众，人民见了干部好像亲兄弟一样，让人民的生活丰富多彩。让人们尽情地歌唱，每个人都仿佛认为，在这美好的生活里不能缺少自己一样。

党啊，我们批评你，是真正爱你！信任你

姚仁杰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沉痛的旧诗句引起了两年前辛酸的回忆。在肃反运动时我虽然被斗了，究竟我错在哪里呢？当时的确我自己也不知道。斗争我时，我的同志竟歪曲事实地力图“证明”我思想是反党的，也有个别同志竟捏造中伤我的私生活和人格。组织上抛弃了我，群众被一般歪风所蒙蔽。这种社会性的误解和孤立，给一颗年青的心灵所带来的伤痕实在是沉重的。我想任何一个共产党人也会为这种无辜遭遇洒几滴同情的泪水。生活中有甚么痛苦能比心灵受伤更可怕呢？！何况自己的良心是拥护党的事业的，刚好就被同志们误解自己是反党的，就连一个人生活的内心支柱也被拆去。亲爱的同志们啊！

你们难道知道由于“三害”的偏见，你们伤害了手足之情呀。难道有谁真的忍心把党儿女，把正直的公民说成敌人，把他（她）们推向虎口去。想想吧！我们应该为以往的委屈抱头痛哭的。我们沉痛地哭以往的误会！我们兴奋地笑今日的谅解：我们从此就会相爱更深，相依为命。

党毕竟是公正的。根据中央规定的“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政策，我主动地协助了党组织查清了我的历史：铁的事实证明了我从来就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也没有任何反动政治问题。同时也澄清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检举材料”。党帮助我认识了从前的一些立场不明的言论（主要是1951年在清华大学学习时，由于认识不清受别人影响。说过一些不满当时统战政策的话），并证明我没有反党思想。党的同志也指出我从前由于自高自大在一些同志中激起的反感，以及和班上一些干部同志之间相互的成见等等缺点。最后，虽然我没有被冤枉成反革命分子。但是当时肃反工作组的一些同志对自己的错误是认识不够的，没有勇气诚恳的对我道歉和在公开的场合恢复我的名誉（包括法院早于去年就因为根据事实性质的不符而撤销了原来对我的处分的判决。我历史上没有受过任何的法律处分及行政处分）。这使我一方面感到党的伟大（因为毕竟没有冤枉好人），而另一方面又怀疑党是否能在人民面前公开地大公无私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也曾请求过党委会应该及早细致地加强肃反善后工作， 然而党委会没有足够的重视我的意见， 显得有些拖拉和魄力不够（如教育肃反工作干部诚恳的贯彻中央的政策）。以至于使很多在肃反

运动中蒙受冤屈的同志长期在群众中抬不起头来，而且有时还受到一些无理的歧视（如我自己在接受分配工作时就遭受过北大人事室党员同志的歧视和盛气凌人的侮辱。后来由于党委书记史梦兰同志去检查了人事处的工作，及我的导师张龙翔教授（党员）和生物系党总支书记陈守良同志能够坚持正义支持我反对歧视待遇才得到基本解决的）。

这些工作中的缺点我再一次向党委会提出批评，希望在整风运动中能够作深入检查。

尤其大家对我校人事处同志们的意见是特别多的，我代表一些受过他们气的同志请求党委会特别检查他们严重的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我愿意参加一次人事处的整风座谈会，我要去提意见。希望人事处纠正以往的错误，特别是由于肃反后对很多同志的歧视。

以我良心的正义感谢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地提出了除“三害”的整风运动，我深切地拥护，而且下决心用自己的觉悟和认识，公正而热情地帮助党整风。我认为这次运动的深刻社会意义不仅在于给有“三害”错误的同志提提意见而已，我认为这是党中央非常有远见的一个革命措施，通过这次从共产党带头反躬自省的思想改造运动，将为我国树立一种全新的社会正气（或即称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和人与人的关系。难道我们能不高兴么！以往的错误和社会歪风将从此了结，真正的同志关怀的友爱和社会正气将从此兴起。历史学家们：重视这样伟大深刻的社会思想变革吧！从前英勇的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经济和政治上人与人的对立关系，今天英明的党又自上而下地领导人民改造社会思想中的人间关系。人民的精神面貌将为之一新。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给国家，人民带来的幸福乐事将无穷无尽！

当然，问题并不如想像时那样单纯。有很多问题不仅是工作中“三害”的结果，同时也涉及深刻的社会歪风和习惯势力。至今不少同志还没有很明确地觉悟到这次整风对社会历史的深远影响，尤其没有很准确地了解人们思想意识中的“三害”的危害性。这需要长期、艰巨、耐心、善意的以理服人，以正义感动人才能真正的帮助同志们清洗“三害”，才能真正达到治病救人，才能真正的挽救人民不再被歪风歪气侵袭！

我认为：1955年进行的肃反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典型的“三害”例子。当然，肃清反革命分子是绝对需要的，人民也是拥护的，我们当然应该肯定运动的成绩，因为的确查出了不少对人民犯有罪行的反革命分子。今天我国政治局面之更加稳定，党对人民的更加信任，难道不是由

于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肃清了么！理智和良心不允许我们抹煞事实。

然而，在运动中用极为粗暴的办法错斗了许多好同志，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惊醒么！我们党的领导同志和全国人民应该以政治家的远见和正义的同情去理解由于我们的错误给社会带来的损失，给受委屈的同志们所带来的心灵上的创伤和政治侮辱这些难于估计的损失是每一个正直人士不应该忽视的！每一个共产党人应该痛心的：这是人民自相侮辱的惨痛悲剧呀！

我以受过伤的心灵向不自觉的犯过错误的同志呼吁！我以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良心向全体同志们招请！请相信我们，一个真正懂得了心灵受伤害时的痛苦的人，绝不会用自己的手再去伤害别人！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对党的真诚拥护使我们不会由于个人的委屈忘记了对人民利益的责任！我也向一切有委屈的同志们祈请：让我们首先以革命者的开阔胸襟，去了解以往的错误。相信吧：绝大多数犯错误的同志当时也是不自觉的，当他们了解了自己的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损害，当他们的良心同情了受损害的兄弟姐妹们的内心衷情，所有的人都会痛心的，看吧！在生物系党总支召开的一次对我们这些被斗错的同志公开道歉和恢复名誉的一次大会上，我们没有厉声厉色的质问，也没有敷衍道歉的虚伪，我们（犯错误的同志和受委屈的同志）以哽咽的悲调倾述出自己的真情。误解消除了！我们又真正的回到了正义的怀抱！很多教授先生们哭了！很多年青人哭了！党总支书记陈守良同志也哭了！多么沉痛而又畅快的泪水啊，你清洗了以往的一切愤怒，你带来了最真诚的心的一致。

我们哭出了往日的悲痛，我们哭出了今日的温暖。真正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们又重新团结到了党所领导的正义事业的周围。

今后，我们将更加热情的，公正无私实事求是的跟党一起整风。我以生命和良心发誓：将一生为正义的事业奋斗！

但是，整风是一次深刻细致的思想改造，因而特别需要耐心和理性。

我欢迎激动的正义冲击！因为正是这惊心动魄的战歌震荡了人们在习惯势力中的蛰睡。

但我更拥护心平气和的讨论！因为只有用最深刻的正义才能服人的

心。才能真正揭出“三害”及一些其他社会歪风的症结所在，才能对症下药，才能治病救人而且避免一些消极的“后遗症”。

我认为：肃反中的错误，集中表现了“三害”的恶果。而且反映了不少社会歪风（如是非心和正义感被舆论所压抑，违背良心说话而不感到惭愧等等），这些东西不但使我们工作造成严重的错误，而且腐蚀了人们的心灵。

诸如：肃反运动中某些同志（当然不是每个人全有）主观主义的捕风捉影！形而上学的断章取义：宗派主义的倾轧排挤！官僚主义的偏听偏信！实用主义的逻辑论证！以及违背事实和良心的乱“揭发”，不以是非为标准（真正的党性应该是与人民的利害是非统一的）的盲从冒进等社会歪风。难道这些不都需要彻底铲除么！

显然这些都是与真正的马列主义违背的。是先进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每一个有良心的人和每一个真正马列主义的卫道者都应该下决心客观地、冷静地、理智地、深刻地、科学地、大胆地、公正地揭露出这些问题出现的真实根源。然后用最果断的魄力和对子孙后代人民的责任坚决地消灭它。

我建议：党委会支持召开由在肃反中被斗错的同志、肃反工作组干部同志、党委会领导同志（最好能请中宣部派人参加）、群众代表联合发起一种长期的（因为决不是一次会谈得完的），心平气和的，说理的关于肃反中错误的研究会。这个会可以深入的研究一些有关当时的理论根据，干部水平、政策执行情况、工作方法、以及错误对革命事业和社会带来的深刻而惨痛的损失。这将对党真正地从根本上铲除“三害”，扭转社会歪风起最积极的作用。

我希望党委会支持我的建议！希望同志们支持我的建议！让我们通过这些活动锻炼自己对社会主义的忠心，让我们从最生动的政治生活中去锻炼成为国家的主人。

最后，我希望一切受过“三害”之苦的朋友们能用理智克制一些愤激之情。冷静热情地帮助党整风，因为我们的体会比别人更深沉！我们的正义呼声也更能打动人心。

今后将陆续发表我的意见，愿与同志们共同讨论。

目前，中国共产党正面临一次严重的历史考验。

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善良人类都在期待：“党是否能真诚透彻的整风，是否能真正大公无私地对待人民，……”。

我们以爱党的心祝愿：

党顺利地通过这一历史考验（当然会需要很艰苦的努力），我相信全国人民也会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帮助和鼓舞我们的领导者通过这一考验。

我无法概括将来会如何美好，我只赤诚地等待着去歌颂礼赞。

（原载北大校刊123期）

大胆向党和党员提意见

黄继忠

最近在报纸上和我们学校的座谈会上揭露了不少人民内部的矛盾，我认为其中最基本、最尖锐的矛盾是党群关系，因此想在这方面发表点粗浅的意见。

解放初期党群关系比现在好

党和党员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是经过一些演变的。在解放初期，党和党员在群众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威信。而今天呢，党的威信当然还是很高，但是由于下面要谈到的种种原因，党群关系恶化了，党员和群众之间竖立起了一堵堵的高墙，群众见了党员有一种疑惧和敬而远之的心理，跟党员不说真心话。傅鹰先生说，和朋友在家里谈知心话，看见党员进来就把话题扯开，谈些无关痛痒的话，这是很说明问题的。日前我去看一位以前在我们西语系的老先生，他说党群搞得很不好，在这方面简直是怨声载道。我认为这话并不过分。下面我要谈谈党群关系恶化的原因。

党员有了党性，好像就不能兼有人性首先，这几年来，党员（当然不是全体，但也不是个别，可以说是一般的，恕不仔细区分）对于群众渐渐由最真诚的人而变成虚假的人。他们戴着一副假面具，装出改造人的道学面孔；在会上专等别人暴露思想问题，好给他批判一通，而自己却对任何问题不发表个人的意见，从来不肯暴露自己的思想问题。实际上有没有思想问题呢？当然有，今天党员的政治觉悟有一部分是非常高的，但大多数是解放后入党的，其中有的在思想上比群众只是先走一步，略胜一筹，有的恐怕还不如群众。

不肯暴露，只是表现他们的虚假而已，群众觉得党员跟他们不是一样的人，群众有的问题，他们没有，因此对他们敬而远之。另一方面，党员同志压抑着自己的人性，不让它跟群众见面，他们和群众只有改造者和被改造者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一点也没有，更谈不上友情。有的人入了党便跟以前无所不谈的朋友疏远起来，见了面僵得无话可谈；有的党员原先和群众格格不入，群众关系恶劣，但因为某种原因取消了党籍，反而变得很可亲，也和大家交起朋友来了。这种情形我们系里就有，真是令人不解。这是一阴森可怕的风气，它扼杀共产党员的

人性，好像党员有了党性，就不能兼有人性似的。这种情况在年轻人身上起的作用尤其令人寒心。我系的党员大都是刚毕业两三年的同志，年龄都很小，他们做学生的时候，活泼可爱，生气勃勃。一毕业留在系里工作，当上了支部书记或委员，立刻就一副老气横秋的党员面孔，青春的热情与活力都给埋葬起来了，人的活生生的生活气息在他们身上一点也嗅不到。这种气氛在同学党员中也有，好些活泼而真挚的年轻学生，入党之后变得少年老成，对同学和先生不随便说一句话，不随便笑一声。我校党委会中不少年纪很轻的的男女同志，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一群小和尚和小尼姑，一个个沉默寡言，老成持重，仿佛都已看破红尘，和五情六欲都已绝了缘似的。把生气勃勃的年轻人弄得这样暮气沉沉，这能说不是扼杀人性吗？其次，今天有些党员的特权思想颇为严重。毛主席明明说，国家是人民大众的国家，国家大事几个共产党员包办不下来的。而事实上，今天共产党员大权独揽、包办国家大事的情况相当普遍，从最高政府机构到机关、学校、农村、工厂、军队，比比皆是。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政府中有职无权，报纸上天天可以看到。有的机关主管人是党外人士，副的是党员；有的正的是党员，副的是非党员。但无论正、副，权总是在党员手中。拿我们学校来说，就给人这种印象：真正的领导人是江副校长，而不是马校长。教务处、总务处、也是如此。各系的总指挥也不是各该系的系主任，而是年轻的党员系秘书。昨天我系系主任冯至先生的发言中提到他以前在西语系是应声虫，其实这是很普遍的事，大家也都心中有数。连作为群众组织的工会中也是这样，我在北大工会当过几届委员知道的比较清楚。工会有好几位主席，但他们都是不大问事的，实际上决策的是党委会派来的秘书长。

有些党员对本门业务一窍不通却居高位拿高薪还有一种更糟糕的风气，对党的威信大有损害。那就是今天有些党员借着共产党这块招牌吃饭。他们对于本门业务一窍不通，不学无术，却居高位，拿高薪，而且当之无愧。有的人居然拍着胸脯，大言不惭地说，老子根本不靠业务吃饭，老子是靠革命吃饭。今天党内似有一种按革命资历封官的风气，比如说，一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党员，分配工作时就要看看他同时的党员是个什么长，如果一般都是司长，那他也得封个司长；一个1945年参加革命的党员就必分配他个科长，诸如此类。这种风气对学生党员也有影响，有的学生党员业务不行，但毫不感到恐慌着急，仿佛毕业后做领导干部满有把握似的。共产党员享有的特权还不止于此，比如说出国留学就是他们的特权，非党员是没有份的。当然，共产党员如果板起面孔来算帐，说老子这么多年，享受这点权利还不应该吗？如果今天的问题单是论功行赏，那你尽管享受特权，大家没有话说。不过，共产党还要不

要保持为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呢？你还想不想维护党在人民大众当中崇高的威信呢？这种特权思想如果发展下去的话，就会形成另一个脱离人民大众的统治阶级，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所以，毛主席今天提出整风的号召，真是最英明不过的措施。说到这里，我想向我校的党委会提一个问题：去年知识分子政策提出之后，我校一阵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我听到的一些名字是严仁康、侯仁之、冯至、陈定民、季羡林、曹靖华等。一分析，这些同志不是教务长，就是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领导干部。这给我一种错觉，好像是专门吸收领导干部入党似的。（对这些同志个人是否合党员标准，我不了解情况，无发言权。）这到底是一种偶合呢，还是有一种什么思想在作祟呢？提出来供党委会参考。

在学术上，让专家们去领导不是更好吗总之，这几年来党员居功自大，排斥党外人士的宗派主义作风是相当普遍而严重的。这几年来，党的改造、团结利用知识分子的政策完全正确，但通过党员干部执行的结果，却产生了很不好的副效果。共产党员的表现，叫知识分子有一种做仆从的感觉，似乎自己不是在直接为祖国和人民服务，而是受雇于党员似的；党员似乎不相信知识分子有主动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愿望，仿佛他们非要共产党员拿着鞭子在后面监督着才肯好好工作似的。这种态度使知识分子心里很不痛快。历史系有位先生对系主任助理夏自强同志（党员）说：“我们之间，你是主人，我是奴仆。”

这句话是值得全党的同志细细寻思的。要知道作为一个国民，每一个人和国家和人民之间有一种亲密得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任何人也不喜欢这种关系给第三者间隔开来；为祖国效忠、为人民效劳，是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每人神圣的天职和权利，也是大家热切的愿望。因此，大家不愿意受做客的待遇，大家热烈要求以主人公的身份主动、直接地为国家尽一份力量。大家要求真正的主人地位。

这里我想顺便谈一谈党能不能领导科学的问题。到如今，我还不懂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共产党领导整个国家，确立社会主义方向，制定政策，这是没有一个人民不拥护的事。可是这是不是说全国的科学及高教机构每一个单位行政、学术上（除了党委）都必须是共产党员直接领导呢？我看不可能也不必要。这些地方让各该行的专家们去领导不是更好吗？难道这就不是党领导了么？难道今天知识分子不是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吗？也许我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些，但是我确实不了解为什么要争论这个问题。

年轻党员不宜做领导工作，不如回到业务单位做点实际工作此外，我想谈谈年轻党员能不能领导的问题。我们系里的老先生谈到这个问题时，总说能领导，毫无问题。我个人则认为大有问题。这些年来年轻人（主要是党团员）与老年人之间的格格不入原因之一，就是年轻党员领导的直接后果。首先，这种领导关系不自然。拿我们系来说，这几年来党员系秘书、党支部书记及委员们大都是刚毕业的学生，毕业前受先生们的教诲，对老师很尊敬，一毕业就大模大样对系主任及全系教师摆出一付领导面孔，这怎能自然呢？他们无论在业务、经验、常识哪一方面都不如先生们，即使在政治觉悟方面，高得也极有限，只是比大家先走一步而已。结果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双方都感到别扭，工作不易做好。第二，年轻人居高位易助长青年得志，目中无人的官僚作风。第三，年轻得志，还会助长不知艰苦、不肯老老实实去钻本门业务的歪风。凡此种种说明年轻党员居领导地位不但工作不易搞好，就是对他们自己也是一种害处。为了爱护年轻的共产党员，不如叫他们回到自己的业务单位上老老实实地去刻苦钻研，做点实际工作。

（原载《北京日报》1957年5月29日）

发言摘要

黄继忠

昨天冯先生谈温德的事，我很反感，你说对温德生活上关心，肃反中没有什么可以道歉的，我反对。

温德是真正的人，是闻一多介绍来的，是美国进步人士，在美国反对种族歧视，美国学校里规定不许把好分数给犹太人，温德就反对。到中国后，一直很进步。解放前，他比冯先生，比我都进步，帮助很多人到解放区去，与吴晗是好友，温德亲自把吴送走。

解放后，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对温德疏远，告诉群众不与他来往，不让东欧学生与他来往，来北大后，给他破房子，不让他开课，把他孤立起来。

肃反时有一人提出温德发过牢骚，我们每人也轮流说我们听到过的牢骚，也不敢和他往来，我也这样，现在感到这是十分可耻的，温德说“要容忍”。

有一教授曾在强烈灯光下受审，说温德是特务，已坦白了。以此来逼供其他教授，这是什么做法。

我们这样对待他，是把朋友当成敌人，我很反感，恐怕这是党的秘密，温德如果是特务，我愿和他一起被枪毙，在这个国家里没有真理。

学校高级知识分子的会上都是迂回曲折地提意见。党员应与群众站在一起，党员所以落在群众后面是因党员有很多特权，整风应打掉党员的特权，否则国家就没有希望。江副校长说大家提我们一定改，做得到否是另一回事。党员应先放下身价与群众一起。党员缺乏人性，拿假面目对群众。我从未听见过冯先生说过有独立性格的话。冯先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爱戴，他解放后的诗没人爱看，因已失去其独立人格，希望冯先生不要做应声虫，要有独立人格，要有血有肉。

要慎重全面考虑，多磋商（按指出去宣传）。今天主要目标是什么，英三走在前面，不要让别处党委走在后面，我们对党中央有信心，应有妥善办法，考虑出校目的，后果，组织起来先在校中扩大影响，取得党委会合作，同学组织代表团找党中央，使党中央认识问题的严重

性，使运动更彻底。

党委落后于群众，我们搞运动也要有组织有纪律，党要不同意，我们就说服他，再不同意就做，还应派代表到中央让他们看到运动的发展、问题的严重性，这就是目的。

黄继忠在5月24日下午西三班会上的发言摘要马副校长请去掉党员的身份，作为搞教育的人、长辈和你谈谈，这几天我受的教育很大，我有疑问。党要把青年培养成为怎样的人材，要把我们培养成为骗子，你骗我，我骗你，互相妒嫉，把特权交给一些人去压另一些人（拍桌子），这是最痛心的，这是不能想象的。要把青年人培养成怎样的人，很多同学没有个性，党员都有假面具，不能都怪党员，这是党的一个风气，这谁负责，共产党负责。党给了他们特权，骑在人头上，出校门后形成一批特权阶级，将来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解决，这社会就没有希望，中国就没有希望，人和人之间没有真心，我不要这样的社会，我冷静地建议，作为一个普通的上一辈的人，马校长希望他多听取群众意见，请教育部长、毛主席来听听青年的意见，不要把青年人培养成死气沉沉的人，否则我们国家没有希望，每个人应有的人性，真诚相见，希望马校长传达我这个意见。在过去的这个基础上来加强思想教育工作没有用。

黄继忠在5月26日江隆基同志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从大字报出现以来，党是落后于群众，没有领导群众，这是危险的，先是瞿副书记，后是江副校长作讲演。控诉会同学争取到学生会和团委会的支持，但党委不重视这一领导，在会后江副校长又说：这一方式不很好，这是很难使人心服的。对违法乱纪的人控诉，没有什么不好。

今天有29人去清华，昨晚江副校长同意这样做，今天早晨我找谢道洲同志征求他的意见，我认为党不能禁止，但也不等于不能领导，但党委放弃领导，对这后果党委要负责。今天这样行动的效果还不知道，但希望明天党委别再来一个反对。

对北大肃反的估计究竟是成绩为主还是缺点为主，　希望重做估价。全校有200人被斗错，西语系有两个斗错，其中一个是有根据的，但只是思想反动，并不是现行犯，　同学中英三斗了6个，除了一个是一个集团的成员之外，其他都斗错了。东语系斗错的也很多。今天就要搞清楚，错就要承认，不然不仅被斗的人不能平心，群众也会有意见。

今天要把青年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呢？现在有彼此猜忌，党群之间有矛盾，青年中的正义感埋藏起来了，青年中的生气消失了，青年中一些美好的理想淡薄了。今天我们教师在谈教学上的问题，但培养目标却更重要，要让青年中的一切美德开展起来。

参加了西三会议后，我才真正地看到青年中的纯洁和可爱，我受到了教育，我希望高教部、毛主席来北大看看抹杀了青年人的人性和基本美德是不好的。毛主席是否了解这一情况，我表示怀疑。

有关民主的几个问题

李绍林

一、目前我国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这个变革是很深刻的，它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果。目前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基本建立，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反革命已基本肃清。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便突出出来，成为国内基本矛盾。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理论与实践中成为有巨大现实意义的课题。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人民的团结，必须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成为问题的焦点。

对这个问题如何认识，涉及到我们国家的本质、政治制度、党政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人民群众参加政权管理与对政权监督的意义，对国际工人运动、民族民主运动如何认识……，同时对如何克服“三害”，更具现实意义，因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人民群众对政权的监督，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克服“三害”的基本措施，人们的思想意识往往落后于客观实践，因而对这个问题，也不是每个人都深刻理解的，教条主义者总以昨天的眼光看新事物，因而往往为事实所耻笑，而急性病的同志则想一个早晨把好事办完，甚至发生种种怀疑。不可战胜的新事物是在斗争中发展成长的。

二、什么是民主呢？民主就是大家当家作主，就是民众的政权[1] ，在阶级社会中民主永远是有阶级性的，民主与专政是两个并生的概念，只有阶级不复存在时，“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例外的民主才能有可能，才会实现。”[2] 而这时的民主（无例外的民主）便失去了阶级内容。

[1] 国家与法权理论，华东政法学院版308页。

[2] 《国家与革命》，1949年莫斯科版84 - 85页。

社会主义民主也象征人民政权与精神上的解放，政治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

三、民主是斗争得来的，不是任何人的恩赐。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没有人民政权，便不会有人民民主，中国人民为了民主曾经流血牺牲，前仆后继、进行斗争。今天殖民地被压迫民族高举着人民民主

和民族解放的旗帜进行革命斗争，也正是为了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争得民主。以（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争得民主。”[3] [3] 《马恩文选》第28页。

人民的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反映在民主与集中上，有矛盾就有斗争，党的整风反“三害”运动正是这种矛盾的反映。

四、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历史的主人，是我们国家的主人， 所以我们说： 人民创造历史，历史创造英雄，而不是英雄创造历史，（领袖与人民的关系）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来肯定英雄与领袖的作用的。

我们国家经过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和一百年的半封建殖民地社会。人民没有民主生活习惯，封建主义思想遗毒很深，“君臣父子”“三纲五常”束缚着人民的思想和行动，所以个人崇拜有很深刻的基础。宣传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推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有更重要的意义，是抵抗个人崇拜的特效药。

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但我国的小资产阶级是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

五、我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这是我国本质问题。宪法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民主意味着：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 我国的法律政策应当由人民的意志体现。

2．人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行监督。

3．让人民群众广泛参加政权管理， 对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发表意见进行讨论。

六、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政权组织形式（政治制度，人们平时说的“民主制”即是一种国家形式，是一种国家形态）[4]，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随经济基础、阶级关系变化而变化的。目前的大变革必然对我国政治制度发生巨大影响，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应当扩大，人民对政权的监督应当加强，地方和中央权

限已在调整，选举应进一步民主化，任何把政治制度绝对化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4] 《国家与革命》第94页。

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党和国家活动的基本原则。群众路线是工作的基本路线。

列宁在谈到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时说“工人夺得了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根本毁坏，把它粉碎无余，而代之以仍然是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关，为了防范这些人变成官僚起见，将立即采取那些已经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得很详尽的办法：

1．不仅选举，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

3．立刻过渡到使一切人都来监督和监视的职能，使一切人都暂时变成“官僚”，因此就使任何人都不成“官僚”[5]。列宁这些话的精神今天是适用的。

[5] 《国家与革命》第105页。

七、人民当家作主是通过行使各种民主权利实现的，因而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权力是特别重要的。少奇说：“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力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干涉；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6]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如果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力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严重侵犯行为，则构成犯法，我国公民的民主权利是日益丰富的。在革命暴风雨时期国家职能多体现在专政一面，民主权利不能不受限制。保卫社会主义社会神圣而不可动摇的公民权利，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任务之一。我们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我们热烈欢迎刑、民法典早日诞生。

八、党和政权的关系。党必须领导政权，但是不能以党代政，因为不能以党的专政，代替无产阶级的专政，一些党政不分现象应该克服。

[7] [7]　毛泽东：《井岗山斗争》。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九、我们要爱惜我们的神圣的民主权利，和一切侵犯现象作斗争。我们要爱护自己的政权，因为它是行使权利的保证。

乌“昼”啼

徐钟年

乌凤和鸣

叶元龙教授在上海市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凤鸣”与“乌鸣”的问题。“风鸣”指的是“报喜”，“乌鸣”指的是“报忧”。叶先生劝共产党党员：凤鸣要听，乌鸣也要听；尤其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鸣的时候，就一枪开去。

因为一枪开去，乌鸦固然没法再鸣，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

我不知道从何年何月起，乌鸦变成了“不吉利”的动物。我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用过考证功夫，因此作不出结论。不过可以肯定：①乌鸦是益鸟，——向人“报喜”

的喜鹊反而是害鸟；②古人以为乌鸦是能“报喜”的（可查：“乐府古题要解”中关于“乌夜啼”的解释）。

一般人以为凤凰是很美丽的鸟，其实不然！它是：“鳞前鹿后，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说文”），实在没有什么好看！何况还有假凤凰，为数相当的多！

因此对于凤凰和乌鸦的估价，应当辩证地看。能够乌凤和鸣，那是最好的好事！

我摹仿“乌夜啼”，作“乌昼啼”。

是否提防猎人的枪？不在考虑之内！

毛毛雨下个不停

和风细雨……

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因此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用不着大张旗鼓，只须和风细雨就够了。

在原则上，这是对的。

然也要看具体情况，不该以不变应万变！

毛毛雨下个不停是有害的：下得久了，秧要烂，棉不结铃。田初湿时是软的，容水过度就会变硬。“清明时节雨纷纷”，尚且要：“路上行人欲断魂”；不幸而淫雨一半载，老百姓就得饿死不少！

和风细雨自有他的妙处，但迅雷烈风也有扫荡阴灵之功！某些时候，错误严重，态度顽强：那就用得着迅雷烈风了；在这种情况下，和风细雨不足以息民愤！

尤其不希望对自己和风细雨，对人迅雷烈风；对党外人士要求自我的批评，对党内人士则要求批评别人！

我听了许多代表所反映的内容，有些事真令人发指！小民主解决小偏差，大错误就得用大民主来纠正，正如对症下药，有些病该用霸药来治。

小论带坑臭

有那么一种说法：旧知识分子在旧社会里生活得久了，难免有股“带坑臭”！

话是对的。

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据我所知道，共产党党员不是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炼出来，确确实实也是从旧社会中来的。那么，在他们的身上，难道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臭气么？

有人说：他们早就参加了革命，不论是“地下”或“地上”，因此他们身上的臭气早已拍掉了：这就叫做“发展观点”！

我回答道：承教了！发展观点是唯物史的基本原则　份我所了解，所谓：“发展”有“纵”的发展（时间上的发展）和“横”的发展（空间上的发展）：二者缺一就不行的。“带坑臭”这顶帽子只往旧知识分子的头上戴，而且几乎在任何运动中，对于知识分子的“评定”都是断章取义，不问发展，不问联系，——要不然只追究“坏的”联系，——这样就造成了：我发展，你不发展的严重偏差！于是高墙耸立起来了，呜呼！

（原载《文汇报》1957年6月18日，略有删节）

我认为阶级分析方法已经过时了

张祖荣

“三害”的根源之一：在青年中坚持已过时的思想方法——阶级分析方法。

我的论点：

（一）思想方法指导人们行动。斯大林的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这个公式，指导了多少错误的行动，同样今天在我国阶级分析的方法也起着危害作用。

（二）今天在我们国家中这种分析方法即将过时。而在青年中这种阶级分析方法已过时了！

（三）阶级分析方法在它提出的年代时曾起了积极作用，而今天已转化到相反的方向去了——消极作用。

（四）阶级分析方法在青年工作中起的消极作用，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　这种方法制造了很多人造的墙，某人一入党，自认为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而没入党的知识分子称为小资产阶级。他们之间只能做一般的朋友不能成为亲密的战友（阶级地位不同而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就有一条鸿沟）。一种习惯的力量认为党员与非党员有本质上的差别，这也造成了人们之间的鸿沟。

（2）　在这种方法影响下形成一种荒谬的是非观念，为某种人建造了特权。审查青年先不看本人而看家庭出身、阶级出身。这种逻辑颠倒了多少黑白，搞错了多少是非？！多少青年终身背着阶级出身不好这一消极沉重而又荒唐的包袱！

（3）　它为教条主义者头脑简单的人开了万灵药方。同学对毕业分配有意见，负责人就会扣一个帽子——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工人阶级：一切好品质的代名词。

小资产阶级：一切坏思想的代名词。这些概念这样的抽象，这样的万能，教条主义者最喜欢它，其实它最不万能。

（五）这种分析方法有逻辑上的荒谬，一万年后，青年人仍会激动，个人与集体仍有矛盾。那时是否还能说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是小资产阶级的劣根？

（六）这种方法在广大人民中形成一种极深的习惯势力。它在危害着人们。对青年来说应抛弃这种分析方法。

（七）青年中只有是非矛盾，原因是青年知道的少，未了解许多规律性，而不是反映各种阶级思想的矛盾。

让青年学生纯洁的头脑自由成长

刘地生

如果共产党这次整风，能够彻底铲除危害人民的三大主义，共产党就不啻第二次解放处在苦难中的中国人民。

消灭三大主义的根本办法，在于消灭产生三大主义的条件。那么，让我们看看什么是产生三大主义的条件。

首先，仅允许听从命令，而不尊重人权不倡导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产生三大主义的主要条件。（这种情况是历史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的反映）。

因此要消灭三大主义，必须首先消灭少数人享有特权，而多数人仅供听命和驱使的现象。真正把宪法规定的人权交还给人民，使6亿人民自己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这才能逐渐根绝三大主义。

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党，但这不等于说共产党就是国家。因为中国有六亿人口，而共产党只有1200万党员　扶不能说1200万党员的利益就是6亿人民的利益，　更不能说1200万党员的利益应该超过6亿人民的利益。当然这两种利益，有时是一致的，但有时也确有矛盾。某些人硬抹煞这种事实，说这两种利益没有一点矛盾，是不符合事实的。根据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改变以往把党放在国家之上，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过国家利益的做法。　今后制定政策方针应首先从6亿人口的利益出发，不应该首先从党的利益出发。任何一个党派的委员会或支部，除开对那个党的机关或党员之外，没有权力对党外的政府机关或行政人员发布命令或指示。

为了将来科学建设的前途着想，必须让青年学生纯洁的头脑自由成长。青年时代的头脑一经定型，以后要客观地研究真理，就比较困难。因此在学校的党派，可以在教员当中活动，不需要在学生中活动，特别在中小学，应取消少先队和青年团的组织。大学里的政治课自由选读，以免阻碍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

（原载南京大学校刊《南大生活》）

怀监狱

聂绀弩

我常常怀念监狱，也常常对人谈监狱。

“监狱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这句话谁都知道。没有进过监狱的人，凭自己的想象，不是超过监狱所实有的不仁慈，就是不及它实有的。这很自然，因为本来是想象。

什么都不可以绝对化，一绝对化就会变为形而上学。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监狱在不仁慈中有它的仁慈的东西，有很仁慈的东西。我将只谈这方面。

一、监狱是学习圣地

前天李四来，即曾和我在监狱推水，我曾填过一首沁园春词和一首七律赠他的那李四。谈到监狱，他说：“坐了7年牢，前5年白坐了。什么也没学，后二年碰到你，才有书看，知道怎么看。才一心一意，专心专意地看，接着一直看下去。脑子也灵活起来了，有强烈的读书的欲望，或者说‘瘾’，不看就不舒服。那是我看书最多的两年，但似乎只有在监狱里才能如此，一出狱就不行。例如《资本论》，刚拿到手，咱们就分手了，你把书带走了。没法，出狱后，搞到一本，想看下去，但总也看不下去。环境同脑子都不同了。”

他说的监狱是山西稷山县看守所。他是在那里同牢房的，我们是在那里才公开看书，买书的。看守所和监狱，应该有所分别，但看牢的人也未必十分清楚，且不管它。李四的话是有道理的，我曾劝凡有点文化的人看《资本论》，也写信劝外面的人。但有效的只有监狱里的人，外面的没有一个人有效。有一个小郑，在临汾山西第三监狱， 不过中学程度， 他看见我读《资本论》，问：“好懂吗？”我说：“有耐心就好懂。”“怎么叫有耐心呢？”我说：“以为一看就懂，看一遍就懂，它是不好懂的。如果一遍不懂，再看一遍，再不懂，看三遍，看一卷嫌多，看一篇（第一卷共七篇），先看一篇，把一篇弄懂了，再看其他各篇就好懂些。无论什么书，要稍微得到一点理解，都不是看一遍就够。瞧！”我把《资本论》第一卷给他看：一共七篇，每篇尾上都用红铅笔注着：年月日时至此第几遍，那时的注是第十遍。这注是给自己看的，也是给别

人看的，告诉他，我是怎样读这书的。小郑说："既然一遍看不懂，有什么兴趣看二遍呢？""所以说要有耐心。读第一遍不懂，不是说一句也看不懂。总会懂一些，不过和不懂得部分不成比例。二遍也不会全懂，不过要比第一遍懂得多一些，三遍懂得更多一些，这样做，总有一天，懂得的部分会多过不懂的部分，以至于全懂。我看了十遍《第一卷》大概将近于全懂了，但离通，还远哩，更不用说精通了。一遍比一遍懂得多，也一遍比一遍兴趣大，怎么没有兴趣呢？"小郑说："照你这样说，一辈子看书好了，还有什么工夫作别的事呢？"

我说："第一，我说的我的经验，别人不一定适用。我是个学生，中学门坎未垮过。

数理化一窍不通，政治经济学毫无基础，读这书的时候已经70岁了，脑子一点也不灵活，所以……至于别人，比如说你，可能比我强。第二，假定马列主义是一百部，并不要每一部都要下这种功夫；对某几部真下了功夫，再读其他的书就容易了，一通百通，触类旁通，那是另一番境界。"这小郑，这只进过中学的30来岁的年轻人，听了我的话，就把第一卷借去了。我留心观察，他真在看，不多几天，看了大半本。

我问他："懂么？"他说："好懂极了。说得浅，解释多，似乎惟恐你不懂。"我说："这就对了，本来是写给工人读的。"

爽兴说说我看这本书的经过。当未看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听来的：《资本论》难懂。作文字工作几十年，也未见有人真看这书的。在稷山看守所时，过了一年多，由于一再申请，也由于我年纪大，不干什么活，干事才准许看书，并给买书（以前在北京监狱，除了读报和讨论报上文章外，什么书都不准看）。最初替我买了一部小《毛选》，后来又替我买了《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别的。看这些书时，忽然想起：一不做二不休，何不趁此读读号称难懂的《资本论》呢？因为这部书太大，万一买来看不懂，岂不真成了"吃不了，兜着走"了么？于是做点准备工作，先看《价值、价格及利润》、（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之贫困》等书，觉得勉强可懂，才写信回家要寄《资本论》第一卷（稷山书店没有），且嘱只要第一卷，以防寄多了，看不懂　栋寄来了，看了一两遍，觉得能懂，就写信要以后各卷。犯人的信，都要经干事检查的。好干事，看了我写的家信，跑到窗口来说：如果性急等不及，可以先在外面向别人替我借一本第二卷。他果真这样办了。借的郭、王译本，直行的，后来家里寄来了全集本二、三卷，又从二卷知道有第四卷，是近几年由苏联许多专家整理出来的，于是又写信去要

四卷书。只第一卷看的遍数多，其他各卷多者也不过三四遍。但比起《反杜林论》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两本书来，却是少的。那两书各看了二十几遍。

看多遍，不但解决懂不懂的问题，也解决记忆问题。我记性坏，随看随忘，看一百遍也记不住。不但看，还用种种方法——记、抄、默写都干过，但最后还是忘了。和个别句段不懂，不碍全局一样，记不住，还是能改变思想。但这些，都是在监狱比自由时容易办到得多，在外面，不但时间不充裕，尤其难有这样大的恒心。

在北京半步桥监狱时，有一个门头沟矿工是文盲，从大学生张苏学认字，竟认识了上千的字（但在另一号，有一个文盲公社社员，怎么劝他学认字他也不学。）在这号里，十几个犯人中有七个高级知识分子。如巨赞、梅洛、徐迈进等。有些青年工人特别要学点哲学，梅洛就给大家念《毛选》两论，随念随解释，念后还讨论，几个“高知”争着发言，颇为动听。不过这是犯人自动组织的。

在监狱里，碰到过两个青工异人。一个是上述的李四，是在梭山碰见的，本来是地铁的，出狱后作了几年木工，那时不过二十三四岁，看《资本论》比我快，比我理解得多。看《自然辩证法》理解得更多。另一个是小蒋，是瘸子，电工，25岁，手边一本书都没有。对《毛选》无论提什么问题，他都记得在几卷几页。对先秦诸子，也看过不少。这人谈笑风声，恢谐百出，是我们大家的宠儿。我在监狱作旧诗，是从赠小蒋开始的，还记得首句：“沁园春寻蒋山青”。但不久我就调走了。哦，应该说还有一个人，名董笑，不到20岁，是个扒手（行话谓之“佛爷”，大概是什么也逃不过他的五个手指之意）。别的事不说，读报，抑扬顿挫，悦耳娱心，非常得宜，从来没听过读得这么好的。批林批孔时，几个号的人要我讲读一些文言文件。

讲了之后，有人说：“看不懂，别人讲读，听不懂，你一念，不讲，我也懂了。”

但我自觉远不如董笑读报念得好。董笑曾对我谈鲁迅，谈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这很使我惊异。我许多“同犯”中，鲁迅似并不曾存在，更不用谈具体篇章。

野马跑得太远！本来是说学习，回转头来吧，从稷山再转临汾，号里每天早晚都学习，就是读报讨论，个个都要发言。这次我所在的队

叫“老残队”，我的打油诗曾有句：“谁把《老残游记》续”，想不到真作“老残游”。学习中发言，以一个瞎子说得很好，可惜连姓名都忘了。他自称是贼娃子，入狱时眼还未瞎。他是个舌辩之士，脑子里逻辑性很强。声音洪亮，一发言千军辟易，万籁俱寂。但据说识字不多，所谈也确与书本之类无关。尽是具体事实，尽是这监狱的前后大小事实，好像是一本活监狱史，那些事也不知他怎么知道的。他的发言，都是根据本日的读报或以前的读报，然后用本身在监狱内外和今昔的具体事件为证，所以说得特别贴切洞详，无论措词有时很粗鄙，只要细心听，总可得点或悟点什么东西。

除了这个瞎子，号内的人，每当学习，几乎都可说一套，不问深浅、高低、繁简的总算是一套。别看轻这一套，真是得来不易，据我所知（我曾调过好几个队，几个号），这些人，原来有的是文盲，进到监狱里才学认字，几乎全部原来连国家、革命、政治、阶级、国民党、共产党、新旧中国乃至抗日战争都不知道（不知他们住何处），都是在监狱里学习的。

临汾比稷山究竟算大地方，各队都有公家准备的书，全狱有个大图书馆，马恩列斯全集之类全有，而且不只一部。

二、监狱里医疗卫生方便

年老多病，不良于行，更不良于呼吸。住在效区，离医疗关系的医院远。三轮已废除，街车无力挤上挤下，出租汽车难叫。单位有车，自己已是不干活，白拿工资的人，不好意思常向单位要车，这些都不谈。到医院看一回门诊，在我说来，还是折腾太多。请大夫到家里来看，那是另外的麻烦。尤其是临时小病，值不得就医或自己就知道用什么药，叫人到单位找卫生员或到药店买，也都不太简单。因此，我常常想起监狱的医疗的方便——监狱的医院开在监狱里头，有病，大夫到监号里来看。

这就比外面任何单位都方便，除了医院本身。县看守所没有医院，不谈。

在北京半步桥监狱，　生过一次肺炎。两三个月，透视了7次，不能走路，同犯背我出进。

在临汾监狱很有些特色。其中之一，就是犯人在外面本来干什么

事，在里面还是干那事，理发的还是理发的，木工还是做木匠，厨子还是做大师傅，大夫还当医生，称为“医犯”（似乎只有医生如此，没有“木犯”、“厨犯”等称号）。临汾监狱医院的大夫全是犯人，有几个是北京转去的，也有干部大夫，不轻易给犯人看病，做些什么，不知道。大夫是犯人，确也有些好处，大夫与病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大夫更能照顾病人的情绪，病人也较少有在干部面前的那种自卑感了。但是好的条件，是医院离监号更近。北京监号是楼房，生了病要上上下下，不免吃亏。

临汾则是平房，监号分若干队，每队一个院子，其中分若干号。医院就是其中的一队即其中的一个院子。也就是其他各院各队各号的或远或近的左邻右舍。每天有一定时间出诊，急诊随时可看，且可叫医犯到号里来看，或同犯用怠盾抬到医院去。

我在老残队，老残队也有不老不残的人参加。否则连饭都没人给打了。老残队有些人也参加点劳动，我参加的是“拣菜”，即在厨房洗菜、削土豆、萝卜之类，但也有相当重的，如刨西葫芦、冬瓜。一个老西葫芦或冬瓜，重几十斤，搬不动，皮有半寸后，刨的工具又极钝，有的就是在小木板上钉一条洋铁片，刨不动。一碰到这种场合，旁边往往有年轻小伙子替我搬，搬来了还刨几下放在旁边，刨过几下的瓜，再刨就省力多了。

有一次，正在刨瓜，一个人蹲在身边看。一回头，就是那说我读文件一念就懂的那人， 他也是北京转去的， 现在做“医犯”。他问：“你刨得动么？”我说：“对付着刨。 ” 他说：“你有病，应该去看病。”我说：“我没有病。”他说：“有病，你自己不知道。星期四一定去看病。”我说：“找你么？”他说：“找谁都行。”到期，我去了，找了个年纪大的，我想他也许经验丰富一些。他看了我的名字，问：“是你么？”诊病后，大声说：“你回号休息，不要劳动。”说完，就把我的名字记入休息三天栏内，并说下星期再来看。下星期一我又找别个医犯看，也叫我休息三天。这样，除了星期日，我都不劳动，一直过了很久。原来医犯有准许病号休息三天的权（还要干部大夫批准，但似乎没有不批准的。）但这是一段附带的话，本意只是想说明在监狱里看病，比在外面方便得多而已。我经常怀念医院，主要就为这。还有，监狱里一般比农村讲卫生。比如临汾，每星期都理发。理发师多，不怕理不过来。用水方便，有富裕时间。比如稷山时，凡初进来的犯人几乎都是被子几年未洗，一阵气味，被上和身上都是虱子，进来了才在同犯的督促帮助之下洗澡洗衣服，焕然一新。

三、监狱伙食不太坏

“一个人顶好不要和公安局打交道，一打上交道，就难免常在监狱出出进进。

来过一次，难保不来二次三次，以至更多（例如“佛爷”之类）。来就来吧，没有好招待，请吃窝窝头。开店的不怕大肚汉，随便吃！”

这是北京半步桥一个看守说的。看守，名称似乎不好听。犯人都叫他们“队长”

或“指导员”之类。但临汾的队长或指导员是正式职务。也有的叫做干事。临汾监狱没有像北京那样的“看守”，监号，队，都是用犯人管，队门也是犯人看，通称之为“值星员”，一个号里一个值星员，负责学习、打饭及一切有关事务。临汾的犯人也好管，衣帽都是特制的，一望而知是犯人，身上也没有钱，每月发两元“零花”，是一种只在监狱小卖部可用的“狱币”，自家有钱也要换成这种钱才可用。

可只给人很少的一点点，多的存在银行里，一句话，不容易逃走，谁都管得住。

说“来了请吃窝窝头”，好像监狱吃得很坏，其实不然，甚至可说大谬不然。

北京半步桥，一星期改善两次，有时好像达到隔天一次。吃饭前，如果听见外面有人喊“有回民没有？”就准是改善了。改善，总是每人可分到一碗肉，有的多到二十几块。（至于回民，至少给两个盐鸡蛋，有时四个。）都是好肉（临汾比较差，常吃肉，都是头蹄内脏，似罐头厂剩下的，烹调也差。但临汾也常吃鱼（带鱼），（北京则一回也未吃过））。凡改善，主食也改善，不是白面馒头就是大米饭，不改善也不坏，最多的场合是西红柿甩蛋汤，犯人见了，似有不屑一顾之态。有一阵子关了一些学生。不知哪个号里有十几岁的小姑娘嗲声嗲气地喊：“看守叔叔，跟我把馒头烤一下吧！”爽性插一段：黑龙江虎林监狱，逢年过节之前，总会有一两个老头之类关进来。他们是附近居民，对于出进监狱之事非常内行，过节之前总有办法（多数是打老婆）犯点事被抓进监狱去。看守见了他们就笑：“又来过节了！”

因为过节定有肉吃。过了节，因为犯的事小，也就把他放了。至于梭山看守所的伙食很差，我本不想谈坏的方面，不谈。当我在半步桥吃

得满嘴是油时，不免偶然想到：如果全国农村，都吃到这种伙食，那将是什么情况。

四、结 语

把监狱说得这么好，似乎比外面还好，不怕有人看了，恨不进监狱，恨未犯法，因之也就是鼓励犯法么？鲁迅说过：北京模范监狱，许多条件，有的条件比外面还强，只有一个条件不好：不自由！一开始我说过，撇开一切方面，专讲我所经历的，我所怀念的它的好的方面。

其实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我来说，最适宜于学习的，是稷山看守所，但伙食很差。对文化落后的人，学习最好的是临汾监狱。医疗条件最方便的，主要是临汾监狱，其次是北京。伙食最好的是北京，其次是临汾。各个监狱，都有这么一两点好处，写在一起，说不定有人认为一切监狱，都具备这一切好处，这不怪我，这不是我的意思。

再说一点。本与监狱无关，而是从监狱看出的。不是说农村里穷么？不是说中国人民能吃苦么？何以见得呢？从监狱最可看出。有些犯人，刚解放就被捕判刑，多半是无期或死缓。判得对否，是法院的事，与监狱无关。且说一判刑，衣食服用就都归公家供应，而且每月发两块钱零花。我再次到临汾时，知道有人把零花积着不用，寄了几百块钱回家了。刚听，把我吓了一跳，怎会这样多？可不，1月2元，1年24元，10年240元，24年480元，二十几年，该有多少？难得的是他的家里（不知情况如何）竟需要他每月两元的补助，而他自己二十几年，一分钱也未花！还有把公家发的毛巾、肥皂、牙刷、袜子，积起来趁家里有人来接见时，偷偷交家里人带回去。但往往带不回去。因为这是不被允许的。

缅怀聂绀弩

冯亦代

自从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协现代文学馆为聂绀弩诞辰90周年召开座谈会的请柬，对绀弩的思念始终萦绕我的心头，久久不散，而且越来越强烈。特别在座谈会上听了丁聪、吴祖光二位谈及老聂的往事，心情更是不能平静。

他们二位自称是五七届“北大（荒）同学”，而且以热烈的口吻回忆同老聂在一起的日子，但在这些思往言辞的背面，我却感到那些日子的苦涩和凄惨。在祖国的大地上正照着一片明亮阳光，而在这一冰天雪地的荒原里，只是一垛生死关心的门坎。多少有为的人在这里落入死神的魔掌，幸而逃生的人也都是梦残魂断了。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坚强的，特别是那些堕入噩梦的人，他们舐干了身上的斑斑血渍，重又站起身来，迎接祖国母亲的召唤。老聂就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

吴祖光说老聂是传奇人物。他是弃文习武投奔革命的书生，是文坛继鲁迅茅盾之后的一位学贯古今的大师。他写的杂文可以媲美鲁迅，他的旧体诗开创了以时代精神贯入诗意的前路，他对古典文学的研究，独辟蹊径，树一家之言。总之，他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他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无期徒刑在山西的班房里， 将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读了4遍，写下了几十万字的笔记，可惜这些笔记已成为“反动言论”而不知所终，如果留至今日，则他必为后学者，开启了读《资本论》的门径。

我和老聂相识是在抗战后期的重庆，但是我知道他却远在抗战初期。我读了他在《野草》杂志上写的文章，深为他的犀利与深邃的笔锋所倾倒。他大我10岁，我虽然叫他老聂，衷心则以师事之。

1962年到“文革”前期，他住在京西半壁街，我是他家的常客，有时他和周婆（周颖大姊）也来前纱络胡同我的寓所小坐。第一次他到我家，看见我居室的湫隘，不禁摇头叹息，称我是公子落难。

他是很用功的人，于各家对《红楼梦》的观点，十分注意。有次他借到一本吴世昌先生在英国出版的《红楼梦考》 ，便让我逐句翻译给他听，一共花了4天，他边听边记下了书中的要点，而且特别注意吴对高鹗

续四十回的意见。我对他说，你有自己对《红楼梦》的看法，为什么还要记下别人的观点，他说正因为他有自己的观点，他才研究别人的观点来对证自己的观点。那时他买了不少古人的碑帖，每天练字，其时我也以写字代气功治疗我的高血压症，他深为称许，但看了我的毛笔字，又大摇其头，说我练字不得法，不能入门。这正是他的直率处，我就喜欢他这一点。

他劝我学写旧体诗，我说戴望舒说我没有诗才，所以我只顾欣赏而不愿自作。他宽厚地笑了，说我弱不经风，受不了打击。

他是个饿怕了的人，但他的饭量并不大，只喜欢和少数几个友人在饭店里，小饮几杯，吃几盘好菜，于是纵谈上下古今，自得其乐。我和他最后一次一块吃饭，是在王府井大街的一家小饭馆里，他喝了几杯，便大谈林彪、江青，说江青是个妖物，今后一定会把中国弄成翻山倒海了，林彪则是个鸦片鬼。这时街上叫卖晚报，我们买了一份，上面是第一次看见打倒彭、罗、陆、杨的消息。他看了之后，对同座的黄苗子和我说，以后不要去找他，少出门，言谈小心，日子会越来越难过的。

他的话不幸而言中了。事实上，他即使"言谈小心"也终于入狱，他是否有预兆，我从未问过他。1972年底，我从沙洋干校劳改回来，就从友人处听到老聂被判入狱的信息，以后常在李健生大姊处遇到周婆。他们二人一见面就谈如何搭救老聂和健生小女早日出狱回京的途径。我眼生生看见她们的头发由黑变灰，又由灰变白，但我无能为力，只能空言使她们一时宽心。

老聂以国民党师团级俘虏而被释放，得到重生，因为他原来判的是无期徒刑。

有人觉得滑稽，其实这是周颖大姊各处奔走呼号的结果。想到真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坐四人帮那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监狱，真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成为国民党战俘得到特赦，也就并不滑稽了。有一次他给我看写狱中生活的诗，诗的反讽使我笑得连眼泪也出来了；这句话有语病，因为我的眼泪不是笑出来的，而是为胸头的痛苦抑压出来了。他说在监狱里比我们日子过得好得多，至少用不着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

奇人而有奇事，他当然能甘于他所得的不公平待遇。

我50岁时，他曾经在我庆寿的册页里题过一首诗，写完了笑着说"涂

鸦！涂鸦！”

这首诗并没有在他诗集里出现， 也许写得匆匆他自己不满意。 可惜这本册页已被“文革”革掉了，我痴想或许有一天会在故书堆里突然出现，这是我不释于怀的企念。周颖大姊生前曾要我为老聂写文章纪念，但牵延至今，始终认为是一笔人情债。

以老聂的身体和他的乐观天性，他原是可以活到90岁的，如今只留得友人们对他的思念了，能不痛哉！

1993年1月8日雪朝于听风楼

聂绀弩在北大荒

徐城北

1958年夏的北大荒，到了收割麦豆的季节。一个高而瘦的老头手持镰刀割麦，连队指导员掏出怀表测试其速——老头每分钟只割十刀，而其他右派分子每分钟平均可割八十刀！指导员仔细观察，发现老头每次把握的麦秆甚微，于是手把手教他“握大把”和“砍滚刀”的要领，老头还算机敏，经过数次演习，“握大把”勉强可以对付，遗憾的是镰刀每砍下去，只能断麦二三茎矣！指导员叹息地说：“我找个小娃儿来，一根儿一根儿地拔，也要比你快哟！”老头直起腰来，“嚓”地一声点着蹩脚香烟：“干农活有两怕，一怕劲头小，二怕个子高。都让我占全了！”

56岁的聂绀弩，曾经是作家、诗人和古典文学研究者，如今怎么落到这般田地？

“龙江打水虎林樵”

从1958年春天开始，首都文化界的右派们，就一批批集合去北大荒劳动改造。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掌权的副社长王任叔（巴人）说：“绀弩岁数大了，不必去了。”

但绀弩明白：继续留在北京，日子不会好过。北大荒虽居漠北，但右派成堆，管制兴许松弛。空暇时可以看点书，甚至写点东西。于是在申请获准之后，便带着两大箱书（大字本“毛选”一部、马列著作若干、文学书籍寥寥），也带着他的苦恼、幻想和热诚，只身北上了。

他走进黑龙江，走过密山、走过虎林，在一个邻近铁道的八五○农场二队落了脚。等待他的是一个既让人兴奋、更让人悲哀的世界：来劳动的人以右派居多，但也不乏因其他“问题”来到这里接受改造的人。最使绀弩动心的，是看到有几位家属万里同行！她们和来劳动的人，都一律住在新盖的简陋大窝棚中。入夜，在每张能睡九十人的大统铺的两头，各睡一位妻子，紧贴她俩的是各自的丈夫，其余男性便一条条地“紧码”其间。由于她们的在场，每个男人都觉得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更应像个男人。平素流行在男人中的那些“荤笑话”，被扫荡得无影无踪。这场

景使聂绀弩感到圣洁，他写道：“共织荒原的锦绣，独憎人世有夫妻！”男人获罪，何须妻子同行？做为男人原单位的领导，又忍见这些女人随夫远行？！绀弩的眼睛潮润了。他想起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一部叙事诗，题目仿佛叫《俄罗斯女人》，是写两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都是公爵夫人），不顾社会的非议而离开彼得堡，去西伯利亚寻找自己充军的丈夫。聂绀弩感到眼前这几位中华民族女人，比俄罗斯女人更值得尊敬——她们远没有“公爵夫人”那样的地位，却在夫君获罪的那一刹，便决定永不分离，便决定共同承担未来不可知的命运！

感动之余，他心头一阵窃喜——能看一眼此情此景，自己这几千里地跌跌撞撞就算没有白来！蓦然，他漾起了诗情。“黑龙江，虎林，呵，‘龙江打水虎林樵’！

有龙，又有虎，啊，‘龙虎风云一担挑’！……”他不仅要用诗歌颂劳动和劳动者，而且要用全副身心去流汗，甚至是流血。他不满足总干“拾粪”、“烧水”一类轻活儿，当他看到全队职工在割麦豆大会战中，在地边站成一道长龙，手持镰刀、拉开架式、占足田垄，一闻号令便风驰电掣般席卷过去时，心中充满了艳羡！经三哀五求，指导员才递过镰刀要自己一试，谁期又是这般结果……“真放午时日已斜”

既然割麦不成，就又被派做另一项轻活儿——当一个小伙子的助手，合放一百头牛。他从实践获得真知：牛一点也不蠢。它总是用眼角“扫瞄”牧放自己的人，尤其还喜欢戏耍像聂绀弩这样不称职的牧者！始见小伙赶来，它自知逃不掉，便在原地甘听吆喝；如见聂朝前追赶，便在他距自己只两三步时陡然跑开，气得聂气急败坏、顿足兴叹：“生来便是放牛娃，真放牛时日已斜……”

聂绀弩羡慕地发觉，周围的人很快就适应了艰苦的劳动。在把脱过粒的麦草堆成大垛时，许多人能儿戏般轻松地叉草码垛。中国京剧院的右派武生周英鹏，这时把私带到北大荒的金箍棒（以往他惯演孙悟空）也“亮”了出来。他利用工间休息为大家表演——持棍从丈多高的麦垛上一个“筋斗”翻到地面，然后把棍耍得八面生风……看着看着。聂又忍不住悲从中来——如此善良、纯真的人们，却在从事何等低效的劳动！由于没有铁订，在盖房中为把椽子固定在梁上，就得经过割草、晒草、浸草、锤草直至搓成草绳的漫长过程，再用草绳一遭遭地将椽子绑紧。盖房还需要木头，队里又派人到百里以外的完达山中伐木。三人一组手工锯树，据说工效比电锯干的还高，常有这样的情形——一组三人早晨离开营地钻进密林，随便拣一个地方不紧不慢干起来，晚间回营地时随便

报个高额数字就算了事。干部们也不去实地验看，林子太密，钻进太深容易回不来。尽管右派们干活的情绪不是太高，但因天气酷寒，干活干慢了人就受不了，所以伐木数量还是颇为可观。运输问题在当时没解决好，许多伐倒的大树就永远躺在那里，直到烂掉。

聂绀弩不敢继续深思，知道那样下去对己、对人都将无益，为了麻木心灵，他便努力参加力所能力的工作，因为“日已斜”，“放牛娃”是当不成了。他就去烧开水，从发愁工地无水到懂得去附近寻觅残雪，从学习在地上挖坑安锅到懂得二次用时要先行扒去冷灰……还有一次他为别人送饭，途中遇到一条具有“哮天势”和“搏虎威”的黄色野狗，自己一面保卫着怀中的饭盒，一面挥杖吓退了它。此时恰遇人来，才知这不是狗而是狼……“到新天地作环游”

聂绀弩到达北大荒一年之后，一件“纵火案”恶化了他的处境。那是一所为干部家属新盖的三间草房，一明两暗，聂和另一位来改造的老头奉命前来烧炕——新垒的炕必须烧过才结实。整个房子还未最后完工，草帘子做成的夹壁墙尚未糊泥，院子里堆满盖房剩下的茅草。活儿不重，但须小心火烛，平时烟不离嘴的聂也只得暂时戒烟。然而正在他俩分别埋头烧炕时，聂绀弩这半边的夹壁墙，不知怎地起了火！聂脱下棉袄上前扑打，火苗早窜上房梁，一切抢救全都无济于事……事后，指导员勘察了现场，对他俩说：“着火时四处无人，既然火从老聂这半边起来，就该你负责。”另一位老头连忙解释：“今天风倒灌，说不定是风把烟中的火星吹回到屋里来……”就在老伙伴絮絮叨叨代为开脱的空当，聂一直凝望着指导员，脑海中闪现出春季点豆子时的一个场面——大家横向站好排，每人分包三垄。一声“开始”，大伙蜂拥前去，只甩下自己遥遥“断后”。弯腰点着点着，奇事忽然发生——三垄变成两垄，不会儿又变成一垄！怎么回事儿？直腰向前看去，正与连长、指导员从前头“递”回来的目光相逢！原来是他俩，每人在前面代点了一垄……聂绀弩打断老伙伴：“别说了，我已经五十七，没什么遗憾或留恋的事儿了。我认下就是。”

而平常以坚强著称的指导员，却忽地扭过脸，仿佛是哭了。事后老伙伴问聂为何如此表态，聂没正面回答，却反问道：“还记得我那首‘推磨’吗？”老伙伴一楞，随即胸中流泻出那一首七律：“百事输人我老头，惟余转磨稍风流。春雷隐隐全中国，玉雪霏霏一小楼。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连朝齐步三千里，不在雷池更外头。”老伙伴被诗“辣”得老泪纵横。

“纵火案”过去多日，连队中竟毫无动静。那名老伙伴跑来偷偷相告：连领导几次开会研究，意见没能统一。不料过了两天，连里开了聂的斗争会。指导员默不做声。另几名干部却来得个凶——命令聂手脚不许动，嘴不许张，连眼珠也不许转！

他们一边咋乎着，一边偷窥指导员的反应。聂此刻出奇地坦然，对几名汹汹然不可一世的干部讲，“这会不必开了，你们向上报吧，需要招什么我就招什么！”此事过后，一连几个月再无人提起，可到了下大雪的一天，县公安局来人把聂领到总场，当众宣布为“纵火犯”，然后给聂戴上手铐押进虎林监狱，事后很久连队的人才知道，是北京新近下来人，才促使县公安局以此行动表示“紧跟”。

“乾坤几个有心人”

超身物外的聂绀弩来到监狱，首先利用漫漫长夜对连队生活进行回忆——干活要天不亮就出发，头顶月亮才返回，没月亮的晚上，还要点燃草堆照明来延长劳动时间。在这种无止无休的疲劳战中，自己破例受到照顾——和大伙混在一块干活儿，从来是不计工效；安排到马号帮忙，老马倌叫自己躲在草垛里睡觉；分配到伙房帮厨，掌勺的师傅一听到外边有脚步声，便连声大呼自己搬柴禾，或是悄悄叫自己把手伸进水盆，装做洗碗的样子……眼下的监狱生活，显然要“自由”得多——天不亮不让起床，天没黑就必须回房，对于像自己这样的老迈之身，除扫雪外从不派他事，晚间还允许下象棋，拉胡琴。不如意事只有一件：不参加劳动（扫雪不算劳动）者没干的吃，只许不定量地喝玉米面粥。聂于是每餐都放足量连喝七碗，然而鼓胀的肚儿只要小便两次，就破气球般干瘪下去。记得有个原是汽车司机的犯人，他膀大腰圆干重活儿，所以每餐不但有窝头吃，而且还有菜——腌咸萝卜，他常常在火边把窝窝头的外皮烤焦，再悄悄揣回来拿给聂。当聂用满嘴假牙去啃去嚼时，真使这位去过南洋和苏联、饱啖过中西大菜的老人，产生味美压倒平生的感觉！

聂绀弩还有更大的遗憾——监狱不许向外写信。自己入狱一事，妻子周颖至今还蒙在鼓里。那时虎林监狱关着不少企图越境或越了境又被送回来的人。这种犯人大多暂关一时，很快就押回原籍，如果本人历史“清白”，大抵挨一通训便发回原单位监督劳动。聂从越境者中看中一名年少的“志诚君子”，他明日即将被遣返。

聂问他可能为自己带一封信？答曰“可”。聂又问他可能代垫一张八

分邮票？犹答曰“可”。然而次日他怀揣聂写给妻子的信准备登上囚车之时，狱警例行公事般问了一句“有无夹带”，志诚君子显然志诚，响亮地报告说“绝无夹带，仅为老聂捎了一封平安家书！……”

聂挨了一顿狠克，仍不死心。恰巧那名汽车司机指日刑满，私下一说，满口答应。司机顺利地为聂带出家信，内容只比上封多了一句——要周颖“速寄50元以备零用” 。然而周颖接到这封信时，“50元”却变成“5千元”，收款处是一个陌生的地址（司机可不陌生，那就是他久违的家）。周颖接信一时情急，四处告贷准备汇款。最后友人提醒了她，侦破由“五十元”改为“五千元”的秘密。周颖气得破口大骂：“一块儿在那个地方共事，还这么为人！世界上简直没好人了！”这几句直抒胸臆的话，后来经聂氏成了诗：“史汉多篇无赖传，乾坤几个有心人。千诗举火羊头硬，六月飞霜狗脸皴。……”

“老了十年为探牢”

周颖决定北上寻夫， 可看到机关给自己开出的介绍信， 顿时傻了眼。上写：“今介绍右派分子周颖去东北虎林监狱探视其夫、犯人兼右派分子聂绀弩！”周颖急怒之中生出智慧，拿着这封信就去找张执一（当时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由于张的“干预”，介绍信重新写过——周颖姓名前的冠词换成了“全国政协委员”。

周颖在除夕——聂绀弩的58岁生日之际，到达虎林。当即找到虎林农垦局长兼虎林县长的王景坤同志，向他诉明原委并求一见老聂。这位在战争时期当过团长的大老粗，在细心听完周颖的倾述后表示：如早些知道详情，早就该放人了。王还感叹地说，现在我们党内有很多同志，并不赞成把那么多人都打成右派……周颖被安排住进县委招待所，聂当晚也从监中提到招待所，与老伴共度除夕。春节后，法院派人去八五○农场调查聂的平时表现，带着很好的结论返回。很快开庭宣判——系属“责任事故”，判一年缓期。聂与周辞别虎林，搭上小火车一同西去。在中途的一个小站，聂独自下了车，由其他旅客帮助着，把有着两个挎袋的小行李扛上双肩，然后借着一根木杖的撑持，才艰难地挺直那堂·吉诃德般的身躯。他想再望望车厢中的妻子，但一声汽笛，小火车继续西驶。他默默地转过身，沿着其他旅客匆匆在茅草中踩出来的小路，缓缓走进灰沉沉的天边暮霭。就在他拄杖一步一顿、数步一歇的“节奏”里，聂心头又涌出一首题为“周婆来探后回京”的七律：“行李一肩强自挑，日光如水水如刀。请看天上九头鸟，化作田间三脚猫。此去定难窗再铁，何时重以鹊为桥？携将冰雪回京去，老了十年为探牢。”

“怀古情多事又非”

周颖返回北京，将此行的“成果”及感受都报告给张执一。张执一又转托另一位领导同志为聂妥为照顾。不久，聂便从农场中抽调到虎林，参加了《北大荒文艺》的编辑工作。这是本铅印的文艺刊物，作者和读者都以在北大荒工作的复员军人为主。在五六名编辑中，只有聂绀弩和丁聪两名右派。丁聪很少作画。画了也不署真名。绀弩除了看稿之外，还得做抄稿之类杂事。他虽然脱离了难以胜任的体力劳动，却陷入了难以忍受的窘迫——因为无论是连队还是牢狱的那种“自由”气氛，在编辑部中都“享受”不到。他不习惯与那三四位趾高气扬的编辑交谈，更懒得看那些气薄云天却干燥无味的稿件。

聂绀弩一年后忽然得到返回北京的通知。在车站上与同行的右派朋友相遇，大伙一致谢他——说是沾了聂的光，聂连忙细问，才知不久前张执一曾向周总理请示说：“北大荒有不少右派上了年纪，可不可以让他们回来？”总理问都有谁，张执一仿佛早有准备地回答：“比如聂绀弩——”总理闻言，仿佛不经心地表示：“聂绀弩？这人吊儿郎当的！让他们回来吧！”

“吊儿郎当”这一句贬词，把当日正时髦风行的政治罪名轻轻抽开——右派们沾了聂绀弩的光，聂绀弩又沾了谁的光呢？他心中明白，却嘴上不说。这答案尽管在右派之间早就是心照不宣的“秘密”，但人深沉些总没有坏处。聂绀弩力求这样做，但是他没能做得干净彻底，谁让他是诗人呢？归途中他又忍不住思绪联翩，终于做出这首足以概括那个历史阶段、并足以预见后来“文革”某些征兆的七言律诗：“东北北东得得归，归程何处未依依。犁锄既已交朋友，风雪何能损帽衣。击壤三年翁失马，沿途两耳招呼稀。贝加湖想邻青冢，怀古情多事又非。”

凭这一结句，聂便足以不朽。

到北大荒去

丁 玲

1．意外的判决

1958年初，我和陈明过了一个十分寂寞而凄凉的春节。没有客人来，没有酒，也没有花。孩子们都在莫斯科念书，他们在做什么？在想什么7在他们受伤的心头，该紧贴着可怜的妈妈的相片吧。风暴总算过去了，可是人还在风雨中飘零。受惊了的、撕碎了的心魂日夜不宁；人该从梦中惊醒，但好像还在没完没了的噩梦之中。

多福巷十六号小小的四合院冷落到只剩一个王姐（当年我们家雇佣的保姆）还伴着我们，现在这里离“福”太远太远，一切可以令人高兴的思绪都已远远离去。我和陈明在繁华热闹、鞭炮齐鸣的北京城里，在摇曳的灯光下，度过了一个十分寂寞而凄凉的春下。

春节刚过几天，文化部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突然来了通知，通知对陈明的判决：撤销级别，保留厂籍，下放到黑龙江密山农场监督劳动；三天后去东郊双桥农场报到，候命出发。命令来得太突然了，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事。在那面红耳赤、唾沫四溅、辱骂横飞乱哄哄的日子里，原来我们早已下定决心，要到东北伊春林区去，或者到贵阳的深山去，我们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下火海、上刀山，我们都无所畏惧，我们都勇于担当，我们俩个都在一起。现在怎能把我们俩分开呢？而且是在这种情况下的生离呢？我们一时都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沉默了许久，陈明才说：“这是不可能的。这种时候我不应该离开你，你不能没有我，不能一个人留在这里。我要找作家协会，让他们知道。看他们如何安排。”但我却冷漠地答道：“不必了。我们不向人乞求怜悯。你尽管去黑龙江吧，对我你应该放心！我一定会咬紧牙关，忍受一切。”

在陈明准备出发的三天里，我们互相规定：“不流眼泪，不唉声叹气。振作精神，面对未来。”这真是“重新做人呀”！让新的生活早日开始吧，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要顶住，我们能顶住。我们将像青年时代投奔革命那样，蔑视这时加在身上的一切，傲然踩着为我们设置的尽冬、刀尖昂首前进。让他们弹冠相庆吧，我们相许我们将信守共产党员的信仰、道德，开辟自己的新路，同心协力，相扶相助，在祖国北疆凛

冽的寒气下共同呼吸。相爱的人儿呵！我们不忍分离，却又坚决分离。我们盼望重聚，而且坚信一定重聚。但何时才能重聚呢？

二月中旬，我们在多福巷十六号的大门口分手了，留下了无尽的思念与回忆。

我还在恍惚之中，三八节那天，陈明在去黑龙江的前夕，忽然回家来看我了。王姐不在家，是我去开大门的，我几乎晕倒在门边。这奇迹真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我们在暖和的小院里携手踱着步子，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我们又紧紧偎坐在屋里的长沙发上，翻着新近合拍的一张相片，那是特为纪念这个平常的分离而拍的。我们原不缺少欢乐，可是在这张照片里我们却显得沉默、忧郁，事情对我们太严峻了啊！我们好像是久别重逢，彼此有说不完的话和藏在这些轻言细语后边的无限的担心。但我们都强压着内心的悲痛，谁也不去触着那入骨的伤痕。短暂的会晤之后，即刻就又要分离了，何年何时能够再聚呵？我们只希望我们的离情能把时间拉住。

天黑了。陈明要走了，同伴顺路来邀他同行，我用同情的眼光看着这个同伴，想着他美丽的情人。“有情人都成眷属”。但有情人却要无尽期的远远分离了。这分离使人断魂，断魂处只有心儿才知道啊。

2．寂居

3月过去了，4月来了。院子里的丁香海棠绽出了绿叶，绿叶中还含着一点深红深紫。春天来了，春风吹进了小院。天天盼望着陈明的来信，却是这样渺茫。他还是经过哈尔滨时从车站来过一封信。　现在，他到了什么地方呢？4月里的北大荒，该有一点春的气息吧？我有点想他，却更担心他。我想只要条件允许，他一定会来信的；现实真会残酷到不只是山河远隔，也还要鸿雁不通吗？我们的公务员夏更起离开我更早。他在1957年九十月间批判会开得热闹的时候就被调离回机关去了。他跟随我们已六七年，生活在一起比儿女更亲近。我记得风暴刚开始，那天我便对他说：“更起！我们都犯‘错误’了。你要相信党，一切要听党的，不要同情我们。

生活应该自己注意，你已不是小孩子了。”他原是河北老解放区农村出来的小孩子，全国解放不久，他到作协机关，派到我这里。他很单纯、聪明，刻苦上进。在我这里工作，夜间进补习学校，离开我们时，他已具有高中的文化水平了。听到我们的话，他什么都不说，只是一个

劲儿哭泣，有两天眼睛都肿了。我们心里难受，却无法安慰他。　　这年7月祖林从苏联回国度暑假，趁便去上海参观造船厂，正当《人民日报》公开报道批斗我们的惊人新闻，他们从南方回北京。我们不忍心他为我们承担痛苦，便替他买了飞机票，让他赶快离京飞回苏联学校。那时夏更起是多么地对他充满同情，陪他去飞机场，同他一道在机场等待起飞。这以后他每天小心陪伴着我们，悄声地亲切地说话。再过一阵，我明白，他可能有了监视我们的任务，他不得不向组织上报告我们的一些行动。我在大会上听到了一些对我生活上的挑剔和指责：如我因连日听会头痛、胸闷、喘不过气，陈明带我去游人较少的北海公园后门散了一次步。又如因我两天两夜没有阖眼，还要支撑着去参加批斗会，陈明叫更起给我买过一次一钱重的西洋参。我们明白了，我们并不怪他，他得接受这个任务。

他怎能拒绝说不呢？但我还是很难受的，因为他正考取了北京化工学院，而不愿意去报到入学。我们问他的理由，他说怀疑自己有肺病，学化学不适宜。但我们却认为这可能是藉口，真正的原因是经济问题。因为他去上大学是离职学习，便没有了收入。如按过去正常情况，我们在经济上可以帮助他，但现在不行了，他得同我们划清界线，他不会接受我们的帮助了。我也就不能像早先那样能够接济他，向他提建议了。这不久，我便向机关提出，我不要公务员了。我并不是怕有人监视我，我们没有什么行为是见不得人的。我是替公务员着想，如果谁还跟着我这个“反党分子”，那是他的耻辱，他将因此在人前抬不起头，伸不直腰，甚至会洗不清自己的。

我只能忍心看着他调回机关，看着他放弃已经考取了的大学专业，而且也模糊地预见他的前途。这孩子虽然日渐长大了，却是一个多么忠厚朴实的年轻人呵！

现在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只剩下王姐和我，显得十分空阔。没有来客，用不着有人听门。电话机如同虚设，等着机关派人来拆走。剩下几盆花，寂寂寞寞自个儿开着。太阳虽然仍旧照射，却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月亮更是冷冷清清。春天的白日原来就长，可是夜晚也不觉得短。用什么打发这漫长白昼的思绪万千的长夜呢？人可以烦闷，可以忧郁，可以愤怒，可以反抗，可以嘤嘤啜泣，可以长歌代哭，……就是不能言不由衷！不能像一只病蛤蟆似地呱呱地叫着自己不愿意听的虚伪的声音。

安徒生写过一篇童话，说一个公主被妖法制住了，变成一个癞蛤

蟆，整天呱呱地叫，只有到夜晚，才能恢复她原来真正的样子，一个美丽的公主。我不是美丽的公主，但我是人，是一个尊严的人，是一个认真的共产党人，我怎么能挂着一张癞蛤蟆的皮，日夜呱呱地叫，说着不是我自己心里的话？我得承认我是“反党的”，是“反社会主义的”，是“反毛主席的”。天呵！我的确没有反过，从来也没有反过。但有人咬定这么说，我就得跟着说，心里不愿，但嘴上得承认。我心里想我可以死，就是死我也不承认，但我却不能“顽抗到底”。我到底害怕什么呢？我到底还能相信谁呢？我只有相信党，我想总有一天党会搞清楚的。我一定要等到这一天，我应该活着耐心等到这一天，我虽然有过迷茫，但是我想来想去，许多熟悉的身影在我眼前显现，许多亲切的声音在耳旁回响。我不能相信，我们的党中央，我们1200万党员中，亿万人民中，真的就没有一个人能尊重事实，肯为丁玲说句公道话吗？我想，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组成的，我坚决不能相信，创造过空前业绩的千万个党员和人民群众竟是那样盲目轻信，一定要把一个自己的战友说成是反党分子。我相信总有一天，历史会作出证明，人民要做出裁决。

我应该不必羞惭，我应该无所畏惧，只能相信群众，相信自己，扫清迷茫，坚定不移地活下去，承担苦难，做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继续用自己的言行，谱写为人民的一生。

3．悲伤

陈明走后，我整天埋头在一些异邦异域的文学作品中，日夜同一些非洲人、印地安人、开发美洲的白种人相处，让奇怪的故事，陌生的风俗，和难以理解的道德伦理观念，亢塞我这摇摇欲坠的灵魂。人要习惯在寂寞中，孤独中，耻辱中熬炼，熬炼出一副钢铁的意志，和一颗对自己也要残酷无情的铁石心肠才行啊！

清明节到了。　我去西郊万安公墓凭吊我的母亲。5年了，亲爱的妈妈，你离开我们5年了。5年中我经常哀悼你去世得太早，后悔我对你的照顾不够。你奋斗的一生经常使我和熟悉的朋友们敬重。你经历的艰难困苦永远使我痛惜和怀念。你赐予我的母爱，是我的幸福。全国解放以来，我多么希望你能多活几年，享受你一生流离中很少得到的平静的温暖的晚年。可是现在，我站在你墓前的枯树下，低着头，含着眼泪，深深感到，妈妈，你死得正是时候呵：你是否预感到船将下沉，便弃我们而去？我常常想你临终时，我们不在你的身边，你已经说不出话的时候，你到底在想些什么？你一定会想到：“冰之现在不在面前也好。”你

总是为我着想，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有一点点知觉的时候，总还是要想到我，并且一定还为我着想。现在我却怀疑了，你是否是在想："我顾不得你们了。我死了也好。"妈妈呵，母亲，你真死得是时候，如果现在你还活着，你将怎样面对这些残酷的现实！你再伟大，你绝不能承认你的女儿是反党的。你再坚强，也不能心平气和地分担我的痛苦，排解你的疑团。你的信赖被粉碎，你的感情被蹂躏。母亲呵，母亲，你看，现在我伫立在你的墓前，却想到你幸而早死。这是多么荒谬的逻辑。这是多么刻骨入髓的苦痛呵！

《在严寒的日子里》是我朝夕爱抚的宠儿。从1947年在阜平乡下写《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时，我就开始构思。1950年准备动笔。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界的许多工作，占据了我的时间，到了1953年，母亲不幸病故，中央文学研究所改组为文学讲习所，改由田间同志等负责；《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先后换人，我才落得无官一身轻。1953年冬天，我回到桑乾河，走访了好几个村庄。1954年我又去桑乾河，见到了许多熟人。这年夏天我躲在安徽黄山，写出了开头的五万字。

到了六七月，便奉召回北京，参加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接着便是文艺界批评《红楼梦研究》问题，又由此引起了对《文艺报》的批判检查，山雨欲来风满楼，文艺界开了几次大会，牵连到《文艺报》初期的主编我。有人指责《文艺报》是独立王国，有人批判《文艺报》初期犯了路线错误等。那时我一心要写长篇小说，实在倦于这些过左的和在人事上杂有派性的争论， 最后我勉强写了一个书面检讨过关。

1955年春天，我离开北京，躲到无锡，一心修改并继续写作，长篇才得八万字，这时又发生了胡风事件。我先到上海，不久又被召回北京，反胡之风刮到了作家协会。

先是零敲碎打了几个同志之后，接着便是来势汹汹地展开了追查一封写给党中央的所谓反革命的匿名信，稍事迂回，便牵扯到我。连续的大会、小会，有人点火，有人唱和。到了1955年底，煞有介事地便有了一个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于是《在严寒的日子里》8万字的手稿被封闭在抽屉里，至今两年多了。稿纸都焦黄了。

我为这长篇所构思的人物档案、地形、村落、房舍、果园、山坡、河流等等的设计草图， 连同一些读者来信。对1956年发表的小说前八章（约4万字）的一些意见，都锁在一个小的铁皮箱里，我常把它取出来反

复翻阅。最使我难忘的是那些在我脑子里翱翔的人物，他们常常对我微笑，对我投来热烈的目光。“我们在等着咧，怎么你还不把我们介绍给读者？”这两年来，他们眼睛瞪着我，诧异我为什么不动笔。

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呼唤是多么地缓解了我现在的愁怀。我要压制眼前的一切的烦恼，打扫心情，理出思路，用心地把他们塑造。呵！亲爱的朋友呵！我知道，人民需要你们。你们一定要在人民中经历风险，在战斗中成长。现在某些人剥夺了我的写作权利，宣判我政治生命的死亡，但是我没有权力，也不忍心扼杀你们。我将怎样排除这挤压着我的千斤重担，全身心地拥抱你们，把你们捧献给人民呢？寂寞、愁苦、耻辱，使我的心灵都萎缩了，一点生机、激情都窒息了，枯干了，失去了颜色。我将从何处再得到滋润，得到一丝阳光，一缕清新空气呢？现在只有你，《在严寒的日子里》还可以治疗我心灵的创伤。可是，我将从哪里得到力量来征服我面临的灾难性的障碍呢？真是“眼泪睨天，雨来天半”，万里长空只有蒙蒙的迷雾一片。

4．火柴

安徒生写过一篇童话；《一个卖火柴的姑娘》。在大雪严寒的夜里，在雪白寂静的街头，人们都围聚在温暖如春的家里过圣诞节。这个小姑娘的火柴卖不出去，又冷又饿。她蹲在街头墙角，划一根火柴来温暖一下她的手。火柴给了她热，也给了她希望，她在火柴的微光中看见了她想望已久，美丽的世界。她得到了勇气，得到了安慰。……

陈明来信告诉我，说王震同志到了他们那里，宝清县境的八五三农场，去他们那个队看望大家。他们那个队都是从北京去的，绝大部分是国务院一些直属单位的所谓“右派分子”　，大约有100多人，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干部，有的是党员，有的是民主人士。还有一些是跟着党走，在党的哺育下长大的青年。这些人的年龄大都在30至40岁左右，正在有为之年，如今却背着黑锅，来到边疆。在体力劳动中锻炼、改造自己思想，很多人都是强忍悲痛，抛妻别子，还要用种种设想，种种方法，说服自己，打通思想，接受这种处理，到北大荒“监督劳动”。他们大都撤销了原来的级别，停发工资，按农场新农工待遇，每月一律只拿28元。不过，人民政府有一条补充规定，有些人的家庭生活如果确有困难，原来靠其赡养的直系亲属，每月可以按人补足8元钱的生活费。　这些人的思想从表面看，自然不能没有区别，从内心来说，就更难知深浅了。大家临时凑在一起，谁对谁在短时期内还能作到彼此同情，互相鼓励；但是否真正能披心沥胆，以诚相见？在风暴之后，恐怕谁都会心有余悸，

一切以少说为佳。但有一点，他们绝大部分都积极劳动，勤奋学习，遵守纪律，循规蹈矩，不乱说乱动，给农场负责人的最初印象是好的。陈明也许是其中比较最单纯的一个。他每封来信都以愉快的心情描述他怎样参加新的艰苦劳动和严格的纪律生活。他根本没有觉得什么不自由，他在冰天雪地里劳动感到无限的乐趣。

我很了解，他这样并不是为了安慰我，而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他还告诉我一件十分兴奋的事。他说王震同志冒着春寒去到他们那个队，他们还住在才搭起的马架子里。王震同志对他们大家说："我是来看你们的，是来和你们交朋友的，你们要不要呀？""共产党准许人犯错误，人总是会犯错误的；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了。""一个人有时右了，有什么了不起呢？右了还能左的嘛。我替你们这个新建点取个名字，叫做'向左村'，好不好？"

这一席话正是寒夜里的火柴，给在冰天雪地里的人们以温暖，给人们以光明，令人从一点微微的温暖里感受到人世间的炽热的感情；从微弱的一线光亮中，看到了伟大的母亲，看到了党；从点滴的希望中，就能积蓄起坚定的无坚不摧的力量。

王震同志，这火柴是你划亮的；你这一席话，便是你那一份多情。你自己也许说过就忘了，你没有在意。可是在那个时候，在那种处境中，你这几句话，有千斤重、万斤重啊，你是真正代表了党嘛，人们都为此整夜不能阖眼。一群踯躅在茫茫愁海中的脆弱的灵魂，就因为你这一席话，你点燃的一根火柴，而振奋起生命的双翅，在暴风雪中翱翔，冲破层层乌云，沐浴在自由的蓝天之上。呵！一根划亮了的火柴。

陈明用最激动的感情描述了这一次的会见。而且王震同志向他问起了我。陈明把我也打算去北大荒的想法讲了，并且企望得到他的支持。王震同志一口说："好嘛。她来，我同意。"火柴！我已感到你的温热了，我一定要飞到那寒冷的北大荒去。

5．何去何从

邵荃麟同志，当年作协的党组书记曾经告诉我："对你的处分是按右派分子的第六类处理。冯雪峰也是按右派分子第六类处理，这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小组会上讨论过的。你可以不下去劳动，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资；……像雪峰，大

概仍将留在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他个人意见，我“也可仍旧留在北京写作，过一段时间再把陈明从东北调回来。”听了这些，我的确心动了。如果真像他这样说，我全心全意从事《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写作，这一件心事总算可以了结，这正是我多年来一桩没有完成的心愿。可是，他个人的这番好心，能够获得另外权威人士的恩准吗？我实在不敢有这样的奢望。同时，我想，我能不能在这热闹的城市，而又远离这里的一切，孤家寡人，独自一个人关在房子里，致力于一本书的写作呢？自然，为了写作，一个时期摆脱一些杂务，是需要的。但现在是什么处境？是在什么条件下写作？我是脸上刺得有字，头上戴有帽子，是走不出大门，见不得人的人。我同一切人、一切生活之间竖立了一堵高墙。我被描绘成一个丑陋的怪物，任人指点，任人笑骂，千夫所指，众口一词，这种处境，我怎么生活下去？怎么有心情创作？！怎么能保持宁静的心情？！

另外，我们原来曾有过一个想望。在我的书桌上摆着当年从《人民画报》上剪下来的图片，和从报纸上剪辑下来的文字资料。这些可爱的风光，和可爱的生活记录，都来自我们曾醉心已久的那些原始森林。那里大树参天，丛林蔽日，在深邃的绿色世界里，这里，那里，透露出几缕耀眼的阳光。阳光下，小鹿跳跃，溪水低吟，听婉转鸟语，看松鼠跳跃，闻青草的芬芳，采艳丽的花朵，领略大自然的雄伟，萌发无穷的生命之力。这些全是有关东北小兴安岭、伊春林城的报导。我真愿奔赴那云烟深处，洗涤我内心的烦忧。我愿意竭力描写山林里伐木人的豪情，那与天地共存、和日月争辉的新的浪漫豪迈的生活。陈明走后，我曾经把我这些期望向作家协会党组反映，请求准许我离开这灰暗的环境去另辟一条道路，即使荆棘丛生，山石拦路，我决心要踩出一条小道，或者还会是一条康庄大道。我应该站立在光天化日之下，应该有所作为！但答复是，我独自一个女人是不能去那个地方的。他们似乎十分关心照顾我，说以我的年龄，我的身体去那种地方不相宜；但是也说，将再考虑我的要求。

此外，新的一条路也摆在我面前。陈明已经顺利到达北大荒。他依然是那么乐观，他总是能发现生活中的美丽，他总是有无穷的力量，他把新的充满了生气的宇宙展现在我面前。他把那四月的飞雪描写成迷人的画图，把他们创建新生活的劳动，在冰天雪地里伐木、打井，化冰煮饭，平地盖房，写得如火如荼。北大荒的广阔的草原，起伏的山峦是如此诱人的。那些人，包括他自己，都在向地球开战，征服自然。一个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是真正的战士，能上能下，能与人民共患难，同安

乐。

他把周围那些人都写得真正可爱，对生活，对人，都是情意深长。我仅仅读了他的一些描述，也不觉心怀开朗。他真正了解我，他说：“来吧，我以为你最好是来我这里。这里的很多人，都在关心你，他们都说要专为你营造一间小茅屋。我相信北大荒将在你的笔下留下永久的芬芳。来吧！我们将共同建立新的生活。你是勇敢的，你好像二十年前奔赴抗日前线那样坚毅果敢。你有力量对付一切暴雨严寒。这里可能也有某些阻碍，但我们一定能跨过去。这里比北京优越，在新的生活里，起码会比较容易忘却那一幕幕阴森恐怖的、意想不到的袭击。这里远离一些是非和勾心斗角。我在这里等着你。我们要在北大荒参加修建宏伟的殿堂。只有真正舍弃个人的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劳动的人才能理解真正的幸福……”

不必犹疑了，到北大荒去，到陈明那里去。两个人在一起，两个人的力量加起来，总比一个人的要强些。我相信去北大荒的困难会少些。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了。到暴风雨中去，到人群里面去，到火热的劳动中去，到建设的最前线去。共产党人是无所畏惧的，冲锋在前，把一切烦恼远远地抛在后边，把那些不值一顾的魔影全部清除扫光。

6．介绍信

我从作家协会拿到由中宣部署名的一纸简单的介绍信。这一张窄纸条，几行字，使我又一次堕入五里雾中。那上边清清楚楚地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那么，党组书记邵荃麟曾经说的，对我与冯雪峰的处理是一样的，降几级工资，可以留在北京工作，还在政协小组上讨论过的，现在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取消级别，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谁决定的？没有人向我解释。这种决定，这样处理，为什么事前没有一个人通知我，和我谈谈呢？我在党内工作、生活了20多年，对人对己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无情，这样草率从事的。看来不知道是什么人，把党的政策当作儿戏，或者是压根儿从没有把党的政策、组织原则、纪律规定放在眼里。对冯雪峰的处理是开除党籍，降三级工资，仍然恩准留在北京工作。江丰呢，这样一位老党员，被划做美术界的大右派，也降了级而被留在北京。我呢，我不想留在北京，我自己要求去北大荒创作，可是“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看来，我比所有的右派都更罪大恶极！试问掌握我的命运大权的那些先生们，照你们用中宣部名义写的这封介绍信，如果我在下面果真能

够有条件从事创作，你们谁能批准哪个刊物发表我的作品？：又有谁胆敢触犯你们的权威，按照常例支付给我稿费呢？我明白了，总有那么几个人，不只要把我驱逐出党，赶出文艺界，而且还要趁此夺走我手中的笔，永远不让我再提笔写作。我去北大荒如从事创作，便不给工资，我只能靠陈明每月28元钱生活。党的一贯政策是战犯也给饭吃，关在牢里的死囚犯也给一碗饭吃嘛！这哪里是介绍我去北大荒体验生活，从事创作，而是要我去冰天雪地，靠体力劳动去挣饭吃。我已经54岁了，我从27岁开始写作，我是一名作家，我究竟有多大力气从事体力劳动呢？更重要的是我拿着这样一纸以中宣部名义出具的介绍信，基层单位的同志将如何看待我。我成了一个被据弃在人民之外， 不齿于人民的人！ 我心里为此很不安，很愤慨。我要问他们，党规定的“给出路”的政策，你们就是这样执行吗？我不相信这样的决定是通过了中央的。

中央某些领导一时听信不真实的小报告，一笔下来点了我的名，我成了大右派，难道他就一点也不了解我吗？我过去那样信仰他，真诚地以为只有他了解我，如今不成为对我自己绝大的嘲弄吗？难道敬爱的周总理、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忍心让我去北大荒喝西北风吗？我是绝不相信的，死也不信的。我以为只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惯于耍弄权术，瞒上欺下，用这样表面堂皇，实则冷酷无情的手段，夺走我手中的笔，想置我于绝地。我在这个小院里，走来走去，压住我狂跳的心。如果不是怕吓坏了王姐，我一定要撞墙，要捶打自己来平息我的愤怒。

王姐把饭端在桌子上，我一眼不看。王姐只好悄悄地又端回厨房。陈明远在东北，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我折腾了一整天，到深夜才稍稍定下心来。我想只有两条路，一是去找邵荃麟问个究竟；二就是拿这张“通行证”硬着头皮到北大荒去。

如果去问，不论去问谁，一定是问不出结果的。他们可以推；甚至可以说组织上的结论就是这样。那么，我仍只得低头回来兜着走。我能抗拒这种待遇吗？我抗拒得了吗？半年多来，我哪里还有什么力量同这伙人纠缠！他们是一帮一伙，他们打着红旗，什么违反政策的事都可以干得出来。我现在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人。那么，走第二条路吧。反正得离开北京，反正要到下面去。下边自然是按照上边的意思办事。

但下边人多，群众中就没有一个头脑稍稍清醒的？何况我到下面去，不是去打官司，打官司的结果注定是要更坏的。下去就是过日子，日子总可以比在这里过得好些。

至少有陈明在那里，他的微弱的力量，对我来说，就是莫大的支持。于是我下了决心的。什么都不说，不问，带着这张“通行证”，壮胆下去，沉在人民中间去，胼手胝足，卧薪尝胆，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我不相信，北京我是不可能再回来的，天下绝不会就由少数这几个人长此主宰摆弄。

7．轻装

我一定要把在北京背上的包袱甩在北京，我一定要轻装上路。不是说要我“重新做人”吗？是这样的，我决心真正的从头做起，把过去的一切都勾销，现在从零做起。不！不是从零做起，是从零下做起，是从负数做起。因为现在已经不把我算是人了，我没有资格从人做起，我只应该从负数做起。既然已经是这样，关在北京将长此这样。不能等待，天上不会落下奇迹。因此要鼓起勇气，走到人群里边去。

个别人口头上不希望我去，他们很会装模作样，好像同情我，可怜我，实际更愿意看到我从此萎靡，一蹶不振，从文坛消失，以此来证明对我的判决和处理是完全正确、大公无私的，是他们的不朽功勋。我不能顺从他们的心愿，我要做出自己的证明。我只有到群众中去，找回真理。十多年革命战争的生涯教育了我，我深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自然境遇不可能一下就好起来，不会出现奇迹。我在下面仍然会遭受白眼，冷眼，我一定还会听到唾骂和更多的闲言碎语。但有什么了不起的呢？难道我还没有遇到过？难道那些诬陷，那些唾骂，那些诅咒，这三年来我听得还少吗？

我就这样鼓励自己，要像战争时期那样，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人民群众有什么可怕的呢？在北大荒创业劳动的人民有什么可怕的呢？群众的眼睛是亮的。群众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只要我凭着一颗共产党员的心，真正地、长期地为人民服务，我一定可以得到群众的理解，赢得群众的信任。我将在他们那里生活得愉快，我将重新获得一个崭新的世界。

作为一个知名作家，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总是常常听到赞扬，受人捧场，因此自己得时时警惕。但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日子过得总是顺利舒服的。而成为一个犯罪分子，一个脸上烙下金印，头上戴着大帽子的人，现在却要承受一切诅咒、斥责、指点、痛骂，就像一个人赤身裸体被严密包裹在一个满是钢针编织的麻包里，随时随地，上下左右，都要碰上许多扎得令人心疼的钢针。大人先生们呵！你们幸运，可能是一

辈子也不会体味到这种滋味的。你们只会说大话教训人："要知罪，要坦白交代罪行，要深刻反省，要努力改造。改造你们的反动的灵魂！你们要重新做人！……"你们真是仰头望天，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呵。好像只有你们才是一贯正确，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家。我清楚地记得，在首都剧场千人参加的作协党组扩大会的总结会上，一位权威说的话，我是一辈子都不敢忘，而引为教育的。他说："以后，没有人会叫你'同志'了。你该怎么想？"说这话时，他那轻松、得意，一副先知的脸色，正是狠狠刺中了我心灵的痛处。我从他的冷语，从他的脸色中，我悟到了人。有些人只是挂着党员的招牌，口口声声讲人道主义，而实际却往往是没有丝毫人性的。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曾经说过：共产党员要受得起冤枉。我第一次读到这话时曾经认为，在共产党内，一个共产党员会有冤枉可挨吗？我以为党绝不会冤枉一个党员。现在看来，我的确太过于天真了！

摔了跤，不管怎么摔的，总得自己爬起来，总得自己站住。党籍没有了；党籍并不一定能说明一个人的真正好坏。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在《青年近卫军》中就写过一段这样的故事。一个党的干部相信了一个有党证的党员，后来才知道这个党员是一个叛变过的坏蛋。他接受这次的教训，说道：怎么能凭着这一张小小证书来信任一个人呢？！现在，我的党籍任人开除了，但一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心却仍是属于我自己的，任何人也不能拿走的。我似乎明白了，有党籍的党员，也不一定全是好的。在党内不长的历史上，总会有少数那么几个想整人的人。但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谋求人类幸福进步的党，她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很好的。在漫长、曲折、复杂的航道上，有时她可能会偏离大方向，有时甚至会被某些坏人操纵，但整个党和党所追求的理想、事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党不是哪几个人的，不是少数人能篡夺的。总有一天，理想终会要实现的，也许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斗争。现在我不是一个党员了，但我应该继续为党工作，要比一个党员工作得更好。我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员，在逆境中也应该符合一个党员的要求。因为我不是糊里糊涂跑进党来的，我在党内受过党的长期教育和培养。

我应该用自己的一生，证明我没有辜负党的教育和人民的培养，我是一个经得起严峻考验的共产党员。我也要明白告诉那些人，你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丁玲绝不是一打就倒的虚弱的，纸扎的，泥糊的人。她会振作起来的。

回忆母亲丁玲——1957年前后

蒋祖林

一、妈妈犯了错误

1957年夏天，我从苏联回国度假。

这年年初，我国驻苏联大使馆通知，允许在苏联学习满三年的留学生自费回国休假一次。原先规定是学习期间不许回国的。知道这个新规定，我很高兴。我1953年来苏联，现已满四年，于是我决定暑假回国。

我从小失去了父亲。我出生后九十多天，父亲胡也频就被国民党杀害了。慷慨就义，血洒龙华。我为有这样一个英雄的父亲自豪，决心踏着他的血迹前进，为他未竟之事业奋斗终生。然而，他的过早去世使我从小就没有得到过父爱，所以，我是把我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妈妈身上的。妈妈十分爱我，她曾多次向我说："你的一切是我个人生活中最大的安慰。"她希望我不仅仅是一个儿子，而且是她的一个什么话都可以谈的知心朋友。同妈妈谈心是最令我神往的了。她思想敏锐，观察细致。

当我向她述说我的学习，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朋友，以及我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时，她常常说出令我信服的见解，没有说教，分析透彻。她谈吐风趣，有时，引一个典故、说一个故事，一切意思也就寓于其中了。我们谈的话题是广泛的，天南地北，从家庭琐事到国家大事，从个人修身到事业理想，从我的学习到她的写作。

我们也谈文学艺术作品，我告诉她我读一些作品的感想，她也常介绍我去读哪些书。

我以有她这么一位文学老师而感到得天独厚。她有时也讲一点轶闻趣事，告诉我一点她工作中的人与事，告诉我她的喜悦，她的烦恼。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就聊到深夜。50年代初，在我们家住的那所四合院中，时场吠只有我们谈话的这间房里深夜还亮着灯。

我已经两年多没有见到妈妈了。1954年底，她应邀参加第二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会后来列宁格勒访问，我陪伴了她四天。两年多来，我十分挂念她。思母之情是我决定回国度假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我已风闻她“犯了错误”，却又不知其详。所以，就为此事，我也一定要回国一次。

这事，　得从1956年7月初谈起。当时，我从苏联南方一个造船厂实习归来后便去教育学院看望于陆琳。于陆林是陈云同志夫人于若木的妹妹，是一位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女同志。她这时已30出头，还离开家庭，离开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我们这群20多岁的人一起当大学生，住集体宿舍，在紧张的功课中拼搏。我敬重她的求知精神和毅力，她对我也关心，所以我们比较接近。还有，1954年至1957年间，她担任中共列宁格勒留学生总支书记，我担任造船学院留学生支部书记，在工作关系上是上下级关系，因此，工作上也有很多联系。这时，她刚从莫斯科回来，她去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开了几天会。我向她谈了我在南方实习的生活。她告诉我，她在莫斯科见到了来苏联访问的李富春副总理，谈了一些她跟李富春副总理在一起的情况。

随后，她关心地问我：“你母亲在国内犯了错误，你知道不知道？”

她的问话使我感到十分意外与震惊，我伤了好一会才说出话来：“不知道，母亲的来信中从未说过。”我又问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犯了什么错误？你从哪里知道的？”

她说：“听李富春同志说的。主要是严重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宣扬个人崇拜，搞独立王国。”

我又问：“受党内处分没有？”

她答：“没有听说受了处分。”

听了她这句话，我的紧张的心情才稍稍松弛一点点。

她宽慰了我一阵，她说，看来主要还是思想问题，她嘱我不要为此事而情绪波动，影响学习。

我苦恼了好多天，因为这些“错误”同我心目中的妈妈的形象始终联系不起来。

可是于陆琳是听李富春副总理说的，那当然是不会错的。一年来，妈妈的信里只字末提此事，我想，她一定是心情不好，她没有告诉我是怕我知道了心里难受。我思索着是否该写信问问她，但想到她没有告诉

我，自然有她的想法，那么我还是不去触动她心里的这个隐痛为好。再说，信里也不一定能说得清楚。

夏去秋来，在那年秋天到次年春天的日子里，她给我的几封信中，表露了一些异样的心情。

一封信中说到《红楼梦》里的贾雨村，大意是说，她从四岁时死了父亲起就看到贾雨村这样的人了，而现今社会中仍不乏贾雨村式的人物。

一封信里说到巴尔扎克的《贝姨》。她称道巴尔扎克对嫉妒的化身贝姨这个典型人物刻画之深刻，谈到人的嫉妒心之可怕，出于这种阴暗心理，可以不择手段。

一封信里谈了她在四川看川戏《打红台》的感想。她怕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所以简述了戏的内容。我后来看了她写的那篇《看川剧〈打红台〉》，信比文章要简单，只是对萧方这个人物，从当今现实社会的角度，抒发出的感慨似乎稍多几句。

这几封信里写到的都是谈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引伸到当今现实生活中，泛指仍有其人。这几封信，我反复看了多遍，看时都会不自觉地仔细思量。我想，她确是“犯了错误”，仅从信里的内容和情绪就可以看得出来。她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又觉得委屈，因而产生郁愤的心情。为此，我更加深深地不安了。

这件事，就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上，只要一想到它，心就隐隐地作痛。

再就是我想藉回国休假的机会参观一下国内的造船工业，这对我剩下的一年半的学习与今后的工作都是有益的。 1955年6月，我去列宁格勒阿斯托利亚饭店看望来苏联访问的第一机械工业部黄敬部长。那时，造船工业属一机部管，我出国前已明确属一机部派出。黄敬部长向我说，国内很需要我所学的潜艇专业的人才，嘱我好好学习。他简要地谈了点国内造船工业的情况，并向我说，如果我学习期间有机会回国的话，他让我参观了解国内的造船工业。

为了回国后同妈妈在一起多住些日子，我提前考完了三门功课，提前三星期完成了这个学期的学业。我用自己平日的积蓄，花了1200卢布，从国际旅行社买了列宁格勒至北京的双程往返火车票，于6月9日离

开列宁格勒经莫斯科转乘国际列车回国。

二、一个不平常的夜晚

我乘坐的莫斯科——北京国际列车在6月20日中午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 妈妈来车站接我。我跳下车喊着“妈妈”向她奔过去，她笑着轻轻地搂了我一下。夏更起（妈妈的勤务员）帮我提着箱子，我一只手提着皮包，一只手挽着妈妈向车站出口走去。妈妈一边走一边说：“你今天回来正是时候，知道你要回来，就找人粉刷房子，前几天刚完工。你回去看看，多福巷十六号可漂亮啦！”“妈妈！干嘛要这么大费工夫。”我心里想着，修房子既费钱，又会打扰她的写作。妈妈说：“你几年没有回家了，房子修得漂亮些，让我们这个夏天过得快乐些。”

我走进家门，只见小院呈现着一副崭新的景象。房屋粉刷一新，红色的柱子，房檐；绿色的窗根，门框。北屋前边的两畦花散发着诱人的芬芳，南屋前边东面的一棵梨树枝繁叶茂，西面的葡萄架上爬满了枝藤，结着一串串还没有成熟的绿色的葡萄。小院清新，宁静，充溢着温馨的气氛。

多福巷十六号是一所典型的方方正正的住家四合院，是公家的房子。妈妈1951年春天从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全国文联宿舍搬来这里。北屋西边的一间是妈妈的书房，另两间打通成一大间是客厅。西厢是卧室。东厢的三间中，有两间打通为一大间是餐厅，房内放了一套沙发，也可以作会客用，另一小间空着。南屋的几间中，夏更起与王姐（女工）各住了一间。北屋西边的耳房用作厨房和暖气锅炉房，东边的耳房我住，我出国前住在这里，这次回来仍住在这里。这间房有门通客厅。

久别重逢，母子间自有许多话要说，下午的大部分时间就在叙叨一些家常事中过去了，自然也谈到了当时的形势。自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由党内整风转入反击右派的斗争。只是我在苏联时没有看到那天的《人民日报》，报纸到列宁格勒时，我已在归国途中。妈妈把这些日子的报纸理出给我看， 她在说到这场斗争时，还嘱咐我：“你在国外4年，这几年国内变化很大，你要认真读报，了解和跟上现在的政治形势。”她款款而谈，态度明朗。当然，她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但是，从她谈话的态度、语气来看，她根本没有想到这场反右派斗争会同她有什么关联。我自然也不会想到这点。

晚上九点多种，各自回房休息之后，我无所事事地独自坐在北屋客厅的长沙发上，没有睡意，也不觉得长途旅行的疲劳。我回味着回到家里这大半天的印象，家是温暖的，妈妈是可亲的，依然乐观，开朗，谈笑风生，一切都同我四年前离家时一样，似乎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思索着，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把我和妈妈谈话的话题引向她1955年“犯错误”的事。这时，妈妈推门走了进来，我原以为她已经睡了。

妈妈在我旁边的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问我：“你在做什么？想什么？”

“不想睡，随便坐坐。”我回答。

她端详着我，说：“我想，你已经听到了一些关于我的事情，我现在就把一切都告诉你，免得你闷在心里，为我受苦。”

呀！才半天光景，她就洞察出了我的心思。

妈妈平静地说：“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从6月6日起，接连开了三次，会上的发言是一致的，都认为1955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斗争我是不应该的，给我作的那个以我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周扬也作了这样的表态。”

我吃惊地看着妈妈，党组扩大会斗争她，还定为“反党集团”，原来情况竟是这么严重！

她接着说： “党组扩大会还没有开完，已休会7天，现在就只等一个正式结果了。”

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没做声，静听她说下去。

妈妈稍稍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理一理她的思路，然后，开始了她的叙述：“1953年春天，我辞去了所有的行政工作，专事创作。1955年4月，我去无锡，住在梅园，写作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七月，回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这时已开始了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 8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有六七十人参加。一个月内共开了十六次会。前三次会是为追查一封写给党中央的匿名信，认为是陈企霞所写，并肯定有

合谋者，但陈企霞不承认是他写的。从第四次会议，斗争的矛头就转向我。其实，早在会议之前和会议之初就先已为我的问题定了性质。周扬在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时就说：作家协会有一股反动的暗流，是反党的，无原则结合起来的小集团，是‘独立王国’，‘独立王国’都有小集团，高岗就有小集团。他号召与会同志：‘独立王国，小集团，反党暗流，既然不允许，就应该揭发。要相信党，要对党忠诚。’他还提醒大家：‘小集团的反党活动，同反革命联系，提高警惕，很有必要……。’所以，整个会议过程就按着会议领导人事先已有了的肯定的结论进行，成为一边倒的情况。”

尽管妈妈已告诉我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了，但听着她叙述会议的概貌，我的心仍阵阵地颤栗。

她继而向我说了以下一些1955年党组扩大会上揭发她的， 后来又据此定她为“反党”的事实。

“说我提倡‘一本书主义’。1952年春天，我去莫斯科参加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苏联作家协会送了我一箱装璜精美的书，也就是我说给你的那些书。

我回国不久，玛拉沁夫等几个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学生来我们家里，他们有些拘束，于是我拿出这些书给他们看，翻看书里漂亮的插图。我感慨地说：‘一个作家，如果一辈子能写出一本值得后人如此精装的书，也就不算白当作家了。’我是以羡叹的心情说这番话的，是深感自己之不足，至今还没有写出一本让自己满意的书来，还需不懈地努力，同时，也是以此与这几位同学共勉。我的这些话，后来被汇报上去。在会上，就说我提倡‘一本书主义’，把我的原意歪曲为‘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有了一切，有了不朽，就谁也打不倒。’声称我把文学创作完全看成达到个人名利的工具，并以此腐蚀、毒害青年。”

妈妈说的那箱书，我都翻看过，有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理、高尔基等俄国文学大师以及一些苏联作家的书。我1952年从学校回家过暑假，妈妈说：“这些书就都给你啦！”那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懂俄语。妈妈又说：“我也说过，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要有作品。没有作品，算什么作家呢！这话有什么错？”

我听后，认为妈妈的这些话并不错。若说她提倡“一本书主义”，她也不只写了一本书啊：若说名，她早在30年代就闻名国内外了；若说

利，她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一书所获斯大林文学奖金全部捐献给了全国妇联妇女儿童委员会；平时所得稿费也大部分交了党费或买了国家建设公债。她常常向我说，为人要正直，无私，现在好好学习，今后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在生活上现在仍应保持在革命根据地时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我在国内时，生活靠供给制，供给制改包干制后，我靠的是干部助学金。她也只有寒暑假时寄点路费给我。我怎么也想不通，何以妈妈说的那几句话，竟会被歪曲成“一本书主义”，作为“反党”的依据。

“再就是说我制造个人崇拜。主要是一件挂照片的事。1953年10月间，张凤珠（丁玲的秘书）从文学讲习所回来告诉我，说文学讲习所为招待民主德国作家代表团正在布置会议室，挂了一些作家的照片，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和我的照片。这时，中央文学研究所已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四五个月了。改组后，我已不担任所长，改由田间担任。我也再没有去过这个所。我一听张凤珠的话，就生气了，马上打电话给田间，叫田间立刻把我的照片取下来，并且批评了田间。田间答应立即取下。我打完电话后还不放心，叫张凤珠到文讲所去，看我的照片取下来了没有。张凤珠回来告诉我，照片已经取下，我也就放心了。没想到在党组扩大会上，不顾事实地硬说我居然把自己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是制造个人崇拜，狂妄地吹嘘自己。”

听妈妈说到这里，我不由得一下就联想到妈妈1954年在列宁格勒向我说起的苏联文学馆挂照片的事。那时，她与周扬、老舍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一起去苏联文学馆参观。馆内挂着一些作家的照片，中国作家中挂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她四人的照片。她即向苏联文学馆的负责人提出，请他们把她的照片取下来，但没有被苏联文学馆负责人接受。她在列宁格勒向我谈这件事时，我曾觉察到她心情上的不安，但我当时体会不深。听了她刚才的这番话，我觉得自己才有真正的体会。

“说我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这里主要说我和周扬的关系，说我反对周扬，而反对周扬就是反党。至于这后一点，我并不这么认为。但是，对于周扬，我是拥护他作为文艺界党的领导人的，并没有反对他。历史上，‘左联’时期，我和他接触的时间很短；我被捕后，他继我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两个口号’的争论，我没有参加。延安时期，他在鲁艺，我在文协、文抗与解放日报社，我同他并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在晋察冀边区，我下去搞土改，写文章，没有安排我参加实际行政工作。 我与他有直接的工作关系是在1949年第一届文代会之后。1949年6月，我从

东北到北京参加文代会筹备工作，毛主席在香山召见我，并留我在他那里吃饭。在谈话中，毛主席问我：‘文艺界党内谁挂帅？’我表示：‘周扬比较合适。’我原打算开完文代会回东北深入到工厂去，但党组织决定我留在北京工作，我即决心拥护周扬。因为，党把文艺界的领导责任委托给他，同时，我觉得文艺界党内没有旁人比他更合适，也愿意同他搞好关系。他是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部党组书记，在文化部办公，他并且兼任全国文联党组书记。我担任全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在他领导下协助他具体负责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的工作。那时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是一个机关，都在东总布胡同22号。我还担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我总希望他多管创作、刊物和文研所方面的事，但他似乎文化部那边的工作很忙，没有多少时间读作品，看文章。1951年初，中宣部领导决定我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在此以前是周扬兼任这个文艺处长。1951年秋天，北京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周扬和我分别担任整风学习委员会正、副主任。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刚开完，周扬就走了。我感到肩上担子太重，心里真不愿意他走，但当我知道是毛主席要他下去的，要他下去参加土改，也就不好说什么了。他去了湖南常德，也就是去到了我们的家乡。我在中宣部领导下，对北京文艺界的整风做了一些工作，但觉得头绪多，问题复杂，心里一直都希望他快点回来领导。所以，我并没有反对他，我是拥护他领导的。在某些问题上或是对某些作品的评价上，看法不尽一致的地方，自然也是有的，这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我担负工作的几年，他曾好几次在会上表扬我，说我正确，党性增强，有原则性，进步大，识大体，有分寸等。他还写信给我，　　也说了这样的话。（注：写此文时，我查阅了周扬1953·2·16日致丁玲信，信中写道：这两三年来，我觉得你的进步是大的，我也喜欢你那股工作的劲头，你也好强，但有原则，识大体，有分寸，与某些同志的个人积极性就不同多了。）可是在我离开工作，专事创作两年多以后他却在党组扩大会上为我的问题定调，什么‘反党’　，‘一本书主义’‘搞个人崇拜’‘’搞独立王国’‘文艺界的高、饶’‘反党联盟’‘反党小集团’等等罪名都掼到我头上。这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听到这里，我想起1952年初秋的一天中午，妈妈从外面开完会回家，径直走进客厅，满面春风，我想她一定有什么好事。她把黑皮手提包（这手提包她后来送给了灵源，我们现在还保存着）往沙发上一扔，就站在房子中间高兴地说：“我今天在会上又受到表扬啦！周扬同志说我工作有成绩，党性强。”她那近乎年青人才有的天真的样子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再就是说我与陈企霞的关系，说是‘反党情绪的结合’，又说是‘反党联盟’，最后定为‘反党小集团’。其中突出的一件事，就是《文艺报》有二个主编的问题。

全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我为《文艺报》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陈企霞就说‘主编就是主编，有什么正的，副的。’陈企霞有个人主义，我没有及时批评他，觉得自己是正主编，处在这样的地位不大好说。我向周扬汇报后，周扬有过一点不愉快的沉默，但他当即同意了。可是在会上说这件事时，就说我个人任命陈企霞、萧殷为主编，是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是同陈企霞‘反党的结合’。”

妈妈还说了好些会议中揭发、批判她与有关的人和事的一些问题。这些都被冠以或是感情拉拢，或是挑拨离间，或是排斥打击，或是破坏团结等等。

妈妈述说这一切时，态度平静。我默默地听着，几乎没有打断她的话。

在妈妈叙述完这些在会上揭发她的问题之后，我问道：“那么，你在会上，针对这些不合乎事实的揭发和批判，是不是说明了事实真相，或者作了申辩呢？”

妈妈说：“当时会议的气氛是不容许我申辩的。有些问题，我作了说明和更正，但会议的领导人根本不听，不予理睬，在他们作结论性的发言时，仍旧按照不符事实的揭发作结论。周扬在会上就说：‘不考虑多一个材料，少一个材料，主要考虑性质。’难道他和其他的会议领导者们会不懂得正确的定性来源于确实的事实这一简单的道理。若是不合私心，若是抱客观的态度，即使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之中，也是不难把这些问题核实清楚的。”

妈妈接着说：“党组扩大会议之后，他们就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的名义，以这些没有核实的事实的根据，写成《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中宣部和中央。后来听说党组在研究讨论上报这个报告时，有的党组成员也没有让参加。我对这一切均一无所知。年底，中央批复后，党组向各文艺单位有关干部传达这个报告时，没让我参加，也不给我看这个报告。我直到现在都没有看到这个报告。1956年夏天，我向中宣部机关党委写要求对重大事实辩正的材料，也只能依据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发言的正式记录。我不明白他们为

何采取如此不光明磊落的做法。根据党章，对党员作出的结论和处理，应告诉党员本人，党员也有申诉的权利。”

妈妈继续说道：“去年夏天，中宣部组成了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的专门小组负责处理1955年定以我为首的‘反党小集团’ 问题。周扬等也参加这个小组愤体工作由李之琏（中宣部秘书长兼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负责，参加做具体工作的有张海（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崔毅（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等。还有一位杨雨民，原是热河省副省长，去年，热河省撤销后，调来作协，他也参加做具体工作。

这个专门小组进行了半年的调查核实工作。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会上揭发与《报告》中列举的那些我的‘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与实际不符，绝大部分不是事实。张际春，李之琏等的意见是应根据调查的结果，实事求是的处理。6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会上的发言是一致的，认为既然没有反党的事实，定性为‘反党”反党小集团’的结论自然不能成立。周扬、邵荃麟、刘白羽等作协党组领导人也先后发言，表示了1955年对我的批判斗争是不恰当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虽然态度勉强。在会上，有些人还提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对揭发的材料不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向中央反映不真实的情况？’也有人提出要会议领导者们总结教训。”

妈妈说：“党组扩大会接连开了三次就休会了，何时复会还不知道。可能上面还要研究，也可能现在已开始了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须集中精力于反右派斗争，而把这件事放一放。我这个问题，纯属1955年党内斗争的一个遗留问题，若以不影响全局，而把它暂搁一段时间再处理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只是时间问题。我想，迟早总会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的。”

妈妈对问题的解决有信心。她完全没有想到会和反右派斗争有什么关联。

最后，她说：“看来全国解放以后那几年，我的声望太大了一些，为人所难容。

若不在北京做这几年工作，而是去工厂或农村深入生活、写文章或许要好一些。”

谈话结束时已是一点多钟。我在苏联时，对此事略有风闻，却完全

没有想到事情竟曾是这样的严重。好在现在情况已大不同前，所以，我也想得特简单，认为平反已成定局，只不过稍迟与稍早一点而已，对于我，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这四个小时的谈活，是如此地震撼着我的心灵，以致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记忆，妈妈说话时的音容神情也仍都历历在目。

三、短暂的欢乐

我回到家的第二天，妈妈就同我商量怎么一起度过这个夏天。她说："你有两个月在国内，我们怎么安排呢？是不是去青岛住些日子，在那里，还可以去海军基地参观，我们一起去看看你学的潜水艇。肖劲光（海军司令员）曾表示过，欢迎我去海军看看，当然，我去了以后得写一两篇反映海军生活的文章。另外，你在列宁格勒也认识了刘道生，他不是要你回国后去找他吗？"

我一听，心里很高兴，我没有去过青岛，那是有名的避暑胜地．去了还可以参观潜艇。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1954年至1956年期间在列宁格勒苏联海军高级指挥学院进修，学习。他知道我学习潜艇设计制造后，对我表示了热情与关心，他约我同他见面，他说："我同你母亲1936年底就认识了，那时她刚来到红军里，1946年在张家口还见过面。"他又说："听说你在学习潜艇设计制造，这很好，我们海军也需要这个专业的人才"。他要我常去他那儿玩。他回国时嘱咐我，要我回国后一到北京就去找他。

但是，妈妈和我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不去青岛。因为，我们都放心不下妈妈所谓"反党集团"的事。为此，不宜在青岛久住，若只住七八天，十来天，又不值得，旅途往返疲劳，天气也热。

既然决定不去青岛，妈妈就说："那我们住到颐和园去，那里安静、凉快，又在北京。"

建国之初，有关部门把颐和园内一些可住人的宅院分给中央的一些单位，供避暑、休息之用。全国文联分到两所宅院：云松巢和邵窝殿。1953年，文协从文联分出，成立中国作家协会，这两所房子归了作协。

云松巢坐落在排云殿与石舫之间的山坡上，是一所较大的宅院，正房五间，耳房两间。房前有一个很宽敞的走廊，走廊下边的院子里满是松树。沿两侧院墙有遮阳的走廊，拾级而下可通正门。正房后面还有一

个小院，院子当中有一座假山，小院里种着许多竹子。正房东侧有一边门，出门经过一个亭子即到邵窝殿。邵窝殿较小，只三间房子。

一星期后，我们住进了云松巢。我1950年夏天曾陪外婆在这里住过一个月。那时，妈妈因要上班，所以只是每星期六下午来，星期一早晨回城。1950年的北京，一过动物园，路两旁就全是农田了，交通也不方便，去颐和园的公共汽车，半小时才有一班，所以园内游人很少。1957年，动物园以西已盖了一些房子，园内游客也不太多。

住进云松巢，我不由得就想起了外婆，想起1950年和外婆一起在这儿度过的日日夜夜。 现在再也见不到她了，她已经去世四年。记得1950年7月，外婆一见到我就开心地向我说：“我有件喜事哩：我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到这里来过。”妈妈也高兴地向我叙述这件事。那些天妈妈正住在这里赶写一篇文章，一天上午，来了一个警卫人员，问：“丁玲同志是否住在这里？请准备一下，有一位首长要来看她。”

妈妈到门口去看，只见毛主席正从坡下拾级而上，陪着他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与江青。妈妈连忙迎了上去。进院后，她请毛主席与罗瑞卿、江青坐在前廊的藤椅上。

毛主席向妈妈说：“我到这儿散散心，休息一下，听说你住在这里，就来看看你。”

妈妈说：“我母亲住在这里，这几天我躲在这里写一篇文章。”毛主席一听就站起身，说，“我去拜望她老人家。”外婆在房子里，从毛主席一进院子，她就两眼透过玻璃窗盯着毛主席看哩！毛主席走进屋，向外婆问道：“老人家身体还康泰吗？”

外婆紧紧握着毛主席伸出的手，连连点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妈妈请毛主席，罗瑞卿，江青等吃西瓜，谈了好一会才送毛主席到排云殿前登上游船。我见到外婆时，外婆仍沉浸在喜悦之中，她不只一次地说：“毛主席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待人是这么和蔼。”

想起这件事， 我不由得问妈妈： “你和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首长都熟识，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期间或会后，你有没有想过要向他们反映实际情况？”

妈妈说：“我也曾有过找中央领导同志的想法，但也想到这一定会被会议的领导者们指为不相信组织，是越级，是告状。周扬在会上就口口

声声说我以前告他的状。所以，迟疑之后没有去找。还有，就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名义给中央写一个定我为‘反党小集团’的报告。我原以为，既然一些问题不容解释或是无法取得他们的理解，那么，我只有寄希望于今后。”

妈妈叹了口气，说：“建国以后，我很少到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那里走动，我觉得局面大了，他们日理万机，还是少打扰为好。当然，也没有进城以前那么好见了。现在看来，有点走动或许好些。不过，通过党的组织来解决问题是对的。我现在相信张际春和中宣部机关党委会弄清事实真相，会实事求是地处理。”

张际春是闻名的人物，解放战争时，是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中央给二野的嘉奖电，抬头都有他的名字。我那时就知道他。

妈妈还同我谈到她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早在1947年，在阜平抬头湾，就同我谈过这个护地队的事迹。她说，1946年，她在涿鹿县温泉屯参加土地改革，土改刚结束，那一带就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翻身的农民组织了护地队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但失败了。她那时就说，写完《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之后就写这个护地队。1953年，她辞去行政工作之后，就着手写这个长篇小说，已写成的八章共五万字发表在1956年的《人民文学》上。她曾把这期杂志寄给我。她以前曾向我说过构思这个长篇小说之初，1948年在西柏坡同刘少奇同志的一段谈话。她说“我向少奇同志说了这个护地队的情况，我说我想写它的失败，写它从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尔后归于失败的全过程。少奇同志赞同我的想法，他说：‘小说的结局不一定都要写成胜利。也可以写它的失败。失败当中也有英雄，也有可歌可泣的事。

写出失败的教训，写出从失败中看到胜利，法捷耶夫的《毁灭》就是写失败。”

妈妈又说：“我实在希望1955年的问题能快点解决，好安下心来继续写这本书。

写长篇小说需要有宁静的心情。我从去年夏天起就搁笔了，时间都花在写申诉材料上去了。”

我刚回到北京的那两三天，妈妈向我说：“这两年出版了几本好看的

书，你闲时可以看看。”她推荐我看《苦难的历程》，《斯巴达克思》与《死水微澜》。我把这几部书带到了颐和园，极有兴味地读着它们，有时同妈妈谈谈读后的感想。

住在云松巢，白天不出门，只有到傍晚，我们才出去走走，沿长廊在昆明湖边散步。这时，游人都已离去，园子里显得空荡荡的。湖光山色，风景如画。妈妈心情恬静，兴致也好。我伴着妈妈踱步其间，真感到舒心。我们总是走一会，在长廊上坐一会，直到夜色浓重了才回云松巢去。在这样的场合下，我们一次也没有谈她1955年的事，我甚至没有去想。

我刚回北京那两天，妈妈就催促着说：“你该去看看你的老师李纳。”女作家李纳是我在延安中学学习时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她也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学员。所以，我是她的学生，她是我母亲的学生。我如约去看望李纳，恰巧她的妹妹李灵源也在家。这是我第一次同灵源见面，但是我对她却早就有一点了解。早在延安时，我就知道李纳有一个小妹妹在云南家乡，李纳曾指着她桌上的一个小墨盒告诉我：“这是我离家来延安时，我小妹妹送给我的。”1951年夏天，我从东北回到北京，妈妈向我说：“李纳去年回了一趟家乡云南，她的小妹妹跟她一起到北京来了。这女孩子很单纯，长得很漂亮的。”她还说：“看不出她还有点经历哩！在昆明参加游行示威，同国民党的兵打，被摔在地上，一身被水笼头冲得水淋淋的。”

1953年夏天，我同妈妈在北戴河住了半个月，我因假期已满先回了北京，妈妈十多天后从北戴河回来向我说：“你刚走，我就遇见了李纳的妹妹，要是早知道她在那儿，你还有个伴，我们也好玩一些。”这些话都给我留下了印象，所以，虽是第一次和灵源见面，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交谈从一开始就很随意，没有多少拘束。

她的确如妈妈所说长得很好看，白皙的脸上有一双漂亮的眼睛，身材窈窕，拖着两条又黑又粗的长辫。她起初静静地坐着听她姐姐同我说话，后来李纳忙别的事去了，我们就聊了起来。我问她的情况，她告诉我她已从音乐系毕业，留校担任助教两年，最近参加中国青年艺术团，领唱几首民歌，下月将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姑娘，如她的名字一样，有点灵气。她对声乐事业有着执拗的追求，在学校里（北京艺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的前身）受到重视，正处在事业上很有希望的境况。

李纳留我吃了午饭。饭后，灵源要回艺术团去，当我和她一起出来沿东四头条漫步到东四牌楼分手时，我问她：“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呢？”她说：“艺术团排练很忙，若有空闲，我打电话给你。”半天的接触，我觉得我同她已相知了，而且我喜欢上了她。

回到家后，妈妈问我去李纳那里的情况，她郑重其事地说：“麟儿！你我个搞艺术的爱人好不好？家里也有趣味些。”我意识到妈妈在关心我我爱人的事，她看中了灵源。

还在我们去颐和园之前，妈妈就打电话邀李纳与灵源来颐和园同住。我们住进颐和园三天后，李纳与灵源也来到园里，在这儿住了三天。

我喜欢颐和园的后湖，环境幽静，空气清新。清晨，我约灵源去后湖散步，走到谐趣园再走回来；晚间，我们坐在云松巢边门外的亭子里聊天。灵源喜欢诗，也读了不少小说。我们一起背诵普希金的抒情诗句：“我记得那美丽的瞬间：你曾出现在我的面前，有如一闪即逝的梦幻，有如纯洁美丽的精灵……。”我们也谈小说，谈我正在读的阿·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我们都看过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我们喜欢这部小说，对书中的两个主人公有着不同寻常的亲近感。我们也谈各自的家庭，随意地谈着想到的一切。我觉得我们对人生，对事业，对生活，对爱情都有一致的看法，有许多共同的爱好与志趣。总之，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李纳与灵源住在颐和园的这些日子，云松巢热闹多了。妈妈心情非常好，看得出她喜欢灵源。当灵源三天假满要回城里去的时候，妈妈叹息着说：“只住了这几天。就要走了。”

灵源回城的第二天打电话给我，约我当晚去看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前的汇报演出。下午，我进了城。看完演出后，我送她回艺术团。艺术团住在鼓楼后面。我送她到艺术团门口，她不进门，又送我到鼓楼公共汽车站，我又送她，她又送我，直到末班车我才离去。我回到家，想着出现在我面前纯洁、美丽的她，回味着和她相处的这些时日的每一个瞬间，心想，但愿不是一闪即逝的梦幻，希望它真实地伴我长存。因为灵源，我滞留在城里了。过了两天，妈妈也搬回来了。原来打算在颐和园长住的，结果住了不到十天。

灵源7月11日离北京去莫斯科。 10日晚，妈妈在灯市口南边的萃华

楼饭庄为灵源饯行。　下午4点钟，妈妈向我说：“我们去东安市场，我帮你挑一件礼物送小灵子（灵源的小名）。”妈妈和我出了多福巷，沿王府大街向南走去。在路上，妈妈说：“先送一个领花，现在送戒指、项链还不合适，这些以后再说。”我们走进了东安市场的首饰店，妈妈又说：“现在还是不要买最贵的，买一个价钱中等偏上的比较好。”她挑了一个浅紫色宝石领花，她说：“这个好，颜色、样式都大方。”

她还选了一个紫红色的首饰盒。在萃华楼饭庄，我把这枚领花送给了灵源。

通过与灵源的多次接触，我认定她是我理想中的爱人。她不仅漂亮，有一般吸引人的魅力，而且心灵美丽，善良，纯洁，正直。她在爱情上是严肃与深刻的。在事业上有理想，有追求。我爱她。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我爱的人。这天晚上，我鼓起勇气向她表白了我对她的爱情。也得到了她同样的回报。

第二天上午，我怀着无比幸福的心情去火车站送她。回到家后，我又激动、又欢快地告诉妈妈，我和灵源已相爱。妈妈非常高兴，她说：“很好，我很满意，愿你们在爱情上幸福。”

稍晚些时候，妈妈向我说：“还在你回国以前，我就向李纳说：‘现在也不兴包办婚姻了，要不我就要托人到你家提亲啦：祖林回来以后，让他们两个人见见面，看他们自己的意思如何。我们两方面从旁给他们创造一些条件。’”真正是“千里姻缘一线牵”。还在1950年夏天，李纳回云南昆明探望离别11年的老母与幼妹。临行前，她去看望妈妈。妈妈拿出一本《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写好题赠的字后，托李纳带给陈赓，并给陈赓写了一封信交给李纳。妈妈说：“你若遇到困难，可以请他帮忙。”陈赓是妈妈熟识的一位部队领导同志，时任第二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四兵团司令员，也是云南前线的司令员。李纳去时随张冲、卢汉等乘飞机去，返回北京时却遇到了困难。云贵川一带刚解放几个月，国民党留下成千上万的武装土匪部队到处骚扰，陆路交通很不好走，很不安全。那时没有民航，军用飞机很少。李纳在昆明找了几位在省政府担任负责工作的熟人。他们都没法给她解决乘飞机的问题。李纳就持妈妈的信去找陈庚，见到了陈赓的夫人傅涯。傅涯高兴地收下了妈妈赠送他们的书，见信后，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纳，向李纳问了一些妈妈的情况，并问李纳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听李纳说后，她说：“陈赓到前方剿匪去了（多年后才知道陈赓是率军事顾问团去了越南。这在当时是绝对机密的），乘飞机的事，我可以转告司令部，你有几个人要乘飞机呢？”李纳

经过几天毫无结果的奔波觉得乘飞机的事太难了，若飞机上能有她一个人的位置就是十分难得的了。

可是，傅涯的热情使李纳终于鼓起了勇气，她看看陪她一起来的身边的灵源，回答道："两个人。"次日，司令部来人通知李纳：明天有飞机，两个人，准备好。于是灵源跟李纳来到了北京。若是没有妈妈给陈赓的信，李纳也就只好走陆路返京，她就不会带灵源同行冒险。灵源留在云南，我和她就不会相识了。妈妈竟在无意之中牵起了这根红线。

在这些日子里，妈妈对自己"反党集团"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但是毕竟问题正处在解决的过程当中，所以，她不愿意到处串门，也不主动邀请人来家作客，她不想因此而又生出什么枝节来。

考虑到社会的复杂性，妈妈对于不熟识的人，尤其是新闻界人物的来访，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有一天，说起因为我回来家里修房子的事。妈妈说："那天搭席棚，工人从门外往院子里拿竹竿、席子，大门洞开着，正好《文汇报》的两位名记者浦熙修，姚芳藻来，见大门开着就闯了进来。我本不见记者，就怕生事。但她们已站在院子里了，我只好从屋里出去同她们谈了几句。她们问我：'社会上传说丁、陈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我回答她们：'我不知道呀！我有什么问题？'她们说：'有的教科书上选编了你的文章，现在都删去了，是为什么？'我说：'教科书上选编我的文章，我根本不清楚，更不知道删去与否？'她们问：'这次党在全民当中整风，作家协会的"谜"在哪里，盖子该怎么揭？'我说：'这在邵荃麟的整风报告中都谈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盖子？"'她们问：'党组是不是在开会？'我说：'不清楚，没有接到通知。'她们说：'不是今天下午党组开会吗？'我仍推说不知道。她们再三问，我便说：'是否开会党组知道，你们问党组好了。'并且向她们表明，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组不能告诉你们的。我也不能告诉你们。就这样送走了她们。"

妈妈又说："也真是凑巧，大门从来都是关上的，只开了这么一小会，就让她们碰上闯了进来，若不是这样，我就让夏更起门口把她们的来访谢绝掉，推托我不在家。"平日，对不熟识的来客，夏更起都是请他们在门房稍坐，他先进来通报。

妈妈说："这问题是党内问题，应在党内解决，通过党的组织解决。可是去年年初在党内传达作协党组给中央的那个报告起，这个问就被他们搞得党外、国外都知道，现在连民主党派的报纸也找门来。"不想，后来这又成了她的一大罪状。

从颐和园搬回来后，有一天，妈妈高兴地说：“聂鲁达到中国来了，作协通知我，要我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代表作协宴请他。”智利诗人聂鲁达是她比较熟识的一位外国著名作家。1951年秋，她曾陪爱伦堡与聂鲁达去上海、杭州访问，相处甚洽。不言而喻，她为再次见到这位她所尊敬的作家而感到心情愉快。此外，在6月初开过三次作协党组扩大会之后， 安排她作为主人宴请聂鲁达，不由得不使她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兆头，预示她的问题会得到平反，从而增添了些许乐观的成份。我听后．也产生了乐观的情绪。她去宴会之前，梳理好头发，换上一件银灰色的连衣裙（为灵源饯行，也是穿的这件连衣裙），走进客厅，开心地站在原地转了一圈，问道：“如何？”我说：“很好，挺合身，样式也好，颜色也好。”妈妈高高兴兴地走了。宴会完毕回家后还兴致勃勃地述说宴会上的情况：谁谁参加、如何坐的、席间与聂鲁达谈了些什么，等等。

比宴请聂鲁达稍早一点，她去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了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去时心情很愉快，开完会回来心情也很好。她说她在会上见到了周总理，会议中间休息时，还在草坪上同康生聊了一会。这个会，有宣传、文艺等方面人士参加。

20年后， 在太行山下的嶂头村，她详细地向我说了那次紫光阁座谈会的细节翻受了这么多年磨难的她，回顾这段往事时，语气平淡，好似在说一件别人的故事。

她说：“那天会议，我坐在郭沫若后面。周总理走进会议室时，我们都站了起来，周总理先同郭沫若握手，他看到了我，这时，我觉察到总理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意外的神情，但一闪即逝。他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同我握了手。当时，我没有对我的这个细微的感觉加以仔细思量。在反右派斗争，一场批判、斗争我的风暴过去之后，回想起周总理那感到意外，却一闪即逝的目光，我想，也许他那时已知道中宣部决定进一步开展对我的斗争，没想到我还会出现在这个座谈会上吧！会议中间休息时，在草坪上遇见康生，他竟有兴趣天南海北地同我聊了差不多20分钟。我当时就有点纳闷。只觉得此人城府之深，让人难以捉摸。1938年，他在群众中扬言，说我在南京自首。我知道后向毛主席诉说：“康生凭什么这么胡说，他有什么根据？”

1940年，中央组织部为我这段历史作了结论，否定了康生的说法。自那时起，我同康生之间彼此都没有好感。在延安，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还向我说：“你去看看康生同志嘛！”我也没有去，心想：我

同康生又没有工作关系，我去看他干什么！回思紫光阁座谈会，康生一定也知道了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心里自然是得意的，他在草坪上表示出的少有的热情，大概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建国后，他一直在养病，那年刚出来工作。”

至于妈妈的这个感觉是否正确？紫光阁座谈会时，是否已作出了进一步开展对她的斗争的决定？我就不知道了。

从颐和园回到城里后，我给黄敬部长写了一封信，向他问候，告诉他我已回国正在休假，希望利用假期了解国内的造船工业，参观潜艇的制造厂与设计单位。三四天后，一机部办公厅打来电话，要我去商谈参观事项与办理相应的手续。黄敬部长批示我可以参观了解国内正建造的五型军用舰艇，阅看五型舰艇的全部技术资料。

当时，从苏联引进了潜艇、护卫舰、猎潜艇、鱼雷快艇，扫雷艇等共五个型号的技术与设备，分别在上海、武汉、芜湖的造船厂建造。我考虑去三个城市时间不够，也不愿走马观花式的参观，所以就商定只去上海一地；参观一个潜艇建造厂，一个护卫舰建造厂与一个舰艇设计室。黄敬部长给了我这么好的学习条件，我十分高兴。

但是，只有在我学成回国参加造船工作之后，我才更深切的感到他对我的优待。因为，我这时才知道国内的技术保密规定，一般是从事哪个型号舰艇的工作，只接触这个型号舰艇的有关技术资料，也只有很少数的技术领导方能接触全部型号舰艇的技术资料。回想起这点，真是由衷地感谢黄敬部长。

妈妈也为我高兴，她说：“黄敬同志给了你很好的学习条件，你就去上海好好地参观吧！”

妈妈又说：“你到上海后，去看看你父亲的墓。”祭扫父亲的墓，给他及与他一同牺牲的革命先烈们献上一束鲜花，是我多年的愿望。我父亲胡也频与其他23位革命先烈，1931年2月7日夜，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国民党松沪警备司令部后面的草地上。1949年上海解放后，市政府找到了烈士们的遗骸（此时，草地已成为菜地），合葬于大场公墓，立碑名“龙华23烈士墓”（后来，移葬上海烈士陵园时改为“龙华24烈士墓），并书刻烈士们的姓名。当时，上海市政府曾致函妈妈告知此事，并附一龙华的草图，说明烈士们的关押处，就义处，发现遗骸处。1951年，妈妈去上海时，曾去大场公墓看过。兼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同志特地告诉妈

妈，葬在大场公墓是临时性的，待革命烈士陵园建成后，再移葬革命烈士陵园。1957年，仍在大场公墓。

这时的我，觉得呈现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都美好：妈妈的问题，平反有望；我的事业，似乎前面的路也很平坦；尤其是我还获得了真挚的爱情。我怀着这样的心情于7月20日登上了去上海的列车。

这一个月的时光，就在欢乐的气氛中过去了。妈妈心情很好，她对她的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当然，这个乐观也是审慎的。

只有一件事，多少扰动了一点欢乐生活的平静。

7月中旬的一天，　妈妈不知从哪里听到一个传闻，说中宣部专门小组对她南京一段历史所作的结论从中组部退回到中宣部了。我问她这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她简单地向我说了她被囚禁在南京三年的情况。她以前没有同我谈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她曾被捕，囚禁在南京，是在党的营救下逃脱囚禁到了陕北苏区。我是从一些关于她的报道的文章中看到的。我从没有想到过这当中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她到陕北以后的这20年中，党一直信任她，委她以文艺工作方面的重任，她的革命活动为国内外所瞩目，有着极好的声誉与影响。她说："1955年斗争我时，提出要审查我在南京被囚三年的这段历史。中宣部专门小组调查后作出的结论是犯有'政治错误'。对这个结论，我不接受，申明保留意见。"她又说："产生这样一个结论，我觉得张际春，李之琏他们有难处，这是一个妥协的产物。"这件事没有更多地谈下去，因为不知传闻是否准确，也不了解其内情，更无法推测其结果。我觉得妈妈那一两天心绪稍有不安，而我只有从好的方面去想，希望妈妈申明的保留意见能为上级组织所接受。

其实，听到的传闻并不准确。李之琏在《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载《炎黄春秋》1993．5）一文中写道：书记处这次会议后，陆定一、周扬两位领导人怎样商量下一步工作的，我不了解，我只知道，周扬在半年前已同意，经专门小组通过，张际春签发报送中央审批的丁玲的历史结论，这时他又反悔了。他向部长提出，他"不同意这个结论"。部长把我找去说明此意，并要我把这个结论从中央撤回来，由他主持在中宣部部务会上再讨论。

这次部务会议所谓再讨论，只是由部长提出，将丁玲的历史结论改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

的”，但并没有提出新的根据。

就在妈妈抱着审慎的乐观，等待并企望党组织对1955年定她的“反党小集团”

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处理的这一个多月当中，一张罗织她新的罪行的网已经在编织。 这一切， 她当然是不会知道的。在我离北京去上海的前夕，她向我说：“作协党组扩大会，可能不久就要复会。会比较忙的，我不会有多少时间陪你。你就去上海好好参观吧！我的问题，你放心好了，不会有什么的。”

四、“反右派斗争”中的6日

我在上海参观造船工业，收获不小。还去了父亲的墓地，献上了一大篮鲜花。

并同朋友贺毅去杭州作二日游。我于8月4日晚九时回到北京，当火车驶入车站时，我看到站在暗淡灯光下的妈妈。我离开上海之前给她发了一个电报，告诉她我的归期，并没有想到她来接我，所以我很高兴。我们上了小轿车，一路上，我兴致勃勃地向妈妈述说我在上海的情况，让她分享我的喜悦。可是，我感到我的话很少得到她回应，便把话打住了。我觉察到妈妈似乎有很重的心事。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复会后有什么变故？我心里隐隐地出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司机和夏更起坐在前面，我不想多问什么。我转过脸去，茫然地从车窗向外望着。

回到家，我和妈妈，陈明叔叔一起走进客厅。我极度地忐忑不安，心里十分焦急，我想问她，又迟疑着没敢开口，生怕得到的是一个可怕的答案。妈妈坐在我对面，神情略显困顿，凝神的目光显示出她在掂量如何开始同我的谈话。这气氛令人难耐。

终于妈妈先开了口，她语气沉重地说：“祖林！我告诉你，我的问题又有了大的反复。这些天，天天在开斗争我的会。”

尽管我已有一点不祥的预感，但这几句话仍有如晴空霹雷。我惊呆了，想说却说不出话来，思想似乎都凝滞了。

妈妈稍稍停顿， 继续说道：“党组扩大会在7月25日复会，你走后四天就复会了。周扬主持会议并首先讲了话，他说他是以前年会议的主持

者和代表中宣部两种身份参加。这样一个申明，就给人一种暗示，他是代表党的，也是正确的。他的讲话与他在前三次党组扩大会上的讲话根本不同，首先肯定了1955年所作‘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正确的。说我的申诉和我在会上提问为什么没有核实事实就向中央报告？为什么还背着我们向中央报告，是‘翻案’；是向党猖狂的进攻；而且是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内外呼应！周扬一开始就为会议定下了这个调子，于是会议又是一边倒，会议的性质从讨论重新处理我的问题变成了斗争我的会。参加会议的人数也增加了。邵荃麟、刘白羽、林默涵也都作了同周扬一样的发言。”

我既感到震惊，又感到困惑。我心里想，我们党处理问题不是应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吗？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为什么现在又再次肯定并非事实的结论呢？党章规定每个党员都有申诉的权利？为什么却把妈妈的申诉斥为“向党猖狂进攻”？

难道对搞错了的事，不应问问为什么，从而总结经验教训？

我问道：“中宣部专门小组现在的态度是什么？”

妈妈沉默了一小会，说：“张际春已经不参与这件事了，他也没有参加会议。

周扬不是说他代表中宣部吗？李之琏他们也只能按这个调子发言。看来作协党组扩大会休会的这一个半月里，中宣部领导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结果就是如此。”

妈妈说：“会上还揭发批判我串通《文汇报》的右派分子向党组施加压力，与社会上的右派里应外合向党进攻，指的就是浦熙修来访的那件事。这样，就把我的问题直接与社会上的反右派斗争联在一起。”

一股颓丧的思绪顿时涌上我的心头，心想：若是我不回国，妈妈就不会装修房子，大门也不会洞开，而让《文汇报》记者浦熙修、姚芳藻闯了进来，使得妈妈不得不同她们说了几句话。天下事，竟有如此凑巧的！

妈妈又说；“昨天陈企霞在会上交待，承认那封匿名信是他写的，找人抄的。

这个人暗地里搞出这些事来，现在却已过关，正参加揭发我。”

这时，妈妈看了一眼陈明叔叔，说道：“陈企霞在会上还揭发了叔叔（即陈明），说有一天叔叔打电话给他，装成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叫他陈企霞叔叔，约他晚上到一个公共汽车站见面，统一口径。这件事叔叔事先事后都没有向我说，弄得我在会上好被动。”妈妈说这件事时，可能是想象到打电话时的那副情景，说着说着竟忍不住笑出声来。妈妈又说：“事已至此，也就谁也不怨谁了。”

妈妈继续说：“我已经在会上做了检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得检讨。但是被斥为‘态度不老实’，说我只承认‘反党’，‘向党进攻’，但不承认具体事实，不交待具体事实，仍在顽抗，继续向党进攻。还说我的态度是‘欺党太甚’，‘欺人太甚’。我是处在被斗争的地位，事实上现在是棍棒齐下，责骂、讽刺、挖苦，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会上把对我的不满发泄无余。”

她还说了一些这两天会上的情况，我听着这一切，精神上感受到很大的压力，直压得透不过气来。

妈妈最后说：“前几天我给小灵子写了一封信，寄到莫斯科去了。我在信里没有明说我现在的处境，但暗示了我今后的命运，让她思想上有所准备。我也委婉地表示了我对她的希望。她是一个纯洁的女孩子，以我对她的了解，我想，她不大会因为我的问题而改变同你的关系。”

我感动地喊了一声“妈妈”。这十天来，连日开斗争她的会，揭发、批判、责骂如暴雨般倾泻，她还得交待“反党”的事实，还得检讨。在这样的处境下，她还想着和关心我和灵源之间的事。

妈妈转而向我：“现在谈谈你吧！你是共产党员，应该相信党，同党站在一起。

应该认识到妈妈是在反党。”她用极大的力量，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字斟句酌地向我说出了这几句话。我明白，她是怕我犯错误，说出与党不一致的话来。

她又说：“你也可以相信我，你这次回来以后，我向你说的一切，都是真话。”

她克制着自己，但悲愤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我点点头：“我知道。”

她郑重地向我说："我看你还是提前回苏联，回学校去吧！现在这样情况，呆在家里已经没有任何意思。"

我不想提前走，我不想在这个时候离开妈妈，我不放心她。我说："学校9月1号开学，我还是再陪你半个月，住到20号再走。"

已是夜半，谈话结束时，妈妈说："明天休会一天，我在家里准备发言材料，后天还要在会上继续检查交待。"我看着她那略显憔悴的面容和疲惫的神情，心想，妈妈今天还在会上接受了一整天的批判斗争，晚上却还去车站接我，我真后悔在上海发那个电报了。

这又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夜气如磐，令人窒息。我几乎彻夜未眠，思绪有如波涛，起伏翻腾不已。在我回国后的这一个多月里，我的心情是乐观的，我做梦也想不到事情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何以会是这样？我想不通。我为妈妈抱屈，为妈妈难过，我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我属于政治上早熟的这一类人，也就是较早地建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在未满十七岁时入了党。这是从小在革命队伍中成长，接受党的教育的结果，也是家庭影响的结果。我也较早地接触到政治运动，在延安参加整风审干运动，我的同学中有七十多人先后被"抢救"成了"特务"。后来，一风吹，全部平反了。由此，我体验到了政治运动中也有搞错人，冤屈人的事实，初步认识到，凡事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且也应该独立思考。

如今，风云突变，噩运再次降临到妈妈头上，也降临到我们这个家庭。我将如何承受？我将如何对待呢？

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我应保持与党一致的态度。但是，以我对妈妈的了解，我认为她不仅不反党，而且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何况，我也多少知道一点文艺界历史上形成的一些人际关系。现在，在急风暴雨般席卷全国的这场反右派斗争中，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众口一声，说妈妈"反党"，妈妈自认从未反党，心里不愿，但嘴上不得不承认"反党"，因为不能"顽抗到底"。想着这一切，心里真是郁闷，郁闷，郁闷。

我从上海回到家的第二天，8月5日下午，作协党总支通知我去谈话。在组织上，我不愿他们管，但他们通知我去谈话，我不能不去。离家时，妈妈嘱咐我："你要有思想准备，满楼都是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我点了点头。

我步入王府大街64号（现在的商务印书馆）全国文联作协大楼，就见赫赫十几张大字报贴满了门厅周围的墙壁，在“丁玲”前面冠以菜碗般大的“反党分子”头衔，右边走廓上也贴满了这样的大字报，楼梯两侧的墙壁也无例外地贴满了大字报。

我顿时感受到这场斗争的气氛，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识大字报这种形式，我真正地为妈妈的处境担忧了。

在总支书记办公室里，总支书记黎辛招呼我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同他的办公桌拼拢的另一张桌前坐着一位三十几岁的女同志，面前放着一叠纸和一支笔，看来是打算做记录。可能黎辛想缓和一下气氛，他向我作了这样的自我介绍：“我叫黎辛，在延安《解放日报》社时，曾经在你母亲领导下工作，我们那时见过，也许你还有印象。”我说：“记得。”从1941年至今，十六个年头过去了，他的模样似乎变化不大。他随即言归正题：“现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正在开展对你母亲的斗争，作协党总支认为有必要同你谈谈。”他首先概要地说了1955年作协党组所定“丁陈反党小集团”的主要事实，肯定这个结论是正确的，然后说了妈妈在这之后“翻案”和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事。最后，他向我说了两点：“一、希望你相信党，相信党对你母亲开展的斗争是正确的，站在党的立场一边；二、现在党还在挽救她，通过斗争来挽救她，希望你同党一起来挽救她。”我向他表示：“我相信党，愿意站在党的立场上来认识她的问题。”我只能作出这样的表示，没有别的选择。

这时， 黎辛问道：“6月下旬，你母亲和艾青等人在北京饭店聚餐，那时，有谁说了‘我们这是裴多菲俱乐部’？你是参加了这次聚餐的。”

我知道裴多菲是匈牙利一位爱国诗人。但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俱乐部成了一个参与煽动反革命暴乱的反革命组织。我当时想，这时有谁胆敢组织这样一个俱乐部并自称是其成员呢！

这件事是这样的：

在我们住进颐和园之前，有一天，艾青给妈妈打来电话，说知道我从苏联回来了，想请我吃餐饭。为什么他要请我吃饭？我想主要是他同妈妈是延安时代的老熟人；另外，他曾经照顾过我，我在他那里住过一小段日子，也许这也是一个原因。

那是1945年的事。那年11月底，妈妈从延安到达张家口以西的丰镇，知道晋察冀和晋绥两个根据地的部队正联合进行归绥（即呼和浩特）战役，她拟去战地采访，于是由陈明叔叔把我和祖慧先送到张家口。祖慧住萧三处，我跟艾青一起。艾青率领华北文艺工作团从延安到达张家口后，正在筹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院址就设在东山坡一个原日本兵的营房，是一排排的日本式平房，房间里铺着“塌塌米”。

艾青的家属还没有来，他同江丰合住一套，共两间。我跟他们在一起住了十多天，房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他们硬把床让给我睡，他们却睡在壁橱里的“塌塌米”上。

他们是长辈，我心里很感过意不去。这事，我一直记着。

那天上午，我们先到艾青家里，是一个小巧的四合院，离崇文门不远。谈话之中，艾青说再把江丰和朱丹、李纳夫妇请上，他给他们打了电话。随后，就去了北京饭店，要了一个单间。江丰、朱丹很快就来了，但李纳没有到，我就去饭店大门口等她，等了20多分钟她才到。我们走进单间后就开始上菜了。一起聚餐的有艾青、高瑛、　江丰、陈明、朱丹、李纳、妈妈和我，一共8人。餐后，就各自回家了。以后的一些天，妈妈同艾青、江丰也没有私人间的来往。万万料不到达餐平常的会餐竟成为妈妈“反党活动”的重大罪行。

我向黎辛说了那天在北京饭店吃饭的前后情节，并且说明我有20多分钟不在场。

我如实地表明：我在时没有听到有谁说过“我们是裴多菲俱乐部”这句话。

他和女同志听后没有再追问下去。

黎辛没有再说话，我以为谈话大概到此为止了。

这时，女同志发话了，她说：“你刚才表示愿意同党站在一起，那么你对你母亲的反党言论与行为有什么要揭发的？”

我说：“我去苏联学习四年，出国前在东北，也只是学校放假时回北京住些日子，所以我对她工作方面的情况不了解。”

她说：“你这次回国以后，她同你说过什么？”

我说：“刚回来的时候，她告诉我1955年对她进行了斗争，定为以她为首的‘反党小集团’，她认为事实不符，向中宣部机关党委写了材料，中宣部成立了专门小组，作了调查核实，也认为大多与实际不符。作协党组扩大会开了三次，会上的发言都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所以，现在就等上级组织作出决定。

我听后，相信党组织会正确处理她的问题。我昨天晚上从上海回到北京，她告诉我，说她犯了更大的错误，是‘翻案’，‘向党进攻’。今天上午她在自己房里写材料，我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才见到她，也没有谈什么。”

她又问：“日常生活中，你母亲总会有些言论，现在看来是属于反党性质的，你能告诉我们一些吗？”

我说：“我昨天夜里方才知道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正在开会斗争她。这事对我很突然，我还没有来得及思考你所说的那方面的问题。”

她说：“那你回去想想吧：想出来了告诉我们。”

我回到家，妈妈问我：“谁同你谈话？”

我说：“黎辛，还有一位女同志，坐在黎辛对面，她没有自我介绍，黎辛也没有介绍。”我说了女同志的模样，穿着。妈妈说：“那是胡海珠，总支副书记。”

我向妈妈说了方才谈话的情况。

这时，妈妈又提出了前一天夜晚说过的事，她说：“我看你还是提前回苏联学校去吧：你呆在这里，只会一步步地被牵进作协机关的这场运动中去。你留在这里也帮不了我什么。你可以相信我、放心我，我不会寻短见的。”她的语气中透出些许急切。

我改变了留在北京陪伴妈妈一些时日的打算，决定提前返回苏联。

我从苏联回国时，通过苏联的国际旅行社买了往返双程火车票。原订8月21日离京。8月6日上午，我去前门附近的国际旅行社更改火车票日期。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一星期两班，次日，7号的票仍有。我迟疑了一下，觉得第二天就走，太急促了，想再陪妈妈住几天。于是，决定下一班车走，就把车票的日期改订为8月11日。

这天下午，妈妈去作协参加党组扩大会。走时，神情坦然、镇定。我无言地跟着她走到院子当中，目送她走出大门。我从昨天看到的贴满大楼的那些大字报，大体上已能想象出批判斗争会上的气氛和情景。想到这些，我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直到吃晚饭时，妈妈才回来。她进门后，只说了——句：“头疼，我休息一下。”

就回房躺到了床上。

妈妈告诉我：“刘白羽要见你，他要你明天上午10点到他的办公室去。”

这时的作家协会，邵荃麟是党组书记，刘白羽是党组副书记。我在延安时，就认识刘白羽，1942年，他同妈妈都在“文抗”。我1947年从晋察冀边区到哈尔滨后也曾去看望过他。

7日上午，　我准时走进了刘白羽的办公室。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办公桌旁放了一张大沙发，两张小沙发。刘白羽略显热情地同我握了手，并介绍他身旁一位面孔微黑的中年人：“这是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崔毅同志。”他招呼我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自己搬了一把靠背椅，坐在办公桌旁，崔毅也坐在一张椅子上，刘白羽说：“听说你从上海回来了，找你来谈谈。关于你母亲1955年定为‘反党小集团’的问题以及现在‘翻案”向党进攻’的情况，黎辛同志已向你谈过了，我就不多说了。我今天主要同你谈你母亲在南京的一段历史问题。你母亲不仅有反党的错误，而且历史上还有自首变节行为。”

刘白羽说的大意是：　你母亲1933年5月，因冯达叛变而被捕。被捕后，最初几个月对敌人是作过斗争的，但后来屈服了。她向敌人写了一个书面的东西，她交待是一个条子，内容是：“因误会被捕，在南京未受虐待，出去后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不在于是条子还是自首书，问题在内容，仅从这个内容来看就是自首变节行为。条子就是自首书。其次是被捕后仍和冯达住在一起，而她明知冯达已叛变。再就是，她被捕后与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大叛徒顾顺章来往，丧失了共产党员气节。她没有被投入监狱，生活上受到这些特务头子的优待。主要就是这几个问题，他还说了一些说明这几个问题的细节。

刘白羽最后说：“考虑到你可能不知道这些情况，所以找你来谈谈，

希望你同党有一致的看法。至于你嘛，你父亲是胡也频烈士，对于你的父亲，我们都是很敬仰的。”

他谈了大约一个多钟头，我注意地听着，心中骇然。只是在谈话结束时向他表示：“这些情况，我以前不知道，事情来得突然，我将按照你的希望认真地去思考。”

崔毅在刘白羽谈完之后简单地说了两句：“希望你同党有一致的认识。我对你母亲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起初，我也没有识破她。”此时，崔毅的处境比较尴尬。一年后，他因支持丁玲“翻案”，被定为反党分子。

我步履艰难地向家里走去，心情十分沉重，深深感到妈妈的问题又加重了。自首变节，这是革命气节问题，是政治生命攸关的问题。

我走进家门，步入客厅，沉重地坐落在沙发上。这三日，噩梦般的事情接踵而来，我的思想接连不断地处于惊疑交集的状况，精神上感受到的压力也一次又一次加重 队上睡眠不足，我感到极度的疲惫，正想暂且什么也不去想，稍歇一会儿，不料邮差送来报纸。

我随手翻开《人民日报》，第一版上醒目的大字标题：“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三天以来的感受，不能说我对此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妈妈也向我说过：“我的问题迟早会见报，你要有精神准备。”但是，当它来到我面前时，我仍是感到震惊，心不停地在颤栗。我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以极大的力量抑制住内心的惶惑，仔细地读完了标题下的全部文字，心头上笼罩着一片幻灭感。我走回卧室，躺到床上。

更起招呼我去吃午饭。我走进饭厅，坐在餐桌旁，望了妈妈一眼，心里袭来一阵悲凉。我不忍心再看她，就低着头吃饭，从碗里扒了一口饭，却咽不下去，抑制了几天的眼泪终于溢满眼眶。我不愿妈妈看见我流泪，就站起身走回到客厅。这是我回到北京后第一次流出眼泪。

我刚在客厅中坐定，妈妈就跟了进来。她有些慌乱，一边用手揩拭着流淌着的眼泪，一边开口想说什么，但泣不成声。

妈妈稍稍平息了激动的情绪，说：“你不要为我难过，我的问题见报是预料中的事，只是迟一点，早一点的事情。”

我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妈妈问道："刘白羽上午同你谈了些什么？"

我说："谈你在南京三年的事，结论就如报纸上登的：自首变节。只是具体情况。你过去告诉我的简单，他谈的详细。"

她说："是的。那时我以为我的问题将会得到平反。所以就说得简单一些。"

我向她说了刘白羽谈的——些内容。

妈妈说："我要向你说明的是，所有这些情况，我以前都向组织谈过。在延安时我是这样说的，中宣部专门小组审查这段历史时，也是这样说的。专门小组做了调查，调查的结果同我向组织讲的也是一致的。专门小组的结论否定了'自首'，但留有'政治错误'。我对这个结论提出保留意见。现在他们没有拿出新的根据，反而加重说我'自首变节'，并且在报纸上公布，这我又有什么办法。但是，就刘白羽所说的这几点，事实上是，我被捕之初，知道家里的地址是冯达供出来的之后，就一直痛骂冯达，我多次提出要和冯达分开，并且提出让他们把我关到监狱里去，但这些掌握我命运的国民党特务就是置之不理，硬要把我和冯达关在一起，利用他来软化我，以此来达到他们的政治日的。后来我觉得既然摆脱不了冯达，那么我也可以利用他，借助他麻痹敌人，使敌人对我的监视松懈，寻求机会逃离南京。写那张条子是徐恩曾通过冯达之口告诉我，说他们逮捕我引起了一些麻烦，社会舆论抗议，外国人也不满，因是在租界抓的我，侵犯了外国人的治外法权，说如果我写一个书面的东西，表示是因误会被捕，愿归隐养母，就可放我回湖南。我想，如果真让我回湖南，我总会找到党组织，继续革命的。于是我写了一个条子，也就是在一张信纸大小的白纸上写了："因误会被捕，未经审讯，出去后愿居家养母。"但他们食言，我骂他们不讲信用，他们也不理睬，囚禁依旧。在党组扩大会上有的人说，这条子就是自首书。就这个内容来说，我既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没有任何损害党的言论，没有自首的言词，这只是为了应付敌人企图脱身。我被捕后，没有出卖党的组织，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泄露党的秘密。这些，周扬，刘白羽他们也是承认的。而且，敌人企图利用我的名望为他们做事，写文章，我都拒绝了。至于与特务头子徐恩曾、顾顺章等人的关系，我是被囚禁的人，他们来找我，我怎么能拒绝得了不见他们。"

在她概括地说完了以上情况之后，她说："我们是母子，你可以相信你的母亲，相信你母亲这个老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你也可以自己思考、判断。"

妈妈还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向我讲了地在囚禁中，曾自尽明志，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以死证明对党的忠贞的情节。我听来心里非常地难受，眼泪一阵阵夺眶而出。

她说："我本不想告诉你这些伤心事，现在也只有说了。"

下午，作协党组扩大会继续开，妈妈走了。我一人在家，静下心来，开始梳理自己的思想。

我从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时起就接触这方面的事了。什么中统，军统，三青团，汪伪敌特等组织的形成及现状；什么叛徒，自首变节分子的政策界限，光笔记就记了一本。我确认，共产党员被捕后，出卖了组织，出卖了同志，泄露了党的秘密，属于叛变，定为叛徒；没有上述行为，写了自首书或登报发表了声明，启事，其内容为宣布脱离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宣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或有其它损害，污蔑党的言词属自首变节，定为自首变节分子。妈妈所写的，并没有这样的内容，怎么说是自首变节呢？

妈妈从作协开会回来后，又同我谈了回苏联去的问题。她说："你还是改乘飞机去莫斯科。三四天后，在莫斯科就会看到今天的《人民日报》。我很不放心祖慧，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要是说出什么同党不一致的话来如何是好，这至少会影响她预备党员转正的。"

我已入党10年。　祖慧这时还是一个预备党员，她1956年8月，去苏联留学前夕入党，预备期一年。

妈妈又说："另外，也许你还能赶上见小灵子一面。"

我说："若改乘飞机，要花好大一笔钱啊！我乘火车走，是无须妈妈花钱的，我在列宁格勒已买了双程往返的车票。"

妈妈说："现在这情况，不要考虑钱的问题。"

我说："好吧！"

次日， 8号上午，妈妈叫夏更起去储蓄所取钱，然后去买机票。夏更起买到了11号的机票，花去800元人民币。我退了火车票，退回300元人民币，这钱我留在了家里。

乘火车与乘飞机都是11号离京，只是飞机两日可达，火车需行8天。

9号下午， 妈妈仍去作协开会。 她走后约半小时， 夏更起接电话后告诉我："作协党总支要你现在去谈话。"我即去文联作协大楼。

同我谈话的只有胡海珠一人。

她问："上次谈话，你说你将思考你母亲的反党言行，现在你想得怎么样了？

你有什么要揭发的？"

我回答："我尽力地想过了，但是还没有想出有属于反党性质的言论。当然，我还可以继续去想。"

她又问："这几天你母亲在家里的情况怎样？说了些什么？"

我说："这几天，她天天去开会，回到家里就在自己房间里写'交待'，'检查'材料，除了吃三餐饭时以外，几乎没有多少时间见面、谈话。"

她脸上露出了不满意的神色，"你说你愿意站在党的立场上，这是须要有实际行动的。" 我没有吭声。

沉默了片刻。她说："听说你要回苏联，希望你回到苏联后，继续考虑你母亲有哪些反党言行。揭发材料可以直接寄给我们，也可以通过大使馆转给我们。"

谈了大约十分钟，结束了。

我从上海回来， 一共在北京呆了6天，除第一天外，其余的几天，妈妈都去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去的时候，神态安然；回来的时候，精神疲惫，总要先去床上躺一会。我担心她的身体，怕她支撑不住，禁不住说几句要她注意身体的话，却自己都感到这些话苍白无力。

以我对妈妈的了解，通过我自己的思考，我不认为她"反党"，"自

首”。我是一个认真的人，一个坦直的人，对党、对组织，从来都是心口一致。可是，现在我却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思想。如果我如实地说，那么，等着我的又将会是什么？这正是妈妈所不希望并为之担心的。不只如此，我还得表明，我相信党，拥护党对她开展的斗争。我不这么表示，难道我还能有别的选择？而这样的表示，也正是妈妈希望并一再告诫我的。一切都这样的扭曲着。我心里感到非常苦恼，何以自己会处于如此境况？我真不知道该怨谁，难道该责备的是我自己？

五、离 别

10号晚上，我收拾自己简单的行装，妈妈坐在我的床上，看着我把一件件衣物放进箱子。她不时插几句话，说把这个放在这里，那个放在那儿，如同我小时候离家出门时一样。我不愿拂妈妈的心，一件、一件都照她的话放好。我觉得这气氛有些凄怆。

妈妈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她说：“麟儿，我很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受苦。”

我心中涌起一阵悲凉：“妈妈！你不要这么说，你爱我们，我们也爱你，现在的事也怨不得你。我这次回来以后，你同我谈了许多，我相信你，相信你所说的一切。我心里全都明白。”

妈妈说：“你要听党的话，党现在认为妈妈反党，你也应该这样认识。”

我点点头说：“我知道。”

妈妈又说：“你放心我，妈妈是一个老党员，妈妈是坚强的。你也应该坚强。”

我答道：“妈妈！你也放心我。”

最后，妈妈说：“我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了。你自己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吧：今后好好的工作。”妈妈说完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我这一夜又几近彻夜末眠。我没有想到竟会是在这样的境况与心情中同妈妈离别。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身了，妈妈卧室的灯也亮了。不一会，司机老

王来了。我同他一起吃早餐，我吃了几口面，咽不下去，就搁下了碗。我回自己房里，系好领带，穿上了西装上衣。这是一套蓝色的西装，是我出国时，妈妈带我一起去王府井大街的西服店，亲自选了料子，做好送我的。今天，我有意地穿上了它。

还在我去吃早餐的时候，妈妈就一直无言地坐在客厅里的一只单人沙发上。我希望自己在这离别的时刻表现得坚强一些，比较不动感情地同妈妈告别。我极力克制着心里的悲伤，走到妈妈跟前向她说："妈妈！我走了，你自己多多珍重啊！"

妈妈想站起，双手撑着沙发的扶手，却没能站起来。她瘫软在沙发里哭泣起来。

我一只腿跪了下去，头伏在妈妈的怀里，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眼泪倾注而下，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是我6天中第二次流泪。妈妈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和耸动的肩膀，她的手不停地颤抖着。过了好一会，我抬起头来，见妈妈脸上流淌着一行行的眼泪，我打算站起来，妈妈伸开了双臂，我趁势把她扶了起来。妈妈刚一站定，就扑向我，紧紧地拥抱着我，好像一松开就会永远失去似的。妈妈泣不成声地，断断续续地喊着："儿子！我的儿子！"她全身都在颤抖。我好不容易才止住的眼泪，又夺眶而出。

妈妈终于松开了紧紧地拥抱着我的双臂。我说声："妈妈！我走了。我爱你，为了我，为了我们，你一定要珍重自己啊！"我狠下心来走了出去。在临出大门前，我回过头来最后地望妈妈一眼，见她无力地倚靠在北屋客厅的门框上，悲哀地目送着我的离去。

我生离，犹如死别。

我坐进了轿车后座，在汽车开动的那一刹那，我回顾了一眼多福巷十六号小院。

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一瞥。1957年春天，我从苏联回到北京时，多福巷的这个家已不复存在。妈妈去了北大荒，小院也已被拆除，盖华侨饭店。

汽车向西郊机场驶去，我的思想仍凝滞在刚才的那番生离死别之中。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车里呈现着死一般的寂静。

在机场大楼前，我向司机老王告别，他没说话，只是叹了口气。夏更起送我进了机场大楼。西郊机场在颐和园后面，候机楼很小。候机楼前有一个平台面对跑道，送行的人可以走到平台上。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望见夏更起还站在平台栏杆的后面。

我心目中的丁玲

王 蒙

这是一个危险的题目，因为丁玲是国内外如此声名赫赫如此重要的一位当代作家，因为她的一生是如此政治化，她面对过和至今（死后）仍须面对的问题是如此尖锐，因为她与文坛的那么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纠缠在一起。还因为，在某些人看来，王与丁是两股道上的车，反正怎么样写也不得好，弄不好又会踩响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地雷。再说，王与丁，分属于两代人，她开始文学生涯的时候鄙人尚未出世。 我对她的了解极其有限，承蒙她老的好意，1985年6月签名赠送给我她的六卷本精装《丁玲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版），我只是最近才为写这篇文章而捧起阅读的。这样，我写起来确实难免挂一漏万，郢书燕说，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强作解人……总之什么不是都会落到自己头上。

这个难题的挑战性恰恰吸引了我。纪念胡乔木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我说，这篇文章没有办法写，但是《读书》的编辑说：“你行。”于是我就来了劲，冒起傻气来了。再说，在我的少年时代，我曾经那样地崇拜过丁玲。我读了一些谈到丁的文字，我又觉得与丁的实际是有着距离。你不写，谁写？

一位论者说，那些1957年出过事的青年作家，在70年代末复出文坛以后，投靠了在文坛掌权的领导，而忘记了与自己同命运而与领导是对立面的老阿姨（丁玲）。

可是我至今记得在1979年丁玲刚刚从外地回到北京，我与邵燕祥、从维熙、邓友梅、刘真等人，在丁玲的老秘书，后来的《中国作家》副主编张凤珠同志引见下去看望丁玲的情景。我们是流着热泪去看丁玲的，我们只觉得与丁玲之间有说不完的话。

但是事隔不太久传来丁玲在南方的一个讲话，她说：“北京这些中青年作家不得了啊，我还不服气呢，我还要和他们比一比呢。”

北京的中青年作家当时表现了旺盛的创作势头，叫做红火得很。当然作品是参差不齐的。大家听到丁阿姨的话后，一个个挤眼缩脖，说：“您老不服，可是我们服呀，您老发表作品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还不知道在谁的大腿肚子里转筋呀。我们再狂也不敢与您老人家比高低呀：”

后来几年，我又亲耳听到丁玲的几次谈当时文学创作情况的发言。一次她说：“都说现在的青年作家起点高，我怎么看不出来？我看还没有我们那个时候起点高啊。”

另一次则是在党的工作部门召开的会上，丁玲说，“现在的问题是党风很坏，文风很坏，学风很坏……”

而在拿出她的《牛棚小品》时候，她不屑地对编辑说：“给你们，时鲜货……”

在一些正式的文章与谈话里，丁玲也着重强调与解放思想相对应的另一面，如要批评社会的缺点，但要给人以希望；要反对特权，但不要反对老干部；要增强党性， 去掉邪气； 以及对青年作家不要捧杀等等。（见《丁玲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六卷233、365页）其实这也是惯常之论，只是与另一些前辈的侧重点不同，在当时具体语境下颇似逆耳之音。

于是传出来丁玲不支持伤痛文学的说法。在思想解放进程中，成为突破江青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与文化专制主义的闯将的中青年作家，似是得不到丁玲的支持，乃至觉得丁玲当时站到了“左”的方面。而另外的周扬等文艺界前辈、领导人，则似是对这批作家作品采取了热情得多友好得多的姿态。

这一类“分歧”本身包含的理论干货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与此后的若干文艺界的某一类分歧一样，大致上是各执一词，各强调一面。这也如我在一篇微型小说里描写过的，一个人强调吃饭，另一个人强调喝水；于是斗得不可开交。但是分歧背后有更复杂的或重要的内容，分歧又与政治上的某种大背景相关联，即与左右之类的问题以及人事的恩怨问题相关联，加上文学工作者的丰富感情与想象力，再加上吃摩擦饭的人的执着加温……分歧便成了死结陷阱，你想摆脱也摆脱不开了。

一位比我大七八岁的名作家，一次私下对我说：“丁玲缺少一位高参。她与周扬的矛盾，大家本来是同情丁的。但是她犯了战略错误。50年代，那时候是愈左愈吃得开，周扬批评她右，她岂有不倒霉之理？现在80年代了、是谁‘左’谁不得人心，丁玲应该批评她的对立面‘左’，揭露周扬才是文艺界的‘左’的根源，责备他思想解放得不够，处处限制大家，这样天下归心，而周扬就臭了。偏偏她老人家现在批起周扬的‘右’来，这样一来，×扬是愈批愈香，而她老人家愈证明自己不右而是很左，就愈

不得人心了。咱们最好给她讲一讲。”

（王蒙原文中“周扬”均以××代替——扫校者识）令人哭笑不得。当然，一直没有谁去就任这个丁氏高参的角色。

而从丁玲的角度呢，她和她的战友好友们悲愤地表示：从前批她右，是为了害她，现在看出来批右是批不倒她了，又批上她的左了，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你左你就是左，说你右你就是右呀！

丁玲的所谓“左”的事迹一个又一个地传来。在她的晚年，她不喜欢别人讲她的名著《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而反复自我宣传，她的描写劳动改造所在地北大荒的模范人物的特写《杜晚香》，才是她的最好作品。

丁玲到美国大讲她的北大荒经验是如何美好快乐，以致一些并无偏见的听众觉得矫情。

丁玲屡屡批评那些暴露文革批判极左的作品，说过谁的作品反党是小学水平，谁的是中学，谁的是大学云云。类似的传言不少，难以一一查对。

那么丁玲是真的“左”了吗？

我认为不是。我至今难忘的是《人民文学》的一次编委会。那时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国作协是委托《人民文学》杂志社操作的，在讨论具体作品以前，编委会先务一务虚。一位老大姐作家根据当时的形势特别强调要严格要求作品的思想性。

话没等她说完，丁玲就接了过去，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什么思想性，当然是首先考虑艺术性，小说是艺术品，当然先要看艺术性！”

我吓了一跳。因为那儿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管着，谁敢把艺术性的强调排在对思想性的较真前头？

王蒙不敢，丁玲敢。丁玲把这个意思最终还是正式发表出来了。（见《文集》六卷447页）

丁玲有一次给青年作家学员讲话，也是出语惊人。如她说：“什么思想解放？

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

她又说：“谁说我们没有创造性，每一次政治运动，整起人来，从来没有重样过！”

如此这般，不再列举。以免有副作用。我坚信，丁玲骨子里绝对不是极左。

那么怎么理解丁玲的某些说法和作法呢？

第一，丁与其他文艺界的领导不同，她有强烈的创作意识、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或者说得再露骨一些，她是一种名星意识、竞争意识。因此，对于活跃于文坛的中、青年作家，她与其说是把他们看作需要扶植需要提携需要关怀直至青出于蓝完全可能超过自己的新生代，不如说是潜意识里看作竞争的对手，大面上则宁愿看作需要自己传帮带、需要老作家为之指路纠偏的不知天高地厚、不成熟而又被她的对手吹捧起来的头重脚轻、嘴尖皮厚的一群。她是经过严酷的战争考验和思想改造的锻炼的，在党的领导人面前，她深知自己活到老改造到老谦虚到老的重要性必要性；但在中、青年作家面前，她又深深地傲视那些没受过这些考验锻炼的后生小子。她自信比这些后生小子高明十倍苦难十倍深刻十倍伟大十倍至少是五倍。她最最不能正视的残酷事实是，出尽风头也受尽屈辱，茹苦含辛、销声匿迹20余年后，复出于文坛，而她已不处于舞台中心，已不处于聚光灯的交叉照射之下。她与一些艺术大星大角儿一样，很在乎谁挂头牌。过去她让领导添堵也是由于这个，她从苏联开会回来就散布，在苏联爱伦堡几次请她讲话，并说：“你是大作家，你应该讲话。”但她不是代表团长。代表团团长是与她不睦的周扬。她引用爱伦堡的话说：那个周扬团长“长着一副作报告的脸”等等。请想想，这样的话传出去，她能不招领导讨厌吗？

（她说的并非完全不是事实，但中国国情与苏联不同，我们这里认的是谁是什么什么长，而不是谁是大作家。愈是大作家大什么家愈要把你摆平，这也是一种自由平等博憎，也许是乐感文化。）那么，她看到那时的所谓中青年作家左一篇作品右一篇作品得奖，以及各种风头正健的表演——其中自然有假冒伪劣——她能不上火么？恨乌及屋，她无法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学潮流抱亲和的态度。当然，她也想立一些人，如写《灵与肉》的张贤亮，她为之不止一次地谈话和著文，但她已无法成事，她的支持中青年的动作的影响已经无法与周扬相比。还不如

少支持一点打起另一面旗子。她的可爱其实也在这里。在这上头，她恰恰表示的是她是普通一兵，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遛遛。咱们比的不是年龄，不是资历，不是级别而是实打实的写作。她喜欢的位置在赛场上，而不是主席台上。她争的是金牌，而不是满足于给金牌得主发奖或进行勉励作总结发言　尔到年轻人火的不行而并无真正的得以压得住她的货色，她就是不服，她就是要评头品足，指手划脚，乃至居高临下，杀杀你的威风。这样的伟大作家前辈并不止她一个，而且，说老实话，如果不及时反省调整，王某人也会变成或已开始变成这样的角色。

其次是由于她的特殊政治经验特别是文坛内斗的经验。由于她长时期以来一直处境严峻，她回到北京较晚，等到她回来的时候伤痕文学已经如火如荼地火起来了。

她那时虽然获得了平反，却也一度仍留着尾巴。而她认定应该对她的命运负责的周扬正在为新时期的文学事业鸣锣开道，思想解放的大旗已经落到了人家手里，人家已经成了气候，并受到许多中、青年作家和整个知识界的拥戴；却也受到某些领导人与老同志的非议。她怎么办？她自然无法紧跟周扬，她要与之抗衡就必须高擎相应的类似“反右”的旗帜。她在党内生活多年，深知自己的命运与领导对自己的看法紧密相关，这决定于是你还是你的对手更能得到党的依赖。要获得这种信赖，就必须顶住一切压力阻力人情面子坚持反右，这是政治上取胜的不二法门——那位老作家的高参论其实没有丁玲高。她必须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地爱护自己的政治可靠性、忠诚性、政治信用性，亦即她的一个老革命老共产党员的政治声誉。她明确地下定义说：　“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见《文集》六卷230页）这来自她的血泪经验，也来自她的政治信念价值系统，当然有她的道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鸿鹄之道？在鸿鹄们看来，根本用不着那些书呆子燕雀雏儿讨论这种问题。

她的对手过去一再论证的就是她并非真革命真光荣真共产主义者，这有莎菲女士为证，有她的某些“历史问题”为证，有她的犯自由主义的言谈话语为证。这是对她的最惨重的打击。有了这一条她就全完了，再写一百部得斯大林奖的小说也不灵了。而她的生死存亡的决定因素是她必须证明她才是真革命的：这有杜晚香为证，有她的复出后的一系列维护党的权威歌颂党的领导以及领导人的言论为证。“一生真伪有谁知？”这才是她的最大的情意结。当差不多是她取得了最后胜利的时候，当她的对手周扬被证明是犯了鼓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错误，从而使党的信赖易手的时候，她该是多么快乐呀。

这样我就特别能理解她在文革后初复出时为什么对于沈从文对她的描写那样反感。沈老对她的描写只能证明她的对手对她的定性是真实的——她不是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她必须痛击这种客观上为她的对手提供炮弹、客观上已经使她倒了半辈子霉的对于她的理解认识勾勒。打的是沈从文，盯着的是一直从政治上贬低她的周扬。你说她惹不起锅惹笊篱也行，灭不了锅就先灭笊篱，灭了笊篱就离灭锅更靠近了一步。这是政治斗争也是军事斗争的常识性法则，理所当然。她无法直接写文章批周扬，对周扬，她并不处于优势，她只能依靠党。与周×斗，那靠的不是文章而是另一套党内斗争的策略和功夫包括等待机会，当然更靠她的思想改造的努力与恪忠恪诚极忠极诚的表现。对于沈从文，她则处于优势，她战则必胜，她毫不手软，毫不客气。她没有把沈放在眼里；打在沈身上就是打在害得她几十年谪入冷宫的罪魁祸首身上。

我还要论述，这里不仅有利害的考虑而且有真诚的信仰。革命许诺的东西太多太多了，要求的东西也太多太多了。一个人接受了革命，就等于换了另一个人——如毛泽东赠丁玲词所言：昨日文小姐（请注意，是小姐，这个称谓并不革命），今日武将军。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今后种种比如今日生。他或她时刻准备着为革命洒尽最后一滴血， 为革命甘当老黄牛，忍辱负重，万死不辞。她在1942年6月即延安文艺座谈会刚刚开完时，触目惊心地论证道："改造，首先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新的阶级……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拔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不要要求别人看重你了解你……"（《文集》六卷21页）没有对于革命或用丁的话即对于新的阶级的真情实感，是写不出这样的刺刀见红的句子的。这样激烈的言辞透露了她在文艺座谈会上受到的震动，也透露了某种心虚。把这样的作家打成右派，真是昏了心！无怪乎直到丁死后，其家属一直悲愤地与治丧人员谈判，要求将鲜红的镰刀斧头党旗覆盖在她的遗体上。而治丧负责人以按上级明文规定她的级别不够为由，并没有满足这一愿望。呜乎，痛哉！

而与此同时，一朝革命，便视天下生灵为等待拯救渴望指引嗷嗷待哺的黑暗中摸索的瞎子。（这种心态表现的最充分的就是话剧《杜鹃山》。此话剧是教育雷刚们的，表达的却是柯湘们的自信。）一朝革命更视那些不大革命的人为糊涂，为落后，为盲瞽，为混账，为历史大波上浮沉的泡沫，最好也不过是一看二帮我说你服的对象。至于反对革命的人，那就只能是敌人了。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同时一旦革命

也就视自己的革命者的身份为高于一切的宝贵。为了这个最宝贵的身份和名誉，人们不能害怕斗争，不能作好好先生，小不忍则乱大谋，人们可以或必须“缴纳”一切的一切。当下的小字辈可以不理解这些，却无法否认这种信念这种追求的真实性与历史必然性。

革命的崇高伟大与艰难牺牲决定了它的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决绝。丁玲自然不能讲情面。她认为她有权利也有义务反击不知革命为何物的沈从文对于她的歪曲——至少是对于她的未革命时的某一侧面的不合时宜的强调。为了革命的正义性，她可以毫不犹豫地不念与沈的旧谊。北京一解放，沈去看望丁，丁对他并不热情，联系一下当时的语境，我们就无法以不革命的庸人的观点去评说这件事。当时一个是老革命，是胜利者接管者掌权者，一个是老不革命，最好也不过是刚刚得到解放、刚刚开了革命之窍、肯定对革命还有许多糊涂思想的老知识分子，说不定还有若干需要审查的历史疑点，丁怎么可能以老朋友的态度对待沈呢？以革命家的身份衡量丁玲，丁玲未必是那么不近人情，而是更高的阶级情政治情原则情。丁玲为革命确实付出了不少东西，那么再把老友沈从文搁置一下，让分管沈的部门去处理，有何不可？沈和丁的恩怨沧桑更多的是历史造成的，我们当然不能责备沈老，同样也无法以一般人情事故的观点去责备丁玲。如果没有一点狂热和自豪，又哪儿来的知识分子的革命化？而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化，正是中国革命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因素，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或者优点。当然，如果丁玲还活着，那么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过去以后，在尘埃落定以后，也许我们愿意与她老人家共同假设一下，如果当初，她老人家不那么严厉，如果她当初也能尊重与自己的政治选择人生选择不同的知识分子，如果她能够多一点人情味，多一点平常心，多一点对劳苦众生的善意，有何不好，岂不更好？换句话说，一个革命者在取胜以后，在普天之下莫非革命之土以后，盛气凌人地炫耀自己的革命与傲视别人的不革命，究竟是有利于执政巩固革命成果还是相反呢？这也值得确实革过命的杰出人士们三思。

年轻得多的人无法理解丁玲的那种政治激情，有时把投身革命与什么仕途进退搅在一起，这会让革过命的人气得发疯。反过来说，如果认为一个人既然参加了崇高伟大的革命就超凡脱俗，从不考虑“仕途”（当然是别的词儿，如叫做进步或者信任或者关怀、考验）大概又太天真烂漫了。

那么，丁玲是一个政治家了？可惜不大是。丁玲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厚的人，她炽热，敏感，好强，争胜，自信，情绪化，个性很强，针

尖麦芒，意气用事，有时候相当刻薄。在1931年写作的未完稿的《莎菲女士日记第二部》中，她的莎菲女士写道：“不过我这人终究不行，旧的感情残留得太多了，你看我多么可笑，昨天竟跑了一下午， 很想找到一点牡丹花……”（《文集》三卷312页）这是她的一个夫子自道。到了半个世纪后她的《牛棚小品》里，丁玲描写她与陈明同志的爱情，竟是那样饱满激越细腻温婉，真如少女一般，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真正的艺术的青春。一个确实政治化了的人绝对写不出那样的小品——却也让极政治化的人觉得肉麻。有一次是中篇小说评奖大会后的合影留念，她来了，坐下了，忽然看到了身旁座位的名签：××，就是她最不喜欢的那个领导，她噢了一声像被蝎子蜇了一下，立即站起身来。她的表现毫无政治风度。再比如她动不动打击一大片，只求泄愤，不顾后果，结果搞得腹背受敌；政治家绝不会这样做。如她说什么作协创作研究室编辑的对于二十四个中、青年作家的评论集是“二十四孝”，用这样恶毒的话来树敌，暴露了自己的心胸不够宽广，窃为丁玲不取。然而，这才是丁玲，她的个性，她的光辉，她的感情气质，常常也表现在这里。

她的过分自信也表现在她晚年办文学杂志的事情里。在新侨饭店举行的创刊招待会上。她是如何喜气洋洋通体舒泰呀。她是以发表革命老作家的作品的理由来创办新刑物的，但是她主办的《中国》，实际上以发表遇罗锦、刘晓波、北岛的作品而引人注目。历史可真会戏弄人。她的创办刊物并未收到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效果，而是举步维艰。她的那些跟随者也并不总是买她的账，她不得不亲自出马，提着礼物去协调与自己的编委们的关系。她费了太多的精力去办刊，可以说是操碎了心。这影响了她晚年的写作，也影响了她的身体健康。她说过：“我现在是满腹经纶，要写，但是时间不多了。”她又说：“过去了的事情是空，是无。”她说得好惨。

她一辈子搅在各种是非里。她也用这种眼光看别人。她预言过中国作协将会发生“垂帘听政与反垂帘听政”的矛盾。她的预言并没有实现。画虎不成反类犬，本来是非政治家，太政治了反而没了政治只剩下了勾心斗角。以至她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她的晚辈，她的同行，本来这些人可以成为她的忘年朋友。我本人几次去看望过丁玲，但是无法交心，不无防范戒备应对进退，着实可叹。

她本来可以写很多很多杰出的作品。她是那一辈人里最有艺术才华的作家之一。

特别是她写的女性，真是让人牵肠挂肚，翻瓶倒罐。丁玲笔下的女

性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娼妓、天使、英雄、圣哲、独行侠、弱者、淑女的特点集于一身，卑贱与高贵集于一身。她写得太强烈，太厉害，好话坏话都那么到位。少年时代我读丁《我在霞村的时候》，贞贞的形象让我看傻了，原来一个女性可以是那么屈辱、苦难、英勇、善良、无助、热烈、尊严而且光明。12岁的王蒙似乎从此才懂得了对女性的膜拜和怜悯。向往、亲近和恐惧，还有一种男人对女人的责任。这也就是爱情的萌发吧。少年的王蒙从丁玲那里发现了女性并从而发现了自己。从梦珂到莎菲到贞贞到陆萍（《在医院中》）到黑妮（《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她特别善于写被伤害的被误解的倔强多情多思而且孤独的女性。这莫非是她的不幸的遭遇的一个征兆？

小说这个玩艺儿是太怕人了，戴厚英的《脑裂》不也是一样的可怕吗？也许丁玲的命运在1927年发表《梦珂》的时候已经注定了？是历史决定性格还是性格决定历史呢？是命运塑造小说还是小说塑造命运呢？《我在霞村的时候》里作者写道：“我喜欢那种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又有明朗的性格的人……”丁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或者本想做一个这样的人。然而她的环境和她自己的性情却不可能使她处处如愿，使她的实际状况特别是旁人的观感与她自己的设想有了距离。

一个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领导曾对我说丁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为什么一个人的自我估量与某些旁人的看法相距如此之遥？

这是说明做人之难吗？这说明相通之不易吗？这真是最大的遗憾了噢！“人大约总是这样，哪怕到了更坏的地方，还不是只得这样，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难道死了不成？”“苦么？现在也说不清，有些是当时难受，于今想来也没有什么……许多人都奇怪地望着我……都把我当一个外路人……”她在《我在霞村的时候》里写下的这些话（《文集》三卷232、233页），莫非后来都应验了吗？

然而，把丁玲当外路人是不公平的，她的一生被伤害过也伤害过别人，例如她的一篇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就差不多“消灭”了萧也牧；但主要是被伤害过。

她理应得到更多的同情，需知现时连周作人也得到了宽容的目光：一个人因追求革命而幼稚而做出过一些蠢事，总不能比不革命反革命的蠢事更受谴责。何况如今丁玲和她的友敌们大多已成为历史人物，历史已经删节掉了多少花絮——而丁玲的作品仍然活着。她的起点就是高。

她笔下的女性的内心世界常常深于同时代其他作家写过的那些角色。她自己则比迄今为止“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中表现过的（包括她自己笔下的）任何女性典型都更丰满也更复杂更痛苦而又令人思量和欷嘘。同时她老了以后又敏锐地却又不无矫情地反感于别人称她为女作家。她认为有的女作家是靠女性标签来卖钱。但是她同时确实是一个擅长写女性的因写女性而赢得了声誉的女作家——谁能否认这个事实？怎么能认为所有的读者都是用一种轻薄的态度而不是郑重的态度来对待她的女性身份与女性文学特质？她这个人物，我要说她这个女性典型，这个并未成功地政治化了的，但确是在政治火焰中烧了自己也烧了别人的艺术家典型还没有被文学表现出来。文学对她的回报还远远不够。而她的经验很值得我和同辈作家借鉴和警惕反思。她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简单。我早已说过写过，在全国掀起张爱玲热的时候，我深深地为了人们没有纪念和谈论丁玲而悲伤而不平。我愿意愚蠢地和冒昧地以一个后辈作家和曾经是丁玲忠实读者的身份，怀着对天人相隔的一个大作家的难以释然的怀念和敬意，为丁玲长歌当哭。

不该发生的事——丁玲问题经过

李之琏

一

“一颗明亮的，曾经子夜高悬，几度隐现云端，多灾多难，与祖国的命运相伴随， 而终于不失其光辉的星，殒落了。”（引自1986年3月19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关于丁玲》）。

1984年党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为丁玲作了全面的平反。丁玲同志逝世后，在对她生平的介绍和一些同志写的文章中，对她的生平作了公允的评价。孙犁同志在文章中用以上这几句话作了概括。

我因过去工作关系，有同志希望我写点什么，使人们更了解这段历史并表悼念。

我同丁玲在全国解放之前只有一面之识。那是我1940年从晋察冀前线回到延安后，在八路军军政学院学习之余，想写些文艺作品反映战地的军民生活。最早写了一首诗，题名《打扫战场》，投到《解放日报》，不久被刊登。后来文艺版主编丁玲召集一些投稿人开座谈会，对这一诗稿表示欣赏并有所鼓励。这当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这以前，我对她30年代在爱人胡也频被捕牺牲后仍能坚持斗争，主编“左联”

刊物《北斗》，也留有好感。后来虽然也听到对她被捕后的一些传闻和议论，但由于她1936年从南京投奔陕北和抗战初期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到前线参加抗战，遗留在头脑中的由传闻而来的疑虑也就消失了。在延安整风期间对她历史审查的情况，也只是传闻，都不是直接接触，实际情况并不了解。1954年底，我调中央宣传部工作后，由于管干部并兼任机关党委书记，参与过对丁玲等问题的审查。因此，我只能就我所接触的事实，提供一些情况供研究，这也许有助于文艺界弄清是非，加强团结。

二

1955年中央直属机关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肃反运动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确定要“整顿党的文艺队伍”，以“克服在领导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为此开展了对丁玲等的

批判。从追查一封向中央反映检查《文艺报》问题的匿名信开始，认为是陈企霞所写，牵连到陈与丁玲的关系。

约七十人参加，共举行了十六次党组扩大会，最后向中央写出“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

我没有时间去参加会议。听说一些情况，虽感到很不正常，但也难以表示意见。

直到1955年9月30日作协党组的上述报告提交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时，　才了解到批判的全部内容。报告指出，他们“反党”活动有四个方面：“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我看后，觉得这个报告罗列的反党词句很多，但确切事实很少。报告中还说，丁玲所犯“反党的错误和她历史上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经过是有一定关系的”等等。

但因我没有参加批判会，也不太了解文艺战线上一些领导人物彼此间的复杂错综的微妙关系以及这次批判的动机和背景。所以我无法提出有力的证据反对这个报告的论据。我在讨论发言时，只表示，对报告列举的丁、陈反党的事实根据应进一步核实，以免向中央反映不准确的情况。

我的意见没有引起主持部务会的主要领导同志的重视。会后作协党组的这一报告正式呈报中央。1955年12月，中央批发了作协党组的报告。报告中还指出要审查丁玲被捕这段历史。对她反党的错误要看她对错误认识的态度再作处理。

三

1956年春夏，中宣部为审查丁玲被捕的这段历史，成立了专门的审查小组。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同志为组长，周扬和我都是小组成员；并吸收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张海同志和作协机关的几个同志作为工作人员做具体的调查研究工作。从各方调查的材料证明，丁玲是在自己的丈夫胡也频被反动当局逮捕牺牲后，根据工作和生活的需要，于1932年同冯达同居。冯当时是共产党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于1933年5月被捕，

招认了自己的住址，因而丁玲也被捕。他们被捕后，冯达表现不坚定。

国民党政府为争取丁玲为其服务，特意安排她和冯达继续同居，想通过冯达影响丁玲。丁玲对冯达的态度虽很不满，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摆脱同他的接触，如果不同冯达保持某种关系也难于应付国民党对她的折磨。……这就形成了他们之间极其复杂而严峻的微妙关系。在百般折磨的情况下，她没有丧失革命气节，对国民党当局提出的各种要求一直采取拒绝的态度，对所用的软硬兼施的各种手法，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并尽一切可能设法同党取得了联系，最后在党的帮助下由冯雪峰同志派人从南京把她接到上海，经西安到党中央所在的陕北革命根据地（这段历史组织上曾作过审查，档案中存有1940年陈云、李富春同志签字的审查结论）。

当时张际春、我和张海等同志曾一同听取过丁玲陈述她被捕后怎样应付国民党当局对她的折磨和三年多陷于无可奈何，既抱有希望，又难料后果，处在悲愤痛苦的日子的时候，她禁不住时断时续地泪流不止。

我们听着她的陈述，思索着当时国民党对革命者的迫害和所实行的“自首政策”，对她这一段经历都感到可以相信并同情。谈话结束，丁玲走后，张际春同志对我们几个人说，“看来确实不容易呀！一个女人，那时还不到30岁……”，表现了无限的感慨。

本来审查丁玲历史的专案小组应该一起听取丁玲本人的申述。但周恩来同志当时曾特别指示，他认为丁玲和周扬之间有很深的成见，如果周扬参加同丁玲的谈话，可能引起感情上的对立，效果不好。因此我们每次同丁玲谈话时，都不通知周扬参加。但每次谈话的情况都向他一一通报。

审查小组在同丁玲谈话前后，作了大量的调查，也查阅了当时国民党遗留下的档案。无论从档案中或是当时能找到的证人的证词中，都没有发现丁玲被捕后有叛变或自首、变节对党不利的行为。而且证人的证言都反映她在那种被监视和折磨中表现不错。

这次对丁玲历史审查结论的第一稿，是我主持起草的。我在文字上作了最后修改。对丁玲被捕后的表现方面，有这样几句话：丁玲同志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作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终于在党的帮助下回到党的怀抱。这个结论草稿经过张际春同志同意后，提交小组讨论。这段文字是对丁玲被捕后政治态度的总的评价，因此小组成员对此都十

分认真。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这段文字上。有的认为，这种写法太过分，丁玲被捕后继续同冯达同居并生了孩子就是叛变，怎能说她同敌人斗争？

等等。持这一见解的同志还对起草人有所指责。审查结论前后修改了七稿。以后的修改是由张海执笔的，讨论时字斟句酌，争执不休，哪怕是对一个字的取舍。最后一稿达成妥协，改为：丁玲被捕后有变节性行为。

关于起草丁玲历史审查的结论，张际春同志当时很慎重，不管怎么修改，只要周扬不同意，就不作决定。最后一致了，他才签发报送中央审批。但丁玲自己看到结论后，对排除了自首的说法表示同意，对“变节性行为”的说法表示不能接受，并写了书面意见，同结论一起报送中央。

四

对丁玲的历史审查结束后，对她“反党”的错误要进行组织处理。这也是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一项工作。中宣部又成立了专门小组，仍以张际春同志为组长，周扬和我仍是小组成员，又吸收中宣部和作协其他有关同志参加。小组在讨论如何进行工作时，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作协党组向中央“报告”中提出的丁玲等的错误，讨论一下如何处分就可以结束了。我和张海、崔毅等同志则认为，对“报告”所列的错误事实需要逐条进行查对核实，以免将来再有反复。 张际春同志同意要逐条核实， 那样处理才更稳妥。小组最后决定，对1955年9月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所列的丁、　陈反党的事实逐条进行查对，根据落实情况再研究如何处理。于是展开了广泛的调查，具体组织工作由我和张海同志主持。

1956年秋，丁玲才得知作协党组给中央报告的内容。她知道作协党组对她的问题要进行组织处理后，便向机关党委写了全面的书面申诉。对在批判过程中出现的她认为不正常的活动，以及揭发的“反党”事实如何同实际情况不符，她一一作了申辩，并提出了证人。申诉中对作协党组的领导人也有所批评。按照组织原则和正常情况，这一申诉可以拿到专门小组讨论并据此安排工作，以示组织上对党员负责，对申诉人意见的尊重。但当时我考虑到，在小组开始工作时，小组成员意见已有很大分歧，如将这一包括批评当事人的申诉信，拿到当事人中去讨论，会引起不满、冲动，甚至反感，不利于弄清事实。小组既然决定逐条查对事实，有了作协党组的报告，又有了丁玲自己的申辩材料，再有其他有关

人员的书面证词，一定会将一切误解澄清 洞向际春同志报告并取得他同意后，丁玲的申诉，没有提交小组讨论。

这是采取了周恩来同志指示精神的作法，让当事人回避一下，有利于工作的进行。

在小组进行调查核实时，陈企霞已从作协机关“隔离审查”中释放出来。他要求和中宣部机关党委谈话，申诉他受的委屈。我和有关同志听了他的申诉。谈话后他又写成书面材料印发各有关同志。

根据调查的结果证明，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四条错误，都是不能成立或不存在的。比如说，原报告认为，丁玲在作家中提倡“一本书主义”，鼓励作家写出一本书，以此为资本，和党闹独立。调查结果是，丁玲在一次向文学讲习所的学员讲话时谈到，作为一个作家首先应有作品，如果一本书也写不出来，那算什么作家呢？等等。她的意思是要求青年作家努力写作，写出好作品，不要徒有虚名，不作无作品的作家。关于《文艺报》主编问题，原来主编是丁玲，陈企霞是副主编。

后来丁玲提议陈企霞也提升为主编，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周表示同意后，刊物上才并列出丁玲、陈企霞两个主编。这顶多只能说是任命主编手续不完备，不能说是向党闹独立。因为在宣布前已经请示了领导。

关于挑拨领导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指周扬同胡乔木同志之间的关系。这方面在报告中并没有提出具体事实，只是一些人认为是这样。为此向胡乔木同志调查，他表示他没有这种感觉，也举不出这种事实来。

所谓不尊重或反对党的领导，是指丁玲和周扬的关系，确实周、丁之间，在工作上和思想作风上有些不一致。对周扬的一些意见和作法，丁玲有些不同看法，有时在同志间有所表示。如果不顾场合议论别人的是非无助于使问题得到解决，但对个人有些意见，绝不能说是“反党”，这也很明显。

从调查的结果看来，报告中列举的所谓“反党小集团”的错误，有的不成为错误，有的不是事实。既没有反党的事实，“反党小集团”的结论自然不能成立。无论从调查和被调查的同志都有这种共同的认识， 但是，1955年9月作协党组的报告中央已经批发，1955年底又向全国作了传达，在1956年要据实纠正它就不那么简单了，这不是调查小组所能解决的，需要经过上级组织讨论后才能决定。

但经过这番调查，许多同志在思想认识上也发生了变化。原来不了解事实真相的，现在了解了；原来有盲目性的，现在清醒了。同时许多同志更看到，丁玲在被批判后，未及时处理；她既没有工作，也不能参加任何活动，何时能够解脱和以什么方式解脱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一时看不到前景。于是在作协机关有许多作家、工作人员就逐渐由怀疑到认识，把同情转到了丁玲身上。这不是哪个个人的偏见，而是情况的反复促使人们清醒并形成了新的认识。

五

1957年5月，　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每个机关、单位人们对建国几年来的各种工作，根据整风的精神都有所思考。对哪个人、哪件事，作的结果如何，符合不符合实际，同党的要求是否一致，人和人的关系是否正常等等，都在人们的思想中进行新的分析和重新衡量。整风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希望领导带头作表率。自然大家都会想到，在本机关最突出和影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在中国作家协会，就不能不把对“丁、陈反党小集切”的批判和处理提到整风的首要议程。这也不是由哪个个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

人们经过学习整风的指示，联系这几年作家协会的工作，对1955年对丁玲等的批判进行了进一步的思索：感到丁玲从延安整风后，在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期间，她能深入农村，同广大农民一起参加土改，同农民交朋友，写出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并以此书获得了1951年度斯大林奖金；她还被派出国参加国际活动；如果她是反党的，这些成就又应怎样解释？在全国解放后的几年中，丁玲身兼文艺方面的几个重要职务，如果她是反党的，那么对她的这种使用又该怎样理解？同时人们还想到，对一个作家的评价应以其在作品中所反映的思想内容，歌颂什么，反对什么为主要根据；而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者作评价则应以他执行的方针、路线作为主要依据。丁玲是提出作家“到群众中去范户”的倡导者，这同党的要求是一致的，如果说她“反党”，这又如何解释？这一系列的问题同1955年的批判相对照，就使人们的怀疑和不解更增加了。……

1957年6月，　作协党组大多数同志意识到，根据整风精神和作协机关群众的要求，如果不首先处理好“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问题，机关的整风便不好开展。于是，在6月6日再次召开党组扩大会，讨论“丁、陈问题”的处理。周扬和党组几个领导人首先讲话，都主动表示1955年对丁玲

的批判是不应该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并向丁玲等表示歉意。

几位领导人发言以后，出席会议的同志发言踊跃，一致认为，1955年的错误批判和结论应该撤销，应该消除这一批判所造成的后果，肃清影响并进一步总结教训，避免今后重犯。有些同志情绪激动，不免说了些很刺耳的话。丁玲本人也提出质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陈企霞从被“隔离”释放后即认为这是“政治迫害”，这时自然讲话就更尖锐。领导者们对所提出的问题无法解答，但又不愿接受大家的批评。会议因此出现僵局，宣布暂时休会。

在开会期间，张际春同志和我曾一起去参加过一次会，听了听大家对丁玲问题的处理意见。会上的发言都是倾向丁玲的，认为1955年对她的批判和结论很不得当，要求领导会议的同志认真检查，得出教训。我们当时没有表态。

本来，从会议开始，作协几位领导人的讲话和与会者的发言，总的方面可以说是一致的，有纠正过去错误的趋势。由于有些同志的发言，言辞尖锐，丁玲本人又提出了“为什么？”这就使会议主持者对所提出的问题难以解答了。本来，丁玲对自己问题的处理有意见，在党内提出申诉和要求找出形成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是一个党员的权利，这是党章上有明文规定的。不应以此作为批判和纪律处分的根据。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休会期间，整风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原来是发动群众向党提意见，帮助党纠正错误的整风运动，突然变成了党向对党提出尖锐批评意见的人进行反击的“反右运动”。本来，从整个社会来说，有人想趁党整风之机，借提意见为名，企图否定党的领导，这确实有的；对这种情况给以反驳，完全应该。

但从党内来说，也有人想借此机会，对曾经有过不同意见的人，置于敌对地位，予以打击，这就同党的政策相违背了。这样做显然是错的。

而作协党组在重新研究、讨论丁玲反党问题的党组扩大会如何继续时，正是由于对领导批评的意见很多，会开不下去，寻找出路而不得的时候。“反右”斗争的开展就提供了一个机会，于是借以进一步批判丁玲等向党的新“进攻”似乎就有了根据。

六

先是由周扬向中宣部主要领导人提出，对中宣部由张际春签发上报中央的审查丁玲的历史结论，他不同意。主要领导人指示我同中央组织部联系，将原结论报告从中央退回来。随后，在中央宣传部部务会议上，由主要领导人提出，对丁玲的历史结论要重新进行修改。在没有发现任何新事实、新证据、新证人和新理由的情况下，宣布将原结论改为：丁玲被捕后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有计划派回来的。

主要领导人宣布后，没有人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赞成。根据已有的惯例，既是领导人正式在会上宣布了，自然就成为部务会的决定。这个决定宣布后，张际春同周扬之间发生了争吵，他问周扬：原来结论是你同意后才签发报中央的，你现在又不同意有什么根据？你这是什么意思？原来你不同意就不会向中央报告了，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能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吗？……他俩一面争吵，大家一面散去。实际上，这种讨论是没有别人发言的讨论，这种结论是没有根据否定原来结论的结论。本来，这样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它既没有提出改变的根据，也不能同本人见面，更无法向党员群众宣布。

但由于结论的修改，就把丁玲历史问题的性质，从人民内部问题变成敌我问题。

这样就可以使一切对丁玲有同情的人置于被批判的地位。

接着，作协党组扩大会在休会多天后，于7月25日复会。主要是批判丁玲等“向党进攻”，指责“反党小集团”要翻案等等。会议主持者的调门同6月上旬会议开始时的认错、向丁玲表示道歉的态度完全相反，恢复并大大发展了1955年批判时的作法。在会上积极鼓动揭发丁玲等的“反党”活动；在会外则从多方搜罗材料，拼凑罪行，作为“反击”的根据。从天津动员一位女作家交代她同“反党小集团”

的另一成员有不正当的关系，并且听他讲过一些对个别文艺方面领导人不满的言论。

这些材料当时如获至宝，并以此为“重炮”，作为反击小集团的突破口。这位同志被迫承认了一些事，也揭发了丁玲一些类似的对那位领导人的议论。这些都被认为是复会后的重大收获。

为了维持1955年的那个错误结论，为了阻止人们对作协党组领导的

批评，为了压制人们对丁、陈案件的不平，还必须揭发新的材料，造成更大的声势。作协党组决定，扩大会议规模，由原来参加会议的限于作协党组成员，作协各部门的负责人及一些知名作家共几十人，现在要扩大到作协以外各文艺部门、文艺团体以及中宣部的工作人员和非党知名作家，共几百人。中宣部的主要领导人指定要我在会上表态，表明中宣部机关党委完全支持对丁玲等的这种作法。

七

我作为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对部领导的这种要求，不能采取抵制态度，只能密切配合，保持一致。如果我不表态或者表态不支持这种作法，那就会被指责破坏“反右”斗争。因此，我没有别的选择。但我作为一个党员，对于这种作法从思想上是不以为然的，如果向我个别征求意见，我会说明我的不同看法。但当时并没有给人这样的机会，这个矛盾已无法解决，为此我很不安。

7月25日， 作协党组扩大会复会是在文联礼堂召开的。先安排陈企霞作“坦白交代”并揭发丁玲。会议进行中有一些人愤怒指责，一些人高呼“打倒反党分子丁玲”的口号。气氛紧张，声势凶猛。在此情况下，把丁玲推到台前作交代。丁玲站在讲台前，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和口号，无以答对。她低着头，欲哭无泪，要讲难言，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会场上一阵混乱。有些人仍斥责丁玲，有些人高声叫喊，有些人在窃窃议论，有些人沉默不语。会议主持人看到这种僵持局面，让丁玲退下。宣布由我发言。

我在发言中，一般号召机关党委所属党员凡知情者要积极揭发……划清界限，斗争到底。

会场的气氛很严肃。但在我的内心里则认为这种讲法，只是对丁玲等施加压力，无助于解决是非。这在我是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个讲话就成为我一次最大的违心之言。长期以来在我的心灵上是一种莫大的遗憾。

这次会议结束后，中宣部有同志竟认为我的讲话很“得体”。我对这种说法则感到不安和惭愧。我的讲话应该认为是一个错误。因为在调查丁玲等“反党”事实的过程中，实际上否定了1955年作协党组批判的结论。我这次讲话表示了党的“一致”，就表明对作协党组作法的支持。由于我的这种错误的迁就态度，就使主持批丁的人更无所顾忌了。从此以

后，作协党组继续对丁玲等的批判和最后处理就不再征求机关党委的意见，　而是由党组直接向中宣部主要领导人请示。直到1957年9月16日周扬在大会上作总结发言时，在题名《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讲话中，除肯定丁玲等是“资产阶级右派反党集团”外，还宣布丁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一个一贯对党不忠的人”；还说，她“早在1933年在南京向国民党自首”

“背叛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篇讲话还点名批判了十多名知名的作家、艺术家、诗人和戏剧家，把他们都说成是修正主义的文艺工作者。

这次的结论比1955年的结论，政治上更加重了，在所谓反党集团的人数上更增多了。　1955年定的“反党小集团”　只有丁玲、陈企霞两人。这次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反党集团”成员扩大了几倍，包括冯雪峰、艾青等在国内外有影响、对中国革命文学有重大贡献的人。这是一个震动世界的事件。这以后，又对丁玲等的作品继续组织了“再批判”，打倒了一批有成就的作家，否定了一批有好评的作品。

八

但是，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结。

1958年5月，　我在外地了解群众宣传工作情况时，被通知回北京参加“八大”

二次会议。回京后才知道，周扬已有安排，要在会前“谈谈”中宣部机关党委在处理丁玲等问题上的错误。他说：“只有几个人参加，谈一两次就行了。”并说这是因为有的同志对此事有意见。对这种安排，我原已想到，不过没有料到竟这样急不可待。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说不清楚。为了便于了解，无妨回顾一下这几年发生的事：1955年在机关肃反运动中，作协党组要求对陈企霞、李又然实行“隔离审查”，说他们有托派嫌疑。中宣部机关党委认为根据不足，没有同意。当时党组负责人直接找到中央肃反五人小组才获得批准（中宣部机关肃反五人小组组长是张际春兼任，我是副组长，机关党委是五人小组的办事机构）。在作协党组批判了丁玲、陈企霞后，党组向中央的报告说“我们决定根据会议的提议开除他们两人的党籍”。中宣部机关党委没有立即配合作出开除他们党籍的决定。陈企霞、李又然经过隔离审查，撤销嫌疑，释放出来后，立即向党委提出申诉，反驳了批判他们的“根据”。机关党委将这些

申诉材料印发给有关同志，暴露了党组一些不正常的作法。在审查丁玲历史和“反党”错误时，机关党委和作协党组之间又有上述那些不一致；从1956年到1957年，机关党委参加的对丁玲问题调查的结果，实际上对1955年作协党组对丁玲等的批判是一个否定。在这整个过程中，给人一种印象，机关党委和作协党组形成了对立面。如果机关党委不是全错的，就表现不出作协党组的一贯正确。而且要使在批丁斗争中已经取得的“胜利”得到巩固，又必须清理留在人们头脑中的一切怀疑。如：在整风开始前，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调查和否定了这个小集团的存在到底是怎么回事？整风开始，周扬等在党组扩大会上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又是怎么回事？到底算不算数？……都必须向群众有所说明，作合理的交代。否则，打倒丁玲的新胜利虽然“战果辉煌”，但它是建立在沙滩上，是不巩固的。如果不把中宣部机关党委参与对丁玲问题的调查所得到的事实和相应的结论推翻，那便给某些人留下了无穷的后患……这样看来，在公开场合“谈谈”机关党委在丁玲问题上的错误，便十分必要了。

由常务副部长周扬直接主持这样的会（原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已调国务院二办工作），也可看出领导上的决心和重视。会议开始让我先作检查。我不能按照主持人的意愿检查错误。因此，我的检查一次、二次、三次都不能通过。机关党委副书记张海、崔毅也是如此，他们都不认为在参与处理丁玲等问题过程中，机关党委有什么真正的错误。这样，满足不了主持人的要求，他原说“谈一两次就行了”的说法就不算数了，就改变了方针，要“彻底揭露，追究到底。”

中宣部领导人号召所有党员对机关党委、特别是对我进行揭发，翻遍了机关党委的会议记录，搜查了我个人保存的文件，只要一字一句同此案有关的材料，就决不放过，一律作为问题揭发。丁玲寄给党委的申诉材料，就是从文件柜里搜查出来的。会议规模越来越扩大，从开始的几个人到几十人、几百人，最后扩大到千多人。

大会批，小会斗，折腾了4个多月才结束。

由于在审查丁玲历史问题时，在结论草稿第一稿上我加写了：丁玲被捕后，同敌人作了种种斗争，终于回到党的怀抱等话，被说成是“美化叛徒”；又由于在审查丁玲“反党”问题时，丁玲写给党委的申诉没有提交审查小组讨论，而她提出的申辩又和调查的结果相一致， 就被认定这是我同丁玲“合谋翻案” 。根据这两大“罪状”就定我们几人为“反党集团”，我是“首要分子”。其实，这两件事都是根据实际情况，为着使审查小组

的工作能正常地顺利进行，经我提出和张际春同志同意的。张海和崔毅同志有的知道，有的并不知道。黎辛同志本来早已调去湖北工作。他是机关党委的副书记兼作协机关党总支书记，主要工作在作协，机关党委的全面工作管得很少。在批判我们时，将他调回来揭发问题，因他无可揭发，就叫他检查，给他戴了多顶“大帽子”，并被认定我们四人是一伙，互相包庇，充当右派和反党分子的保护人。最后结果是我和黎辛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张海和崔毅定为“反党分子”，留党察看。

这一斗争结束后，对丁玲等的结论和处理好像就显得很牢靠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实事求是地说过丁玲好话的人，都一一受到检查处理，或定为右派，或定为反党分子，或作为犯严重错误，很少听到有谁幸免于难。

在“十年浩劫” 中， 所有不幸者们又重受折磨，丁玲被送进秦城监狱，直到1975年才被释放，遣送山西农村。其他受株连的人在“文革”中也都无例外的重新抖露了一番……

九

但是，历史总是按照客观规律发展的，绝大多数人的愿望不能违背。正像阴云和太阳相比，不管阴云密布，还是暴雨成灾，总是一时的现象；最后总是太阳把一切阴云驱散。随着“文革”的结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实事求是，用实践检验真理，拨乱反正，许多混乱思想被澄清，许多被颠倒了的是非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1978年12月，我们四人“反党集团”一案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联合复查后，经中央批准彻底平反，我们四个受害者的一切处分都撤销，政治上恢复了名誉。

除张海同志已逝世外，生活上都恢复了待遇，工作上作了重新调整。

1980年1月， 丁玲案被定为“右派”的结论，经中央批准，作了改正，恢复了党籍（随后各地为此受株连者也或前或后逐个得到平反或改正）。

丁玲1933年被捕后囚禁在南京的政治表现， 于1984年8月由中央组织部报中央批准，再次被肯定并通报全党。中央组织部“关于为丁玲恢复

名誉的通知”中，指出：1955年、1957年定丁玲为“丁、陈反党小集团”，“右派分子”都属于错划错定，不能成立。把丁玲打成“叛徒”属不实之词，应予平反。并指出，丁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

其实，早在1940年，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对丁玲被捕问题就作了审查，由陈云同志和李富春同志签字的审查结论就已肯定“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从1940年第一次“忠实的共产党员”的结论，到1984年最后一次“忠实的共产党员”的结论，相隔44年，其中约三十年丁玲是戴着“反党”、“右派”

或“叛徒”的帽子度过的。这三十年，她在桑乾河畔，在北大荒，在汾水之滨，她结识了不少新中国的农民，并同他们结为朋友。她体验了群众生活，丰富了自己创作的源泉……

从1940年到1984年，更确切地说，从1933年到1984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年月中，丁玲同志的革命活动经历了肯定、否定，又肯定、再否定，再次肯定、第三次否定；最后才又得到党的总肯定。这是多么生动、又多么令人难于理解、值得深思的故事啊！

丁玲同志是个作家，但又是个共产党员。她虽然长期处在被打击、被折磨、被贬斥的逆境中，但从没有动摇自己的信仰和追求。这是由于她始终坚持以共产党员作为自己的第一生命，以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终身志愿，而不是以单纯的作家，以个人名声来显示自己的存在。所以直到晚年，她一直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维护党的利益，在文艺战线上坚持党的方针，而不计较个人得失与恩怨。她的作品获得人民的好评，也受到海内外国际人士的赞誉。

对丁玲同志一生的曲折遭遇，发生在她身上的那些令人难以理解的事件，到底应该怎样去认识？哪些是社会的必然？哪些是人为的制造？在各个有关方面，包括有关组织和个人，从几十年的反复过程中，又应该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有的人，对丁玲的历史，既不承认组织上已有的结论，也不相信现实的调查，却一味按照自己想当然的怀疑来给人定罪并急于公之于众，这是为什么呢？我在这里说不清楚。只有让历史学家们去研究了。

事情已经过去。追究责任易于引起新的混乱，不利于团结，是不可

取的。但为着避免重走错路，从思想上清理清理不正之源，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则很有益处。

最后，我引用贺敬之同志一段话：“丁玲同志是我从现实生活中所能见识到的一位真正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作家，是一位以她的党性的光辉使我感到确实是为我们这些党员文艺工作者树立了榜样的人。不论是她在和阶级敌人作斗争，或者和民族敌人作斗争所经历的严峻考验都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在革命阵营内部和党内长期的不幸遭遇中所经历的令人惊叹的反复考验更说明了这一点。”（引自《光明日报》1986年7月3日，贺敬之《致丁玲作品讨论会的信》）

这一论断，我认为比较客观和切合实际。我引用在这里，本文也就此结束。

1986年9月

（原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节录）

戴 煌

李之琏与温济泽，都是1957年“反右运动”结束近一年之后，于1958年秋天被“反右补课”补为“右派”的。

在这之前，李之琏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党的“八大”代表，同时为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之一；温济泽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

李之琏与周扬的主要分野，就是如何看待“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

1955年夏季，全国大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肃反”

运动。当年8月3日到9月4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举行了约70人参加的党组扩大会，对丁玲陈企霞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斗争。会议结束后，由中宣部副部长兼作协党组书记周扬主持，写成了《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 。9月30日，由部长陆定一主持的中宣部部务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并上报党中央。

当时，李之琏也参加了这个部务会议。他作为中宣部秘书长，又是分管作协党组织生活的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早就听到了作协一些党员对批判斗争丁、陈问题的一些反映。同时他个人也考虑到：“肃反”与思想批判是不同性质的范畴，作协党组为什么不去搞“肃反”，而把重点放在对丁、陈的批判上？一年前，周扬还赞誉丁玲是以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观点描写农民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在毛泽东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新的巨大成就中的优秀作品” ， 转眼间却又由他主持批判丁玲的“反党活动”，这是怎么回事？

由于这些做法确实令人费解，李之琏在参加这次部务会议时，对作协党组的那份报告看得特别入神，从而发现这报告矛盾百出：首先，这报告的题目和内容就分道扬镳：题目是《反党小集团活动》，内容却是抽象的思想作风、工作态度之类的表现，还说了丁玲历史上被国民党逮

捕过的问题，等等，为什么不着重揭露他们的反党事实？

其次，报告强调了陈企霞和并未被列入“反党小集团”的李又然的“托派嫌疑”，从而“决定开除此二人党籍”。然而“嫌疑”毕竟不等于事实，何况这二人正被公安机关“隔离审查”中，还未作出审查结论，为何要急于开除他们的党籍？

再次，既然决定把“反党小集团”成员陈企霞和一个非成员李又然的党籍都开除了，为什么对“反党小集团”的首领丁玲的处理，反而“要看她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程度再考虑”？

再说，按照党章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对党员任何处分，必须经过其所在其层党组织讨论，并允许本人申诉；现在避着正被“隔离审查”的当事人及其所在的党支部，作协党组就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不觉得这违反党章吗？……面对如许矛盾，李之琏觉得自己有责任开诚布公地表述自己的意见。他说作协党组报告中的“决定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二字，应该改为“建议”

才合适；因为对所揭发的问题尚需进一步核实，同时也避免向中央反映的情况有不确之嫌。

可惜，他的这一提议没有得到主持部务会议的部长陆定一的重视，作协党组的报告以及代中央起草的对报告的“批语”，就被草率地通过并上报中央了。

随后，作协党总支才写了《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送中宣部机关党委审批。李之琏与机关党委的几位副书记认为，在“肃反”高潮中，对于政治上还没搞清楚的党员就这样开除党籍，肯定不利于运动的正常开展；虽然部务会议已通过了作协党组的那个报告，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多方听取意见为好。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和机关“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同意这个提议，决定机关党委与机关“肃反”五人小组共同审议作协党总支的这个决定。

审议的结果认定：因不能肯定的“托派嫌疑”而开除陈、李的党籍是不妥的；如作为“反党小集团”成员开除党籍，而“反党小集团”为首者丁玲却尚未处理，这也不合适。另外，“反党小集团”除丁玲、陈企霞外，还有一个第三者；这位第三者只因为对丁玲、陈企霞“反戈一击”，就立刻变成了揭发小集团的积极分子而得以豁免，这就充分证明“反党”与

否，完全由主管者个人意志所决定，显得很不严肃。联席会议最后确定：作协党总支的这个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事实根据不充分，应拿回去研究重写。

1955年12月15日，作协党总支改写的决定还没写出来，中央书记处批发了原先中宣部部务会议通过的作协党组的那个报告，“开除陈企霞、李又然二人党籍”已随着整个报告之被批准而成了既定事实。随后立即召开中央各部门的骨干大会，传达了这个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报告。

可是，待到1956年5月初，陈企霞、李又然的“托派嫌疑”终于被作协“肃反”

五人小组与公安机关所否定。5月22日，他们二人就恢复了自由。张际春立即决定：不能向他们宣布他们的党籍已被开除，而只能说这与整个“小集团”的问题仍在处理过程中。

恢复了自由而又被蒙在鼓里的陈企霞、李又然，都立即要求与机关党委谈话，说作协党组对他们的批判斗争与实际情况根本不符。陈企霞在申诉中，还把他与周扬之间在政治问题、学术问题、思想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相互关系中的问题做了全面陈述。他认为作协党组向中央的那个报告是捏造事实，是对他的政治迫害。李又然也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他与周扬之间的各种意见分歧。陈企霞还将他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了机关党委。

这样，对陈、李二人的党籍问题如何处理，就关系到如何对待作协党组给中央的那个报告，　　以及中央对这个报告的批准等一系列问题，1956年6月28日，中宣部不得不举行部务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

讨论的结果是：同意陈企霞、李又然继续参加党的生活。关于他们的问题，由张际春主持，中宣部机关党委、作协党组和党总支的一些同志参加，查清事实并听取各方意见，然后再提出处理意见。

这个结果得到了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首肯后，中宣部机关党委就组织郭小川、阮章兢、严文井、康濯、葛洛等人，对陈企霞的问题一一作了检查；然后由张际春主持，周扬、熊复、刘白羽、林默涵、李之琏等人参加，提出了处理意见；最后再由作协党组起草成《关于陈企霞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

这个结论认为。陈企霞在主持《文艺报》期间，工作还比较积极并获得了一些成绩；但由此而骄傲自满，在若干重要问题上犯了拒绝党的领导监督、向党闹独立性的严重错误。

对于陈企霞与丁玲的关系，结论认为他们两人都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损害了党的团结。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不应作“反党小集团”论。

这样的结论经陆定一审阅同意，陈企霞却根本不接受，而要求“彻底平反”。

关于丁玲，中宣部组成了张际春为组长，周扬、刘白羽、李之涟和作协党总支的一位同志为组员的专门小组，审查丁玲当年被国民党逮捕的历史问题。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早于1940年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就作出过审查结论，肯定“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和副部长李富春都在这个结论上签了字。

因此对于这一次的重新审查，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特别作了这样的指示：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

张际春严格地执行了这一指示：在专门小组与丁玲谈话时，都没让也是小组成员的周扬参加。

专门小组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档案以及其他方面作了大量调查，都没有发现丁玲在1933年5月被敌人逮捕或绑架后，　有变节自首或叛党投敌的证据。她只是向敌人表示以后回家奉养老母，不再从事社会活动，从而拒绝为敌人服务。在敌人认为她态度消沉，逐渐放松对她的监视时，她就利用多种线索找党，最后终于在冯雪峰等人的秘密安排下，于1936年9月派人把她送到了当时党中央所在地的陕北保安。

专门小组起草这些历史的结论时，李之琏加了这两行字：“丁玲被捕后，同敌人作了种种斗争，最后在党的帮助下回到了党的怀抱。”但这两行字因周扬的极力反对而被取消。结论一共逐字逐句地讨论修改到第七稿。最后按照周扬的意见，写成了丁玲被捕后犯有变节性错误。

这样的结论同丁玲见面时，丁玲一方面对否定了“自首”的说法感到

满意，另一方面对“有变节性错误”表示不能接受。同时她表示，1955年对她的批判，很多问题都不是事实，并说她对周扬有很多意见，接着她就写了个声明。

李之琏把她的声明交张际春签署后，和审查结论一起报送党中央审批。中宣部随之又组成一个以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小组，来处理丁玲、陈企霞的“反党小集团”

问题。李之琏将这些调查材料以及丁玲、陈企霞等人历次所写的声明、申诉材料和丁玲给李之涟送交材料时附加的一封信，全都印发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机关党委委员、作协党组成员和专门小组成员作参考。

周扬对李之琏的这种作法大为恼火。有一次在陆定一家中谈话时，他当着陆定一和张际春的面质问李之琏：“你们把反党分子对人的诬蔑广为散发，这是什么意思？！”

后来丁玲又写了有关周扬的信和材料，李之琏只好放进文件柜，不再印发有关同志了。

但是不论周扬个人如何恼火，于1956年冬季才结束的对丁玲等人“反党”问题的调查核实活动，在中国作协内部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同时人们又全都看到，因为“托派嫌疑”而被公安机关“隔离审查”的陈企霞、李又然，都被无条件释放了；处理丁玲问题的专门小组，也由张际春做组长而不再以周扬为领导了。所有这类“反常”的现象促使人们纷纷发问：周扬在作协领导的种种斗争，是否还能站得住？

于是有些在1955年积极揭发批判丁玲的人，纷纷声明过去都是某某叫他们那么说的， 都要求准许更正。再加上大量的调查核实，证明作协党组1955年9月给中央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报告中所列举的事实，绝大部分都属于虚乌有。

比如：

原说中国文联党组决定丁玲为《文艺报》主编、陈企霞与萧殷为副主编，丁玲竟违反党的决定，把陈、萧也列为主编；事实是丁玲与周扬商量后，周扬同意才这样做的；

原说丁玲1953年在文学讲习所招待德国作家时，居然把她自己的照

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高挂；事实是这个会场并非丁玲所布置，当她闻讯时立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并把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原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谁也打不倒；事实是丁玲有一次与青年作家们谈话说：作为一个作家，首先要写出书来；如果一本书也写不出，还算什么作家呢？……1956年12月，陆定一主持中宣部部务会议听取了这些落实情况的汇报，感到十分尴尬，当场埋怨周扬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是这样的！”至于今后如何处理，他也同意专门小组的意见说：“也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

周扬此刻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并不出于他的建议，而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说了丁玲的不少好话。

李之琏对于周扬的这种解释感到很奇怪：既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并共同研究如何更好地执行？既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在结束批判后不落实揭发的问题，就向中央写那样不负责任的报告？现在又说在毛主席面前讲过丁玲的不少好话，这又出于什么目的？

归纳起这一切，不能不使李之琏和机关党委的同志感到在批判丁玲的问题上，确有令人难解的奥秘。

这次部务会议结束后， 周扬就竭力找机会来弥合他原来所作的漏洞。1957年1月，他和作协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及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等人一起，研究如何修改对丁玲的结论，他们修改了若干次，将“反党小集团”改为丁玲、陈企霞“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

这个结论稿， 还没来得及拿到专门小组和中宣部的部务会议上讨论，1957年5月的整风鸣放开始了。在中国作协，大家鸣放得最集中的，就是如何对待“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问题。陆定一认为既然群众对1955年批判丁、陈有这么多不同意见，那就应该把这一问题再交回作协党组讨论如何处理。

1957年6月6日，作协党组根据陆定一的这个指示，召开了党组扩大会。周扬首先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

邵荃麟、刘白羽等人也相继发言。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经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有的人还表示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等等。

接着，党组扩大会的批评矛头都指向了周扬，批评得越来越尖锐，态度也越来越强烈。丁玲、陈企霞也追问周扬是谁叫他这么搞的……会议开了三天再也没开下去。正好，6月8日这一天，党中央吹响了“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号角，《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对丁玲、陈企霞的问题如何处理，如不再提交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而由陆定一直接向中央书记处去请示了。

一天，李之琏也接到了通知，要他去参加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一个会议。

在别的议题结束后，陆定一汇报丁、陈问题的处理经过时，他没有概述两年来的全面情况，而只说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按照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一种是张际春、李之琏为代表的主张改变中央批准的结论，而完全隐瞒了周扬态度的前后反复，更回避了当初给中央的报告与实际调查的情况不符，以及1956年12月中宣部部务会议上，陆定一自己确定的“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等等的重要事实。

书记处这次会议后，周扬对他半年前已同意，经专门小组通过，张际春签发报送中央审批的丁玲那次被捕后“有变节性”的结论，又要将其改为“叛变”。陆定一立即要李之琏将原来的结论从中央撤回来，由他主持部务会再讨论。讨论时，陆定一提出，将这一段经历改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

周扬对陆定一的这种支持，感到很满意。他顺势进一步说，丁玲等人在作协党组整风扩大会上向他提意见，就是翻案；作协机关的干部为1955年对丁玲等的批判表示不满，则是替丁玲等人翻案；而所有这些翻案活动，都是中宣部机关党委调查核实丁玲等人问题时鼓动起来的，等等。至于他自己半年前主持修改而否定丁玲等人是“反党小集团”的结论，并当面向丁玲等人表示歉意，等等，却只字不提，似乎那都是别人干的事。

这当儿，李之琏实在没法再忍下去，当场问周扬：“你6月6日在作协

党组扩大会上的那种讲话，向丁玲赔礼道歉是要干什么呢？”

周扬顿即回答说：“那是你们逼的！”

张际春立即站了起来说：“你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谁知道你在搞什么哟！丁玲的历史结论，同意了才报中央的；你现在又不同意，有什么新根据！……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吗？！”

中宣部的人都知道，张际春的这等气愤是少见的。周扬也就不再吭气。

1957年7月，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击全面展开。7月25日，中断一个半月的作协党组整风扩大会复会。 周扬的讲话与6月6日的讲话完全翻了个180度。他又重新肯定1955年对丁、陈的批判成绩是主要的，是根据上面的指示进行的。

他这样定了新调调，这个继续的整风扩大会就变成了“反击”的斗争会。而且会议的范围也越开越大，成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一个主战场，把丁玲等人在鸣放期间追问1955年对他们发动批判的原因，说成是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对党的猖狂进攻。接着就把艾青、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明等人，与丁玲、陈企霞一道归结为“资产阶级右派集团”。

这个“反击”大会，从7月25日到9月17日持续了50多天。在大会结束的前一天，周扬又到会讲了话。他说他一生忠于党，一贯坚持与反党分子作斗争；他指名道姓地“揭露批判”了丁玲、冯雪峰等十多位著名的新老作家，给他们戴上了多种多样的政治帽子，其中突出地说丁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是“一个对党不忠的人”。

会后，这个讲话经过整理补充，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发表在1958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

这样大起大落几个回合的较量，周扬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成了文艺界正确领导与权威的化身；而丁玲、陈企霞等人则开始了为期21年的流放，尝遍人间的苦辛……

党“八大”代表李之琏，边参加“八大”

二次会议边接受批判，也踏上了苦难路1958年2月， 李之琏跟着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等人，去山西、河南了解群众宣传工作。临离开北京

时，周扬对李之琏说："要早些回来啊！有些问题还要谈谈。"

李之琏不知他是何用意，所以也没往心里去。

过了两个月， 李之琏一行接到通知， 要他们尽快回来参加将在5月初召开的"八大"第二次会议。李之琏等人遂与洛阳市委书记李立一起回到了北京。一回来，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之一的张骸吠神情紧张地对李之琏说："周扬已决定要谈谈我们几个人在处理丁玲等人问题中的'错误'，不知周扬的目的是什么？"

"谈就谈吧，无非是要我们作检查！"李之琏觉得无所谓。

接着，副部长张子意也对李之琏说，过两天谈谈关于处理丁玲问题中的一些问题。

张子意是1957年初，张际春被调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周扬成了常务副部长之后，才到中宣部担任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副部长的。他在工作中总是竭力维护陆定一和周扬这两位领导人。听张子意这一说，李之琏才意识到这个"谈谈问题"，似乎是早已安排好的一个步骤。

正在李之琏也开始感到"形势有点紧张"的时候，中宣部开了个部长办公会。

在这个会上，周扬说，有些同志对机关党委在处理丁玲的问题时有些意见，"打算找个机会组织几个人，谈那么一两次就行了。"说得很轻松。但李之琏不相信他这种说法是真的："有些同志有意见"，究竟是些谁？

1958年5月3日，在"八大"二次会议即将开幕前，在周扬的主持下，"谈谈"

李之琏等人问题的会议开始了。参加会议的，还有副部长张子意，中宣部的几位处长和作协党组的个别成员。张际春也被请回来参加这个会。首先由李之琏和机关党委副书记张海、崔毅、童大林等人作检查；已调往湖北的副书记兼作协党总支书黎辛，也被调回来一道检查，然后让"有些意见"的人"谈谈"他们的看法。在所有的检查发言中，除×××一人外，李之英等人都遵照周扬的"只准检查自己，不要牵扯别人"的规定，着重"检查"自己认识上的不够之处，避而不提周扬——既不提他在处理丁玲等人问题上的反复无常和错误，也不说他有何正确处。唯有

×××，作了使周扬十分赞赏的检查。

他说他的错误归结于一点，就是对周扬的态度不端正，并列举了对周扬的哪些看法是错误的。他然后说："过去认为，周扬对丁玲的态度是宗派主义的；现在认识到，这种看法完全错了，而周扬同志是完全正确的！"

×××的"检查"刚说完，周扬就站起来叫好。他认为×××这样的检查"干脆"、"痛快"，"我就喜欢这样的态度"，要李之琏等人都学习×××。

从此，周扬就把×××当作揭批李之琏等人的积极分子。×××从党委会议记录中，找出谁个在丁、陈问题上说过这样那样的话，都分别当作李之琏等人的"错误"证据。尽管李之琏他们连续作了几次检查，只因谁也不肯像×××那样说"周扬是完全正确的"，就一直下不了台，而且还被说成相互包庇，毫不揭发，形成了"负隅顽抗的小集团"。

于是在陆定一的支持下，批判会逐步扩大，从十几人到几十人几百人。"八大"

二次会议开幕后，就与"八大"二次会议穿插着开——"八大"二次开会，李之琏等几个代表就去参加"八大"二次会；"八大"休会，周扬就又主持开会批判李之琏等人；"八大"二次会议闭幕，中宣部的这种批判会则继续开。大小会议持续了三个多月，　直到8月中旬，召开了所有宣传文教部门上千名党员骨干参加的宣布处理结果的大会。

在批判揭发中，中宣部的一位"八大"代表说，在1956年"八大"第一次会议酝酿中央委员人选时，他曾问过李之琏：在全国文艺界，还有谁参加中央委员会比周扬更合适？李之琏遂和他谈了对周扬的一些"很不好的看法"。

这种揭发，立即引起周扬的全神关注，也引起与会群众的兴趣，一个劲地要李之琏交代对周扬到底是怎么个看法。

一位在文化部工作的同志也是"八大"代表，这时就向周扬检举李之琏在河南会议上，就丁玲等人问题的处理，提过对周扬的意见，说李之琏在"八大"为丁玲翻案。

这等于给追究李之琏与周扬之间关系的浪潮加刮了台风，随之李之

琏听到了不同口音的质问——

“你对周扬同志的看法，是不是受了鲁迅的影响？”

“你在《学习》杂志上发表的《论护短》的文章中所批评的那种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的人，是否影射周扬？”……周扬也起来指责李之琏：“你这是把我们看成了‘娄阿鼠’啊！”

在这连珠炮似的质问声中，李之琏心想：索性把我对周扬的看法和盘托出，作为我的“思想检查”，又能把我怎么样？于是他说：“我要求给我一些时间作准备。”

群众的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追究才停息下来。

但是，在专门让李之琏“检查”对周扬看法的大会上，李之琏刚刚开了一个头，只见周扬与形式上的会议主持人张子意悄声嘀咕了一阵，他就被赶下台来，不让他讲下去，转而追问丁玲给他写过几次“反党”信件和材料。

李之琏记得丁玲写的信和材料都印发给所有领导同志和有关同志了，不记得多少次。周扬随即派人找丁玲作了核对，发现有一封信并没有被印发，又立即派人以“清理文件”为名，搜查了李之琏的办公室，从文件柜中搜出了丁玲写给机关党委而没有被印发的有关周扬的那封信。

周扬如获至宝，说这是丁玲写给李之琏的“反党密信”，是李之琏与丁玲“合谋翻案的罪证”，是“私藏变天账”。

李之琏申辩说，在印发过丁玲等人的信和材料之后，周扬曾当着陆定一和张际春的面质问他为什么“把反党分子对人的诬蔑广为散发”，所以对丁玲后来写的这封信才没有印发；但他作为机关党委书记，对任何一个党员交给组织上的材料，又不能弃之如废纸，谈不上什么“私藏变天账”。

周扬越听越火冒三丈。他怀疑李之琏之所以了解他的许多情况，《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公木（张松如），可能是这些情况的来源之一。因为他知道，公木与李之琏在延安时，曾共同在八路军军政学院学习过。在这之前，李之琏在1932年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委员时，公木作为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曾与李之琏共同参加过党所领导的文化活动。1932年冬，鲁迅在师范大学操场上演讲和1933年4月25日追

悼李大钊的游行， 他们二人又都是参加者。后来都到了延安，他俩又在一起学习，准备党的“七大”召开后一同奔赴敌后的……周扬遂决定把正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访问的公木急电催调回来进行批判，追查他与李之琏的“交往”和向李之琏反映过哪些“问题” 房其实，公木在作协党组讨论丁、陈问题的座谈会上，也讲过一些周扬不中听的正确意见，周扬就对他也怀恨在心，非要把他整倒不可。所以当公木从国外归来虽然什么也没交代，也被划为“李之琏、黎辛反党集团”的同伙。

关于对丁玲历史问题的处理，周扬给李之琏扣上了“美化叛徒”的帽子。张际春对这种故意违背事实的随意乱说，非常反感。他在大会上发言说：“专门小组给丁玲作的历史结论，是集体讨论，多次修改，逐字逐句通过的正式文件；即使有所谓的‘错误’，也不能由李之琏个人负责！”

个别群众对张际春的这一实事求是的说明，当作是为李之琏“开脱”。周扬看到了会议《简报》有关这个情节的描述极为赞赏，说“这个意见是提得好的。”张际春就此再不参加批判李之琏等人的大小会议。

但是，周扬觉得，只在丁玲等人问题上拼凑李之琏们的“反党”材料还远远不够。他又打电话，又登门拜访，想方设法去找过去同李之琏共同工作过的人，向他提供李之琏的“反党”线索：“肃反”运动后期，李之琏曾作为文教部门的代表代替张际春，参加过中央“肃反”五人小组的工作，为此，周扬就去拜访罗瑞卿；大军渡江后直到1954年初大区撤销，李之琏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先后担任过组织部秘书长兼纪律检查委员会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兼纪委副书记和党校副校长，为此周扬又去找了当时也在中南局担任纪委书记的钱瑛和统战部长的张枫一。结果他不是一无所获，就是遭到被访者的拒绝。可当他回转身来，却在大会上大放空炮，以壮声威。他对李之琏说：“你不要以为过去你熟悉的人都对你有好印象，现在他们对你的看法也改变了！”

对李之琏和中宣部机关党委其他几位副书记的批判会，从开始发动到最后处理，都是周扬一手操纵的。但是最后，却以机关党委的名义，向党中央写了一个关于李之琏等人的错误的报告，完全剥夺了被批判者申诉的权利。

1958年8月14日， 在景山公园西边的三座门军委礼堂，召开中央各宣传文教部门的党员骨干大会，并吸收党和国家其他部门的代表参加，由张子意报告东拼西凑的李之琏等人的“错误”，并宣布已被中央批准的“李之琏、黎辛反党集团”的处理结论：李之琏被定为“极右分子”，黎

辛被定为“右派分子”，都开除党籍；张海和崔毅被定为“反党分子”，都留党察看两年；四个人都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李之琏从行政七级降为十三级，其他人也都从原来的级别下降四级或五级。处理结论一宣布完，李之琏和黎辛就被喝令退出会场，然后再由陆定一向到会的党员们发表讲话。

李之琏本想，在大会上当众喊冤，但又觉得那是白费力，因为中央已经有了处理结论。转而一想，又觉得这像是一出神使鬼差的滑稽剧——导演与演员们本没有共同的意志，却能完全合拍在一起。他不知道对这出滑稽剧应该如何去评价：“难道开除一个党员就好像捻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吗？”

当他走出礼堂的时候，扑面阳光普照，他立刻抑制了这种忧愤的情感。他回想1929年自己16岁就加入了党所领导的反敌大同盟的反帝反蒋地下活动，1930年考入北平大学的法商学院后不久，又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因被叛徒告密而遭国民党逮捕，被叛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但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在狱中秘密党支部担任了支部委员， 领导政治犯们同敌人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斗争。1937年5月刑满出狱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在党的指示下回到自己的故土——河北省蠡县发动群众武装抗战，后历任冀中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长兼军区直属部队政治处主任和党支部书记；1940年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到了延安。因“七大”延期而先后进入八路军军政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了整风运动。1945年参加了“七大”后，日寇投降，跟随林枫等人去了东北，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秘书兼干部科长、东北局党校教务处长，后又去了中南局和中央宣传部……从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多少年来没有做过不利于党的事，现在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是非分明的。

他回到沙滩的宿舍，挥毫写下四行诗：酷刑可以摧残生命，

不能泯灭人的魂灵；

念党光荣伟大，

真理定会再生！

他每天照样去中宣部继续上班。没有工作，他就看书看报，参加支援古巴的大会……直到被周扬一眼瞅见，才被正式通知“不要再到办公室

来了”，他才停止上班。

不久，他宿舍的电话机也被撤了，汽车也被收回了，秘书被调走。熟人变成陌生客，朋友不再往来……

一天，他被通知去机关党委看对他的处分决定。这个1958年8月5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极右分子李之琏党籍的决定》是这样写的——第三届机关党委全体同志一致拥护中央批准的中央宣传部《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立即撤销李之琏现任机关党委委员和书记职务并开除其党籍。

《决定》有一个附件，叫做《中共中央宣传部整风领导小组关于极右分子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列举李之琏的“主要反动言行”一共有四条：一、鼓动丁玲并同她合谋翻案；二、反对“肃反”运动；三、写反党作品诬蔑转业军人；四、1934年被捕后叛变党。给他戴的帽子也有四顶：“阶级异己分子”，“极右分子”、“叛党分子”，“反党集团首恶分子”，另有“野心家”、“阴谋家”等头衔。为了节省篇幅，现仅将这《结论》的第一条全文转述如下：反对党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阴谋推翻中央1955年12月对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策动丁、陈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他首先以“根据不充分”、“手续不完备”为借口，保持了陈企霞、李又然的党籍。他掩盖丁玲的叛党历史，把她美化成一个革命战士。

在他提出的审查结论的初稿中，不写丁玲是自首变节，而写成是“属于在敌人面前犯了政治上的错误行为”。强调丁玲在被捕期间曾进行“对敌斗争”，坚持要把丁玲在南京变节后三年多的历史计算党龄。帮助丁玲向党提出有关她历史结论的三点保留，以欺骗和愚弄组织。鼓励和帮助丁玲、陈企霞翻案，唆使他们写“申诉书”，并广为印发陈企霞向党进攻的“陈述书”。完全按照丁玲的意思对丁、陈问题进行所谓重新查对，力图为丁玲、陈企霞开脱。丁玲直接寄给他的一封为自己辩护、诬蔑周扬同志和作协党组的信，要求不要给周扬同志和作协党组负责同志传阅，他完全照办。

他还散布“1955年斗争丁、陈反党集团搞错了”、“丁、陈反党集团案完全能否掉”等谎言，并在“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会上说：“丁、陈问题搞错了”，企图在“八大”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为丁、陈反党集团翻案。陈企霞给他的信中公然诬蔑党对自己的斗争是政治迫害，李之琏

予以默认；丁玲给他的密信中竟说：“翻身有日、有重见天日的可能了。”

1957年5月， 他亲自在《宣教动态》上一条关于文艺界情况的消息中加按语说：“丁、陈问题自1955年作协党组的报告通报全国后，起码到现在还未做出结论。”企图在全党散布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中央搞错了的空气，以配合右派的进攻，推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看了这一条，就可以想见其他三条“罪名”是如何罗织的了。李之琏不信这是党对他的最后处理。他要求回到农村去：是黑是白，日久自可分明。

这要求，得到了机关的批准。

1958年12月，他到了河北省承德地区青龙县的农村……温济泽之被补“右”就简单多了：只因转达了有关周扬的一个说法

温济泽从延安到北京，直到被补为“右派”。早就在新闻界、科普界和青少年读者中大名鼎鼎了。

他1938年到延安，就在陕北公学讲授社会科学概念、哲学、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概念和社会发展史，编写了《自然发展史提纲》和《社会发展史讲义》；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参加调查研究国民教育并编写《中国现时国民教育问题》一书。

1941年7月， 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他被调到这个研究院的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担任学术秘书和研究员，参加了“五四”以来中国哲学思想课题的研究， 并在毛泽东的主持下， 参与编纂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同时写了《伽利略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客观事实与主观愿望》等文。

1943年1月， 他被调到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部担任秘书、编辑和主编。在三年多的时间结合编辑工作，陆续写出了一百多篇适应报纸读者需要的科学小品和历史人物、历史知识等文，诸如《学习科学》、《黄花岗的故事》、《马克思的生平》、《辛亥革命》、《孙中山晚年对和平统一的主张》等等。

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温济泽被调任新华社口头广播部——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尽管战争的日日夜夜，使他

把全副精力都用到了广播工作上，他仍然挤时间写了《蒋介石罪恶史三章》的小册子；1948年《中国青年》复刊，又应约写些科学小品。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相继担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并兼任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委和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笔耕不辍，编写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武器》、《人和自然的斗争》等小册子和《关于原子弹问答》等科学小品。

1949年3月进北京后， 他已检查出肺病复发，但仍坚持工作。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工作更加紧张劳碌，使他大口大口地吐血。在一年半的医治疗养中，他又坚持读书，读了二十卷的《鲁迅全集》（包括译文集），在病床上写了好几本读书笔记，后来写了一本《鲁迅和他教导青年的话》，成为许多青年爱读的一本书。

1957年“反右”时，他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和对外广播部门的负责人 分党委办公室的负责人对他说：“你们部门二百几十人，按平均百分之五计算，应打出十几个右派分子。”温济泽说：“如果有百分之六，我不会放过；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

温济泽这样说，是因为延安“抢救运动”和批斗王实味的教训，使他牢记难忘——

1942年，他和王实味同在中央研究院。王实味主要因为写了杂文《野百合花》等，在整风中的态度又不够端正，受到批判斗争。

温济泽因为临时被调到院党委搞整风工作，曾找王实味谈过几次话。他希望王实味认识错误，诚恳地做个检查，不要与大伙对立。王实味后来哭着对温济泽说：“像你这样说服我， 我愿意检查； 但有些人说我是‘托派’、‘反党’，说我是‘敌人’，我实在受不了，太冤枉了！”

温济泽随即向院党委书记汇报说：“对王实味的问题，应该作为思想问题批评，不要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和反党问题。”第二天，院党委书记对温济泽说：“你的意见，我向康生汇报了。他批评了我们，还批评你有温情主义。”

结果，康生给王实味定了三大罪名——“反革命托派分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1943年下令将他逮捕，1947年又

在晋绥区批准将他处决！

1943年1月， 王实味还没被逮捕，温济泽与艾思奇一道被调到《解放日报》副刊部。康生的“抢救运动”初发时，鲁迅文艺学院等单位就搞起了车轮战，问不出，就硬逼。《解放日报》学委会负责人说：“人家能逼出来，我们为什么逼不出来？”

也是学委会委员的艾思奇说：“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能搞逼供信。”结果副刊部一个“特务”也没有搞出来。

这时“上面”说，整个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白点——就是《解放日报》副刊部！

还有人说“这是大特务包庇了小特务”。艾思奇被撤掉了学委会委员，温济泽也因为有个叔叔是国民党少将，被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幸好这“抢救运动”

很快被扭转了，温济泽才幸免落难……事隔十几年，残酷的敌我斗争也已经结束了好几年，现在又接连起了“肃反”

和“反右”，而且又强行规定了比例数大抓“敌对分子”，温济泽的耳际不禁又响起了王实味的哭泣声，他当然要脱口而出，“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

结果对外广播部门的“抓右派”未能达到这个规定数。

这时，对外广播部门的业务，归中共中央联络部管。有一次，在中联部的国外宣传工作会议上，温济泽对周扬在一个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了他自己的一点看法。周扬在这个讲话中说；在分辨不清香花和毒草的时候，可以让它们先放出来；如认为有毒草的话，再把它锄掉，还可以肥田嘛！

温济泽说，周扬的这种说法不能适用于对国外的广播。因为“毒草”在报刊上登了出来，还可以批驳更正；而如果广播出去了，这次听到的人，下次即便批驳更正也不一定听到了，怎么个“锄”法呢？

当时主持会议的熊复说，周扬的这个说法，已受到了中央的批评。这件事，你们知道就行了，不必向下面传达。

但是温济泽认为，对外广播部门还有四位主持发稿的编委和部门负责人，也应该让他们从严掌握分寸，万万马虎不得，就把这些意见转告了他们。

万万没料到，有人把温济泽的这一举动，汇报到了周扬跟前。

当时周扬正在明里跟“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算账，暗里在盘算着如何整治帮助丁、陈说话的李之琏们，突然又听说温济泽在背后对他说三道四，非常生气。

他立即给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打了电话。梅益遂把温济泽找去谈话：“你怎么说周扬有错误的呢？”

温济泽早忘了这档子事。但梅益是个有心人，他接到了周扬的电话就下功夫调查过了，见温济泽一时想不起来，就把别的编委的笔记拿给温济泽看。温济泽这才恍然想起，连忙向梅益道明了原委。梅益说：“你自己去向周扬说吧！”

过了不久，周扬在中宣部做报告，温济泽也是听众之一。待周扬报告完，温济泽连忙上前不无检讨地汇报了当时的实情。但已经没法挽回了，因为中宣部和梅益要温济泽作没完没了的检查。

1958年10月，广播事业局党组“关于反对反党小集团的斗争”的总结又把温济泽向“右派”一边推了一把。

终于，在“反右”斗争基本结束11个月之后，温济泽在中央司局级干部“反右补课”时被补成了“右派”，并揪出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反党小集团”。

1958年10月的一个夜晚，已快半夜了，胡乔木听说温济泽也被打成了“右派”，十分震惊，连忙给廖承志打了电话，又匆匆跑到廖承志家说：“你知道温济泽被打成了‘右派’吗？”

廖承志也大吃一惊，说：“这怎么可能呢？”

他们两位都认为，应该历史地全面地看人，绝不该这样乱打一气。他们相约，第二天上午一起去中宣部问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到了中宣部。得到的答复是：是广播事业局党

组划的，中宣部已经批准了， 已报到中央书记处了， 没法改了……胡乔木当即长叹一声——“又毁了一个好同志！”廖承志也不禁叹了一口气。

胡乔木与廖承志所以如此痛心，是因为温济泽的的确确是一位好同志。

他们都很了解，1929年，温济泽刚读江苏省立淮阴中学一年级，就加入了党的秘密支部领导的文学团体“稚鸿社”。在召开成立会时，温济泽和十几个同学被捕，罪名是“共党嫌疑犯”。其实这时温济泽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共产主义。经过半年审讯，他以“年龄不足16岁，不负刑事责任”而被交保释放。

从此温济泽反而决心寻找共产党，结果加入了共青团。不久，学校将他开除，他改名考进了全国有名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高中部，一面读书，一面想方设法恢复了不久前被破坏的秘密共青团支部， 并被指定为团支部书记。可是只过了3个月，淮阴和扬州两地的国民党县党部和公安局，就联合派出军警来搜捕温济泽。在一位老师的保护下，他化装跑到上海，辗转进入复旦大学附中，建立了共青团支部，又被指定为支部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被选为附中学生救国会的执行委员；第二年又发生了“一·二八”事变，他担任了附中在内的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淞沪抗战被出卖后，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上海市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并反对上海停战协定联合会（简称“民联”），他被选为这个联合会的青年部长，接着又兼任江苏省民联和全国民联筹备处的青年部长。1932年7月17日，在参加江苏省民联代表大会时温济泽和很多同志被捕，被关进苏州国民党陆军军人监狱，这时他才18岁。

在监狱中，他被狱中极秘密的共产党支部吸收入党，积极投入狱中的对敌斗争，同时刻苦学习。他按照恩格斯的科学分类，系统地阅读了大量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 以及大学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等教科书。经5年苦读，他对从星云到太阳系、从无生物到有生物、从猿到人、从原始共产社会到将来必会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有了粗略但明确的认识。

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他与很多同志被无条件释放。第二年他到了延安，虽然只有24岁，而且又刚刚坐了五年监狱，但由于不断苦学磨砺，一到延安就能大显身手。

1946年，廖承志当了新华社社长，两年后，胡乔木边当毛泽东秘书边做新华社总编辑，温济泽又直接在他们的领导下担任口播部主任和全社管理委员会委员。从延安撤退到瓦窑堡坚持广播，又长途转战到太行山的涉县西戌材，又转到阜平县的西柏坡，后来又进了北京城，温济泽多才多智、谦诚谨慎、工作兢兢业业、无畏艰险牺牲的人品，都给他们留下了良好而深切的记忆。这样的好同志，居然也被打成了“右派”，成了“党的敌人”，他们不能不百般痛惜！

本来，早在建国之初，廖承志改任为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时候，就曾经与梅益和温济泽等人语重心长地谈过话。他说他有一个希望，就是同志间相处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密切合作，加强团结，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革命事业才能蒸蒸日上。没想到时隔数载，温济泽竟被自己人推到了“右派”一边，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何年何月才能把这样的同志再拉回来，只能等待着，等待着！

李、温二位各自走了漫长的坎坷路河北省承德地区的青龙县，是长城外的一个穷县。承德地委书记王克东，本想把李之琏留在地委文教部门干点儿事，以示对这位不幸落难的老同志的照顾；但李之琏执意要到艰苦的农村去，重温战争岁月与农民打成一片的鱼水情。王克东觉得对这种高要求也不便泼冷水，只得随其意。

李之琏出了长城才知道，这不但是个穷县，而且还是个党政不分的县：县委和县政府共管一个农业部。由于他好赖还是个13级干部，比县长、县委书记的级别还高，就被分到这个农业部下面还没配备科长的农业技术推广科，当了个副科长。连他在内，一共只有九个人，其他人都是农业大学或农业专科学校的毕业生。

他决心从头学起：向这些农业技术员学，向农民学，也向老伴从北京寄来的农业院校教科书学。

1960年春天，他跟随一位不是共产党员的副县长下放到一个公社，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候县里的干部下乡都不带行李，都由当地生产队干部向社员家庭借用。李之琏为不给社员们添麻烦，不论走到哪儿，都自己背着行李卷，像战争年代腿动人搬家一样。“三同”期满快回县上时，社员们说什么也要把他评为“五好社员”，有几位老农还流着泪盼望他们日后再来，说是打走了日本鬼子打败了老蒋以后这些年来，“像这样的老八路难得见着哩！”

就凭这，加上日常在推广科的团结同志、刻苦钻研和出色的领导工作，他又被评为“五好干部”。为此，推广科的党小组长挨了上面一顿克：“屁股坐到哪儿去啦？‘右派分子’与‘五好干部’能混为一谈吗？！”

1960年秋天，又决定为一批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子。经过青龙县农业部的评议，青龙县委建议摘去李之琏的“右派”帽子。“建议”报到地委、省委再转到中宣部，中宣部“卡”地亮了红灯：不准摘！

不久，青龙县农业部被撤销，县政府成立了农业局，李之琏被调到新建的农业局下面的农科所做副所长。可是这个农科所名为农业科研机构，却一无土地，二元房屋，只能在县城以外十里地的农村，向两家农民各借一间房，再请公社划出几亩地作试验田。全所老少还是总共四张嘴，都在农村“共产主义大食堂”吃饭，每天两顿粥，每顿二两粮，只饿得李之琏全身浮肿，大小便失禁。县委有人说，“这样拖下去很危险”，遂让他回北京治病。

恰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张仲确到北京办事，听说李之琏正在家养病，急于想见到他。

他们是老战友。“七·七”事变时，李之琏与一批地下党员奉党的指示，回河北老家发动乡亲武装抗战。这时，与北平地下组织失掉了联系的张仲瀚正担任河北民军第三支队司令，李之琏和另一名党员齐健秋奉蠡县县委指派，到张仲瀚支队去做政治工作。时间很短，李之琏调上级政治部工作，当张仲瀚要求解决失掉的组织关系，他俩就帮助并介绍张仲瀚暂且重新入了党，以利于他领导部队指挥作战。后来李之琏去了延安，一别就是二十多年，张仲瀚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李之琏却被打成了“右派”，这亦可谓“沧伞忿变”！

此时李之琏的家已不在沙滩中宣部宿舍，而被赶到了景山东街原北京大学的西齐，六口人只住两小间房，哪能接待阔别多年的远方来客！李之琏急忙跑到北京饭店去拜访张仲瀚。

两个老战友见了面，张仲瀚见李之琏语音低沉，面似灰土，非常感慨。他问：“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听了李之琏的诉说，张仲瀚说：“这样吧，你到我们兵团去，至少还能吃饱肚子。保住性命要紧啊！”

他介绍了兵团农业机械化的现状，又说：“我现在没法帮你改善政治

状况，你如有志于农业，到我们那里去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李之琏当然很乐意。经过各方联系， 1961年9月，中宣部介绍李之琏去新疆。

李之琏爱人陈处舒，中央卫生部的一位副处长，全家一共六口人全都跟了去。

也许是因为兵团政委张仲瀚的推荐，李之琏到达新疆不久，就被任命为生产建设兵团农林牧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而这个拥有40人左右的科研所，所长是兵团参谋长陶晋初——兵团司令员陶峙的堂弟兼任的，不能到所里管事；另一位副所长是兵团农学院农学系主任王彬生副教授，也是兼职，因此李之琏是全所实际上的第一把手。

又不久，河北省委决定给他摘去“右派”帽子的通知，也转发到了新疆。他工作更加努力，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兵团领导——特别是兼所长陶晋初后又升为兵团副司令，调人、批物、拨款，积极为科研创造条件。短短几年，科研所就由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从没有试验地发展到3000多亩的试验田；每年都有栽培育种、改良土壤等等，从事几十个试验课题的研究，并承担了国家内陆盐碱地农业科研的任务。成了一个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农林畜科研所，成绩是显著的。

但是， 他要申那个被定为“右派” 的冤， 却难而又难。1962年1月中央召开7000人大会，“崇左”之纲似有下降时，他曾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写了一封信， 问她是否可以把他在中宣部被定成“右派” 的问题说清楚。钱瑛回信说：“是有机会说清楚的”；并告诉他：7000人大会之后，首先要解决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问题，然后才能处理1957、1958年的“右派”问题。

李之琏见到这封回信，觉得有了希望。但是这年秋天，北戴河会议又提出“打退单干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口号，李之琏又感到自己的前途陷入了一片黑暗。

1965年夏天，李之琏与兵团科委办公室主任程人英到北京参加农业科技会议，他顺便去中央组织部要求解决党籍问题；中组部副部长李楚离说，目前暂且采取重新入党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是可以的。但是，当中组部把这样的信件发往新疆区党委组织部，区党委组织部又转至兵团党委组织部，兵团负责人在北京医院治病巧遇同时住院的陆定一，向陆

定一表示了这个意向时，陆定一予以断然否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兵团政委张仲瀚被打倒，几乎被折磨致死。李之琏不但是“摘帽右派”，而且成了张仲瀚“招降纳叛来的牛鬼蛇神”，“篡夺了党的领导权”。从而被交给群众实行专政。他的爱人陈处舒先在石河子兵团医专任副校长，“文革”中被批斗、毒打得头破血流，受到严重摧残……后在兵团领导中的一位现役将军的支持下，调去乌鲁木齐的兵团第一医院担任第二院长。大儿子高中毕业又经过农场劳动，报名参军也遭到拒绝。后来经过李之琏的一再委婉申诉，科研所的一些人也对他的历史作了全面调查，才知道他不但被补为“右派”是冤枉的，就是1934年被捕之后也清清白白，根本不存在什么“叛党”问题。

在得到了科研所革命群众的谅解、大儿子又经深明事理的兵团驻石河子指挥部政委刘仲明下令办了参军手续，但到兵团后，又被个别领导人拒收。李之琏就开始了又一轮的申诉。但是通过兵团党委向郭玉峰把持的中央组织部转去的一封又一封申诉材料都被原封退回。

1975年，兵团党委出面，建议中组部对李之琏的问题进行复查，中组部也不受理。

这年夏天，经过指挥部政委刘仲明的批准，李之琏回河北老家探望三十多年没见面已年过九旬的老父，顺便去北京中组部当面申诉自己的冤屈。得到一位熟人的介绍，中组部信访组的一位同志接待得很热情。李之琏给了这位同志一封申诉材料和给中央领导人的信，这位同志表示研究后再答复。

但过了几天，李之琏再去时，已换了一个生面孔。这位生面孔对李之琏冷冷地说：“领导已研究过了，右派问题过去分工由统战部管；‘文革’后中央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新的指示，你仍应该去统战部。”

李之琏说：“问题已经过去了15年，现在看得更清楚了，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

统战部现在有人负责吗？”

“不太了解。你去统战部问问吧！”

“为什么党员的申诉要交给统战部去管？如果组织部不给开个介绍信或打个电话，那边不接待怎么办？”“组织部与统战部是平行关系，不好

开信或打电话。你自个儿去找找看吧！”

李之琏觉得这简直就不像一个共产党领导部门的答复。他忍着气，要求先给找个住处，然后再去找统战部。得到的答复是三个字——“不可能”。这下李之琏再也忍不住了。他说，他作为党的一条牛，给党拉了几十年的车，现在即使回北京办点私事，也该帮忙给安排个睡觉的地方吧，何况他是来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申诉自己的冤屈的？

“再请问：这是谁决定的？”李之琏问。

“请示了领导。”这位生面孔答道，接着把李之琏的申诉材料退还给李之琏。

李之琏没法，只得不顾头昏眼花，向府右街走去。

到了统战部，传达室的值班人员倒还很客气，说：“现在大家都去‘学习’了，部里没人办公，不接待外来的人。”

“既然机构还存在，总该有人在机关负责吧？”

“那好，你可以写一封信留下。”

“我写好了。”

“那你就放下吧。”

“什么时候再来问结果？”

“不用再来了。有什么结果会通知你的；如不通知，你就不必久等了。”

那结果，当然是“不必久等了”！

当兵团新政委来到农科所的时候，李之琏又向他要求兵团党委直接向党中央转报自己的申诉。这位政委是老政委被打倒后整个生产建设兵团的“文革”第一把手；把李之琏当作张仲瀚“招降纳叛来的牛鬼蛇神”、“篡夺了农科所的领导权”而进行批斗并专政的，正是这位“第一把手”。如果把李之琏这个“牛鬼蛇神”解放了，那也等于给张仲瀚减少了一个罪名，那还行？于是他对李之琏的要求回答得很奇特：“兵团党委不能转，你可以从邮局寄嘛！”

李之琏对这种答复感到很刺耳，反唇相讥道：“政委，1958年开除我的党籍时，可不是经过邮局通知我的。这些年我多次申诉无人答复。现在我作为兵团党委领导下的一个干部，我认为兵团党委有责任帮助我实现这种向党申诉的权利。”

这位政委无言以对。他迟疑了一会儿才说：“党委转一下也可以，但不能表态。”

后来据说是转了，但照例无人答复。

这时李之琏的爱人陈处舒在“文革”中受尽了折磨而恢复工作之后，又因派性排斥而很难工作下去，不得不通过建国之初在武汉的一位老领导的联系，带着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暂且移居武汉。这样，一家六口人就分居三处，新疆只剩下李之琏孤身一人。

不久，李之琏趁去武汉探望陈处舒之便，又拐到北京上访中组部。接待的是一男一妇。听了李之琏的申诉，女的表示同情，男的打官腔。打官腔的这位说：“中央对右派问题还没有明确的新政策”，“能不能再入党，也还没有这样的事例”。

李之琏要求给找个住处。这位“官腔”表示中组部招待所只剩下一个，让李之琏自个儿想办法。

李之琏说：“我已为党工作了40多年，……如果没有饭吃，党不是也该给我一条活路吗？”

这时“官腔”才似乎有些同情和抱歉，但也希望李之琏能够谅解。到头来什么实际困难也没解决。

李之琏苦无栖息处，只得又去看看熊复。熊复说：“你可以给小平同志写一信，我替你转去，试试看。”

过了些日子，李之琏将写好的一封长信交给熊复时，熊复说：“不好了！最近局势又变，有人要‘反击右倾翻案风’了，信不能再转小平了！”

随后不久，周总理去世，邓小平又被打倒，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四人帮”们似乎为所欲为，李之琏深感未来更加渺茫，不知这尽冬丛生的人生终将走到何年何月……

※※※※※温济泽的荆棘路没有这么复杂，但也是够揪心的。当他被补为“右派”时，他也是对党忠贞不二，认为党总是对的。至于广播事业局党组说自己“右”，只能先承认下来，以后再慢慢去“认识”吧。如有“罪名”与事实不符、处理过分的地方，日后有机会总能说清楚的——延安“抢救运动”不就是很快甄别了吗？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想总该这样想，头抬得高高地向前看；但是每日扑面而来的生活景象，总不是那么令人舒心畅气的。首先，家里的电话被撤掉了，有事想拨个电话、节省时间少跑腿，完全不可能了。他所有出版过的书都成了禁书，就是摆在新华书店书架上的，也都全被撤下来扔进准备化作纸浆的废纸堆里。在北京图书馆陈列架上的也被严禁借阅。发表文章的权利自然也被剥夺。就是他出于崇敬而苦心搜集的瞿秋白文稿与史料，他也感到继续放在自己家里不安全，而交给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大姐了。

尽管他一直身躯瘦弱又有肺痨病，还是被发配到渤海之滨的一个农场去劳动。

劳动了一年多之后，被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工作。因为头上还戴着“右”帽，他只能搞点资料；1960年10月摘了帽子之后，才开始讲些课，并得以在不公开的《广播业务》上发表点文章。

在广播学院教书教到第六年，“文革”浩劫开始，他再次遭受劫难。他所写的文稿和出版的书籍，多半都被烧毁，罪名是“四旧”，是“修正主义”；甚至连建国之初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和北京大学新闻专业讲授新闻广播学的讲义，以及刚刚出版的《马恩列斯论报刊·列宁论广播》，也都被付之一炬。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全国即笼罩在恐怖气氛中。他也在广播学院接受“群众专政”。一次他坐14路汽车去医院看病，车到站门一打开，一眼瞅见胡乔木上车，他十分欣喜，连忙点头致意，并起身让座。但胡乔木只无言地用眼神向他示意，叫他不要跟他打招呼。两个人只好都相互陌生人似地，都把着扶手摇摇晃晃地站着，偶尔目光碰到一起，也一句话都不说。最后胡乔木用眼神示意要下车，温济泽用注目礼送他，这时才注意到一个跟他上车的人也紧跟着下了车。“噢，原来有‘尾巴’！”

“文革”开始不久，温济泽从红卫兵小报上看到邮电学院揪斗胡乔木

的消息，就非常惦念他。没想到这次车上意外相遇，却连一句话都不能说，“我们的国家究竟要变成什么样子呢？”

1972年，温济泽听说廖承志得了心肌梗塞，住院治疗后回到家里休养，他急于想去探望。‘因为自从他被定为“右派”之后，已整整十四年没见过廖公了。他说去就去，到廖公家里一看，廖公虽然消瘦一点，但仍然保持着乐观、热情、豪爽、幽默。此后有一段时间，他常常去看他。

从谈话中得知，“文革”开始不久，廖公也受到了“四人帮”的迫害。周总理为了保护他，让他住进了中南海，一直住到1972年。在与外界隔绝的那些年，他学会了做饭做菜。看书绘画之余也写诗。他向温济泽背诵过一首自己写的诗，那后几句是：“自悟残生日渐促，尚拼余力渡江潮；梦中忘却‘靠边站’，还向旌旗笑手招。”这表明他在孤寂苦恼中，仍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他说：“乌云终不会长久遮蔽着天空，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的。”

温济泽告诉他，十几年来，他是一直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应缴的党费也按月积存着。廖公听了表示很欣慰，要温济泽如实写个报告，他打算找周总理去说明温济泽被补为“右派”的问题。

不日，温济泽把写好的报告送给廖公，过了一段时间，廖公对温济泽说，总理的处境也十分困难，不能再给总理增添烦恼了，只能等一等再说。不久总理逝世，他们都万分悲痛。温济泽说：“我们党，我们国家，断了一根顶梁柱！”廖承志说：“还有邓小平还有很多好同志，我们党和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是的，还是有希望的。

陈述书

陈企霞

1955年8月19日，作家协会某些方面通过中央公安部将我逮捕，一直到1956年5月22日，才由阮章竞同志和崔毅同志以及中直党委另一个同志一起，宣布停止所谓停职反省，　恢复了我的自由。3月（疑为五月——恭怀注）24日，在中宣部党委会所召集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党委书记李之琏同志叫我作一总的陈述，以资研究。我在三个小时中将初步意见陈述完毕，李之琏同志提出要我将它写成书面的。这就是根据当天发言重新写了一遍的书面陈述。

我准备以下列三个部分来叙述整个事件的各个方面，完全以事实为根据，我相信我完全能以足够的冷静的态度。这一陈述的整个精神是对事不对人的（自然，事情是人做的，谈事也不能不牵涉到做事的人）。崔毅同志那天说，即使你的牢骚也要倾听，这精神我很感动。我深深检查自己，我认为我确实没有个人牢骚，个人的牢骚是完全不值得发的。这里要加以声明的是，我所根据的事实，我能保证全是真实的。当然这是我在自己的角度上所接触的事实，是否是完全，或是某些事实我看重些，某些看不够重或竟至忽视，这也不能说没有可能，何况我被和文艺界隔离，说多已有三年之久，至少也有九个多月，有些事情可能我完全不知道。但事实总是最雄辩的，可以互相印证，并且可以继续根据事实讨论看清，以求把整个事件弄清楚，这完全不只是我个人的问题，这是很明白的。

一

第一部分我所陈述的是整个事件的经过。我根据亲身遭受的事实，已经长期在我的脑子里构成了一幅这样的图画。这里面，很多地方不能用一般的合理合法的原则去解释它。我在自己的解释中有时自己也是不相信，但却并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重新解释，这怎么办呢，我请求党的组织帮助我。譬如说，我在和阮章竞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曾说：关于我的事件，我认为大概是有那么几个人发了神经病，或是有人一定要故意为难我，才造成这矛盾百出，百思不解的一连串事件。我也在一次给郑重（我的老婆）的信说到，我说：人们用这样的方法审查我的历史，这真是很有意思，世界上只有天才和疯子，才能从我的历史上做出“犯法”的结论来的。我自己也知道这样解释是不对的，人们并没有发疯，大概也

不至于有人故意长期要和我为难，但是除此以外，我总无法解释一连串的事实，这是我最苦恼的事。只要有了正确的解释，我相信一切所谓思想问题，情绪问题，态度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事件应当从1954年文艺报发表批评于黑丁关于李准小说的文章开始说起。众所周知，文艺批评在当时很受一些责备，作家们也不满意，我认为主要是□□□（原文不清——恭怀注）思想混乱，文艺领导机关缺乏战斗性和原则性。笼统地责备文艺批评粗暴，或是文艺批评软弱，都不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两种倾向同时严重地存在）。对新作品简单地或是肯定或是否定，而且不大愿意展开讨论，这可以代表前者。读者要求有更多更好的批评（这完全是对的），引起编辑部的责任感，这也是对的。但从这里有时因考虑不够而发表了一些不够全面的有缺点的批评，这自然也是很难完全避免。问题是在学术问题范围内应当允许讨论，而这种精神整个文艺界都很差，我认为这才是“粗暴”的主要原因。至于软弱，那只要指出对胡风，对红楼梦（在文艺范围内说）思想上的斗争的迟疑和犹豫就足够了。这种摇摆状态，是文艺批评最大的特点，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在文艺报编辑部本身，冯雪峰同志对文艺批评是很消极的，我也同样是觉得没有办法，不过我因为主持日场愦体编辑业务，问题就要碰到，因此有时也想在自己认为问题比较明显的情况下，组织一些批评文章。这是这件事实的前提条件。

于黑丁的文章发表的时候，编辑部侯民泽同志（他分工阅读中南的刊物）谈了文章和李准的小说，在会上汇报，认为于的文章对这小说来说是“拔苗助长”的方式（编辑部认为：对新作品十分过火的捧场，这是粗暴批评的另一面，这倾向也是应当批评的）。我在会上提议他作些准备，起草一个写作提纲对于的文章可以提出意见。侯将提纲交我以后，我发现提法上有些过火之处（他因为要指摘于的文章捧得过火的地方，就把小说本身的缺点强调）。我不时发现他有些火，就要他把小说也找来看。我看了小说后，就提出请他注意，这小说是应当肯定的，请他修改文章，并经大家看过修改后署名李琮发表了。这文章引起很利害反响，首先，河南文艺界对这小说本来有争论，一部分不重视小说的人认为文艺报支持了他们，纷纷写信来拥护李琮的文章。另一方面，于黑丁同志写了一封信给冯雪峰，提出抗议。雪峰同志事先并没有把于的信给我看，也没有在编辑会议上提出。在一次开会回来的车上，他把回于的信给我看，信上表示编辑部不对，并提到我（和——恭怀加）他（有——恭怀加）同样意见。我在车上即向他提出异议，我认为于的文章是有毛病的，可以批评，也可以讨论，不应该先向于说我们全错了。我不

同意对文艺批评用这种庸俗的“息事宁人”的方法，我提议把信中我的名字划掉，两人这就发生了争吵，我认为这样不分是非，各打五十板的方法，对工作并无好处，并损害了文艺报工作。

这件事在作家协会引起一些反响。也在中南地区发生了反响。当时编辑部收到的全是拥护李琮文章的信，当我们编辑通讯员内部通报的时候，我在会上提议可以把这些意见编进去。当这些材料编好送给我看时，当时正是冯和我关于此事有不同意见的时候。过去通讯员内部通报一直是由我负责审稿的，这次我嘱咐编通报的同志将这一部分材料同时送冯审查，并写了一封信给冯，说明请他审阅的意思。冯看了并未表示反对，就退回来了。我们也就发了稿。当通报出来之后，我们开始收到另一部分读者反对李琮文章的意见（主要是河南日报的），这时我们也开始选择反对的意见编入编辑部内部通报（另一种内部材料，主要是供文艺界领导同志参考的）里。

正是这一时候，人民文学发表了路翎的几篇小说，在文艺界引起了普遍的意见。

作家协会党组准备讨论这些问题，同时进行关于党的四中全会文件的学习。周扬同志在这一次党组会上，首先对文艺报李琮文章及人民文学路翎的小说都提出了意见。

他首先说发表路翎的文章并不是文艺方向问题，但对文艺报的问题，却提得很尖锐，这引起我的不平。同时，他对某些问题的提法，引起我当时不得不插言提醒他。譬如他说，地方文联的主席（指于黑丁）文艺报不能随便批评，说这是纪律性问题。

我当时提出，过去并无此种规定。他说过去既无规定，那么以后注意就是，这次也就算了。又说：当《人民日报》转载了李准的小说并加按语，发表后文艺报却说这小说有缺点，岂不是故意同党报捣蛋，反对党报（由于他既不根据事实，却把问题提得这样尖锐，我立即插言，说，周扬同志请你注意，我们并不知道党报要转载这一小说，同时文艺报的文章是半个月以前发稿的，这恐怕不能说是有意反对党报吧。

这引起他大为愤怒，他立即拍了桌子，并不许我发言），又说，我们在通报上发表读者来信，是专挑拥护李琮文章的，把反对的意见压了，利用群众意见来威胁党云云（事实已如上述，完全不是这样），他还说，我们请冯审查这部分材料也是无纪律无组织倾向云云。

党组会决定组织文章来反对李琮，当（即——恭怀注）推定由康濯起草，两三天后，康濯文章写出来，并经过周扬、林默涵等同志修改，送到编辑部发稿。我仔细阅读康的文章，发现经修改的地方很多，我认为这文章打击文艺报过火，保护于黑丁的文章不必要。当时即向冯建议，再修改时开会讨论这文章，为节省时间起见，可由我先用红笔改一遍，如有意见，再改回来。晚上，康濯在会前向我说，原来他写得比较温和，后来就改得更尖锐了云云。晚上的修改会议由于各人坚持己见，实际上成了讨价还价的样子，大家都很不耐烦，我也只好不再坚持，重新又改回来很多，这就是发表了的那篇文章，并由冯雪峰写了按语，承认文艺报对这一篇作品看法不对云云。事实上是这样：康的文章中几乎认为于的文章没有毛病，但后来中南长江文艺转载这一文章时，却不得不首先承认于的文章分寸很不对。这就和康的文章有了原则上的矛盾。

从这一情形看来，到现在我还以为：1．于文章是完全可以批评，应当批评的，决不可以归结为无纪律性。 2．李琮的文章有缺点（即对小说肯定不够），可以另外用文章来进行讨论， 而不需要用完全否定的过分严重的方法来“纠正”。3．编辑部对这小说估计不够高，应当用仔细的对小说的再评价来进行教育，而不应当用“整思想”的方式，这反而不能解决问题。事实确是如此，文艺报发表了康的文章和按语，编辑部人员都是反感的，都觉得有冤无处申，即如亲手起草按语的冯雪峰，在对待新生力量这一问题，显然并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这从相隔三四个月以后他在处理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所加按语的错误来看，就可以更明白了，李琮事件就这样结束。在接着所开的学习四中全会文件的党组会上，很多人就针对着我，并围绕“反领导”这一中心对我提出意见。我向周扬同志说，党组会这样开法是不民主的。后来也就不开了。周扬同志说要找我谈谈。我们也谈过一次话，他要我检讨，我也认为我应当检讨，于是在一次周、冯、丁、林、我五人的小会上（在丁玲家），我作了一次检讨，主要是检查自己和领导同志的关系。我承认我有时为了强调讲道理，自己态度不够注意。并举出幼年时代读过的一个战国故事为例，我并说：从我的认识，自然认为这故事和我们所处情况大不相同，但我自己认为领导同志对下面同志应当谦虚些，多倾听些，这还是要注意的。在这一会上，决定我于6月1日休假， 下去深入生活，6月份我未离京，主要是想做一些准备工作，阅读一些有关的书报，并计划把几篇答应别的杂志的文章写起来（后来只给中国青年写了一篇介绍《保卫延安》的）。有一次在丁玲同志家里，她催我赶快下去，我说明上述原因后，并附带地说，我也很老实告诉你，我的经济也很困难，这几篇文章写了后，多少也可以安一安家。第二天，她派人送来了200元钱

（我和丁玲除工作外，平常并无这种私人生活上的这一类交往，当时我觉得盛意难却，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即写信道谢，说惭愧无地云云）。我本来打算七月离京，谁知7月1日我脊骨神经炎大为发作， 躺在床上20多天，才能起床走动，一直到9月初，才和戈扬、艾青一起去浙江海岸阵地去。刚到上海第二天，就收到周扬同志的电报，命我立即回京。

这当时，就是发生了红楼梦问题的时候。

关于李、蓝文章的发表，我正在休假期中，在我未离京前已在会议上听过一些传达。我回京后，当天就参加了会议，好几个同志要我在文联大会上做检讨。当时文艺报内部的工作检查并未结束，很多问题尚未弄清，编辑部同人，开始对我的意见是不多的，有的也只是一般性的问题。红楼梦问题，我并没有直接的责任问题，编辑部的检查工作尚未有结论，在这样的时候，我曾表示无法检讨，实在是因为自己还没有认识自己有多少错误，有哪种性质上的错误。和这同时，一起开着四种会议，在中宣部由周扬同志主持的检查文艺报的会议，作协支部讨论我处分的会议，文联召开的从讨论红楼梦问题，批评文艺报问题，批评胡风问题，编辑部内部检查工作的会议。这些都交叉着开的。我在文联的两次（会议上——恭怀加）做了敷衍了事的检讨，在中宣部会上和支部大会上做了比较深入的检讨，在编辑部会上也做了检讨。这些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年一月。这一时期，我的思想上是极端矛盾的。

这些会议，已把我的问题提到反党、反中央、反领导，独立王国，骄傲自大的这一类范围上了。在作协支部大会上，作家杨朔并无充分根据，首先提出应当把我撤职的建议，作协主席并未充分讨论，更没有让受处分的本人出席，就做出了撤职的决定。在最后的支部大会上，我则勉强地接受了处分（也是经过反复的）。我首先在中宣部的会上提出请求让我说清事实，我说，在这些会所谓揭露的一些事实，可分三类，第一类，根本不是事实，第二类，别人的事实强放在我头上，第三，多少有些事实根据，但看法问题，尚可讨论。我话未完即被斥为向党进攻，反党。我一方面，认识到必须坚持事实真相，而另一方面，当时的气氛和某些做法，使我根本丧失了当时为自己辩护的勇气和可能。同时，我又受了一些庸俗的自由主义的劝告的影响，例如，丁玲说，文艺报既然在红楼梦问题上确实犯了大错误，又被胡风攻击得一塌糊涂，譬如赌徒，大的本钱蚀光了，你难道还想捞回一些小的吗？例如冯雪峰对我说：你文艺报工作不干了，未必没有好处，你可以去创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例如艾青说，周扬同志已向刘少奇同志反映，说你是抗上，

还有什么办法呢，咽了这口气吧。支书康濯则说，如果你当支书，也只好这样干吧。这以前，周扬同志在中宣部会上说，要斗争胡风。当时，文艺界好些同志传说陈企霞要被开除党籍。

这些情况使我丧失理智（这其实是自己软弱），但是使我产生应付式的检查和勉强接受处分的重要一点，却是我听了周扬同志在中宣部会上提出“攘外必先安内”。

“攘外”指的胡风之类，“安内”主要自然是指我了。我已知道我们必定要对胡风展开斗争了，如果我当时坚持自己意见，相持不下，就会影响这一战斗。我从这样的“打算”下十分勉强地接受了处分。我当时还存了一个希望，我认为中宣部总支或中直党委在批准这处分时可能还有机会让我说一说，但终于没有。我在那样空气下自己也不敢提出，当时的空气对我说来是紧张的，譬如说在中宣部会上，其实并无什么根据，竟有人说我是文艺界的高岗。譬如说，前文艺报的编委张光年（光未然）提出建议，他认为文艺报整个文艺方向和路线（在我们党切生活的习惯中，一提到方向路线，完全是能使人觉得严重的，这也是应该如此的）有问题，要求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恭怀加） 审查， 这委员（会——恭怀加）也在大会上产生（附带说一下，这委员会并无任何审查结果的报告，至少作为文艺报负责人之一的我，完全不知道这委员会如何工作的，有什么结果）。

这种情况，使我在精神上有了很大负担，一直到梅山后（我3月20日左右离京）才在群众生活中排除了一些，情绪也就健康了些。但是，当我在梅山读到《人民日报》公布第一批胡风材料时所加按语提出不应作假的检讨，我实在出了一身冷汗。

我觉得我的勉强接受处分与应付式的检讨，何尝不是一种虚假。这想法，当我接到周扬、刘白羽两同志调我回京的电报后到达北京的第一天，就向党组副书记刘白羽同志陈述了的。

1955年8月1日夜， 我按照来电的要求抵达北京，1日晚即参加了党组扩大会上关于匿名信问题的讨论。第一次会主要是文艺报几个同志的发言，他们一致认为信是我写的。会后，周扬、丁玲、刘白羽等同志留下我来同我谈话，我申辩了一下，并提出一些意见。我向周扬同志说，不能把很多不明不白的事情，强加在（我——恭怀加）头上。我举例说，过去认为我在编辑部一次谈话中所曾举出的“相濡以沫”

的话是一种反党的罪状，事实完全不是如此，恰恰在讨论时，《人民日报》的一篇短文中也引用过这句“成语”，为什么允许别人引用，不允许我引用呢。我希望弄清各种事实。周扬同志回答我说：你就是这样说也是错的。这句（话——恭怀加）引起我很大反感，我认为这就根本不允许我说清事实，当时我心里想，这大概是秦桧对付岳飞的方法，但是，我不敢把这话说出口，怕又激怒了他。他又说，当你被当作思想典型的时候，为什么那样不愿意呢，做了典型还可以给别人作教训呢（大意）。我当然也不同意这样意见，但我已不想再辩护了。丁玲同志说要讨论陈企霞的工作与思想问题，如果不先解决她自己同周扬同志的领导关系问题，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我认为她这话是有一些道理的）。但是她后来说：她在这么多年来几次和我一起工作，好像背了一个大包袱，也该卸一下了。这话也引起（我——恭怀加）反感。我是为党工作，并不是为丁玲个人工作。如果说，共同工作的同志身上的缺点成为包袱的话，那么谁背谁的包袱，背多背少还值得大研究呢。最后，周扬同志又说，你看，今天晚上大家一起来检举你，该不是布置的吧。我当即回答他说：如果是正确的思想斗争的话，不但可以布置，而且也是应当布置的。问题是斗争得对不对，不在于是否经过领导的布置。

这以后，又继续开了二次党组扩大会，空气愈来愈紧张，所有所谓“揭露”的问题，已使我不能辩白，我在向组织上写了一次书面报告后，就不让参加这样的会了。在我所参加的最后一次的会上，同一个在去年中宣部会上提出要检查文艺报方向路线却没有丝毫结果的张光年（即光未然）同志提出要停止我的党籍，审查我的历史，党内公布我的问题。他并□□（原文不清——恭怀注）说去年讨论红楼梦时他曾向周扬同志提议要在党内公布我的材料，周扬没有照办，所以陈不承认错误云云。　8月19日晚上，我被宣布逮捕（有逮捕证），搜查了住所，但始终并未宣布是犯的什么罪。我当场说了这样三句话：这样的决定是根本错误的，完全把范围搞乱了。康濯、张僖两位同志（他们是带来捕人的）你们以后检查要深刻些。我是服从政府法令，才勉强就捕。

这以后，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还使我莫名其妙的被迫丧失自由的生活，到1956年5月22日为止，共计9个月零3天。

这就是我所遭遇的整个事件的一幅图画。　我编了5年文艺报，从李琮文章的讨论开始，　实际上是处于“失业状态”三年，其中9个多月失掉了自由。这为的是什么呢，我自己找不出解答。

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我深深思索所有的事件和问题，我对于我在

这样的运动中采取了应付式的检讨，这才是我最大的最严重的错误，我甚至应当把自己这一行动看成是一次思想上政治上一次严重的摇摆，不管为的是什么，不管当时受多少自由主义的劝告，这责任我自己是应当负的，并且一定要作为个人工作经历中一次最深刻的教训。

其次，我在深刻的思考中发现，从思想问题与工作问题开始，一直到政治问题法律问题，贯串着在对我的斗争中，其内容和方法都充满了浓厚的逼供信色彩，这首先表现：先对一个人有一个固定的看法，然后发动群众进行所谓“揭露”，对于“揭露”出来的事实，完全不加分析，有些是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事实是别人的，甚至这事实的当事人本人也在场，也不加说明和区别。相反的，对于有些关键性的事情，并不积极调查研究，或形式上调查了而实际上却按上述先入的固定看法来选择这些所谓“事实”，以充实自己原先固定看法，对于会上某些既不了解情况，却又逞一时之快的无根无据的意见与建议，会上既不讨论研究，看重相反之见，会后也完全缺乏科学的冷静的考虑，这就会轻率地作出一些不对头的结论来了。对于一个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党员，完全放弃了历史的、全面的认识与考察。在这些会上，根本不能产生不同的意见，不要说允许本人声辩了。

我在被捕一次书面（意见——恭怀加）上，曾说逼供信分子惯于“金里淘沙”，然后“聚沙成塔”，就当作一座伟大的建筑物，他根本不考虑后果如何，也不想一想，这建筑能存在多久。

以上主要是我遭遇的经过情况，自然，由于我失去了自由，还有很多事实和很多所谓“事实”是我所不知道的。但是，仅仅按照我知道的事实，已足够构成一幅使人深刻考虑的图画了。下面，我将在第二部分，把一些过去构成所谓反党问题，以及构成处分的一系列所谓事实，作一个分别的陈述。

我相信，让事实来回答各种各样的看法，这就是最后必然会得出一个正确的看法的。

二

我在第一部分的陈述中已按事件的次序叙明了全部经过。那么，我们可以问：从最初的斗争开始，一直到宣布逮捕，究竟有些什么具体问题，在每次会议或谈话中屡次被责备、议论，并且有些被作为处分及犯罪的具体的内容呢？这也就是我屡次提出要求让我说明事实而恰恰不但

不被允许，反而被扣上这样那样的大帽子，甚至得到：你就是这样说也是错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加以逐条的说明。我在中宣部会上曾提出事实的三种情况。但并没有给以陈述的机会，我在给公安部某局长的信上也声明，如果真有什么材料，我敢说在一百件材料有九十件材料是假的，留下一些多少有些根据的话，也是被歪曲了。这话确实有些过分，如果有些问题在思想与工作的范围来说，我自己并不是完全没有缺点和错误的话，那么，从纪律处分，犯罪这些范围来说情形正是如此。人们对我的责备首先把事实的非事实的汇报弄到，然后又把事实实际范围弄乱，这就使问题看起来复杂，而处理更使人莫名其妙。

有一次康濯与我五弟陈适五谈话，说我有六十条罪状，可惜他不敢公布。我倒愿意知道这六十条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破烂的垃圾堆，很可以在讨论与辩驳的阳光中晒它一晒，看还能留下些什么。我下面逐条的事实，大概很多是在那六十条里面的，我虽然不知道那六十条究竟是什么，那么先让我把我已知道（大部分是在斗争会和讨论处分中提出来的）的每一条先陈述一下吧：首先，应当说一说所谓“反领导”的问题。

刘白羽同志以及还有些同志曾在会上诬蔑我是一贯反领导的，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信口胡说。从1940年我到延安开始，16年来我先后曾和许多我们党内宣传文化部门的负责同志一起工作过，有时在他们领导下工作，有时直接作他们的助手：如胡乔木、博古、杨松、陆定一、丁玲、艾思奇、艾青、沙可夫、成仿吾、张如心、萧三、周扬、钱俊瑞、李伯钊、冯雪峰等等。自然，在工作过程中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在互相了解可能也会有所不同，但这是在实际工作□□（原文不清——恭怀注）是不可免的，□□□□（原文不清——恭怀注）的意见，有时甚至是必要的，而且甚至应当是受鼓励的。如果有时同个别同志由于□□（原文不清——恭怀注）不同态度不够好，或者为了坚持自己认为正确意见而争论了一下，这也是我们生活中正常的事情，从哪里可以得出一些反领导的结论来呢。

这次□□（原文不清——恭怀注）处分以来所提到的，具体是指和周扬同志的关系。我对周扬同志的理论、工作与作风，在其中某些方面是有一些意见的，过去，在专门会议上也提出过（我从进北京城以前，除了在张家□□□□（原文不清——恭怀注）时期不到一月外，并没有直接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在上次口头陈述时，曾提及在到北京以前同他的关系和对他的意见，（此处从略）。但我从来没有“反”

他的意思，更没有“一贯反”的事实，事实却是相反，我只要举第一

次文代大会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基本情况就可以了（是的，最后却发生了一次争吵，下面应当说到）。

最常被人们提到的是两次和周扬同志所谓“吵架”的事件。人们说我拍桌子，其实两次的桌子都是他拍的。第一次就发生在文代大会结束后，整个第一次文代大会从三月到八、九月结束，我在周扬和沙可夫同志领导下，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事情，周扬同志对我也没有提过什么意见。我除了工作中的问题以外，对他本来也没有什么意见。在文代大会结束的一次党组会议上（当时我是党组秘书），周扬同志严厉责备我不帮马少波找房子，认为是故意违抗他的命令，并说我对马彦祥发脾气，我稍稍声辩了一下，他拍桌子骂我：“你这算什么共产党员！”我觉得受侮辱当即回答：“你这算什么领导。”这就闹僵了。周扬同志向在座三四十个文艺界负责同志说：“你们大家说说，这太不像话。”当时并无任何人发言，后来周扬同志只好说：“沙可夫同志，开了会同企霞谈谈吧。”事后，沙可夫同志同我谈了一次不关痛痒的话，也就算了。

必须弄清楚这次争吵的具体内容，才能使人明白真相。第一次文代大会快结束，周扬同志筹备设立文化部，在这时期文联和文化部的工作搅在一起，我也曾帮助周扬同志做一些有关于文化部的事情。但慢慢地就分开来了（这情况是自然的）。文代会山东代表马少波，一家好几口，还有别的人，周扬同志决定留他们在文化部工作（这我是知道的）。有一天，事先并未接到通知，马少波同志派人拿着周扬同志的条子要我立刻给他们找房子。我当时认为马少波等已决定在文化部工作，不应由文联借给住所，文联房子虽有一些，但当时都住满了人，马少波他们人多，一时也无法腾出空房来，而周扬同志事先并未交代清楚，我没有准备。因此我告诉来人，暂时不能解决。事后我告诉周扬、沙可夫同志，这就是全部经过，我认为这事情我并没有错误，这虽是上级同志交办的事，但究竟不能□□（原文不清——恭怀注）地就□□□（原文不清——恭怀注）作命令，而且即使是上级一时不了解情况而下的命令，下级实在一时根本没法做到，除非特殊情况，也是允许再作商量的。周扬同志有什么必要坚持这是命令而且在会上大发脾气，骂我不像共产党员呢。本来，在进城不久，工作紧张的情况，这种事情也是普遍可能发生的，如果不采取上下互相按实际情况来研究并体谅困难，那么，试问叫下面同志如何工作呢。

马彦祥事件更叫人莫名其妙，当时马是文代会演出方面的负责人。有一次，为了要求梅兰芳演出一次出钱的问题，马与我在电话中商量演出报酬，我当时并不了解梅的演出是不能少钱的，曾向马提议减少演出

费用（这费用当时觉得很大），马发脾气把电话挂了，却到周扬同志处说我发脾气把电话挂了。马彦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很多人是知道的。周扬同志听信了他的话，不查查具体情况，却拿来作为材料在会上这样数落责备我，而且更不允许我说明事实，那又叫人怎么办呢。这些事情本来都是小事，甚至是一些无原则纠纷，有时更是实际工作中很难避免的事，却长期被作为反领导的内容，难道有这样的必要吗？

第二次争吵，桌子也是周扬同志拍的，那就是讨论李琮的时候，我已在第一部分叙述过了，不必重复。这些事情，周扬同志在会议上，以及别的同志也常常提到，但是，我想，即使我有什么错误，周扬同志的胸怀能和他的工作岗位相称，这些事一经说明白，我相信他自己也会哑然失笑的。又何必严重得提到反领导的高度，使人承受不起呢。

另一个事例也是周扬自己以及别的同志在会上常提到的，就是说，周扬同志找我谈话，我抗而不去，这也不是事实。那就是在第一部分提到过李琮问题以后那一次，会上说过他要找我谈一次话，我天天等着，过了很久，有一次他的女秘书来电话说周扬同志要我今天晚上去谈话。那天晚上，我们已决定开党小组会，我在电话中向秘书同志说，是否可以改一改期，因为要开党的会议，她去问了一下后说可以。

后来不知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谈了的。那次谈话，情况是良好的，我想周扬同志也该记得。

所谓反领导的另一个事件的内容是一篇我所写的文章《关于文艺批评》的审阅问题。这问题也是周扬同志自己在会上提到的。这篇文章本来是批评上海文汇报罗石（现已知是胡风分子）和北京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王淑明所写两篇文章的，这两篇谩骂了当时的文艺批评，完全是错误的。编辑部决定我写这篇文章，写好以后，大家的意见是这问题较大，应当请乔木同志审阅一下（当时乔木同志经常对文艺报有所指示），我把来稿寄给乔木同志后，就想到也应当请周扬同志审查，所以接着也送了一份请周扬同志审查。乔木同志很快把文章寄回来了，改了很多。不久，周扬同志的审阅稿也退回来了，也改了一些。当时因为付印很急，我又仔细看了一下他们两人改的并无矛盾之处，就综合两人所改的，完全没有损害他们所修改的，付印了。刊物出版后，乔木和周扬同志都并未提出别的意见。但事隔一二年后，周扬两同志却提出这也是反领导内容之一，这问题一直使我不懂。附带说一下，在批评文艺报的文联大会上，刘白羽曾经发言，大大批评我写的这篇《关于文艺批评》文章。

他实在很替胡风分子罗石诬蔑批评翻了一次案。至于王淑明的文章，他在文章发表的同时已作公开检讨，如果根据刘的意见，他也应该翻案。

整个所谓“反领导”的内容就是如此。下面，我再以事实为基础，陈述一些常被提到并作为处分与定罪内容的事件：关于所谓反党问题，因无具体内容，只是一顶空帽子，所以我无从说起。

关于所谓反中央问题，指的新人物问题的讨论。

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关于整个新人物问题的讨论，说来话长，此处从略。说我在这问题上反中央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二次文代大会期间，传达过中央对文艺工作六条意见，其中有一条提到写英雄人物是否能写缺点问题，传达只提到，某些实际人物身上的缺点，在重要描写的情形下可以忽视，并举水浒传描写鲁智深并不涉及他的恋爱家庭生活为例。我从来不曾主张过人物必须写缺点，或绝不许写缺点，我以为这样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人物有大小，作者批判和反映人物，本人思想水平与艺术水平有高低，而且优点缺点，如果脱离了社会的、历史的条件，是无法思考的。

还有人物优点、缺点，是否描写也被决定于作品题材和主题的要求。能写或不能写，万应灵方是没有的。我认为我这主张并没有和中央所传达的矛盾。而且这是纯粹学术和文艺学理论的问题，即使有分歧，也允许讨论，怎能归结成为反中央的罪状。

何况我起草的一篇文章，本来是提供讨论，也并未发表呢。

在中宣部会上，被提的最尖锐的一个问题，是所谓“自封主编”的事件。林默涵同志大声疾呼地说：就这一条已经够了，同饶漱石一样。事实是如何呢？文艺报初办的时候，编者并未署名，决定丁、陈、萧三人编文艺报，并有一个编委会，我并未参与。编了不久，有一次丁玲同志说，她已同周扬同志商量过，决定编者署名，由丁玲主编，我和萧殷副主编，我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这问题，随便说了一句，署名不署名没有关系，主编还有什么副的。丁玲同志迟疑了一下，她说那么慢一点发表吧，再商量一下，大概又隔了一二期，丁玲同志才说她、周扬同志的意见，可以署三人主编。这件事经过就是如此。现在我可以问，如果我是自封，为什么封了二三年并没有人在会上或是在一定场合下提出，作为领导的丁玲、周扬根本没有和我谈过，隔了三五年才提出作了罪状呢。

我还可以问，后来冯雪峰主编了，我只是编委之一，却负责日常编辑工作，但我并没有提过任何意见。如果我是一个醉心名位不择手段的人，能这样吗？在我入党的二十多年中，如果查出我曾经为个人名誉地位及待遇进行过任何不正当的活动，那就可以说这条罪状还有可能。否则问题这样的提法是毫无根据的。事情可奇怪的还在这里，我自封后来在处分决定中曾屡次改字，由自封改为自居，又改为自称。何地自居，何处自称？这难道不都可以说是捕风捉影吗？

另外一些称为罪状的，是从我平时谈话中东摘一句，西取一段，不顾事实，却歪曲为加上一顶大帽子所造成的。有的更为滑稽，不是望文主义，就是在你所用的比喻的跛脚（列宁引用过法国谚语说，譬喻总是跛脚的）部分大做文章。下面可举一些常被提起的著名的例子。

所谓“幸福”问题。作协整党后，进行评级会议，在编辑部会议上。编辑周文博谈到说，在企霞同志领导下我们是幸福的。我当时即批评了他，我说：在党的领导下，到处都是幸福的，如果你有进步，那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后来，当时和全编辑部都闹得不好的王知还，取了周说的一句话，根本不提我对他的批评，到处告状。这以后，很多人都向王知还学，于是这一条就这样作为“独立王国”的主要内容了。后来周还特别向党支部写过汇报说明真相，但没有用，这仍是我的处分决定里的重要的一条。同志们，什么原则允许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的？（附带说一句，如果文艺报编辑部真是独立王国，那么首先“揭发”的正是王知还。如果陈企霞真是像处分决定中所写的，那么我也应该向党建议，应当大大奖励王知还。如果她真正首先是这样一个大案子的发难者，那么，我以为奖她为一个劳动英雄，先进工作者也不算过分，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正是王知还，她歇斯底里地诬蔑了全体文艺报编辑和工作人员！虽然，即使她，也还不敢加上反党、反中央、反领导、独立王国等等大帽子哩！）

所谓“相濡以沫”的问题。这是我在编辑部一次谈话中曾援引到过的一句话。

事实是怎样呢？当时文艺报工作困难，编辑部内情绪不好，主要是因为文艺批评展不开，不能回答读者的要求。在大家的苦闷情绪下，有时个别年青同志常为小事争吵，有一次大家对唐因提出苛求的意见，我谈了一次话，我大意是说，我们工作有困难，这是事实，但是困难不应使我们产生无原则的纠纷，相反，我们应当在小问题上互相原谅，互相帮助，这帮助也包括互相正常的批评在内，但不应该闹无原则的纠纷。

我们有党的领导，当然不是涸辙枯鱼，但是我们自己力量很小，在困难尚未解决之前，应当互相帮助，学习“相濡以沫”的精神……。人们也可以说引用这句成语不够妥当，也可以说这样说不够全面。文艺报当时的困难原因很多，但文艺报的党组织，或是某一个具体负责同志领导得不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人们为什么可以从这句话里得出这是不要“党的领导”，这是“独立王国”的表现呢？就是周扬同志，他不是也不能不承认自己对文艺报曾经放弃领导吗？

所谓“创痕与苍蝇”问题。这句话之常被提出，并竟被说成是我诬蔑党，诬蔑同志的证据，这也是很可深思的。这事情发生在这样情况下面：有一次萧殷同志去北大做报告，回来对文艺报同志说，在北大学生中有人说过，文艺报和人民文学是死对头，是互相揭底的。文艺报同志都很骇异，对这种流言蜚语感觉很不安。我在一次会上说：党叫我们做文艺批评的工作，难免得罪人，并且更不能杜绝一些嘁嘁喳喳的私议。我说，文艺批评作为思想斗争来看，这是一种战斗，既然是战斗，战士就可能受伤。鲁迅先生说，战士受伤了，难免会有几个苍蝇，在他的伤口上嗡嗡。

到现在为止，对于这些流言蜚语，我认为这样看法并没有大错，硬说是诬蔑党，真不知从何说起。最有意思的是，关于这一问题，有一次康濯对我说，原来处分上有这一条，后来觉得你也许是对胡风分子之类嘁嘁喳喳之流说的，所以去掉了。他告诉我这事，一方面表示处分决定是慎重的，但是他却忘记了，在多次处分讨论会上，人们把这句话作为我侮辱党的根据，正是说得何等响亮。而且据说最近他和陈适五谈话时却又把这句话当作罪状了。事情即使故意而且滑稽，也不应该到这样程度。

上面二件事情，曾经是被当作大罪状而多次引用的，我也说明过多次了，但都没有用处，因此，不得不再在这里说一说。

关于文艺报编辑部成为独立王国的问题，人们屡次说什么不民主，无批评，无原则等等，我认为都是缺乏根据的。我不想再举那些实际上是没有的，或细小的但被当作实有的、巨大的那些事件了。总而言之，所谓独立王国，实在只是一顶高帽子。

三

我的被逮捕，　据宣布恢复自由时的说法，根据两点：１．说有人说

我说过有一支手枪和六颗子弹，　要打死别人再打死自己。２．历史上有和所谓托派（主要是翁涛）分子有关系。

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这实在是十分轻率的举动，而且更没有理由拖延这么久。说一说前一个根据吧，我曾有一支左轮枪和六颗子弹，这（是——恭怀加）北京军管时期组织上发的，有正式枪照。上述的话，我根本没有说过。我想来想去，只记得在第二（次——恭怀加）文代（会——恭怀加）以前，雪峰同志因为起草大会报告被否决而意志消沉，有一次他来我家，发牢骚似地说：如果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一定自杀了。我开玩笑说：要自杀，我这里还有一支枪六颗子弹呢！说了大家哈哈大笑。我相信雪峰同志绝不会把这样的事当认真的。至于说打死别人，那就从脑子里都没有想过。老实说，我根本不会打枪，而那支枪也好久不擦，恐怕早已锈坏了。我恢复自由，同老婆郑重谈起此事，她说，她是记得一次你醉了，曾胡说乱道，艾青曾跑来劝你，好像你说过自杀之类的话，至于说打死别人，那是连影子也没有的。除此之外，更不知从何说起。用这样的根据捕人，实在是太轻率了。

至于翁涛问题，作为逮捕的根据，同样是轻率的。翁涛曾一度同我一起在苏联大使馆工作过，由于他不能完成任务，我们照事实报告了上级，才由大使馆出面割断同他的关系的。知道这事情的人都在。而且这问题，在延安审干时都审查过的。

翁涛是陈适五幼年时代的朋友，陈适五也和他在大使馆系统工作过，既然翁涛问题这么重要，居然是逮捕的根据之一，那么为什么陈适五同志在年底前归国，却不向他去调查最直接的材料呢？既这样重要，又这样轻率，这真叫百思不得其解。

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是我们国家的公安部门上了作协某些人荒谬的估计的当。作协的某些同志，完全用逼供信方式在对付我的问题。从思想问题到法律问题，其痕迹斑斑可寻。到现在为止，我还认为我是逮捕，因为有正式的逮捕状，而且恐唬我说，公安部有我的材料云云。这以后，除了失去自由七八天后有康、张、阮章竞三同志来作过恐吓式的谈话以外，没有宣布过什么罪状，更没有正式审，一直到四个月之外，根本无人过问，这真使人奇怪。在这四个月中不许看书看报，我给老婆写信都被扣留。被逮捕时，根本没有明确告诉我的家属，搜查住所，我的孩子曾质问康濯，你为什么拿爸爸的东西，他还撒谎说替你爸爸整理整理，这真叫做又要瞎做又是胆小。

三四个月以后，我的老婆曾去找作协一些负责人，很难找，都是推三推四的，根本不明确答复问题。只有一次张僖同志曾对郑重说：被捕前是为了匿名信问题，逮捕后变成了“丁陈反党集团”问题。而现在却又变成上述两件更莫名其妙的事，这也是使人不解的。

我的岳母是一个旧家庭妇女老太大，70多岁了，当时住在我家，我老婆因为发生了这事，想将她送回上海去，她要求来见我一次面，竟被拒绝。老太大对女儿说，如果老四得罪了什么人，她可以摆酒叩头，不要把好人当作坏人，这当然是她的旧看法。她既不被允许见我一次，哭着就回上海了，回上海后生了一次大病，几乎死去，我认为即使我真犯罪，作协的同志都不该对老年人如此没有人道。如果他们太不放心，尽可以监视我们见面。

不让看书看报，除了逼人发疯还有什么理由？被隔离在作协角落小间里，两人看守，生活上是不堪设想的。而事实上看守却如同儿戏。康等口口声声说照顾，实际上却在尽量虐待。第一次康说，公安部有你材料，应送监狱，因为老干部，可以照顾，住在机关。我说，你这话不对，如果犯罪，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必照顾，如不能肯定犯罪，根本不应使人丧失自由。他无话可答。

12月中旬（离被捕4个月了）　阮章竞同志和一个公安部的局长同志找我谈话，他让我说话，这是他最好的一点，但从他对我的看法看来，完全受了作家协会某些人逼供信的影响，我曾请求他让去公安机关或监狱，他说这不必。这次谈话我才第一次听说，我这是停职反省。谈话后我曾写给他长信一封，要求他考虑应即恢复自由，他至今并未答复。我屡次问阮章竞同志，他一会儿说局长病了，我说病了也得有人接替工作。一会儿阮又说局长不知到哪儿去了。这封信里我还提出很多问题和意见，至今未见答复，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

这以后，允许搬到对面小房间单独住，允许看报了。生活稍好了一些，张僖同志还说生活上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提，我要求把家里的收音机送来，使能稍稍有文化娱乐，就答应了，但拿来后却又给扣住了。说是我态度不好，不给了。作协某些人，实际上是在同我开玩笑。我说该给就给，不该给就不给，不要用拿糖骗小孩的方法，说叫叔叔给你糖吃，不叫不给。这对小孩已经是一种最恶劣的方法了，居然还学来对付自己的同志！有人屡屡说我态度不好，一直到今年二月间康濯和陈适五谈话，还说主要是态度问题。试问，世界上有以态度论罪的法律吗？其实我态度根本没有不好，我要求讲理，对于不讲理的一切行动，我必加抨

击，有时声音大些，问题尖锐些，这是有的。在这种情形下，还要责备别人态度，岂不等于砍了别人脑袋，还怪别（人——恭怀加）脖（子长得——恭怀加）细吗？

凡是正式讲道理，我都是平心静气谈的。第一（次——恭怀加）谈社会关系，翁涛问题是我自己提出的，而且谈得很平静很详细，这就足够说明情况是怎样的了。

陈适五前年回国的时候，合作总社根据作协总支的通知告诉了郑重，说适五回国了，她可以去看他，但不能谈政治。第一次合作总社的党是照样通知的。接着，有一个惠局长专门派一个人去同郑重说，刚才的通知是不对的，你们是一家人，又都是老党员，碰面不谈政治，这是不可能的，可以谈。这事后来郑重告诉我，我说，你们惠局长是通达人情法理的好干部，而作家协会某些人的这种规定，是既荒唐而又可笑的。但这种荒唐的规定，作协某些人居然还要重复一次，自己也不以为怪。

旧历新年后，答应我的家属来看我，小孩老婆先来，以后他们天天在我处吃饭。

过年时，郑重把我五弟带来了，引起了好大波浪，就又被禁止来看了。我据理力争，几天后又允许了。却又告诉郑重，叫她和我不许谈政治！

这以后老婆孩子放学下班都来我处，事实上监禁完全没有意义，两看守更成具文，但这情况竟还拖延三四个月之久。这以后由阮章竞同志和我联系，他声明他是负责处理我的问题的。但每次约定什么，必定失约，谈话一拖再拖。我要求立即恢复自由，阮都采取躲避推脱方法。我问他我究竟犯什么罪，他无言可答。有一次阮、康、张三人来谈一次话，由阮正式通知我，说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丁玲和我（的——恭怀加）问题（他们在我面前，未提反党集团这名词），但这事并无下文，到现在我仍莫名其妙。

后期两三个月来，阮的谈话比较客观了，我们也就谈得多些，但谈话机会是很少的，阮总是失约，我提的问题他避不作答，只说向上转达了。当时我也不知这上面指的是什么机构，后来知道是中宣部党委，但不理解怎么先一下子由作协转到公安部。 后来又从公安部转到中宣部党委会，到现在我还莫名其妙。这样一直到5月22日才获得被宣布恢复自

由。最近总支××同志交给我一个文件，是中央十人小组批准我解除隔离的，时间是5月11日，但正式通知我却是5月22日，这11天耽搁又是为何原因。这许多使人莫名其妙的、百思不解的情形，我要求弄弄明白。

我的几点声明：

当我口头陈述完了的时候，党委书记认为：问题是复杂的，有关于思想的、学术的，也有关于组织的问题。是的，事实是如此，但这却实在并没有关于法律的，而却通过了公安部，让人无缘无故失去了近280天的自由，这也使我莫名其妙。

我的书报文件笔记本，一部分给搜查去了，一部分又经过一次我不在场的搬家，结果弄得很乱，要找材料也甚至根本不可能。因此，我应当声明，这陈述书个别枝节可能不够准确，但并无防于基本的、绝大部分的事实的真实性。请允许我保留以后查对、校正修改的机会。

我的身体在长期囚禁的生活中，已被搞得很坏，我目前已没有一小时以上的睡眠，一个晚上醒一二十次。因此在写这书面陈述的时候，也颇受健康上的影响，如果写得太烦碎，太冗长，请阅者多多原谅。

我这一次陈述，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只能说是初步的。我请求允许我继续有机会来逐步把事情说得更清楚，也请求党委会彻底调查所有事实，从根本上弄清这一事件。

1．我的被捕是公安部正式有逮捕状的，虽然始终没有宣布过我究竟犯什么罪。

因此现在我有理由要求公安部有正式手续撤销我的逮捕状，并说明误捕的理由和原因。　这意见曾（对——恭怀加）在5月22日向我宣布恢复自由的崔毅同志提过，现在，再提一下。

2．我请求党委让我知道究竟我为什么被捕，　谁做的决定，在我失去自由的九个月零三天的长时期，问题是怎么在被处理的全部情形。因为有很多事情，我到现在还不得其解。

3．我请求党委会经过调查研究以后，　考虑根本撤销我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的问题。

4．我请求党委责成作协把这次对我的历史审查做出具体的结论来。

5．我请求党委会给我机会让我知道我所应知道的党内关于国际国内形势， 以及党的重大问题的传达，以及补读一定文件。

6．我请求党委会立即恢复我的组织生活，并考虑分配我新的工作岗位。

7．我请求党委彻底检查从康濯担任支书以后的作协的党支部处理我的问题中有无偏向，如何产生？谁应负责？

8．我请求党委会向作协党组提出， 请党组重新考虑：提请作协主席团根本撤回去年对我的撤文艺报编辑职务的行政处分。请主席团给予机会让我在一定范围内为第二次理事会中对我的诬蔑和毁谤进行合法的辩护。

关于父亲的《陈述书》

陈恭怀

1988年元月16日，父亲不幸去世。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笔记本，里面有一篇1956年他写给中宣部党委和中宣部的《陈述书》的底稿。这对我来说，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从中可以知道很多1955年他被打成所谓“丁陈”反党集团的情况。事情过去已经四十多年了，不仅现在的年轻人对此一无所知，即便如我，虽然当时就在他的身边，并同他一起经历了以后多年的坎坷，对这一冤案也只是略知一二，而对其全部真相及来龙去脉，仍是如坠迷雾。“丁陈”案件是父亲一生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它不仅带给他超过过去经历的任何痛苦，包括童年时代四处流浪谋生，青年时代参加革命后被捕入狱，而且还彻底改变了他以后的命运以致于性格。

所以即使他在1980年前后重获改正后，这一事件带给他身体上与精神上的极大痛苦，仍使他难以摆脱，以致于后来他从不提起，也不愿别人在他面前提起它。父亲的最大痛苦在于，他所经受的那些本不该经受的曲解、羞辱、压力和迫害，都是来自自己的同志、领导，和他们的抗争，远比同明火执杖的敌人斗争要复杂困难得多，他只有把这种痛苦深深埋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这样一来，我们若想从他嘴里了解事件的经过，也就完全没有了可能。因此，《陈述书》的发现就成为我们了解“丁陈”

案件的情况的唯一可信的材料。

循着这条线索，后来我采访了一些知情人，又陆续读到一些当事人的有关回忆文章与书籍，特别是一些偶然也必然得到的珍贵的原始资料，如1957年秦兆阳给邵荃麟同志的两封信（见《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二期）等等，才逐渐知道了一些原委。

所谓“丁陈”问题，发生在1955年作协机关的“肃反”运动中，丁，即丁玲。

陈，即我的父亲陈企霞。从1949年《文艺报》创刊后，两人曾一起担任该刊的主要负责人 份说，他们都不是当时文艺界领导人、中宣部副部长、作协党组书记周扬所喜爱的人。

解放初期的文艺界，尽管有当年解放区文艺创作的雄厚基础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指引，但是，一方面在文艺理论和批评上深受苏联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及批评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从《文艺报》创刊到1955年前后，文艺界上层领导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一直是相当激烈的，抗战以前文艺界在上海的矛盾也不时重新流露。《文艺报》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和批评的阵地，自然就成为矛盾的焦点。所以《文艺报》的工作就不断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指责。

“丁陈”问题的发难，是从追查一封匿名信，追查丁玲与胡风有关“反革命关系”及康濯同志“揭发”丁、陈反党问题开始的，这封匿名信向中央反映了对作协党组某些人在处理《文艺报》问题上的不同看法。有关领导不是花力气去研究信中反映的问题真实与否，如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追查写信人是谁。我父亲与胡风没有关系。康濯的揭发信，当时只有三几位领导人看过，至今没有公开，无法得到其具体内容。如此，一时间，在作协及所属机关，特别是《文艺报》编辑部就大会小会不断，开始了全面“围剿”。

林默涵同志（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来到《文艺报》编辑部，“征求”大家对陈企霞同志的意见。大家开始不摸底，纷纷反映陈企霞如何领导有方，如何勤奋肯干。林顿时拉下脸来，勃然大怒：“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他评功摆好的！”人们不知所措，只好提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小问题。

从这里打不开缺口，他们又打算从历史上找父亲的问题。作协某领导人带着何路同志（作协人事室主任）等人到上海与南京，想从南京军区某部部长丁公量处抓到上海市公安局关押的“托派分子”翁涛与陈企霞之间的反革命关系的证据。丁公量没能提供出什么可以作为罪状的材料（延安审查干部时，陈企霞曾交待个人与翁涛认识，但个人不是托派，请组织审查），作协某领导人大为不满，就向上海公安局打报告说，丁公量私自向陈企霞透露机密……这以后，作协前后召开了十六次党组扩大会议，加紧揭发所谓“丁陈”问题的罪证与批斗“丁陈”的反党罪行，同时又通过莫须有的罪状将陈企霞逮捕。当时，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组长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组员有周扬等人。周扬因中宣部“肃反”领导小组（组长为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副组长为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认为逮捕陈企霞理由不足，不同意逮捕陈企霞，乃以作协“肃反”领导小组（组长刘白羽）名义，径报中央肃反领导小组，将陈企霞逮捕审查，至使陈不能参加后半截批斗“丁陈”的会议。作协肃反小组向中央肃反领导小组报告的陈企霞的反革命罪行是什么呢？　是1957年6月14

日秦兆阳给邵荃麟的信中所说的“何路曾到南京调查陈企霞的材料，回来后，刘白羽同志把一些本来不是确切可靠的材料当成可靠的材料加以运用。”（见《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二期《秦兆阳给邵荃麟同志的两封信》 ）何路说的是什么材料呢7原来是说丁公量利用职权，个人提审翁涛，不让翁涛交待陈企霞与丁公量是托派。天哪：南京军区写的证明材料，明确提出根本没有此事。人们不禁要问，这材料究竟是怎么出笼的？

就这样， 1955年8月19日，父亲被逮捕。从8月19日到次年5月22日，父亲被非法关押在东总布胡同22号作协大院西北角的一间平房里。这期间，作协党组一方面对父亲实行逼供信，逼他就范，另一方面向中央呈交题为《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并代中央起草了批语一同呈报。中央书记处于1955年12月15日将此文件批转全国县团级以上党委。

《报告》列举了“丁陈反党集团”的罪状有四点：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派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帽子很大，但却没有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

父亲被作协“肃反”领导小组的康濯与张僖同志持逮捕证逮捕审查，到宣布自由， 前后共280天左右。后来，康濯与张僖执行中央肃反小组指示取消逮捕时，又说不是逮捕， 而是“隔离审查”。1956年5月11日，中央十人小组宣布解除隔离，从通知下达， 到5月22日通知到父亲本人，中间又被作协某些人无故拖延11天，父亲也就毫无理由地多被扣留了11天。看来，这些人心目中根本没有法制意识与组织观念。

5月24日，父亲在中宣部党委会所召集的小型会议上，作了3个小时的陈述。当时中宣部党委邀请刘白羽与作协支部书记阮章竞等人出席。中宣部党委书记李之琏同志提出要父亲把以上的陈述写成书面的材料，于是就有了这份《陈述书》。事后党委会请示张际春同志，并根据组织程序，将《陈述书》与丁玲的《申诉书》一起作为绝密件打印发给中宣部长、副部长与党委书记、副书记，以供讨论研究。

还在父亲被关押的时候，作协就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将父亲开除党籍。报告送至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处，小平同志指示，事情尚未结论，先不要忙于处理。随后中央十人小组指示解除父亲的“逮捕”，党籍问题也

就搁置下来。

1956年6月28日， 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讨论了“丁陈”的申诉，决定成立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同志为组长的审查小组，成员主要有杨雨民（作协书记处书记）、刘白羽、张海（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党组副书记）等人，重新审查所谓的“丁陈”

一案。经过慎重的调查，最后得出了此案不能成立的结论。周扬等人迫于确凿的事实，也不得不同意这一结论。

1957年6月6 B，周扬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作了传达，并且承认没有查对清楚事实向中央报告不对。本来事情到此应该算是完满解决了，但是，在传达过程中，与会的同志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使周扬等人无法回答，周扬匆匆宣布暂时休会。

休会期间，形势发生了变化：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运动开始。作协某些领导看到机会到了，迅速将无法解决的“丁陈”一案转向“为‘肃反’翻案”的新罪名，把丁、陈与对迫害“丁陈”不满意与不同意的几十个人统统打成了“右派”或同情“右派”给予处分。这还不算，到1958年秋反右补课时，甚至连同中宣部里不同意他们意见，而按实事求是原则办事的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等人，即党委书记与三个副书记都打成了“反党小集团”，并分别划为“极右分子”、“右派分子”与“反党分子”。而他们的所谓罪名，是包庇“丁陈”，为“丁陈”翻案等等。

具体说起来有：黎辛鼓动陈企霞写《陈述书》，李之琏到处散发《陈述书》，影响极坏等等等等……

今天，人们再来读这份《陈述书》，不仅可以了解到解放初期文艺界内部的许多矛盾和真实情况，而且也可以深切领会到：在一个没有民主，个人说了算和缺乏法制意识的环境中，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是多么的不正常，它会给人们带来多么大的不幸！而从《陈述书》呈递后事件发展的后果看，负有领导责任的个别人以自己的意志和意气处理事情又会给党的事业造成多么大的损失。在他们的眼里，李之琏等人听取陈企霞的申诉是“鼓动翻案”，而刘白羽等人复查“丁陈”案件却是正当工作？这完全是颠倒事非！1978年末，党中央政治局批发的对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一案的复查结论，盖了红色图章，清清楚楚地说明“是一起完全搞错了的案件”，李之琏等人当时是“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肃反、审干方针、政策”

的，这一案件的定性材料都与事实不符。党是正确、光荣、伟大的，党是实事求是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手头父亲的这份陈述书，是他刚被解除隔离后，身体状况、精神状况和情绪最不好的时候写的手稿原件。他受了委屈，却没能听取全部揭发，也无法看到作协党组向中央报告他反党的文件，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正面为作协某些人背着他对他的栽赃式的“报告”作出辩解和申诉，他的陈述意见也就与报刊上对他的批判不太吻合。父亲的《陈述书》底稿字迹小而潦草，很多地方难以辨认，因为是历史原件，我无权改动和臆测，有些实在认不出的字，就只好空在那里了。

1996年11月6日于北京

坎坷人生路

黎 白

——陈企霞逝世十周年祭

陈企霞同志逝世已经整整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依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希望这篇纪念短文，使读者能从中对企霞同志的精神、品德有所了解。

一

1945年10月，我住在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的解放饭店。我那时在城工部工作，城工部长刘仁也住在解放饭店。

一天上午，刘仁找我谈话。他用乡音很重的四川话对我说："你考虑一下今后的工作吧，是留在城工部还是回北平呢？还是留在张家口继续读书呢？"

我全家都在解放区，我不打算留在城工部再回北平了。就问："在哪个学校读书？"刘仁说："你挑！行政干校，白求恩医大，抗大，华北联大全可以。"

我向刘仁提出可不可以去华北联大文艺学院？

刘仁一口答应了我，并且说：城工部原来的一位同志叫夏力民，现在是文艺学院音乐系的学生，让她带我先到文艺学院看看，自己去选择入哪一个系，定下来后，城工部负责向学校推荐。

过了几天，夏力民领我来到东山坡。一片红房子座落在山坡上，当年是日本侵略军的营房，如今已是联大文艺学院的院址。

夏力民介绍情况说，文艺学院刚刚组建，只有文学、美术、戏剧、音乐四个系，学生很少，还有一个联大文工团也住在这里。

她领我走进一间日式屋子，只见一位穿着灰棉衣的中年人，瘦瘦的，戴着眼镜，正背着手来回走着。看见我们进屋也没有停步，冷漠的眼光从眼镜片透出来盯了我一下，没有说话，也没有笑容，我心里"扑

通”了一下，心想，这个同志好严厉，千万别是文学系主任。

“陈企霞同志，文学系主任，认识一下。”夏力民笑着介绍说。

我感到失望了。文学系主任怎么这么冷冰冰的？我鞠了一个躬，没有吭气。

夏力民走了，屋里剩下陈企霞和我了。我怔怔地站在门口。

“坐！”陈企霞一指椅子。

我坐下。

“你多大了？”陈企霞背着手，站在我面前。

“15岁！”我心里又一阵紧张。心想，年龄是稍微小了点儿，高中又没毕业，八成儿没希望了。

“读几年书了？”陈企霞神情依然冷漠。

“高中二年级。”我低声回答。

“唔！”陈企霞点点头，看了我一眼，眼角似乎多了几条皱纹，算是笑意吧！

他又踱起步，“看过什么文学作品？喜欢谁？”

“看过鲁迅、茅盾、老舍的作品，也看过武侠小说。”

“看没看过《红楼梦》？”

“没有。我不喜欢看言情小说。看过《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也看过（水浒》、《西游记》。”

没有想到，陈企霞停下脚步，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我吓了一跳，怔怔地看着他。

他突然止住笑。说：“写一篇文章，题目叫《我与文学》，明天送来！”

我答应着，站了起来。

第二天，我按时把《我与文学》交给陈企霞。他坐在那里仔细地看了一遍，朝我点点头，眼角上似乎又多了几条皱纹，说："好吧，明天把行李带来吧！住在一组，组长叫李炳川，明天到我这里来。我领你去！"

我就是这样进了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

二

文学系的政治空气很浓，民主空气也很浓。这两种空气并存，本属平凡，却又极为可贵。

1946年4、5月间，文学系同学在一次学习讨论会上自发地展开了一场极为激烈的大辩论。同学赵克前是东北籍，来系学习时间不久，他在时局座谈会上发言讲到苏联红军于1945年秋出兵我国东北进攻日本侵略军时，曾经奸淫掠抢，酗酒打人，因此，苏联红军也并不都是好人。东北人民对"小鼻子"（指日本侵略军）恨之入骨；对"大鼻子"（指苏联红军）也没有好感。这个发言引起了来自延安及其它解放区的同学们的极大愤怒，立予驳斥。其它来自平津的同学大部分赞同这种驳斥，认为是反苏反共的言论。赵克前坚持自己的看法并又举了许多苏军暴行的事例。少数东北籍的同学表示赵克前的看法正确，事实也准确。另一些东北籍的同学虽未敢公开赞同赵克前的意见，但私下里却表示赞同，认为延安等地来的老同志那种不管事实真相如何，就无名火高千丈和严厉驳斥的态度是以势压人。又感到由于大部分同学那种忿慨和强烈反驳的态度，赵克前同学的处境大为不妙，很有可能被院系领导作为反动分子而处理。

我当时并不知道苏联红军在东北如何。但我倾向于延安来的同学那种驳斥。认为我们这里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好，苏联也是共产党，怎么能坏呢？

八路军好，苏联红军怎么能坏呢？可想到赵克前会被抓起来，也有些同情，认为他是东北人，有他的亲身感受，大概不敢在这里公开造谣吧？

经过两三天激烈的大辩论，在人心不定的时刻，系主任陈企霞在做结论时却说："赵克前同学的看法，是可以讲出来的，言者无罪。个别苏联红军犯法也是存在的。

但是，对联共党，对斯大林同志还是要有正确认识。许多同学的忿

慨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是民主讨论，不能忽视事实，也不能给赵克前加什么罪名。对他进行思想上的帮助，使他能全面认识问题是必要的，如果对这种发言定什么罪就不应当了。”

赵克前当场掉了泪。

经过这次大辩论，人心大定，同学们敢于无所顾忌地谈出自己的看法了。

这次大辩论，使同学们对系主任陈企霞产生了由衷的敬佩。

三

1945年底至1946年5月， 我们文学系和整个联大一样，除了本身的学习之外，用了很大精力投入了边区的建设和政治生活中间。我们全校热烈地投入了边区临时参议会的选举热潮，有一些师生投入了市内的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的斗争，文工团则上演了《白毛女》等剧，唤起解放区民众的觉悟，同时也给予民众很高的艺术享受。

不久，张家口失守，联大撤退到冀中束鹿县的农村。陈企霞要求每个同学在村里最少要交三个农民朋友，要向他们学习，要观察他们的生活、性格、作风，了解和采集民间传说、民谣，每周要写一篇人物特写交给老师。还决定由同学主编两个刊物，一个是《文学新兵》，由同学将自己的创作交给由同学担任的编辑，择优选登，手抄后以墙报形式挂在村子里显著的地方，每月一期。稿件还要评议，陈企霞、肖殷在讲课中对这些稿子的评论是极其严格的，有时会毫不留情的把同学某一篇文稿指责得体无完肤，却又不能不使同学们认为指责是有理而中肯的。对优秀的稿件，他们则交地方的一些报刊发表。另一个刊物是《街头诗》，每月出刊两次，同样是手抄后挂在村中墙上，并且请村中的干部、小学教师、学生投稿。这种生活、创作、讲课、办刊物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是很有效的，许多同学受益终生。像同学徐光耀、李兴华、徐孔、陈淼、白石、闻功、鲁煤、李克、鲁芝、刘朝兰、唐因、刘剑青、丁浦等等都是两个刊物的积极投稿者，后来，他们大多成了作家、记者，都能坚持以文艺为武器战斗了几十年。

1947年新年刚过，同学们就分三批出发了。一批到野战军随军参加战斗；一批参加了土改的复查斗争；一批到冀中一些县深入农村开展艺术活动，一方面采风，搜集民歌、民谣、民间故事、地方戏曲等等，一

方面帮助县、村剧切、民校培养文艺骨干，教跳秧歌舞、作曲、表演及一般创作方法。这三项活动先后都进行了近三个月，使很多同学开始养成深入生活，向人民群众学习的习惯，对后来从事文艺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

文学系的同学，先后入学的时间不同，依当时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对干部的需要，毕业的时间也不同，是陆陆续续不断分配到其它单位的。每当有一批同学被分配离系，大家都曾十分珍重地互相勉励胜利后再相会！

1949年夏，文学系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了盼望已久的胜利后的欢聚盛会。系主任陈企霞和何洛、厂民、肖殷、蔡其矫、熊焰等老师，在华北党政军文机关部队工作的原文学系同学几十位纷纷从前方、后方来到北京欢聚一堂。

聚会的气氛热烈感人，聚会的形式却是很简单的，拼起来的桌上只摆着花生、瓜子，糖果和茶水，师生们久别重逢，喜悦、激动中却也有着一些遗憾。座谈中，不少同学发言讲到毕业后做着与文学毫无关系的工作，有的同学甚至提出来请陈企霞设法能把他调到文学工作岗位上来。

陈企霞本来一直是难得笑逐颜开的，但是听了这类发言之后，他恢复了往日同学们十分熟悉的严肃神色，他脸上没有了笑容，手插在口袋里，站起身来回踱着快步。

漫谈之后，大家欢迎陈企霞讲话。但，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讲话却是如此严厉。

他说：“文学系教育学生的标准，第一是做一个完全彻底的革命者，第二才是文学。文学系所教的文学只是起步，真正能为工农兵服务，首先要长期投入火热的斗争中间去，积累生活，提高水平，不然是谈不上搞文学的，我们没有空头文学家。

所以，不是应该想调动工作，而是努力地、无条件地做好本职工作，不安心自己的工作，就不是一个合格的革命者。我希望同学们首先把组织上交给你们的工作做好，利用一切条件密切注意生活，多学习、多实践、多读书，可以在工作之余写一些作品。现在就想当文学家，我

可以这样讲，多数人远远不具备条件。要像列宁讲的那样，先甘心当一个螺丝钉！”

以陈企霞在同学们心目中的威望，他的讲话尽管严厉，却使许多同学心悦诚服。

谁料到八年之后，即1957年“反右”开始，第一个轰动全国的就是“揪出”了一个“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而文学系师生这次胜利后的聚会也被定为陈企霞纠集反党宗派小集团的一个吓人的罪状。仅我自己，这个“罪状”就跟随了我20年。

五

1957年“反右”开始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揭发、批斗时，我在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任创作员，与文学系同学徐光耀都在创作室受到揭发和批判，主要“罪行”是“丁陈反党集团”在部队的骨干。不久，徐光耀被划成右派，我也受了处分。但在本单位受批判的同时，还允许我们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陈”及冯雪峰、艾青等。在几十天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我听不出了陈冯艾反党罪行和反党活动在那里，有人把联大文学系和中央文学研究所都形容为丁玲、陈企霞搞反党宗派的地方，我做为文学系的学生有着亲身经历，当然不信。

可是另一方面，使我又不能不相信当时在会上揭发批判丁、陈的一些事情。因为揭发者是我素来敬仰和比较熟悉的文艺界老同志，有的还是以当事人的身份揭发的，导致我对丁、陈，特别是对陈企霞的看法也有改变。真正觉悟到“丁陈反党集团”是被制造出来的，以及一切都是“打”、“揪”出来的，是十年“文化大革命”

的“启发”，走资派无所不在，“横扫一切”，使我悟到今日之非，也悟到昨日之非。

六

反右之后，我受了处分，总政创作室也已解散，我被下放到昆明军区，十三军三十八师宣传科工作，以后奉命参加编写《红二方面军战史》，1962年调八一电影制片厂，“文革”中在劫难逃，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近20年，没有和陈企霞同志联系过。

1979年底或1980年初，陈企霞到北京来参加文代会，我到和平门外

陈企霞住的饭店去看望了他。

他显得又老又瘦，但外形没有变，精神似乎也很好。那严厉的目光不见了，握着我的手，吃力地说：“对不起你们，因为我，让你们受了株连。”

我呐呐地说：“没有丁陈事件，我也还是要挨整的，我当时还有两条大罪，一条是恶毒攻击赫鲁晓夫；一条是赞同费孝通那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文章，在发言中把费孝通称呼为同志。”

他说：“称同志并不错嘛！”他的眼里又闪出严厉的光。我想，20年的“改造”

到底是抹不掉他的锋芒啊！

这次会晤，我们都没有互问20年来的经历，或是都在回避，或是尽在不言中了。

不久，陈企霞同志调回北京，一家人住在团结湖小区。这期间，他约我到他家大约有四五次。

企霞是老了，他已经不再来回踱步，也很少有突发性的大笑了。有一次，他要我去，他说：“我请你来，是想认真和你谈谈。”

他郑重地向我提出，希望我在今后的一二十年里写出两部长篇：一个是写我们湘潭黎家，一个是写写联大文学系。对此，我毫无思想准备，当时我就提出，我所掌握的资料和我的写作平，很难完成这两部长篇。我特别提出，在文学系教学中，一强调为工农兵服务，而这两个题材都是写知识分子的，这是否偏离了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向呢？

他似乎恢复了系主任的严肃，说：“那是不全面的教育。歌颂工农兵是必须的，正确的。忽视了写知识分子是不对的。大家都认识得晚了很多年哪。你的大伯黎锦熙，二伯黎锦晖“五四”以前就是高举新文化运动大旗的勇士，你四伯黎锦纾是大革命时期在德国入党的，和朱德总司令在一个党小组。你的老辈中很多人是我们文化艺术科学界的代表人物，以他们为主要人物写出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有很大的意义，这是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啊。”

使我深为触动的是尽管他经受了20年的冤屈，而他的观念，对革命

的热情，对文学为人民服务的执着却毫无改变，老而弥坚，内心充满激情。我觉得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过去是师生之谊，只有崇敬，却说不上了解，现在仿佛对企霞了解得深了一些。

后来，一位同学因为要证明在文学系学习是参加革命，找到我，要我给他所在单位写一份证明，我答应了，但认为如果能当年系主任陈企霞写一份证明会更有力，我们俩人就去拜访企霞。

陈企霞明显的削瘦和衰老了，走起来也显得步履维艰了。我将这个同学的来意讲明以后， 没有想到， 他一下子从沙发上站起来，脸色极为难看，暴躁地大骂：“这个组织部门都是白痴吗？晋察冀华北联大是从抗日战争就建立的大学，还不是参加革命？混帐已极，革命的基本常识，基本政策都搞不清楚，他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半响之后，他叹了口气说：“好，我写个证明吧。我这个几十年前的文学系主任写的证明管不管用，可就难说喽！”

他立刻写了证明，而且郑重地盖了印章，说：“我再写封信给作协党组，请他们证明一下我的可靠性，也请他们写公函并盖章。不然，那个混帐组织部门还认为我陈企霞是个大右派呢！哈哈……”他又突然爆发出一阵令人心悸的大笑！

我明显感到企霞同志的脾气大变，喜怒无常了。他的变，我以为主要不是年龄老了，而是压抑着不愿人知的苦闷。我们这些学生是无法启齿，也无法帮助的啊！

所以，同学们看望企霞的次数大为减少了。直到突然接到同学的通知说企霞已经住入协和医院，并且报了病危，要我们赶去看望。

我和同学徐孔赶到病室的时候，他已经处于弥留状态了。

一位久经考验也久历坎坷的共产党员，文艺战线上的老战士与世长辞了！

[image]

[image]